

中州大学学报

ZHONGZHOU DAXUE XUEBAO

双月刊

《中州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白仲虎

副 主 任 张建伟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莉 万陆洋 王 代 王宇飞 王 菲 王焕锋

叶大萌 白仲虎 冯 美 吕志元 任 珂 刘 戈

刘海燕 刘秋菊 杨庆年 李玉玲 吴 炯 张 军

张枝梅 张建伟 陈凤菊 姜冬梅 姚 虹 徐自立

徐传波 郭 凯 曹发军 焦红波 谭笑风

主 编 张建伟

执行主编 曹发军

副 主 编 李玉玲 刘海燕

封面题字 陈 云

执行编辑 刘海燕

中州大学学报

双月刊

第 43 卷 第 1 期

2026 年第 1 期(总第 186 期)

目 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以文学回应现实

——论中国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立场 刘宏志,李思妍(1)

论金圣叹的援画论入评点 刘 芳(7)

· 经济与管理 ·

基于超效率 SBM-Malmquist 模型的河南省新质生产力效率评价 王 菲,许以撒(12)

数智化赋能国家审计:审计人员数智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 孙 姣(19)

制度激励与学科协同:高校收入分配体系的演化逻辑与优化路径研究 高 深(26)

健康中国 2030 视域下构建高质量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 侯艳丽(34)

融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困境及破局策略研究 李 柯(40)

· 政治与法律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系统性建构 王 彤(46)

论动产抵押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 王惠敏,邵其琪(52)

· 社会与历史 ·

周恩来与抗战胜利后中共苏联关系的嬗变

——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龚 宇,杜俊华(62)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收入、工作条件与阶级意识的历史形塑

——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中心 王梦楠(69)

2026 年 2 月 20 日出版

號文化的区域特征及活化传承研究 冯乐辉(75)

· 传媒与艺术 ·

90 后作为年代剧的“主角”

——电视剧《北上》的文学改编及文化张力 余宗霖(80)

失衡 or 共振？自媒体述评中官方与个人话语权的变革 刘英翠,孙畅泽(85)

· 教育与教学 ·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重点内容及实践路径 王自芳(91)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筑牢高等教育强国之基的实践路径探索 王丽丽(96)

新时代“大思政”理念的应然图景与实践指向

——基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分析 张党诺(102)

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分层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王明风(107)

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以郑州轻工业大学为例 赵建波,秦肖雲,田 宽,李亚坤,彭东来,张晓静(112)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某跨江既有桥的拆除及新建桥梁的设计 黎述亮(118)

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制备及其凝胶性能研究 段冰潮,屈灵鸽,王紫薇,王 丽,徐梦真(123)

JOURNAL OF ZHONGZHOU UNIVERSITY

Bimonthly Vol. 43 No. 1 2026 (Serial No. 186)

MAIN CONTENTS

Responding to Reality with Literature

——On the Realistic Stand of Chinese Industrial Literature LIU Hongzhi, MA Huanxin(1)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Super-Efficiency SBM-Malmquist Model WANG Fei, XU Yisa(12)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National Auditing: A Study on the Path to Enhanc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Auditors SUN Jiao(19)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 WANG Tong(46)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for Normal Operating Buyers in Movable Property Mortgages

..... WANG Huimin, SHAO Qiqi(52)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Soviet

Archives GONG Yu, DU Junhua(62)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haping of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February 7th" Strike—Centered on the Jinghan Railway Workers WANG Mengnan(69)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s the "Protagonist" of Era Drama: Literary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TV Drama *Northward* YU Zonglin(80)

Value Implication, Core Content, and Practical Paths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WANG Zifang(91)

Exploration on the Practical Path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Educators’ Spirit WANG Lili(96)

Preparation and Gel Properties of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 DUAN Bingchao, QU Lingge, WANG Ziwei, WANG Li, XU Mengzhen(123)

以文学回应现实

——论中国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立场

刘宏志,李思妍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以工业题材短篇小说为标本纵观中国工业文学,可以发现,百年来中国工业文学的叙事主旨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1950—1978年,1979年以来。这三个阶段分别写出了中国工业的艰难生存及工人的挣扎和反抗,中国工业的发展及工人地位的提高,新时期以来中国工业经历改革的阵痛以及在阵痛中的发展。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立场,彰显着鲜明的人民性特质。

关键词:工业文学;短篇小说;现实主义;人民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01-06

自现代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以来,仅数百年时间便深刻重塑了全球的发展格局,推动整个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变革。在世界工业化漫长的演进历程中,中国工业的发展路径有着独有的特点:一方面,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迈向工业社会的步伐晚了一百多年,且起步时十分艰难。1949年,在西方国家成为发达工业强国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另一方面,中国却在之后的历程中,坚持发展工业,到21世纪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制造大国、工业大国。中国工业的这些特殊性,以及中国工业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在百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呈现。

纵观百年来中国工业题材短篇小说,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鲜明特征——对时代工业现实状况的敏锐关注。上述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如中国工业早期发展的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业、工人地位的提高,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工业发展的阵痛,新世纪以来工业的突破,都在百年中国

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中呈现了出来。

一、中国工业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呈现

文学中蕴藏着历史,或者说,文学是历史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把横跨百年的中国工业题材短篇小说通读下来,在为不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变化而感慨唏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百年来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一步步地崛起,感受到在中国工业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工人命运的巨大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作家们写出了不一样的中国工业状况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工人形象。按照作品风貌的不同,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以前的工业题材小说,“十七年”及新时期前夕的工业题材小说,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划分,是因为这三个时段的工业文学存在各自相对一致的工业状况书写和工人形象建构。

1900—1949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多集中呈现旧中国工业的孱弱,塑造了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工人形象。我们所见到的第一篇工业题材小说是

收稿日期:2025-09-1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主题小说研究”(2023BWX021)

作者简介:刘宏志(1976—),男,河南延津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柳亚子的《劳动狱》，该小说发表于1905年，讲述三个女工找到工厂管理人员，要求涨薪，结果反被该管理人员押送至官府，痛打五百鞭的故事。小说中的工厂管理人员是中国人，但因他是英国国籍，在面对官员时，就可以不用下跪；在他眼中，在工厂工作的同胞，不过是“贱种、猪狗”。小说末尾，叙事者又说，上述故事，“皆劳动界实事，稍以我悲愤之笔渲染之耳，原案见癸卯年某日报，犹依稀忆之，惜忘此厂之名与其日月……”^[1]从艺术角度来讲，这篇小说显然不够成熟。人物形象也不够生动、丰富，带有明显的概念化痕迹——作家想要表达的意图，都是靠叙述者直抒胸臆地陈述出来的。不过，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工业题材小说的整体风貌，即基本呈现出了工厂主的霸道、官员与资本家的互相勾结，以及在多重压迫、剥削之下的工人的痛苦生活，也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工业的孱弱。

总体而言，在1949年之前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所书写的工人主要是纺织工人、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在码头、盐场等地方从事苦力劳动的工人。从这类小说主人公的工种及劳作情况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工业的落后，而小说所书写的工人的痛苦生活及其抗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1949年以前工人的生存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工业题材小说，大致有以下几类主题：

其一，书写官僚、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以及工人在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如上述的《劳动狱》，以及丁玲《法网》、曹靖华《女工话》、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庐隐《灵魂可以卖吗？》、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张天翼《一件寻常事》、刘一梦《失业之后》、企翁《欧战声中苦力界》等，这些小说写出了官僚、资本家以及他们的爪牙对工人的残酷压迫，也写出了工人生计的艰难和绝望。妻子生病，而丈夫却失业了，无力为妻子治病，便酗酒发疯，最终，丈夫为了不让妻子继续受病痛的折磨，给妻子喂下了毒药，这正是张天翼《一件寻常事》所讲述的核心情节，深刻凸显了工人生存的绝望。即便暂时生计尚可的工人，他们的生活也可能被一个意外事件打破，如《欧战声中苦力界》中的王二，原本在码头靠出卖苦力，勉强能支撑家里的生活，可是遥远欧洲的战争，却直接导致他失业了。在《法网》中，原本生活还不错的工人顾美泉、阿翠夫妻，仅仅因为阿翠和王婆婆的一点矛盾，便引发了一系列后果，直接导致了

顾美泉、阿翠夫妻以及邻居小玉子的惨死。资本家与官僚的残酷压迫，工人生计的艰难，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与揭露。

其二，书写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反抗。如麦克昂（郭沫若）《一只手》、华汉《马桶间》《十姑的悲愁》、戴平万《小丰》、孟超《路工手记》、建南（楼适夷）《盐场》、冯铿《突变》等小说，都呈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成长以及反抗的过程。在《突变》中，原本对生活麻木、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女工阿娥，在目睹富人的奢靡消费、认清阶级差异后，阶级意识逐渐觉醒，不再将未来寄托于宗教，而是投身工人运动。《路工手记》则以日记体形式，详尽地写出铁路工人为了反抗军阀的奴役而举行大罢工的过程。显然，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在这些小说中也得到了反映。

其三，也有一些书写以乐观向上为基调的作品。如汪剑虹《苏家布》、鲁煤《双红旗》，前者讲述天津布商在外国布匹冲击市场的背景下，锐意革新，最终占领市场，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故事；后者则是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落后工人在解放区成为劳动模范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苏家布》是作家在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而真实的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实则步履维艰。《双红旗》这类作品就其风貌而言，可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题材小说的先声，却显然不属于1949年以前工业题材小说的主流。

总之，对工人痛苦、麻木生活的呈现以及对工人觉醒、反抗过程的描述，是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重要主题。

1950—1978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则更多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基础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对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强调，显然都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风貌。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不再仅仅是纺织工人和煤矿工人，炼钢工人和造船工人也在小说中出现了，这显示了中国重工业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地发展。如陆俊超《国际友谊号》，写的便是海洋上的水手，在书写中国工业发展的同时，凸显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无论是主题表达，还是小说的风格、基调，相比较1949年之前的工业题材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小说基调来讲，相比较1949年之前工业题材小说的悲凉，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洋

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就小说主题来讲,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着重强调新旧社会的对比,强调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奉献精神。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工人生活的对比,来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主题,是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中比较常见的模式。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周嘉俊《包身工的后代》、唐克新《第一课》等,都存在一个新旧对比的主题。《包身工的后代》通过女工戴凤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工作状态的对比,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工人是奴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是国家主人,以及工人对党和国家的热爱这类主题。强调奉献精神,强调工人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是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南丁《检验工叶英》、张弦《上海姑娘》、陆文夫《荣誉》、徐俊杰《女车间主任》、艾明之《竞赛》、杜鹏程《年轻的朋友》、舒群《在厂史之外》等,虽然设置的故事矛盾点不一样,但共同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工人们都表现出自觉的国家主人翁精神和奉献精神。《检验工叶英》和《上海姑娘》这两篇小说,写出了年轻的质检员为了国家利益,不顾情面,严把质量关的故事;《荣誉》《竞赛》《女车间主任》以及费礼文《竞赛没有结束》等,写新社会的工人们不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首要考虑,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故事。这些小说中的工人都显示出鲜明的国家主人翁精神。这种国家主人翁精神的强调,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非常有特点的捍卫国家利益的青年工人形象,如叶英(《检验工叶英》)、白玫(《上海姑娘》)、寇金童(《在厂史之外》)、沙桂英(《沙桂英》)等,这些人物形象,毫无疑问,都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非常有特色的典型形象了。

相比较前两个时期小说风貌的相对单一,1979—2020年的工业题材小说面貌显得驳杂多变,这和时间跨度相对更长有关,也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启市场经济。在这个背景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被推向市场,要参与市场竞争;境外资本也开始纷纷在大陆设厂,私营经济开始发展。这些直接影响了工人的工作和生存状况,一方面,工厂被推到市场中去,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于是工厂也纷纷改革,对工人实行绩效考核,工人也开始竞争上岗;另一方面,随着境外资本纷纷在大陆设厂,大陆也开始出现和之前迥然不同

的工人,当时被称为“打工仔”或“打工妹”。他们从事着工厂里传统工人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编制,没有铁饭碗。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允许国营工厂破产,在这个过程中,私营企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工业的发展模式也随之改变。同样,因为国营工厂的破产,体制内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发生变化。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对时代的转折,对工业生产和发展模式的变化都进行了敏锐的回应。如针对20世纪80年代汹涌而来的改革大潮,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三千万》等,直接书写时代的改革需求,以及工厂在改革中艰难前进的境况。针对境外资本进入大陆设厂、新的工人出现这种现象,有以张晓明《下一站》为代表的作品。当时,“打工作家”的作品,大多直接写新时期以来最早的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面貌。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深化改革,中国工厂面临的巨大压力,李佩甫《学习微笑》、肖克凡《男工张义》、隆振彪《卖厂》等,写出了工厂在市场经济中的困境,以及工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拼搏。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题材小说对工人形象的塑造。如黄静泉《过年》、李铁《水边的阿迪利亚》,写工人之间朴素而真挚的感情;郝随穗《王的记性》、张西祥《一个小站两个人》、邓仁宪《异情》,写工人对岗位的热爱与对工作的责任感。在《过年》中,普通煤矿工人玉香,过年时,首先不是回自己家,而是和一位因患矽肺病死亡的矿工的孤独遗孀共度除夕夜。在《王的记性》中,“王”作为一名普通工人,他似乎记性很不好,家里的事情总是忘东忘西,可工作上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忘记过一次。在《一个小站两个人》中,老马和肖强,先后坚守在一个荒凉的小站,将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通过对这些工人形象的塑造,作品既呈现了工人的优秀品质,显示出工人之间的大爱,也表达了即便在市场经济时代,这些看上去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工人也依然是国家坚实的基石。

总体来讲,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很难简单概括。就其题材内容而言,既有表现工厂在市场化浪潮中艰难改革的《乔厂长上任记》,也有书写私营经济发展、收购国营企业现象的作品,如隆振彪《卖厂》、毕四海《最后的资本家》,还有呈现不同时代工人生存状态的,如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王十月《开冲床的人》、黄静泉《过年》等,不一而足。就小说叙事的基调而言,既有改革开放初期虽面临诸多问题却仍积极

进取、蓬勃向上的朝气,亦有深化改革过程中对国企被兼并现象进行反思的沉郁,更有工人之间互相扶持的温暖。小说塑造的工人形象,既有改革开放时锐意进取、努力进步的青年工人,也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艰难前行、寻找自己发展道路的下岗工人,还有在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上不计名利、不计得失默默付出的劳动者。当然,新时期工业题材小说风貌的复杂性恰恰说明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繁荣——正是百花齐放的文学环境,才造就了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的繁荣局面。

回顾百年来中国工业题材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同阶段的工业题材小说风貌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当时的工业状况及工人生活境况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工业在帝国主义挤压下艰难发展,工人在劳动中蕴藏着反抗的怒火,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因此充满悲怆与愤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工人被确立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也洋溢着昂扬热烈的气息。新时期以来,中国工业在阵痛中前行,也造就了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小说斑驳多样的风貌。从小说与时代的呼应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对现实工业状况的密切关注。

二、中国工业文学的现实主义立场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升在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时,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点。他在援引谷崎润一郎、金子光晴、宫本百合子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后指出,这些学者“虽然表述方式各不相同,但把与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处的现实‘苦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来认识,并且与之发生共鸣。而且金子光晴还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特色中蕴含着纠正日本文学弱点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很想让中国的同行们知道”^{[2]137}。毋庸置疑,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也具备这一鲜明特质。事实上,从早期柳亚子《劳动狱》、指严《猪仔还国记》,到中期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孟超《路工手记》,再到新时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三千万》、李佩甫《学习微笑》、王十月《开冲床的人》等,我们不难发现:与时代共鸣、与人民共情,是中国工业题材小说非常鲜明的特征,而现实主义则是其始终坚守的立场。其现实主义立场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对艺术手法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选取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是工业题材小说突出的特点。如果说早期的工业题材创作还受制于时代的局限,作家没有强烈的艺术探索意愿,那么新时期以来,在作家们积极开展艺术形式探索的背景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依然更多地强调采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新时期以来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工业题材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这种艺术手法的选择,或许和作家的个性有关,也和作家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中国工业变革现实的作家,或许都是带有强烈现实主义气质的人。丸山升谈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把艺术家分为两种人:“第一种是把全部生活都投入纯粹的艺术境地中去的人,不管与周围的生活如何隔绝,他们都毫不在意。与此相比,第二种艺术家如果不对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世界加以关心就活不下去。”^{[2]137}从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强烈关注工业发展现实、进行工业题材写作的作家,其实都是有岛武郎所说的第二种艺术家。他们如果不对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世界加以关心就活不下去,这种立场会影响到他们的艺术观念——强调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

其二,对时代大势的密切关注。由上述可见,工业题材小说家显然都是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作家。因此,时代的变革,尤其是中国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在工业题材小说中都得到了呈现。从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冲击(《苏家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工业体系的建设(《女车间主任》)、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对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陈冲《小厂来了个大学生》),以及深化改革背景下私营企业的发展(《最后的资本家》)。从中国工人运动历程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沙基惨案(《小丰》)、省港大罢工(《十姑的悲愁》)以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路工手记》)。从中国工人命运变迁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在海外被资本家当作奴隶一样剥削的华工(《猪仔还国记》),旧社会工人痛苦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一件寻常事》),工人的觉醒与反抗(《盐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们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生活(《包身工的后

代》),改革开放后工人们对新生活的追寻(陈建功《丹凤眼》、航鹰《明姑娘》),煤窑工人辛劳却充满人情味的人生(刘云生《爱》、刘庆邦《班中餐》、黄静泉《过年》),以及市场经济大潮下工人重新定位人生、选择自身人生方向的历程(《学习微笑》)。某种程度上而言,工业题材小说就是一部中国工业发展史、中国工人命运更迭史与中国社会变迁史。阅读这些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百年间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看到中国工人命运的变迁,更能感受到百年来时代脉搏的跳动。

其三,始终坚守人民性。在较早的工业题材作品如柳亚子《劳动狱》、指严《猪仔还国记》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作家始终对工人的苦难与生活状况充满关切,当工人与资本家等势力发生冲突时,作家总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普通工人的立场上,对资本家等压迫者进行激烈批判。事实上,这种对人民性的坚守,也是百年来工业题材小说的共同特点。在焦木(恽铁樵)《工人小史》、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孟超《路工手记》、冯铿《突变》、楼适夷《盐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系列小说中,面对工人生活的困苦、生存的艰难与无望,作家一方面对工人生活状况表示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指出导致工人生活困难的根源,批判资本家、军阀及各类统治者,并明确指出革命才是工人的前途所在。如在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中,小说借助一个贫困劳动者的死亡,批判了这个时代的贫富对立、富人对穷人的压迫,且含蓄地表达出,世界上的穷苦劳动者本是一家人。在楼适夷《盐场》中,作家虽对老定等劳动者的麻木进行了批判,却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工人反抗者成和,也批判了破坏盐民暴动的陆先生。在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当工人与资本方或工厂领导发生矛盾时,作家同样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工人立场上。在张伟明的《下一站》中,青年工人面对来自香港资方代表的无理指责,毫不犹豫地主动离职,以捍卫自己的尊严。在毕淑敏《女人之约》中,声名狼藉的女工郁容秋为了获得各方面的尊重,主动承担起替工厂要账的重任,最终让工厂度过难关,自己却因此患上癌症,奄奄一息。她最终的要求,只是希望厂长能给她鞠一躬,让自己感受到真正被尊重的滋味。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厂长却食言了。从小说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对郁容秋这个声名狼藉的女工充满了深切同情。

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人,大多具有自觉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小说对工人们国家主人翁

意识的书写,亦是其人民性的一种具体表现。李佩甫《学习微笑》、隆振彪《卖厂》等小说,书写了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背景下,工厂面临破产或被私营企业收购时工人們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为保护工厂所做的努力:《卖厂》中的宋师傅,为保全工厂主动卖肾,为工厂筹措发展资金;《学习微笑》中的女工刘小水,在公公去世后,主动拒绝厂里的救济,一家人依靠自身努力在困境中奋起。这些小说与新时期以来书写工人坚守普通岗位的作品(如《一个小站两个人》《王的记性》等)相互映照,彰显出中国工人无论身处多么普通的工作岗位,都始终对国家充满感情,以国家主人翁自居,愿意为国家奉献。这种大爱精神的书写,既是对中国工人的深情歌颂,亦是工业题材小说人民性的鲜明体现。

作家的人民性立场,不仅表现在对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上,还表现在他们总是以热切的目光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力图为国家发展、民族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家们在热情歌颂工人们主人翁精神的同时,也在为国家的未来喝彩。新时期以来书写改革的工业题材小说,例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三千万》、陈冲《小厂来了个大学生》等,都对损害人民利益、损公肥私的领导进行了批判,对主动承担重任、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领导进行了歌颂^[3]。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主动放弃权力大责任小的肥差,到问题重重的重型电机厂担任厂长,进行改革。因为,乔光朴认为,重型电机厂这样的工业大厂必须承担起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责任。从乔光朴、丁猛(《三千万》)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富强的期盼。正如评论家张炯在评论张平作品时所言:“张平创作的可贵价值正在这里。他直面社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粉饰现实,甚至把现实的疮疤揭给人们看,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人民和社会生活的进步。他的作品中总是充满凛然的正气,充满对现实负面力量的控诉,令人惊心动魄,但他又非常掌握分寸。他对正面力量必然要战胜对立面总怀有充沛的信心。因而他的作品并不灰暗,它所闪耀的亮色,总给读者以鼓舞的力量。”^[4]当然,在这些工业题材小说中,有些作家不自觉地带有精英主义的立场,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工业题材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作家忧国忧民的承担意识,以及对工人热切的关注和同情。

三、结语

文学并非现实的客观实录,却能折射出时代的特质。作家的认知水平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家眼中的世界样貌,也决定着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呈现出时代的哪些方面。百年来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之所以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形成如今的格局,既是对不同阶段现实的反映,也是工业题材小说家认知和立场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少工业题材小说对当时的现实进行了去蔽和敞亮。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到蕴含在作品中的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当时多数工人对现实还没有清晰认知,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去工厂辛苦求生存,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已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资本家的批判,揭示了工人生存艰难的根本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呈现着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这是其特点,也是其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些特点,成就了中国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强烈的现实主义立场,使其能够对社会和工人生活状况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并因此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工业改革艰难推进的时候,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横空出世,引发热议,也让社会各界对改革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改革者有了

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客观上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深化改革、国企纷纷破产的情况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风靡一时,这些小说聚焦时代困境中的工厂,聚焦面临下岗的工人,写出了对工人的理解和同情,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作家们坚守的人民性立场,让他们的作品始终呈现着强烈的国家忧患意识和对工人生存状况的关注。

综上所述,紧贴时代、忧国忧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工人共进退,皆是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成就了《春风沉醉的晚上》《乔厂长上任记》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也推动了进步思想的传播,以文学艺术的视角,为百年来中国工业与社会的时代变迁留下了生动剪影。

参考文献:

- [1] 侠少年(柳亚子). 劳动狱[J]. 醒狮,1905(3):107.
- [2] 丸山升.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J]. 文学评论,1989(2).
- [3] 高露洋. 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民族国家[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 [4] 张炯. 在张平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M]//张炯文存(第10卷).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48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ponding to Reality with Literature

——On the Realistic Stand of Chinese Industrial Literature

LIU Hongzhi, MA Huan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Chinese industrial-themed short novels as the specimen to observe Chinese industrial literature, we can find that over the past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Chinese industrial literature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erms of its narrative theme: the period before 1949,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1978, and the period since 1979. These three phases respectively depicted the arduous survival of Chinese industry alongside the struggles and resistance of work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workers; and the pain of reform experienced by Chines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ain. From these works, it is evident that Chinese industrial-themed novels have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the realistic stance and have a strong people-oriented nature.

Keywords: Industrial literature; Short stories; Realism; People-oriented

论金圣叹的援画论人评点

刘芳

(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摘要:金圣叹是一位深谙画理的大评点家,在其评点中出现了大量援画论入评点的现象,其中有分析文字具有画意或绘画特质的,有用画理分析文学描写、评析艺术手法的,还有从审美感觉的相通性来看待绘画与文学作品的。此外,他将画论中的“白描”以及具有辩证关系的“落骨”与“皴染”、“留白”与“烘染”等术语运用于评点之中,以表达不同笔法的审美效果与意义,这不但体现了金圣叹本人的审美取向,而且丰富了评点理论,加深了人们对其诗法理论的理解。金圣叹援画论入评点,影响了其后的评点乃至创作活动。

关键词:金圣叹;画论;评点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07-05

金圣叹的文学评点能够取得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与其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其中,援画论入评点,从绘画理论中汲取营养,大大深化了评点的内涵,对评点理论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说:“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1]6}金圣叹诸评点著作中画学元素的全方位融入,也正是在其深悉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异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研究金圣叹援画论入评点现象,有助于把握金圣叹的审美取向及其对文学特征的认识。

一、金圣叹评点中的画论

明清两代的文学评点家们大多喜欢简单地用“画”“如画”等字眼,来形容作品中如画的自然风光描写或逼真的人物情状刻画。至金圣叹,则将画论广泛融入其评点中,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与金圣叹本身的绘画造诣是分不开的。

据清人章腾龙《贞丰拟乘》载,金圣叹“有《鱼化龙》及《大士出山图》,一细钩,一粗笔,均非凡品”^[2]。而叶绍袁(1589—1648)则曾亲睹金圣叹“画牡丹、芙蕖、菊花、水仙四幅,生色映人,墨韵飞

舞”^{[3]518}。可见,赵时揖所言非虚,“先生(金圣叹)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故论画独得神理”^{[4]98}。在多才多艺的金圣叹笔下,历代绘画大家的名字及其相关掌故,如自东汉刘褒《云汉图》《北风图》以下,顾恺之“传神阿堵”、张僧繇“画龙点睛”,以及李公麟、米芾、赵孟頫、倪瓒等,无不被金圣叹运用于评点之中,或作为装饰性的存在,或为增添读者的兴趣。然而金圣叹评点中画学元素融入的价值,却远不止于此。

金圣叹常常带着绘画的视角与思维评书。他的评点之中有分析文字具有画意或绘画特质的,如《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处有夹批云:“乃今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幅活虎搏人图来。”^{[5]421}第六十三回写林冲与花荣引军马,截住宣赞之时,“月明之下,三马相交”,金圣叹夹批道“一幅好画”^{[6]1146}。这些看似简单的评语,蕴含着金圣叹对画面感与文学语言之间深层关系的理解,也使人顿觉诗情画意相融无间。有用画理分析文学描写、评析艺术手法的,如在《西厢记·惊艳》中说:“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双文勿写而先写张生者,所谓画家‘烘云托月’之秘法。”^{[7]894}《水浒传》第

收稿日期:2025-09-18

作者简介:刘芳(1986—),女,河南中牟人,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

六十三回回批云：“写雪天擒索超，略写索超而勤写雪天者，写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画家所谓‘衬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4]1137} 金圣叹运用绘画中的衬托技法评析文学手法，即通过精心描绘次要形象来间接突出主要形象。有从审美感觉的相通性来看待绘画与文学作品的，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东汉刘褒“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8]158-159}。而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十五回回批中说：“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是有事。”^{[5]292} 他将绘画中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审美追求，融入小说评点，使文字叙事呈现出可视化的意境。也有以画论讲文学创作构思原理的，如赵孟頫画马时构思的典故，金圣叹批《水浒传》第二十二回时说：“传闻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5]421} 金圣叹将作家代入角色动作的构思过程，比作画家摹形写貌前的体物入微，揭示出艺术创作中“设身处地”的普遍法则。

如果说以上例子尚是金圣叹在评点中对画论的简单移植的话，那么他对王维七言律诗的批评则体现出画学对诗歌评点的深度融渗。如《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泉寓目》前四句“汉主离宫接露台，秦川一半夕阳开。青山尽是朱旗绕，碧涧翻从玉殿来”，金圣叹评曰：“……是写温泉，然吾详玩其四句次第，却是细细又写‘寓目’。譬如作大幅界画者，其正经主笔，本自定于一幅之居中，而其初时起手，却必自最下一角，先作从旁小景，既而渐渐添成，便是远近正偏，无数形势，一齐俱备矣。”^{[9]177} 这里，已经体现出金圣叹对王维以画家之眼作诗的洞察。王维另一首七律《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前四句“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金圣叹评道：

看他一、二，先写“渭水自萦”“黄山旧绕”，即三、四之銮舆看花、阁道留辔，宛然便在无数山围水抱之中间也。先生为画家鼻祖，其点笔吮墨，布置远近，居然欲与造化参伍。^{[9]176}

绘画是空间的艺术，须将空间并存的景物加以巧妙地布置；而诗歌是时间的艺术，要想实现绘画般的空间感，须将时间相续的情境给以文字上的有序安排。此诗一、二句先写渭水、黄山的萦绕，即是将三、四句所写唐玄宗君臣置于其中，作为人物活动的

背景。金圣叹认为正是经过王维的这种苦心经营、远近布置，方才达到了“与造化参伍”的逼真效果。王维本人就是诗人兼画家，他的《画学秘诀》所讲的就是山水画中布景位置，以及虚实、远近、疏密的安排方法。他在写诗时将这些技法运用其中，即用作画的方法来写诗，以视觉画面层次为作诗章法。金圣叹的评点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以画学眼光评诗，揭示了王维在时空交错中构建视觉秩序的匠心。

二、“白描”与“落骨”

除却画论，金圣叹还在评点中借用一些画学术语，体现他的某些重要审美取向，如“白描”与“落骨”。

“白描”是中国画传统技法，是指绘画中单纯用墨线，不加渲染、不着色彩的一种画法，其特点是笔法简洁，形象突出。最先把这个术语运用到小说批评当中的，正是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九回，林冲于大雪天杀死陆谦等人后，到林中草屋借火烘衣，因讨酒发生冲突将几个庄客打跑，众庄客又回来复仇。小说写道“却说众庄客引了二十余人，拖枪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时，不见了林冲。却寻着踪迹赶将来”，金圣叹批云：

“寻着踪迹”四字，真是绘雪高手，龙眠白描，庶几有此。^{[5]221}

又在评《西厢记》描画莺莺的简短两行文字后说：

如看李龙眠白描观音也。^{[7]1037}

这里，金圣叹虽然并未直接对“白描”作出具体解释，但其意义与审美取向却可清晰探知。“龙眠”为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之号。公麟，字伯时，其画风简洁精炼而不着色彩，是“白描”画法的代表人物。李龙眠画笔下的白描观音，在宋人邓椿《画继》中有这样的记载：

其佛像每务出奇立异，使世俗惊惑，而不失其胜绝处。尝作《长带观音》，其绅甚长，过一身有半。又为吕吉甫作《石上卧观音》，盖前此所未见者。又画《自在观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10]42}

李公麟画佛像能够不流于俗而又独具妙处。世俗画自在观音，打破佛教造像或直立或打坐的成规，作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貌；而李公麟偏偏是在规规矩矩的“跏趺合爪”中“具自在之相”，这是他着眼于人物精神刻画的一个特点。他说的“自在之相”与“自在之心”，分别指人物的外在姿态与精神风貌两个方面，二者之中他所偏重表现的是精神意态即心的自在。也就是说，龙眠所重在神不在貌，其妙处在于传神。由上可知，金圣叹所谓“龙眠白描”的文学作

品,应具备两个特色:其一,要言简,用极为朴实精练的语言写作;其二,要传神,把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呈现出来。总之,就是以平实简淡之笔,却能以少胜多,达到形神毕现的效果。这与叶朗先生从金圣叹的后继者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大量“白描”实例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叶先生说:

所谓“白描”,就是指用最少的笔墨,勾出事物的动态和风貌,从而表现事物的生命,表现事物内在的性格和神韵。“白描”的概念和“传神”的概念是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白描”的概念包含了“传神”的概念。^{[11]188-189}

我们也可以从《水浒传》第六十一回中写狱卒蔡福、蔡庆兄弟,并被金圣叹称为“写二蔡,便若一幅绝妙白描地狱变相”的一段描写中得以印证。原文如下:

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膊”。旁边立着这个嫡亲兄弟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侧边。^{[6]1112}

如同金圣叹所称赞的“寻着踪迹”四字,让人想象出众庄客顺着雪地上留下的足迹追寻林冲,不加渲染地传达出雪的意象与神韵来一样,在这百余字之中,蔡福的职业、姓氏、籍贯、专业技能、绰号及与蔡庆的关系,以及后者的癖好、绰号与其时动作状态,无不面面俱到、色色兼顾。就其信息量而言,用语可谓简而又简;而其效果却是将二蔡兄弟之形象,令读者感觉恍若眼前一般。总之,白描的特征就是简而传神。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明确含有“白描”二字的例子外,在金圣叹的评点中还包含着大量虽未使用“白描”之名,却有“白描”之实的例子。状物之例,如《水浒传》第五回写鲁智深于山林中看见一所破败寺院,“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金圣叹批道:“只用三个字(‘都昏了’),写废寺入神,抵无数‘墙坍壁倒’语。”^{[5]148}写人之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潘金莲“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金圣叹批道:“写淫妇便是活淫妇。”^{[5]438}所谓“写活”,也正是指“只一捏”这个动作传达出了潘金莲的淫荡之“神”^[12]。

金圣叹说:“文章家、画家,最贵惜墨如金。”^{[13]661}用笔简是其文学评点中的一贯主张。当

然,更宜于惜墨如金、体现锤炼字句功夫的文体是诗歌,尤其是律诗。这里,我们将探讨金圣叹从画学中借用来的另一个术语——“落骨”。金圣叹《与王斫山》云:

自来唐律,无有脱却一二,另自作三四者。一二正如画家之落骨,三四则如画家之皴染。一二落骨,以待三四皴染;三四皴染,以完一二落骨。^{[14]105-106}

其中,“落骨”一词,笔者仅于金圣叹文字中此处见之,大概是其所自创。由于它是金圣叹律诗论中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因此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值得研究。其义可作两种推测:其一,即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句“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中之“画骨”;其二,清人华琳《南宗抉秘》云:“钩轮廓谓之初落墨,骨法是也。”^{[15]298}金圣叹既以之与“皴染”相对,根据语境应相当于绘画物体骨架的“勾勒”。无论“画骨”抑或“勾勒”,总之其出于画学当无疑问。勾勒,也写作勾勒,原为中国画学技法术语,指用线条勾描物象轮廓,与“皴染”同是作画手法。清代方薰(1736—1799)云:“画石则大小磊叠,山则络脉分支,而后皴之也。叠石分山,在周边一笔,谓之勾勒。勾勒之,则一石一山之势定,一石一山,妍丑亦随势而定。故古人画石,用意勾勒,皴法次之……古人画石,有勾勒而不设皴者。”^{[16]9}郑绩(1813—1874)《梦幻居画学简明·论形》亦云:“山石之形或先定轮廓后加皴,或连廓带皴,一气浑成,或先皴而后包廓。”^{[15]945}可见,“勾勒”一词,在绘画中指用线条勾画出物体的骨架,起到强化所绘对象形体之作用,定形显神;既可以与皴染搭配使用,也可以脱离皴染而独立存在,具有独立审美价值。而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则有“吾词中之意,唯恐人不知。于是乎勾勒”^{[17]11}之语,表明“勾勒”在词学中用来点明主旨,使内在意蕴清晰呈现。金圣叹将“落骨”与“皴染”引入评点,前者强调文学创作中立意为骨,即确立篇章之结构主干,后者则是填充细节、润饰文采,加以烘托以使形象更丰满、意味更隽永。他对律诗的看法是:

抑岂知三、四之专承一、二,而一、二用意高拔,比三、四较严;五、六转出七、八,而七、八含蓄渊深,比五、六更切,宁可以起结二字抹却古人无数心血耶?”^{[18]784}

金圣叹以“落骨”喻律诗起结,取其确立格局、奠定气势之意。由“较严”“更切”二语观之,则一、二与七、八较之三、四与五、六地位更为重要。质言之,即“落骨”重要性要超过“皴染”,体现出金圣叹

的审美倾向。

上文所引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句“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金圣叹有批云:“‘画肉不画骨’,箴砭世人多少!”^{[18]728}而宋人黄伯思《跋王晋玉所藏韦鷗马图后》说:“曹将军画马神胜形,韩丞画马形胜神。”^{[19]23}“画肉”所偏重于体现的是形似,“画骨”所偏重于体现的则是神似。金圣叹与杜甫都表现出对“画骨”的注重。当然,二者可以有所偏重却不可偏废。清人唐岱《绘事发微》云:“盖有笔而无墨者,非真无墨也。是皴染少,石之轮廓显露,树之枝干枯涩。望之似乎无墨,所谓骨胜肉也。有墨而无笔者,非真无笔也。是勾石之轮廓,画树之干本,落笔涉轻而烘染过度,遂至掩其笔、损其真也。观之似乎无笔,所谓肉胜骨也。”^{[20]23}“落骨”与“皴染”实各司其职,所以圣叹批杜甫《画鹰》诗云:“世人恒言传神写照,夫传神写照,乃二事也……传神要在远望中出,写照要在细看中出。”^{[18]627}“皴染”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仍是为传神服务的。

需要说明的是,“落骨”不等同于“白描”。诚然,二者在使用笔墨上的以少胜多与达成效果上的生动传神两方面,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白描偏重以线条勾勒形体,多不加渲染;而“落骨”更偏重强调在立意与结构上的骨干作用,注重确立整体气势与格局,且多数情况下须“皴染”。而金圣叹以“白描”与“落骨”用于评点文学作品,不但丰富了评点理论,诠释了其审美理想,而且加深了人们对其诗法理论的理解。

三、“留白”与“烘染”

金圣叹曾说:“文章之妙,都在无字句处。”^{[6]1071}如果说“落骨”与“白描”是用精简的笔墨直接体现作者意图或表现对象特征的话,那“留白”之“白”就是简之极致,简到无可再简的空白。不过,这种空白并不是真的空诸所有,而是依赖烘托渲染来间接描绘表现对象。换言之,这种极致之“简”是需要以“繁”来作支撑的。是以金圣叹又有所谓“妙处不传”之论。他在批《西厢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尝有狂生题半身美人图,其末句云:“妙处不传。”……夫所谓“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处;振笔迅疾取之,取此妙处;累百千万言曲曲写之,曲曲写而至于妙处;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处。然而又必云“不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既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

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然则后人欲寻我得意处,则必须于我笔墨都停处也。”^{[7]1092-1093}

这段话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苏轼的《续丽人行》:“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21]69}据诗前小序,知此诗系苏轼为唐代大画家周昉作品“背面欠伸内人”而作。周昉画作呈现的只是一个背对观者打哈欠伸懒腰的女子,而苏轼却认为画出了“无穷意”。程千帆先生曾对苏轼诗意作了诠释:“周昉画了一个很美的人,却不画脸。为什么这样呢?这可以让读者充分地展开自己想象的双翅,在美的世界里翱翔。你心目中最美的人相貌如何,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宫女转过来的脸是如何。”^[22]这很好地解释了其中缘由。金圣叹所云“半身美人图”正如周昉“背面欠伸内人”画,他将“狂生”所题轻薄语“妙处不传”转而解作“正是独传妙处”,并大加发挥,认为将这种绘画手法运用于文学创作,写至关键处戛然而止,能引起读者无限兴味。此节文字由画论导入而畅论文心,可将之与华琳《南宗抉秘》中所论画理比并观之。华氏云:

白即纸素之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然但于白处求之岂能得乎!必落笔时气吞云梦,使全幅之纸皆吾之画,何患白之不合也。挥毫落纸如烟,何患白之不活也。禅家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道出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15]296}

画中的空白部分,一方面确实是画面上未曾着墨的部分,是“纸素之白”;另一方面,在注入画家情感富有生趣的画作中,这种“白”不再是“纸素之白”,而是已经活起来的“画中之白”。其区别在于,“画中之白”在笔墨形式导向下,既是画作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即“画中之画”,又是能够提供充分想象空间的“画外之画”。

金圣叹无疑是深谙此种画理的,在评点杜甫的《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时,他作了充分的发挥。杜诗、王画俱属佳作,金圣叹也不无自负地说:“此是王宰异样心力画出来,是先生异样心力看出来,是圣叹异样心力解出来。王宰昔日滴泪谢先生,先生今日滴泪谢圣叹。”^{[18]695}那么,深通画理又能解诗的评点家金圣叹,评解大诗人杜甫题咏画家王宰的诗作,究竟解出了些什么呢?金圣叹评诗句“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

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如下:

上既明说此图之为昆仑方壶矣,此忽故作惊怪,荒荒忽忽,疑是洞庭,疑是日本,疑是赤岸。约此图,满幅是湏洞大水,天风翻卷,其势震荡,而于一角略作山坡树木,更点缀数船,避风小港。画者既无笔墨相着,题者如何反着笔墨?……而又有“中有云气随飞龙”七字者,原来王宰此图,满幅纯画大水,却于中间连水亦不复画,只用烘染法,留取一片空白绢素。……此图本题,须知明明标出在前是“昆仑方壶”。若入俗手,岂不于大海中央,画作无数丹崖碧嶂,瑶草琪花,白鹤青鸾,吹笙行乐。今王宰偏不尔,偏只于大水当中,留得一片云气。若谓方壶是有,则此一片云气中间意者是耶;若曰方壶不经,儒者难言,则我此一片云气乃是连水都不画处,无笔无墨,云何诬我曾画方壶哉?……“随飞龙”三字妙,写此一片空白云气,是活云,不是死云,便是秦汉方士无数奇谈,一齐隐括,成此三字。^{[18]695-696}

其中,“烘染”即烘托渲染,是指中国画传统技法中,以周围景物烘托渲染画面中心事物的画法;而“空白”意义的生成则有赖于笔墨形式。笔墨之外的风神韵味,还是要凭借笔墨的技巧来表现的。“空白”只有与各种画面结构、笔墨形态组合时,方能显示出其意义,引发各种不同的联想;在那些相信方壶存在的人看来,这座仙山就隐藏在云气中间;而认为仙山之说不雅驯的儒家人士,则觉得云气中间什么都没有。这种以无胜有的艺术手法,在画为“留白”,在诗为“含蓄”。我国自古就有“云从龙”之说,而龙又是和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杜诗仅以“随飞龙”三字就将空白云气写成了引人遐想的活云,从而取得将“秦汉方士无数奇谈,一齐隐括”的效果。这样的诗句不是意随语竭的刻板文字,而是清空灵动的,将作者思想深层的意脉借助于笔墨形态,含而不露,让读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去领悟具象之形之外的无形之意。

这种源自绘画的“烘染”与“留白”相生的理论,在金圣叹所批诸书中是普遍存在的。他说:“有字处反是闲笔,无字处是正笔。”^{[23]28}“有字处”即“烘染”之笔,特为“留白”处而设,是为“闲笔”;“无字处”即“留白”处,方为“正笔”。又说:“知文在题之前,便须恣意摇之曳之,不得便到题;知文在题之后,便索性将题拽过了,却重与之摇之曳之。若不解此

法,而误向正位,多写作一行或两行,便如画死人坐像,无非印板衣褶,纵复费尽渲染,我见之,早向新宅中哭钟太傅矣。”^{[7]859-860}所以,若无“烘染”之笔与“留白”之处,势必剥夺读者进行想象与联想的空间,而致文章无余味。金圣叹的“烘染”与“留白”之论,在“有”与“无”的交织中,表达了不同笔法的审美效果与意义,体现了他本人的审美取向,和他对中国文学艺术深层次规律的把握。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援画论入评点,影响了其后的文学评点乃至创作活动。如“白描”,在金圣叹之后经由张竹坡的大量使用,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如脂砚斋评《红楼梦》时所强调的“不写之写”,正是“留白”手法在小说批评中的延伸与深化;如《西厢记》中金圣叹所记“玄元皇帝殿中赌画”一则轶事,在《红楼梦》评点中出现过多次;其他画学元素受金圣叹影响者也是不胜枚举,毛宗岗评《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红楼梦》,均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画论中的“布局”“设色”“意境”等概念。可见,金圣叹以画理通文心,不仅提升了评点的理论深度,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也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审美空间,使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得以更全面地彰显。

参考文献:

- [1]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M]//钱锺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章腾龙原本,陈懿增辑.贞丰拟乘[M].清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 [3]叶绍袁.续窃闻[M]//叶绍袁.午梦堂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
- [4]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M]//金圣叹.金圣叹全集(6)附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5]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M]//金圣叹.金圣叹全集(3).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6]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M]//金圣叹.金圣叹全集(4).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7]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M]//金圣叹.金圣叹全集(2).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8]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9]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M]//金圣叹.金圣叹全集(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10]邓椿.画继校注[M].刘世军,校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1]叶朗.中国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 [12]刘芳.论金圣叹的欧阳修词批评:兼及陈廷焯对欧阳修词评的批评[J].中州大学学报,2025(3).

(下转第39页)

基于超效率 SBM-Malmquist 模型的 河南省新质生产力效率评价

王菲, 许以撒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对其进行科学的测度与系统评价具有重大意义。以河南省十八地市为研究对象, 构建涵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纳入碳排放非期望产出, 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 综合评估 2021—2023 年河南各地市新质生产力的静态效率水平与动态效率演进特征。研究发现, 河南省新质生产力静态效率呈现显著梯度分化格局: 全省三年效率均值为 0.942, 整体未达到有效水平, 郑州、济源等 8 市组成第一梯队, 洛阳、周口、新乡落入第四梯队, 区域效率两极分化明显; 动态效率演进由技术进步主导,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年均增长 15.4%, 技术进步指数 (Techch) 1.189, 贡献率 83%, 但规模效率 (Sech=0.988) 成为核心短板, 存在高投入低转化的困局。基于此, 提出构建“技术—规模—制度”三角支撑体系、梯度精准施策等建议, 为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超效率 SBM; 全要素生产率; 河南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3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12-07

当前,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 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以创新为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 兼具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 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关键着力点。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 将其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河南省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 亟须通过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来突破发展瓶颈、重塑竞争优势、实现动能转换, 奋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走在前列, 加速推进国家创新高地和现代化河南建设。

河南省内十八地市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各异,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价各地市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水平, 揭示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与效率差异, 明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与短板, 对于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优化区域协同布局、精准配置创新资源、推动河南全省新质生产力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 本文对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评价, 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其区域实现路径的理解, 更能为河南省及各市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和决策支持, 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 新质生产力方面研究

202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

收稿日期:2025-12-18

基金项目:2025 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质生产力推动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政策研究”(252400410178);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菲(1980—), 男, 河南郑州人, 经济学博士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教授,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发展经济学。

力这一概念,明确新质生产力需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标尺,成为当前区域发展的核心动能。近年来,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广泛丰富。

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方面,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的质态跃升。洪银兴^[1]提出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驱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核心特征为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与绿色低碳转型。马荣等^[2]从理论上的新内容、生产力的新范式等角度阐述新质生产力的“新”,提出从新动能、新产业、新科技和新人才等维度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罗文娟^[3]从要素构成、驱动因素、产业载体及生产关系 4 个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新质”进行阐述,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揭示旧生产力形态与新时代需求的矛盾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动力源。简新华等^[4]将科学技术列为第四要素,认为其从“渗透性要素”转变为“实体性要素”。

在新质生产力的评价体系 and 评价方法方面,大多数学者采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为基础构建评价体系框架,但权重分配差异显著。李金虎等^[5]构建涵盖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四维度 36 个指标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CRITIC-熵值法对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算评价;文丰安等^[6]构建包含总体、核心、过程、结果 4 个立体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着眼于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陈钰芬等^[7]首创“投入—过程—产出”三维模型(投入质量、生产活力、产出效能),克服静态评价局限;李光勤等^[8]运用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和 Dagum 基尼系数等方法,评价 2013—2022 年中国 30 省新质生产力水平,揭示其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区域差异收敛趋势及空间关联强化特征;李春丽等^[9]用熵值法实证揭示黄河流域新质生产力下游高、上游低的梯度差异,通过收敛检验和障碍诊断证明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陈丹临等^[10]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收敛模型,系统研究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时空演化特征与均衡性问题。

(二)超效率 SBM 模型应用于效率评价方面研究

超效率 SBM 模型因其无需对生产函数的结构做出先验假设、无需估计参数,且可纳入非期望产出、支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被广泛应用于效率评价的相关研究中。张林洁等^[11]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京津冀 13 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发现

整体效率处于中高水平但区域差异显著。李经保等^[12]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和 GWR 模型,研究中国 30 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的空间异质性,揭示效率总体上升但区域失衡、空间聚集性增强、经济发展为核心驱动等结论。为了解决评估多周期动态效率的问题,大多研究采用 Malmquist 指数方法与之结合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邓玉勇等^[13]运用超效率 DEA 和 DEA-Malmquist 模型,分析中国 15 个智慧港口的静态效率、动态效率,发现智慧化建设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仍需优化;张婷等^[14]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和 Malmquist 指数,静态测算与动态分析 2015—2020 年中国 31 省科技创新效率,发现区域呈西部>东部>中部格局,技术进步是主驱动,但北京、上海存在投入冗余与进步不足问题。杨一帆等^[15]运用 Super-SBM 模型与 Malmquist 指数,评估 2015—2022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物流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发现区域效率差异显著但具备较大提升潜力,实证揭示技术进步为关键驱动因素。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当前新质生产力研究聚焦于理论内涵解析与评价体系构建等层面,但是评价体系很少涉及非期望产出,如二氧化碳等;另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长三角、粤港澳等发达地区,针对河南等中西部省份的新质生产力转型机制研究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 SBM-Malmquist 模型,从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河南省十八地市的新质生产力效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为推动河南省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 超效率 SBM 模型

DEA 方法由于其不需要预先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在多投入多产出效率评价的研究中应用广泛。但是传统 DEA 方法存在径向模型忽略松弛变量改进空间、无法处理非期望产出、难以区分高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差异等痛点,基于此,学者 Tone 构想提出了 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和超效率 SBM(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超效率 SBM 模型可以考虑非期望产出,同时效率值可以大于 1,也可以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的高低进行对比^[16-17]。本文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对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的效率进行测算,该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min \rho = \frac{\frac{1}{m} \sum_{i=1}^m \frac{\bar{x}}{x_{i0}}}{\frac{1}{s_1 + s_2} \left(\sum_{r=1}^{s_1} \frac{\bar{y}^d}{y_{r0}^d} + \sum_{q=1}^{s_2} \frac{\bar{y}^u}{y_{q0}^u} \right)}$$

$$s. t. \left\{ \begin{array}{l} \bar{x} \geq \sum_{j=1, \neq 0}^n \lambda_j x_j \\ \bar{y}^d \leq \sum_{j=1, \neq 0}^n \lambda_j y_j^d \\ \bar{y}^u \geq \sum_{j=1, \neq 0}^n \lambda_j y_j^u \\ \bar{x} \geq x_0; \bar{y}^d \leq y_0^d; \bar{y}^u \geq y_0^u; \lambda_j \geq 0 \end{array} \right\} \quad (1)$$

式中, ρ 指的是河南省十八地市的新质生产力效率值,当 $\rho \geq 1$ 时,表示被评价的决策单元达到有效状态,当 $\rho < 1$ 时,则表示该决策单元处于无效状态。 n 为决策单元个数,每个决策单元包含 m 个投入指标、 s_1 个期望产出指标、 s_2 个非期望产出指标。 x 、 y^d 、 y^u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

2. Malmquist 指数分析

为分析 DMU 在连续时期内生产效率的动态变化,本文采用 Malmquist 指数,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评价动态变化情况。Malmquist 指数被广泛应用在生产率变动的评价研究中,尤其适用于面板数据的效率分析。Malmquist-Luenberger (ML) 指数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引入 Malmquist 指数,以支持对非期望产出的分析。该指数可分解为两个指数分解项,分别为反映技术效率提高对环境效率变化贡献

的技术效率变化(EC),以及反映技术进步提升对环境效率变化贡献的技术进步变化(TC)^[18]。该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Meffch_m^{m+1} = \frac{S^m(X^{m+1}, Y^{m+1}, B^{m+1})}{S^m(X^m, Y^m, B^m)} \quad (2)$$

$$Mtech_m^{m+1} = \sqrt{\frac{S^m(X^m, Y^m, B^m)}{S^{m+1}(X^m, Y^m, B^m)} \times \frac{S^m(X^{m+1}, Y^{m+1}, B^{m+1})}{S^{m+1}(X^{m+1}, Y^{m+1}, B^{m+1})}} \quad (3)$$

$$Tfpch = Effch \times Techch = EC \times TC \quad (4)$$

式中 $Tfpch$ 即全局 Malmquist 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当 $Tfpch > 1$ 时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新质生产力总体提升;当 $Tfpch < 1$ 时,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生产率衰退。 $Effch$ (EC) 表示技术效率变化率,测度从第 m 期到 $m+1$ 期,管理水平提升对生产率的贡献。 $Techch$ (TC) 技术进步变化率,测度从第 m 期到 $m+1$ 期,技术前沿面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S^m 、 S^{m+1} 分别指 m 期、 $m+1$ 期的超效率 SBM 距离函数; X^m 、 X^{m+1} 分别表示第 m 期、第 $m+1$ 期的投入数值; Y^m 、 Y^{m+1} 分别表示第 m 期、第 $m+1$ 期的产出数值; B^m 、 B^{m+1} 分别表示第 m 期、第 $m+1$ 期的非期望产出。

(二)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新质生产力效率测算的投入产出指标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构成要素等,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与指标科学性原则,构建涵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3 个维度的一级指标体系,下设 12 个二级指标,用于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详见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劳动者	科技人力投入(投入)	R&D 人员全时当量
	培育经费(投入)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00%
	高等学历人才产出(产出)	高等院校毕业生数
	劳动生产率(产出)	人均 GDP
劳动对象	环境保护强度(投入)	(环境保护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00%
	新产品销售收入(产出)	企业自研产品、引进技术转化产品、合作研发产品所实现的收入
	二氧化碳排放量(非期望产出)	各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能源消费量折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信息化水平(产出)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劳动资料	传统基础设施(投入)	公路里程
	数字基础设施(投入)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科技创新(投入)	R&D 投入
	技术成果转化能力(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

2. 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本文选取 2021—2023 年河南省十八地市作为观测样本来评估各地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各地市的投入产出指标均来源于 2022—2024 年度《河南省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及当地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

三、实证分析

(一) 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静态分析

本文在对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进行静态分析时,采用了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运用 Dearun 软件对 2021—2023 年十八地市的相关数据进行新质生产力效率测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21—2023 年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

年份/地区	2021	2022	2023	均值
郑州市	2.089	2.050	1.968	2.036
开封市	1.003	0.572	1.106	0.894
洛阳市	0.471	0.425	0.446	0.447
平顶山市	0.482	0.518	1.035	0.678
安阳市	1.085	1.011	0.611	0.902
鹤壁市	1.152	1.072	1.043	1.089
新乡市	0.582	0.537	0.519	0.546
焦作市	1.068	0.659	0.650	0.792
濮阳市	1.030	1.041	0.626	0.899
许昌市	1.053	0.642	0.771	0.822
漯河市	1.094	1.148	1.137	1.126
三门峡市	1.046	1.020	1.012	1.026
南阳市	0.435	1.014	0.403	0.617
商丘市	1.031	1.061	1.129	1.074
信阳市	1.094	1.094	1.066	1.084
周口市	1.043	0.267	0.410	0.573
驻马店市	1.048	1.009	1.160	1.072
济源示范区	1.309	1.257	1.259	1.275
均值	1.006	0.911	0.908	0.942

新质生产力效率值小于 1 的城市是非 DEA 有效的,大于 1 的是 DEA 有效的。从整体来看,全省 2021—2023 年新质生产力效率均值为 0.942,表明河南省新质生产力总体发展未达到 DEA 有效水平。分年度看,每年约有 60%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效率达到有效水平,其中 2021 年有 14 个城市达到有效水平,2022 年降至 11 个,2023 年进一步降至 10 个。这三年,多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 2023 年河南省实施“双碳”政策升级,工业企业碳减排成本上升,压缩先进制造业利润空间,同时更高的环保标准也暴露了重工业城市的技术短板;二是传统产业收缩速度超过新动能培育速度,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不畅。此外,各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基于 2021—2023 年平均新质生产力效率对河南省十八地市进行排序,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21—2023 年河南省十八地市平均新质生产力效率排序

效率	梯队	城市
$\rho \geq 1$	第一梯队	郑州、鹤壁、漯河、三门峡、商丘、信阳、驻马店、济源示范区
$0.8 \leq \rho < 1$	第二梯队	开封、安阳、濮阳、许昌
$0.6 \leq \rho < 0.8$	第三梯队	平顶山、焦作、南阳
$0.4 \leq \rho < 0.6$	第四梯队	洛阳、新乡、周口

第一梯队城市,空间分布特征上多为黄河流域集聚区域,具有创新辐射能力强、轻资产转型速度快等优势,这些城市通过聚焦细分领域、激活边界效应实现逆袭。郑州作为省会城市,连续三年稳居全省第一,但是 2023 年郑州效率值从 2.050 降至 1.968,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转化环节存在

断链问题,尽管研发投入强度较大,但技术合同成交额存在显著松弛量,缺口达 568 亿元;二是教育资源配置出现错位,教育投入冗余率高达 8.77%,而高校人才产出却存在 34 万人的缺口。漯河作为普通地级市,依托食品产业全链条数字化改造,将传统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济源作为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凭借“小体量、高浓度”的发展特色,在细分领域构建专业化创新生态,这种“隐形冠军”模式有效规避了与郑州的同质化资源竞争。鹤壁获得首批增量配电改革试点,同时承接北京卫星产业转移,航天科工遥感数据中心成功落地。信阳叠加加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计划与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政策支持。商丘利用豫鲁皖交界的区位优势,建成跨省物流无感通关系统,节约货运时效 32%。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均受益于河南省“多极支撑”战略,省级资源的精准滴灌进一步放大了各地的禀赋优势。

第二梯队城市接近有效前沿但尚未实现突破,这类城市环绕郑州布局,凸显核心城市的辐射边界,代表城市包括开封、安阳、许昌等。此类城市产业基础扎实,但传统发展动能持续衰退,新兴转型动能培育不足,导致效率难以跨越至第一梯队。

第三梯队城市新质生产力效率均值为 0.696,多位于豫西南资源富集带,资源优势突出。平顶山、焦作、南阳等城市坐拥煤炭等丰富矿产资源,但发展模式过度依赖传统资源开发,产业结构固化问题突出,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第四梯队城市新质生产力效率均值仅为 0.522,洛阳、新乡、周口等城市虽具备政策支持力度大的优势,但受体制性障碍严重拖累。尤其是洛阳,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效率值却位列全省最低(0.447),深层原因在于三重困境叠加:一是传统重工业的路径依赖显著,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滞后,造成 R&D 经费冗余投入高达 51.8 亿元;二是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低下,技术合同成交额松弛量达 71 亿元;三是承受河南全省最强的环境约束压力,碳排放松弛量高达 786 万吨。上述数据充分表明,洛阳已陷入“管理退化—技术滞后—环保制约”的恶性循环。

(二) 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动态时间差异分析

为实现对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的动态评价,本研究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导向 SBM-Malmquist 模型,运用 Dearun 软件对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面板数据进行运算,得到 Malmquist 指数及其分解结果,具体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基于截面维度的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的

Malmquist 指数及其分解					
	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i>Effch</i>)	技术进 步指数 (<i>Techch</i>)	纯技术效 率变化指 数(<i>Pech</i>)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i>Sech</i>)	全要素 生产率 (<i>Tfpch</i>)
2021—2022	0.963	1.064	1.115	0.870	1.007
2022—2023	1.059	1.314	0.945	1.106	1.300
Mean	1.011	1.189	1.030	0.988	1.154

表 5 基于时间维度的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的

Malmquist 指数及其分解					
	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i>Effch</i>)	技术进 步指数 (<i>Techch</i>)	纯技术效 率变化指 数(<i>Pech</i>)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i>Sech</i>)	全要素 生产率 (<i>Tfpch</i>)
郑州市	1.000	1.068	1.000	1.000	1.068
开封市	1.160	1.175	1.000	1.160	1.276
洛阳市	0.977	1.591	0.988	0.987	1.549
平顶山市	1.503	0.898	1.477	1.241	1.442
安阳市	0.805	1.453	0.851	0.935	1.075
鹤壁市	1.000	0.990	1.000	1.000	0.990
新乡市	0.945	1.153	1.036	0.918	1.097
焦作市	0.822	1.121	1.000	0.822	0.907
濮阳市	0.813	1.415	0.833	0.970	1.075
许昌市	0.921	1.104	1.000	0.921	0.975
漯河市	1.000	0.997	1.000	1.000	0.997
三门峡市	1.000	0.849	1.000	1.000	0.849
南阳市	1.350	1.844	1.357	0.934	1.746
商丘市	1.000	1.211	1.000	1.000	1.211
信阳市	1.000	1.039	1.000	1.000	1.039
周口市	0.900	1.254	1.000	0.900	1.236
驻马店市	1.000	1.236	1.000	1.000	1.236
济源示范区	1.000	0.999	1.000	1.000	0.999
均值	1.011	1.189	1.030	0.988	1.154

整体来看,2022—2023 年河南省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TFP*)达 1.300,环比增长 30.0%,远高于 2021—2022 年的 1.007,年均增速达 15.4%。进一步分析发现,效率增长结构存在显著矛盾:一方面,技术进步指数(*Techch* = 1.189)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引擎,贡献率达 83%;技术效率指数(*Effch* = 1.011)实现企稳回升,从 2021—2022 年的萎缩状态(0.963)转为正向增长(1.059)。另一方面,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呈现较大幅度波动下滑,形成“技术高增长—规模低效能”的独特发展模式,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未能被规模效率充分吸收转化。

河南省新质生产力呈现技术进步(*Techch*)主导高增长,但是规模效率持续低迷的特征。全省技术进步指数均值达 1.189,十八地市中 12 个地市技术进步指数高于 1,南阳(1.844)、洛阳(1.591)等 7 个地市增速显著领跑全省。全省技术进步贡献率 83%,技术效率贡献率仅 11%,技术升级驱动全要素生产率(*TFP*)达 1.154,实现年均 15.4%的增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规模效率均值仅 0.988,8 个地市规模效率值低于 1,资源型城市规模效率萎缩问题尤为突出。技术突破未能有效转化为规模效益,特别是豫西南地区陷入“高创新—低转化”的发展困局。

由图 1 可见,从不同城市表现来看,南阳呈现典型的发展矛盾现象:全要素生产率(*TFP*)最高达到 1.746,位居全省首位;技术进步指数以 1.844 断层领先,但规模效率仅为 0.934,深刻反映出技术爆发未能转化为规模效益的深层发展问题。洛阳全要素生产率(*TFP*)为 1.549,位列全省第二,技术进步指数 1.591 仅次于南阳,但技术效率处于萎缩状态(0.977),大概率存在技术成果转化阻滞的症结。规模驱动型城市主要以平顶山、开封等为代表,其中平顶山的规模效率达 1.241,为全省最高水平,是拉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其技术进步指数仅为 0.898,暴露出技术升级后劲不足的短板。豫北区域则处于技术效率洼地,鹤壁、焦作、济源三市技术效率均值为 0.940,低于全省均值 7 个百分点,区域内企业数字化转型率<35%(省均 52%)。反观处于郑州辐射圈的开封和许昌两地,技术效率 1.040,超过全省均值 2.9 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郑州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

省会城市郑州在 2021—2023 年的新质生产力效率分解指标表现反常:技术效率变化(*Effch*)、纯技术效率(*Pech*)和规模效率(*Sech*)三项关键指标均为 1.000,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技术进步指数(*Techch*)为 1.068,全要素生产率(*TFP*)为 1.068,仅呈现微弱增长。尽管郑州研发投入强度以 3.1%位居全省第一,但技术转化率仅为 28%,特别是技术合同成交额缺口高达 568 亿元,高校人才供给缺口 34 万人,暴露出产学研链条断裂的核心矛盾。与此同时,郑州规模效率为 1.000,表明其先进制造业集群尚未形成明显的规模效益。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1. 静态效率的梯度分化与空间分异特征

河南省新质生产力近三年效率均值为 0.942,整体未达到 DEA 有效水平,且呈现清晰的“四梯队”梯度格局。第一梯队($\rho \geq 1$):郑州、济源等 8 市构成高效引领区,空间分布集聚于黄河流域,共性优势体现为创新辐射力强、轻资产转型快;第二梯队($0.8 \leq \rho < 1$):开封、安阳等 4 市处于转型临界点,虽环绕郑州布局但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不足;第三梯队($0.6 \leq \rho < 0.8$):平顶山、南阳等资源型城市,坐拥丰

富的矿产、能源资源,却过度依赖传统资源开发模式;第四梯队($0.4 \leq p < 0.6$):洛阳、周口等市受体制

性障碍制约,发展瓶颈突出,其中洛阳 R&D 经费冗余投入高达 51.8 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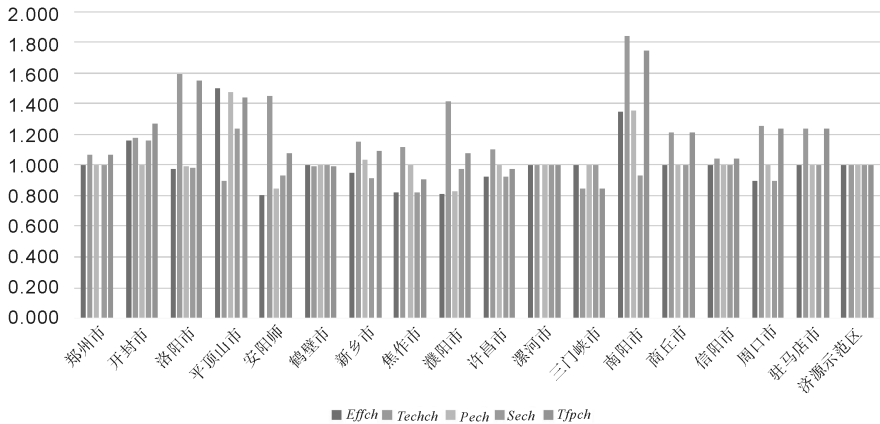


图 1 2021—2023 年河南省十八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的 Malmquist 指数分解图

2. 动态效率的技术主导与规模短板并存

技术进步 (*Techch*) 是河南全省新质生产力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全省 *Techch* 均值 1.189, 贡献率 83%, 其中南阳 (1.844)、洛阳 (1.591) 实现技术能级跃迁。规模效率 (*Sech*) 成为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全省 *Sech* 均值仅为 0.988, 2021—2022 年受环保限产政策冲击一度跌至 0.870, 2023 年虽反弹至 1.106, 但整体提升幅度仍远低于技术进步幅度。省会郑州的表现尤为反常:全要素生产率 (*TFP*) 仅为 1.068, 低于全省均值 7.4 个百分点, 技术进步处于低速停滞状态 (*Techch* = 1.068), 充分暴露出“高投入、低转化”的发展困局。

(二) 政策建议

1. 精准施策提升全省各地市新质生产力效率

河南省新质生产力效率整体偏低且区域发展失衡, 一方面是省会郑州辐射带动不足, 另一方面是豫西南资源型城市路径依赖突出且转型受阻。对此, 需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构建“核心引领+短板突破”的全域提升格局。对于省会城市郑州, 通过技术创新扩散与规模效能跃升来提高技术转化率和规模效率, 建成国家创新高地核心枢纽, 辐射带动全省效率均衡。另外, 对于新质生产力效率较低的城市, 一方面需要依托优势资源和战略发挥核心动能,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政策支持, 尤其是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的扶持力度, 激活市场机能, 引导转型升级, 从而提高整体新质生产力水平。

2. 构建省级统筹的三角支撑体系, 聚焦技术创新、规模效应、制度环境的三维协同

技术端应破解技术转化断链, 通过核心枢纽辐射带动全域技术跃迁, 激活河南全省技术合同存量;

规模端应破解高技术与低效能的结构性矛盾, 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红利带动规模效益, 优化规模效率; 制度端应着力于降低系统性成本, 建立联动交易平台, 以市场化机制促进跨区域要素对流, 弥合区域效率差异。三者通过动态反馈机制闭环联动, 形成技术突破、规模吸收、制度保障、再创新的螺旋升级路径, 推动新质生产力从单点突破向全域协同的质效跃升。

3. 加强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根据测算结果, 部分城市 (如郑州、洛阳) 没有达到效率前沿面, 主要是由于资源投入存在一定的冗余或资源浪费, 因此要加强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做到优势互补。一方面, 各城市要根据自身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产业规模, 在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基础上促进要素的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 要打破行政区域壁垒, 激活人才与资金跨区对流机制, 建立有效的资源要素协作网络, 探索推行“用工共享”“专利共享”模式, 通过要素流动降低发展成本、通过资源共享提升配置效能, 实现全域新质生产力均衡跃升。

4. 推进梯度精准滴灌政策

第一梯队城市, 如郑州、济源等, 应强化技术辐射枢纽功能, 通过技术枢纽建设和飞地经济升级等战略, 推动核心技术、经济向周边扩散; 第二梯队城市, 如开封、安阳等, 应激活转型动能, 重点破解制度成本障碍, 推行绿色技改补贴、数字资产确权等政策。第三梯队城市, 如南阳、平顶山等, 应打破资源路径锁定, 设立产业替代信托基金, 推动资源收益转向技术替代投资。第四梯队城市, 如洛阳、周口等, 应深化制度型开放改革, 试点央地权益分置、县域品牌整合等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 [1] 洪银兴. 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 经济学动态, 2024(1):3-11.
- [2] 马荣,王灏翔,焉祯. 论新质生产力:深刻内涵、生成背景、践行路径[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4(1):10-17.
- [3] 罗文娟.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J]. 商展经济,2024(23):38-41.
- [4] 简新华,聂长飞.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省际现状的比较分析[J]. 经济学动态,2024(10):3-20.
- [5] 李金虎,陈建国,常文博.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时空差异及分布演进探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25,43(2):9-18.
- [6] 文丰安,贺佳佳. 新质生产力基本内涵、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发展路径[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38(11):9-22.
- [7] 陈钰芬,杨双双,胡思慧.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分析:基于“投入-过程-产出”视角[J]. 科研管理,2025,46(2):1-11.
- [8] 李光勤,李梦娇. 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J]. 经济地理,2024,44(8):116-125.
- [9] 李春丽,安家浩,程硕勋,等. 黄河流域九省(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J]. 人民黄河,2025,47(5):1-7.
- [10] 陈丹临,周睿. 长江经济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化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25(2):28-39.
- [11] 张林洁,刘茜. 基于超效率 SBM 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评价[J]. 财富时代,2023(1):112-114.
- [12] 李经保,卢长利.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23 年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一). 上海海事大学,2023:44-56.
- [13] 邓玉勇,秦俊平. 基于超效率 DEA 和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的智慧港口效率评价[J]. 上海海事大学学报, 2022,43(4):83-90.
- [14] 张婷,王玮蓉,姚昀辰. 中国 31 个省(区、市)及重点省域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研究:基于超效率 SBM-Malmquist 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2023,43(3):87-95.
- [15] 杨一帆,闫磊. 基于超效率 SBM-Malmquist 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物流效率评价研究[J]. 物流科技,2025,48(10):103-107.
- [16] 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1,130(3):498-509.
- [17] 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2,143(1):32-41.
- [18] FÄRE R. 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66-8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Super-Efficiency SBM-Malmquist Model

WANG Fei, XU Yisa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arrant scientific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1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establishing an index system encompassing three dimensions: laborers, labor objects, and means of labor. Incorporating undesirable output such as carbon emissions, we apply the Super-SBM model and Malmquist index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both the static efficiency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2021 to 2023. Key findings include: Significant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in static efficiency: The provincial average efficiency (0.942) remains suboptimal. Zhengzhou, Jiyuan, and six other cities form the first tier, while Luoyang and Zhoukou fall into the fourth tier, revealing a regional efficiency disparity. Technology-driven dynamic evolu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s annually by 15.4%, wi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ch = 1.189) contributing 83% of gains. However, scale efficiency (Sech = 0.988) emerges as a critical bottleneck, reflecting high investment costs without proportionat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propose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y-scale-institution" tripartite support framework and implementing tiered policy measures to advance Henan's national innovation hub strateg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uper-SB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Henan Province

数智化赋能国家审计:审计人员数智素养提升的路径研究

孙 姣

(南京审计大学 工程审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通用人工智能(AGI)等数智技术正深刻重塑国家审计的环境、对象与方法,同时也带来审计价值链重构、技术能力鸿沟及监管滞后等核心挑战。在此背景下,审计人员的数智素养成为影响审计监督效能的关键因素,其内涵涉及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智能技术理解与应用、人机协同与敏捷适应、数智伦理与风险研判等多维能力。研究进一步揭示当前审计人员存在政治站位不够高、技术业务融合不够、智能工具应用能力薄弱及伦理意识模糊等突出短板。为此,文章提出应从政治引领、知识重构、技术赋能、伦理培育和角色重塑五个维度协同推进,构建系统化的数智素养提升路径,推动审计人员由“传统执行者”向“数智引领者”转型,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智化;国家审计;通用人工智能;数智素养;人机协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4

中图分类号:F239.0-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19-07

一、引言

数智化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国家审计的未来图景。技术赋能的巨大潜力能否充分释放,最终取决于审计人才队伍的数智素养。提升审计人员的数智素养是适应时代发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和战略基石。为迎接这场认知变革与能力重塑,审计人员须保持持续的自我革新和进取精神,同时审计机关也必须秉持坚定的战略决心,并提供稳定、长效的数智资源保障。唯有如此,国家审计方能在数智时代的浪潮中稳固自身地位,掌握审计对象的数字化运行逻辑,精准识别数据背后潜藏的风险隐患,从而切实履行“经济体检”及“查病、治已病、防未病”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数智支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二、数智时代国家审计的深刻变革与核心挑战

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技术时代的开启,使全球经济格局与国家治理

模式正经历根本性重构。AGI将通过自主学习真正实现技术自创生,引发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深刻而彻底的变革^[1]。

(一)AGI的超越性技术特征重塑审计环境

AGI的不断进化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治理环境,构成国家审计面临的新时代背景。审计作为经济活动的系统性鉴证机制,其发展始终与技术进步紧密交织。从手工账册到ERP系统,从抽样审计到持续审计,技术迭代不断推动审计边界的拓展。AGI所展现的进化能力与学习能力,正从底层逻辑上解构并重构着审计的运作环境、核心流程与价值定位。理解这种超越性技术特征对审计生态的深层影响,并前瞻性地构建适应性框架,已成为维系审计工作质效的关键命题。

1. 审计对象复杂化与实时动态化。国家审计的核心使命是保障国家利益、维护经济秩序、推动政策落实、监督公权力运行。AGI驱动的社会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使传统的审计对象,如财政收支、国有

收稿日期:2025-01-05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智化驱动的审计人才培养目标重塑与路径优化”(2023SJYB0351)

作者简介:孙姣(1986—),女,福建三明人,硕士,南京审计大学工程审计学院党委副书记、讲师,研究方向:审计人才培养。

企业运营、政府投资项目等,其边界、形态和运行方式都在被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深刻重塑。这一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审计环境,迫使国家审计直面审计对象日益加剧的复杂化与实时动态化挑战。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随着国家治理重点和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转变而不断拓展^[2]。在 AGI 环境下,实体经济活动与虚拟数字空间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海量、异构、高速流动的数据资源,经济活动以数据流的形式实时映射和交互,使得国家审计对象不再局限于静态的财务报表或历史业务记录,而是扩展为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动态数据生态系统。

2. 审计方法体系的颠覆性变革。AGI 不再局限于特定任务的自动化,其核心是具备自主推理、持续学习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类人甚至超人的通用智能。传统审计中依赖人工抽样、经验判断的模式,逐渐被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全样本审计所取代。AGI 可即时处理大规模多样化数据,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自主检测异常情况与潜在风险,从而大幅提升审计的准确性和覆盖广度。同时,AGI 具备审计流程的动态模拟与预测分析能力,助力审计人员精准预测风险动向,制定更科学的审计策略,推动审计模式从“事后核查”向“过程监控”与“风险预判”的全面转变。这种根本性的技术进化,使得支撑审计实践的底层环境,正在经历结构性、颠覆性的重塑。审计方法体系作为应对审计环境挑战的专业手段,其运行根基已发生重大变革。这促使传统审计在数据来源、风险理解、程序效率和分析逻辑等多个维度必须升级。

3. 审计伦理内涵的深刻拓展与复杂化。AGI 对审计环境的塑造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不仅挑战了传统审计的伦理边界,还重塑了审计伦理的核心框架。透明度、责任性、公平性、隐私保护和人类监督等核心伦理原则面临着技术现实的严峻拷问。人工智能技术的全方位嵌入必然对传统审计关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并将挑战既有的审计价值观、审计职业道德、审计准则等伦理观念和原则^[3]。审计伦理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情境下的职业操守和行为规范,正从相对明确的职业行为规范,拓展至涵盖责任哲学、算法正义、数据权利、人机共生乃至社会稳定等更宏大、更交织的领域。忽视这种拓展与复杂化,将导致伦理真空,侵蚀审计的根基——信任。未来的审计,不仅是数字的验证,更是价值的守望;不仅是技术的应用,更是伦理智慧的彰显。

(二) 国家审计面临的核心挑战

1. 瓦解传统价值链与比较优势。AGI 强大的跨

领域融合能力正在消解传统的行业边界与发展逻辑。其通用性使单一模型能渗透并改造多个产业。传统审计价值链面临断裂的风险,AGI 可能替代大量基础性、流程化审计工作,传统基于人工分工、层级审核的审计流程和价值链面临解构。审计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础服务模式受到冲击。更为关键的是,国家审计正面临其比较优势重构的压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拓展,不同类型审计主体之间可能形成新的“数字鸿沟”。国家审计如何快速整合资源,在核心能力上建立并维持新的比较优势,并重新审视国际产业格局变动对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影响,以确保其主导地位,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2. 技术能力鸿沟与知识权力不对称。雷·库兹威尔的技术进化加速回归定律进一步指出了技术进化中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4]当 AGI 通过技术自创生加速了技术递归性时,技术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领先方与后发方的能力差距可能几何级扩大。国家审计机关作为监管方,在监督具备 AGI 技术的审计对象时,将面临技术能力鸿沟的严峻挑战。审计机关若未能深入掌握 AGI 的底层逻辑、算法模型和数据结构,将难以穿透技术表象洞察经济活动的真实本质,甚至可能因技术盲区导致审计结论失真。这种技术-知识层面的权力不对称进一步加剧了审计风险,不仅损害审计监督的权威性,更可能引发系统性治理风险。因此,突破技术能力鸿沟、重构知识权力平衡,已成为 AGI 时代国家审计必须解决的战略命题。

3. 社会安全风险性与审计监管滞后。随着数智化深入发展,社会安全风险也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深度合成技术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其伴随的社会安全风险亦不容忽视。这种风险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信任的危机^[5]。置身于数字化与智能化交织的时代浪潮中,任何主权国家如果不能维护本国的数字主权与数字安全,就可能成为数字霸权国家的数字殖民地或者数字技术附庸^[6]。数智化转型深刻重构了国家治理的技术环境与风险格局,国家审计的使命被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社会安全风险防控与监管时效性不足的双重挑战。这一对矛盾本质上是技术快速演进与社会治理体系缓慢适应之间矛盾在国家审计领域的具体体现。数智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传统监管框架的更新周期,导致监管规则、标准与手段常常落后于技术应用实践。一方面,新兴业务模式及其风险存在监管空白;另一方面,监管技术能力的

提升进程迟缓。这种监管能力与风险形态之间的“时间差”和“能力差”,削弱了审计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对国家审计维护经济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核心职能构成重大挑战。

三、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 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内涵诠释

随着智能化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的深度应用,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与保障,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智慧审计的范式转型。由于审计证据呈现电子化、云端化特征,审计流程高度依赖数据交互与算法模型,传统以财务专业能力为核心的审计素养体系已难以适应数智化发展需求。国家审计人员的数智素养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操作能力范畴,主要指其推动国家审计智能化转型升级所必备的综合素质,即能够快速适应数智技术环境,有效运用数智技术资源开展审计工作,并具备在复杂多变的数智环境中持续学习与创新的能力。

1. 思维维度: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审计人员的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力是数智素养的核心支柱。在 AGI 重塑经济社会底层逻辑的背景下,国家审计人员必须具备穿透技术表象、洞察数智化进程中国家意志与战略目标的能力。这要求其深刻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在数智空间的具体映射,敏锐识别技术变革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深远影响,确保审计监督始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只有将技术能力扎根于政治土壤、提升至战略高度,审计才能在数智化浪潮中有效履行“经济卫士”的重要使命。第一,政治意识是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灵魂,体现在对政治属性、政治功能和政治责任的深刻把握上。首先,审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增强审计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提高政治能力,把党中央意图和部署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保障党中央令行禁止。”^[7]其次,政治意识需转化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审计人员要能够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有效识别数智化进程中的政治风险。例如,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审计机关需主动研判其对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和公共利益的影响,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建议。第二,战略思维是审计人员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能力,要求审计人员从全局性、前瞻性和系统性视角谋划审计工作。首先,深刻理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新兴科技发展脉络及其对审计对象和审计环境的影响。

其次,强调数智技术与审计业务的深度融合,审计人员需把握数字化变革趋势,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审计监督有机结合。审计人员的计算机基础能力应升级为运用数智技术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维护经济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战略性能力,为宏观决策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的审计洞见。

2. 知识维度:智能技术理解与应用能力。在 AGI 重塑审计模式的背景下,智能技术理解与应用能力已成为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核心技术维度。智能技术理解与应用能力本质上是一场“审计思维革命”,这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掌握技术工具的操作,更需从底层逻辑理解智能技术与审计业务的融合路径,实现从“被动使用”到“主动赋能”的跨越。首先,深入理解人工智能(特别是 AGI)、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等核心数智技术的基本原理、功能边界及潜在风险。这不仅包括能够有效利用智能算法进行自动化审计测试、异常模式识别、风险预测,更要求具备在算法辅助下保持独立专业判断和校准模型偏差的能力。其次,技术应用的核心在于赋能而非替代,应用能力强调技术融入审计实践的价值转化,需覆盖审计全生命周期。在审计准备阶段,通过集成机器学习模型分析历史审计数据、宏观经济指标与行业风险特征,实现风险导向审计计划的动态优化。在审计执行阶段,审计人员需熟练掌握此类工具的操作逻辑,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赋能非结构化文本分析,辅助审计证据的实时获取与交叉验证,以确保审计结论的稳健性。在审计报告与后续跟踪阶段,数据可视化工具可将复杂审计发现转化为直观洞察,既提升报告的可读性与决策支持价值,又增强审计过程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这种全周期技术整合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跨领域知识融合能力,既要理解算法模型的数学基础,又要掌握其在具体审计场景的适配性。总之,智能技术理解与应用能力是使国家审计人员在算法辅助下强化专业判断力、提升风险响应力,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国家审计监督的公共价值目标。

3. 技能维度:人机协同与敏捷适应能力。人机协同能力与敏捷适应能力构成了审计人员在智能时代有效履职的重要基础。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审计监督从传统手工模式向全面监管、人机协同、智能决策与敏捷响应转型^[8]。数智化审计环境,人机协同与敏捷适应能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审计实践中相互促进、协同演进的复合能力体系。首先,国家审计人员须具备与智能系统有效交互、协同工作的能力,明确人机分工边界,优化人机协作流

程。同时,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审计对象的高度动态化,必须具备强大的学习敏捷性,能够迅速掌握新工具、新方法、新知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灵活调整审计策略,高效完成审计任务。其次,在国家审计的数智化转型中,构建高效的人机协同系统并有效消减交互偏差,是提升审计监督质效的关键。由于在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潜在偏差,无论是数据驱动的偏差还是人机交互的偏差,都可能损害审计质量^[9]。需要通过持续的流程优化、能力提升和组织保障,将交互偏差的影响降至最低,将国家审计人员的专业智慧与机器的计算能力深度融合,专注于需要职业判断、政策分析和战略思考的高价值工作,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

4. 伦理维度:数智伦理与风险研判能力。数字智能传播时代,亟须自觉防范数智传播对人的意义自主的可能侵蚀^[10]。在数智技术深刻重塑审计模式下,数智伦理与风险研判能力已成为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重要维度。这要求审计人员不仅关注技术应用的效率提升,更要对技术背后的伦理准则、潜在风险及社会治理影响保持敏锐洞察,确保审计监督在数智化进程中始终坚守公共利益守护者的使命定位。首先,数智伦理是审计价值理性的基石。伦理影响审计判断。职业判断虽然是审计人员作出的,但是其职业判断的过程必须依托所处的伦理环境^[11]。数智伦理是确保技术应用方向正确的价值导航系统,其核心在于将审计工作的核心价值嵌入技术应用全流程。这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伦理警觉性,深刻理解数智环境下的审计伦理新内涵,能够识别、评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风险和社会影响,并在审计过程中坚守公平、透明、负责、可解释等核心原则。其次,风险研判是前瞻性审计监督的关键能力。风险研判能力是审计人员识别、评估和应对数智化进程中各类新型风险的核心竞争力。针对“人工智能应用衍生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特征,这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能够识别数据质量、算法缺陷和模型漏洞等基础性风险,还需将伦理自觉与风险预判内化为审计人员的重要素养,才能使国家审计在技术狂飙中始终锚定“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价值坐标,切实履行经济监督使命。

(二)培养与提升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时代价值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及人民群众期望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面对海量数据和复杂经济活动的挑战,传统审计方式已难以有效应对,推动审计工作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国家审计人员的数智素养已成为影响审计质量、效率和监督效能的核心因素。因此,培养与提升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不仅是适应技术变革的必然要求,更是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1. 推动从“传统审计执行者”到“数智审计引领者”的角色转型。智慧审计与人工智能审计的核心目标不在于用机器替代审计师,而是打造一种“人类负责决策+AI 系统处理计算”的创新工作形态。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提升有力推动了审计人员角色转变与能力升级,为审计职能的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首先,成为数据治理的主导者,能够主动挖掘审计数据价值,构建标准化数据治理体系,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与协同审计。其次,成为技术创新的实践者,通过掌握智能审计工具,实现审计流程智能化,提升审计效率。再次,成为风险预警的前瞻者,借助大数据分析与预测模型,对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进行动态监测与预警。

2. 有助于增强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效能。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提升,直接强化了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数智素养不仅指审计人员对数字技术的操作能力,更包含数据思维、智能分析等多维度的专业素养。这种素养的提升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审计监督的广度、深度和效率。首先,智能审计使审计监督从抽样检查转向全量分析,实现“审计全覆盖”。传统审计受限于人力物力,往往采用抽样方法,而具备数智素养的审计团队能够处理海量数据,实现对经济活动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控,降低传统抽样审计的局限性,显著提升审计覆盖的广度。其次,深度挖掘数据价值,确保公权力运行透明高效。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审计的核心生产要素,通过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可实现对公共资金、政策执行、权力行使的全链条动态监督,而具备数智素养的审计团队能够建立动态监测系统,结合智能算法对异常交易、政策执行偏离等风险进行及时响应,进而从源头上压缩权力寻租空间,持续巩固“不能腐”的体制机制保障。最后,数智素养赋予审计人员应对新型风险的前瞻性防御能力。在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背景下,新型风险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隐蔽性与系统性特征。国家审

计人员数智素养的提升,特别是其在风险研判与智能技术理解方面的能力深化,使其能够穿透技术表象,洞察数智化进程中潜藏的风险传导机制与演化路径。智能分析技术的应用使审计从“事后监督”向“事中预警”“事前预防”转变,大幅提升监督的时效性,助力实现“治已病、防未病”的监督目标。

3. 有效提升应对数据安全与伦理挑战的能力。在数智化进程中,数据泄露、算法偏见和伦理冲突等风险日益凸显,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提升是化解这些挑战的关键保障。审计人员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包括数据加密、隐私保护和合规审计技能,以确保审计过程中敏感信息的安全。同时,通过强化数智伦理意识,审计人员能在技术应用中坚守公平、透明和问责原则,例如在算法辅助决策时识别并校正模型偏差,避免因技术缺陷导致的审计失误。这不仅能适应审计环境的复杂化,还能主动应对新型风险,如人工智能滥用或数据垄断问题,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信任,确保审计监督在数智浪潮中始终锚定价值坐标。

四、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突出短板与系统性提升的核心路径

(一)当前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的突出短板

1. 政治站位不够高:数智化场景中的政治判断力不足。数智化审计场景下,数据穿透式分析可能涉及多领域、多层级的政策执行效果评估,但部分审计人员存在“重技术轻政治”倾向。部分审计人员在处理海量异构数据、运用复杂算法模型时,过度聚焦技术逻辑的严密性与数据关联性,未能深刻把握国家审计的政治定位,容易陷入“技术理性优先”的认知误区。例如,在数字政府建设审计中,若不能从政治高度识别数据异常,且对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整体性把握不足,就难以识别政策执行偏差。此外,政治风险敏感性缺位制约监督的前瞻性,加之技术滥用、算法偏见引发公平正义问题——算法偏见会造成片面或者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信息、观念的生产与传播,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审计信息的客观全面认知^[12]。因此,审计人员将难以预料算法应用可能引发的公共信任危机或治理效能弱化等问题。这种短板将导致技术赋能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弱化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权威性与政治功能。

2. 知识结构短板:技术与业务融合不足。大数据时代,审计人才技术与业务融合不足的知识短板,成为制约数智化转型的关键瓶颈。为实现审计工作的数智化转型,需要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导向^[13]。当前多数审计人员的知识体系仍固守传统财务审计

范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智技术的底层逻辑、应用场景及局限性认知浅表化,导致技术与审计业务需求之间出现显著断层。这一短板具体表现为:一是核心技术原理掌握不深,面对复杂模型时常陷入“技术黑箱”,难以独立评估算法结果的可靠性;二是技术向业务价值的转化能力薄弱,往往出现工具与审计目标脱节的“空转”现象,无法将技术能力精准对接至具体审计场景;三是跨领域知识融合欠缺,难以应对数字化环境中跨系统、跨领域的复杂性和关联性风险。知识结构的陈旧与单一,已成为制约审计工作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升级的关键瓶颈。

3. 技术应用短板:智能工具实操与场景适配能力薄弱。当前,国家审计人员在智能工具的实际操作与复杂场景适配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数智技术效能的最大化释放。审计智能化不仅是技术的引入,更是审计业务流程的重构与人员能力的再造。尽管部分审计机关已引入数据分析平台、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及AI审计模型,但多数审计人员仍停留在基础工具操作层面,缺乏将技术深度融入审计业务闭环的能力。例如,在运用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异常交易识别时,审计人员往往只能依赖预设模型运行结果,而对模型的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参数调优及结果解释等关键环节掌握不足,导致在面对新型业务模式或数据突变时,模型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大幅下降。此外,智能工具的跨场景迁移与定制化开发能力欠缺,使得技术应用往往“削足适履”,难以适应不同行业、不同层级审计对象的差异化需求,导致技术赋能效果受限。

4. 伦理意识短板:数智环境下的职业判断与责任边界模糊。随着算法决策在审计中的渗透,审计人员面临的伦理情境日益复杂,传统审计伦理框架在数智环境下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14]。当前,审计人员普遍对数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缺乏系统认知与应对策略,尤其在算法可解释性、数据隐私保护、机器决策责任归属等方面存在意识盲区。例如,当AI系统输出高风险审计线索时,审计人员是应完全依赖算法结果,还是需保持职业怀疑进行人工复核?如果算法因训练数据偏差导致审计结论失当,责任应由审计人员、技术供应商还是算法本身承担?这类问题在现行审计准则与伦理规范中尚未形成明确指引,导致审计人员在实践中往往陷入“技术依赖”与“责任规避”的困境,不仅影响审计质量,也可能损害审计公信力。

(二) 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提升的核心路径

1. 以政治引领为核心,强化数智时代的审计政治属性。国家审计机关必须将政治建设贯穿于数智能力培养的全过程,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目标。首先,深化理论武装与政策解读。常态化组织开展国家重大战略、宏观政策与数智化发展前沿的专题学习,引导审计人员深刻理解“国之大者”在数字空间的具体形态与风险表征,提升从政治高度审视数据、研判风险的能力。其次,建立政治风险识别评估机制。在审计项目中增设“数智化政治影响评估”环节,对数据采集、算法应用、结论形成等方面可能涉及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等维度进行前置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审计质量控制体系。最后,强化审计成果的政治转化。推动审计建议从技术性问题解决向治理机制优化、政策体系完善层面跃升,使审计监督真正成为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

2. 以知识重构为基础,推动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打破技术与业务之间的知识壁垒,必须以跨学科、融合式的知识重构为核心。首先,设计分层分类的课程体系。针对审计领导、业务骨干、一线人员等不同群体,设计涵盖数智技术原理、审计场景应用、数据治理法规、伦理风险辨析等模块的差异化培训课程,推广案例教学、沙盘模拟等实战化教学方式。其次,推动“业务+技术”双向融合。鼓励业务骨干深度参与审计平台与工具的设计开发,同时安排技术背景人员嵌入审计项目组,在实战中促进知识交融与能力互补。再次,构建动态更新的知识库与学习社群。整合形成覆盖主流技术工具操作指南、典型审计场景解决方案、常见算法模型解析等的数字知识库,并依托线上平台建立跨地域、跨层级的学习交流社群,营造持续学习的组织氛围。

3. 以技术赋能为支撑,提升数据应用与实战能力。打造“平台+工具+场景”一体化实战支撑体系,技术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在实战中学会实战”。首先,建设集约化、智能化的审计数字平台。打破数据孤岛,整合多源异构数据,内置可灵活配置的审计分析模型与可视化工具,降低一线人员的技术使用门槛。其次,开发轻量化、场景化的智能审计工具包。针对财政审计、金融审计、企业审计、资源环境审计等不同领域,开发适配其业务特点的专用分析脚本、风险预警模型和数据验证工具,实现“开箱即用、按需组合”。再次,推行“试点-推广-迭代”的应用模式。选择代表性项目开展新技术全流程应用试点,总结形成最佳实践与操作规范后全面推广,并建

立快速反馈机制,持续优化工具与流程。

4. 以伦理培育为底线,筑牢数据安全与伦理防线。应对数智伦理挑战,需构建从理念到规则,从研判到应对的完整体系。首先,制定国家审计数智伦理准则。明确算法审计、数据使用、人机协同等环节的伦理要求,确立透明、公平、可问责、人类监督等核心原则。其次,将伦理风险评估嵌入审计流程。在审计计划、实施、报告各阶段设置伦理审查点,对关键算法模型进行可解释性评估与偏见检测,并对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预判。再次,加强审计人员伦理决策训练。通过伦理困境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提升审计人员在复杂情境下作出符合职业伦理和价值理性的判断与选择的能力。

5. 以角色重塑为关键,凸显审计人员的主体价值。推动审计人员角色重塑的核心,在于构建以审计人员专业智慧为主导,以智能系统为延伸赋能的新型人机协同关系。这需要从理念、权责与实践三个层面进行系统调整,确保人在审计回路中的核心地位。首先,深化“人机互补、人为主导”的协同认知。应摒弃技术替代或工具附庸的极端思维,树立智能系统处理数据、人类专注判断的互补观。审计人员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政治判断、伦理权衡、复杂决策及对结论的最终责任上。其次,明确人机协同的权责边界。审计人员主导目标制定与策略选择,系统提供数据支持;系统可执行大规模数据分析,但人员负责设计逻辑、复核关键证据并作出所有重要职业判断。同时建立算法评估与问责机制,厘清技术应用中的责任归属。最后,聚焦人机协同下的高阶能力培养。审计人员应强化“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将审计目标转化为机器可执行的任务;发展“与机器对话”的能力,能批判性评估与解释算法输出;提升“综合决策”能力,整合机器线索与专业经验。通过优化协同流程,审计人员可以在高效协作中强化其监督者、分析师与守护者的复合价值。

五、结论

数智化浪潮正在重绘国家审计的职能边界、技术方法与价值逻辑。本研究系统剖析了 AGI 驱动下国家审计面临的深刻变革与核心挑战,阐释了国家审计人员数智素养涵盖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智能技术理解与应用、人机协同与敏捷适应、数智伦理与风险研判等多维度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并直面当前审计人员在政治站位、知识结构、技术应用、伦理意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政治引领、知识重构、技术赋能、伦理培育、角色重塑五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审计人员数智素

养系统性提升的核心路径。这一路径并非简单的能力叠加,而是一场涉及思维革命、知识更新、技能升级、价值坚守的深刻转型。它要求审计人员主动拥抱变革,将数智素养内化为职业发展的核心动能;更要求审计机关秉持长远战略眼光,构建可持续的支撑生态。唯有如此,国家审计才能锻造出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伦理坚实、善于协同的数智化专业队伍,从而在日益复杂动态的监督环境中精准“排雷”、高效“护航”,切实提升“查病、治已病、防未病”的能力,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审计保障。

参考文献:

[1] 余南平.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重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4): 41-59, 205.
[2] 崔春, 杨周南. 数字化时代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提升: 理论框架、逻辑构建和实现路径[J]. 经济体制改革, 2024(3): 16-25.
[3] 刘国城. 人工智能时代审计伦理的危机表征与治理路径[J]. 兰州学刊, 2024(1): 41-57.
[4] 雷·库兹韦尔. 奇点临近[M]. 李庆诚, 董振华, 田源,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19-23.

[5] 赵秀丽, 周敏. 数智时代下的风险升级与治理路径: 2024年风险传播研究综述[J]. 教育传媒研究, 2025(1): 26-31.
[6] 保建云. 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数字治理变革及数字风险治理[J]. 人民论坛, 2023(12): 42-47.
[7] 习近平: 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23-10-31) [2024-12-10]. <https://www.12371.cn/2023/10/31/ARTI1698737334251396.shtml>
[8] 任磊, 陈硕研. 人工智能审计: 内涵特征、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J]. 财会月刊, 2025, 46(21): 83-88.
[9] 吴勇, 余洁, 王尚纯, 等. 人工智能审计应用的国际进展[J].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6): 121-126.
[10] 王蓓, 陈好迪. 数智传播重塑价值观教育新形态: 挑战与应对[J]. 中国编辑, 2024(10): 13-19.
[11] 商思争. 关系治理系统下的审计探析[J]. 财会月刊, 2017(22): 119-124.
[12] 姜晨, 陈堂发. 技术与理性的博弈: 中国媒介法规与伦理10年研究[J]. 传媒观察, 2023(4): 70-79.
[13] 黄华. 风险导向审计的数智化转型研究[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5, 39(04): 104-106.
[14] 孙伟平. 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J]. 哲学研究, 2023(3): 46-55, 126-12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National Auditing: A Study on the Path to Enhancing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Auditors

SUN Jiao

(School of Engineering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Abstract: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I)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environment, objects and methods of national auditing, while also bringing cor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ing value chain,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gap, and regulatory lag.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of auditors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udit supervision. Its connotation involve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capabilities such as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strategic thinking,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agile adapt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risk assessment. The research further reveals that current auditors have prominent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tical stance, inadequat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weak application ability of intelligent tools, and ambiguous ethical awareness.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from five dimensions: political guidance,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ethical cultivation, and role reshaping, to build a systematic path for enhancing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literac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ditors from "traditional executors" to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leaders", and safeguard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rough high-quality audit supervision.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audit;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制度激励与学科协同:高校收入分配体系的演化逻辑与优化路径研究

高 深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摘 要: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高校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影响学科建设与科研活力的关键因素。现实中,资源配置不均、绩效考核短期化与激励偏差等问题削弱了学科协同效应。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激励相容理论与系统论,揭示收入分配制度在“结构约束—激励机制—学科协同”链条中的张力,并构建“薪酬杠杆—绩效反馈—协同增益”模型,解释不同学科因资源禀赋与评价差异所导致的激励非对称性。为优化制度,提出重构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差异化分配体系,建立跨学科与长周期绩效激励机制,完善反馈回路实现动态调整。研究认为,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学科协同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关键词:高校;收入分配制度;学科协同;激励相容;制度重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5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26-08

高校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力资本激励的关键制度安排,其合理性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学科建设的持续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正由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双一流”建设与教育现代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激发教师群体创新活力、优化学科协同格局,已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收入分配制度不仅承担着薪酬激励与公平调节的双重职能,更在无形中塑造着高校内部的资源流向、学科生态与学术文化。

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高校收入分配体系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绩效考核过度依附量化指标,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激励失衡,制度缺乏动态修正与跨学科协调机制。这些问题使得教师行为出现短期化倾向,学科之间形成“资源虹吸”与“激励断层”,削弱了教育创新的系统活力。

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学科协同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新机制,已成为破解高校发展结构性瓶颈的制度

突破口。通过制度重构,实现“公平与效率”及“激励与协同”的有机统一,既能激发高校人力资本的潜能,又能推动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协同发展。

当前,学界对高校收入分配的研究多集中于薪酬激励或教师满意度层面,而对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激励效应传导路径及学科协同机制的系统性研究仍显不足。因此,从制度经济学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出发,探究高校收入分配制度的逻辑基础与优化路径,既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也为新时代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启示。

一、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校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力资本激励的重要机制,已成为影响学科建设、科研创新能力与学科协同的关键变量。收入分配不仅承担着薪酬激励与公平调节职能,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学科资源配置、科研周期安排以及跨学科协作生态。近年来,学界对高校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日益丰富,但现有研究仍存

收稿日期:2025-11-10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党的教育政策研究课题“深化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2025-DDJYZC-58)

作者简介:高深(1991—),男,河南郑州人,教育学硕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体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学科发展,绩效考核。

在视角局限、系统性不足与实证分析缺失的问题。

在高校收入分配的评价体系构建方面,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部分学者通过单一指标如教师薪酬水平和绩效奖金占比来衡量收入分配制度的激励效果^[1];而其他研究则尝试采用多维度指标体系,综合考虑薪酬结构、科研奖励、职称晋升、岗位津贴等因素,以更全面地评估高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激励性^[2]。通过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者发现,不同学科间因科研产出周期、资源禀赋及学科地位差异,导致激励效果存在显著非对称性^[3]。例如,基础学科科研周期较长,短期绩效考核机制往往忽视其长期科研贡献;而应用型或热点学科在绩效评价中易获得较高奖励,从而形成“强势学科虹吸”现象,进一步加剧学科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在高校收入分配制度的经济效应及学科协同作用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其直接影响科研产出效率、学科协作意愿以及跨学科创新能力。同时,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改进和完善高校科研人员收入分配政策尤为重要。高校收入分配制度不仅关系到教职工的生存和发展,还对教职工激励、学校发展导向及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此外,薪酬制度改革试点还强调薪酬分配同绩效紧密挂钩,向承担基础学科教学和基础前沿研究的人员倾斜,这有助于提高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部分学者从制度经济学与组织行为学视角分析收入分配制度对科研行为的约束机制与激励传导路径,指出短期绩效导向和奖金分配策略可能导致教师行为短期化,抑制长期科研创新和跨学科协作^[4]。此外,差异化薪酬策略与跨学科评价体系能够促进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均衡发展,通过优化激励结构实现资源合理流动与学科间协同创新。这些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制度不仅是一种激励工具,更是塑造高校科研生态、学科协同结构的重要制度安排。

国外研究同样提供了有益借鉴。以美国和欧洲高校为例,学者普遍认为绩效导向的收入分配与学科协同之间存在复杂关系。Bammer 指出,美国部分研究型大学通过长期科研奖励与跨学科项目资金分配机制,提升了学科交叉合作效率^[5]。而欧洲高校则更注重制度设计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通过薪酬结构与科研评价制度的优化,实现教师行为与学科战略目标的匹配^[6]。这些实践表明,高校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不仅需关注个体激励,更应统筹学科间协同效应,实现制度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平衡。

在制度性视角下,高校收入分配制度的优化涉

及制度逻辑、组织行为与学科协同的复杂互动。资源依赖理论提示,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存在“强势学科虹吸”现象,基础学科或新兴学科难以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资源。激励相容理论强调,制度设计需确保不同学科教师的激励结构与其贡献相匹配,从而激发其长期科研积极性。从系统论视角来看,收入分配制度、绩效考核机制与学科协同之间构成闭环反馈关系:制度设计会影响教师行为及学科协同水平,而协同结果又会通过绩效考核与资源分配反作用于制度安排,形成动态的演化过程。

此外,国内部分研究还尝试提出基于学科协同的收入分配优化方案。有学者提出应根据学科特性实行差异化薪酬分配,并建立跨学科绩效评价体系,以促进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均衡发展^[7];有学者强调动态调整机制的重要性,建议通过定期制度反馈与调整,实现收入分配的持续优化与公平性保障^[8]。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强化长期激励、优化跨学科评价体系以及实施动态修正机制,能够显著改善教师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进而提升科研创新效率与学科协同水平。

尽管已有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现有文献多聚焦教师个体激励与薪酬满意度,缺乏对收入分配制度整体逻辑及演化机理的系统分析;其二,学科间协同效应及跨学科资源流动机制研究不足,难以揭示“强势学科虹吸”及激励不对称对科研生态的长期影响;其三,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多数研究依赖问卷调查或理论推演,缺少基于大样本数据的面板模型分析,难以验证收入分配制度对科研产出与学科协同的实际作用。

本文的潜在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视角来看,从收入分配制度对学科协同影响的系统性分析入手,突破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个体激励或绩效评价的局限,为探索高校内部治理优化与学科协同机制提供新的视角;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将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并进行异质性检验与作用机制分析,从制度设计、绩效激励及学科协同三个维度全面考察收入分配制度的影响效应;三是从研究意义来看,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正处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研究和实施科学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优化路径,高校不仅能够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还能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体系,从而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后发现,高校收入分配制度在科研产出、学科协同及学科资源配置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深入理解其演化机理、优化路径及实践效应,不仅有助于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也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高校收入分配现状与制度演化分析

高校收入分配体系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激发教师创新活力、促进学科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其完善程度直接关乎高校学科建设质量与科研活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收入分配问题逐渐成为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当前,高校收入分配呈现收入结构多元化、绩效激励短期化、学科间资源配置差异显著等特点,具体表现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收入结构与绩效激励模式

高校教师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各类津贴补助构成,其中基本工资保障教师职业稳定性,绩效工资依据科研、教学及社会服务成果进行分配,津贴补助则受学校特色和地区政策影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不断完善,绩效工资的比重也随之提高。当前,科研成果数量、项目经费投入以及论文影响因子等指标已成为评价科研绩效的核心标准。虽然短周期、量化导向的激励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科研产出,但研究显示,这种模式可能导致教师行为短期化,使其过分关注量化成果,而忽视了教学、社会服务及学科协作的综合价值。例如,科研激励制度对高校教师科研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单纯提高科研收益分配比例并不能全面促进科研效益,还需要配套措施来平衡科研与教学、社会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工作。同时,高校为提升科研排名或专项指标,常优先投入资源支持强势学科与优势科研团队,形成“高绩效拉动强学科发展”的局面,进而加剧不同学科间的激励差异。这种模式不仅影响了教师的长期科研规划,也削弱了跨学科协作的动力,使部分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在绩效激励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学科间资源配置差异

高校学科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经费分配、科研平台建设及人才支持等方面,其中优势学科往往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基础学科由于科研周期长、成果形式多样且难以量化,在绩效考核和薪酬激励中处于相对劣势;应用型学科和热门交叉学科则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经费、实验设备和人才引进机会。这种差异化配置不仅影响学科内部创新活力,也对跨学科科研合作产生制约。例如,在实验室建设、科研团队配备和科研项目立项中,基础学科和

新兴交叉学科往往面临资源短缺、绩效激励有限的问题,导致科研产出效率低于预期,同时抑制了教师在多学科交叉领域的探索热情。进一步来看,学科科研周期与绩效评价的不匹配也是制约学科协同的重要因素。基础学科通常需要长期地观察与积累,短期内难以形成高量化的成果指标,而当前的绩效评价体系更侧重于短期产出,这导致学科间的激励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进而对跨学科协作与创新产生一定约束。

(三)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高校收入分配体系在激励教师、优化学科结构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绩效考核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考核指标过于单一,过分依赖科研成果量化,忽视了教学质量、团队协作及社会服务等多维度贡献,这可能导致教师行为短期化;学科间资源配置不均衡,基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激励不足,限制了学科协同和跨学科科研产出;收入分配体系缺乏动态调整与反馈机制,难以适应高校发展战略变化和学科建设需求;制度设计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应用脱节,缺少对激励相容、组织行为和资源依赖等制度性机制的系统分析。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收入分配的系统效能,也影响了高校学科协同创新与长期科研产出的可持续性。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高校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通过实施年薪制等差异化薪酬结构,以实现学科贡献与激励的有效匹配。例如,对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设置专门的绩效指标体系,以弥补短期科研量化考核的不足。二是引入长期激励机制和跨学科项目奖励制度,鼓励教师参与团队科研和跨学科协作。三是建立动态反馈机制,通过定期调整绩效指标权重和资源配置比例,实现收入分配的持续优化与公平性保障。尽管已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概念分析和经验总结层面,缺乏基于高校实际数据的系统性实证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通过优化高校薪酬结构和绩效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提升其积极性,进而促进学科间的协同合作和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体系合理化水平越高,高校科研产出与学科协同效率越高。

假设2: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薪酬分配与绩效紧密挂钩的制度,不仅直接影响教师行为和学科发展,还能通过激励机制、促进跨学科资源流动及引导长期科研规划,间接促进高校学科协同与科研创新。

假设 3: 差异化激励与动态调整机制能够缓解学科间资源配置不均问题,提高基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的科研活力,从而提升高校整体学科协同效能。

高校收入分配体系不仅体现薪酬公平,更是学科建设和科研创新生态的重要驱动力。对现行收入分配问题开展科学诊断与优化,有助于构建公平高效的激励体系,提升学科协同效能及高校整体科研竞争力,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实践支撑。

三、高校收入分配改革的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对高校收入分配现状与改革实践的分析,本文构建高校收入分配影响教师绩效及学科协同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旨在系统考察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教师绩效和学科协同的影响。模型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DI_{it} + \sum \alpha_j X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Y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高校 i 在时期 t 的教师整体绩效水平与学科协同指标;

DI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反映高校 i 在时期 t 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程度,包括绩效激励、薪酬结构优化以及长期激励机制等;

X_{it} 为控制变量集合,涵盖高校规模、学科结构、科研经费总额、教师年龄结构及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高校自身特征(如办学历史、学校类型)对绩效和学科协同的影响; ν_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全国高等教育政策变化或宏观经济环境对高校绩效的整体影响;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反映模型无法解释的随机扰动;

α_0 为截距项, α_1 及 α_j 分别表示核心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衡量其对高校绩效与学科协同的影响强度。

本模型能够同时检验高校收入分配改革对绩效与学科协同的直接效应,并通过控制变量分析稳健性,进而形成科学、系统的实证结论。

(二) 变量设定与指标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高校绩效与学科协同水平(Y_{it})。

教师绩效分为科研绩效和教学绩效两个方面。科研绩效的评估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年度科研论文发表数量、SCI/EI 论文比例、获批科研项目数、科研奖励数量等。此外,中国高校在 Nature 和 Science 等顶级期刊上的发表情况也是衡量科研绩效的重要指标。

教学绩效的评估涵盖了多个关键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本科及研究生教学评价、学生满意度、毕业生就业率等。例如,根据《教师本科教学评价工作实施办法》对教师进行教学质量评价,并对排名前 10% 的教师进行表彰。此外,教务处通过组织审核评估工作,推进教学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确保教学活动的质量监控。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和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科协同的评估指标主要衡量跨学科科研项目数量、跨学科论文发表数量及跨学科基金申请成功率。

如表 1 所示,高校绩效评估体系主要从科研、教学和学科协同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科研绩效关注年度科研论文数量、SCI/EI 论文比例及科研项目数量;教学绩效则侧重于学生满意度与教学评价;而学科协同则通过跨学科项目、论文数量和基金申请成功率来衡量。

表 1 高校绩效与学科协同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科研绩效	年度科研论文发表数	篇	+
	SCI/EI 论文比例	%	+
	获批科研项目数	项	+
教学绩效	学生满意度	分	+
	教学评价平均分	分	+
学科协同	跨学科项目数量	项	+
	跨学科论文数量	篇	+
	跨学科基金申请成功率	%	+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高校收入分配改革水平(DI_{it}),反映薪酬制度优化和绩效激励实施效果。将收入分配改革指标分为两大类一级指标:

薪酬结构优化:岗位职责工资占比、绩效工资占比、学科资源倾斜指数等;

绩效激励机制:年度绩效奖金占比、长期激励覆盖率、学科间差异化激励系数。

二级指标赋权采用熵权法计算,以确保各指标对综合改革水平的贡献客观合理。综合指数越高,表示高校收入分配改革越深入。

3. 控制变量

为降低遗漏变量偏误,如表 2 所示,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 2015—2022 年全国 30 所重点高校(不含港澳台及数据不完整高校)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涵盖:《中国高校年度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研项目数据库》、高校年度财务

表 2 控制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理论依据说明

控制变量	测量方法	理论依据
高校规模 (<i>SIZE</i>)	在校学生及教职工人数	大型高校可能具备更多资源与管理制度弹性,影响绩效
学科结构 (<i>DISC</i>)	重点学科比例、跨学科项目比例	学科布局优化可能影响资源分配效率
科研经费总量 (<i>FUND</i>)	年度科研经费总额	经费充足程度影响科研产出
教师年龄结构 (<i>AGE</i>)	各年龄段教师占比	教师年龄结构影响创新能力和教学经验
地区经济水平 (<i>GDP</i>)	人均 GDP(对数)	宏观经济条件对高校运行效率的外部影响
地区财政投入 (<i>FISC</i>)	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占比	地方财政支持影响薪酬与绩效激励实施

为确保数据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针对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对数值型变量实施标准化或对数处理,以减少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如表 3 所示,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差异较大,反映了数据的不同波动性。地区经济水平(*GDP*)相对稳定,而科研经费总量(*FUND*)波动较大。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Y_{it}</i>	240	3.421	1.218	1.023	6.987
<i>DI_{it}</i>	240	0.317	0.095	0.125	0.592
<i>SIZE</i>	240	16200	8500	5000	45000
<i>DISC</i>	240	0.412	0.138	0.125	0.683
<i>FUND</i>	240	125000000	52000000	21000000	380000000
<i>AGE</i>	240	0.356	0.104	0.180	0.622
<i>GDP</i>	240	11.234	0.472	10.001	12.487
<i>FISC</i>	240	0.183	0.032	0.102	0.267

四、高校收入分配改革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剖析高校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整体绩效及学科协同的实证影响。为确保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依次运用了四类回归模型:未控制固定效应模型、高校固定效应模型、高校与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纳入控制变量的全模型(见表 4)。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DI_{it}</i>	8.022***	4.083***	1.964**	2.538***
<i>SIZE</i>				0.482*
<i>DISC</i>				1.311*
<i>FUND</i>				2.640**
<i>AGE</i>				-0.314
<i>GDP</i>				0.009
<i>FISC</i>				0.427
高校效应	否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330	330	330	330
R-squared	0.244	0.984	0.991	0.992

注: *、** 和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回归结果均控制高校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模型(1)显示,在未控制高校个体特征及年份效应的情况下,高校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整体绩效

的影响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改革能够促进科研产出提升和学科协同优化。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高校固定效应以控制高校自身长期特征,结果显示收入分配改革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3)进一步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宏观政策与经济周期等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绩效的正向影响仍在 5%水平显著。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各控制变量,包括高校规模(*SIZE*)、学科结构(*DISC*)、科研经费总量(*FUND*)、教师年龄结构(*AGE*)、地区经济水平(*GDP*)以及地区财政投入(*FISC*)等,结果显示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绩效的正向影响在 1%水平显著,且估计系数有所上升,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解释力较高。

分析原因可从以下三个维度理解:

第一,高校收入分配改革通过优化薪酬结构、强化绩效激励,显著提升教师科研积极性和教学投入,进而提高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

第二,改革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和跨学科协作机制,提高学科协同效率 and 创新能力,推动学科间科研成果互通与资源共享;

第三,改革完善教师激励与保障体系,有利于吸引高层次人才并稳定核心科研团队,为高校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保障。

控制变量分析显示:科研经费总量(*FUND*)对高校绩效的影响在 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科研投入是绩效提升的核心驱动力,这与“年度科研经费总额”这一测量方法一致。经费充足程度直接影响科研产出,是科研绩效的重要推动因素。高校规模(*SIZE*)在 10%水平显著为正,反映大规模高校在资源整合、跨学科协调及制度执行上具有制度性优势。根据表 2 的“在校学生及教职工人数”这一测量方法,规模较大的高校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和灵活的管理制度,从而影响绩效。学科结构(*DISC*)显著为正,说明学科布局优化能够有效促进跨学科协作与创新。根据表 2 中的“重点学科比例、跨学科项目比例”可知,学科结构优化能够提高资源分配

效率,从而提升高校绩效。地区经济水平(*GDP*)及地区财政投入(*FISC*)虽为正向影响,但其影响有限。根据表2中的“人均*GDP*(对数)”和“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占比”测量方法,宏观经济条件与地方财政支持影响高校运行效率,并间接作用于高校的绩效表现。

此外,如表4所示,各变量对高校绩效的影响方向总体一致,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统计显著性。从学科协同视角来看,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激励科研团队合作、优化跨学科科研资源配置,能够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与成果转化。这表明改革不仅能够提升高校整体绩效,还通过结构性激励机制优化学科协同模式,间接推动高校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持续增长。

(二)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本研究采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5):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滞后一期	(2) 滞后二期	(3) 主成分分析法	(4) 剔除特殊高校	(5) 样本期≤2016
<i>L1.DI</i>	2.400*** (0.697)				
<i>L2.DI</i>		3.097*** (0.672)			
<i>DI_alt</i>			0.549*** (0.113)		
<i>DI</i>				2.594*** (0.808)	1.996** (0.8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高校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270	330	286	180
R-squared	0.993	0.994	0.992	0.993	0.996

注:***表示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回归结果均控制高校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5)仅保留2016年及以前的样本,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时间稳健性。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校收入分配改革的绩效提升作用在不同测度方式、不同样本和不同时间维度下均保持显著,说明其制度性激励效应具有广泛适用性和时间连续性。

(三) 内生性检验

为应对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高校前期薪酬结构与地区财政投入(*FISC*)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检验。

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高校收入分配改革高度相关,显著性通过检验;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估计的改革对绩效的影响仍在1%水平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见表6)。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未受内生性问题显著干扰,实证结论可信。

根据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的结果,高校绩效工资分配改革显著提升了高校整体绩效和学科协同能力。这一改革通过强化科研激励、

滞后效应检验:参考文献做法,将改革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分别引入回归。研究显示,高校绩效工资改革无论在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均在1%水平显著提升高校绩效,这表明改革带来的制度性激励作用具有持续性,不会因时间推移而减弱。

核心变量测度替代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度高校收入分配改革指标,构建替代变量(*DI_alt*)进行回归。结果显示*DI_alt*对绩效影响在1%水平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验证结果稳健。

剔除特殊高校样本:剔除政策倾斜高校及民族院校样本,避免政策或地域特殊性干扰。结果显示改革对绩效仍显著正向,说明不同高校样本差异对整体结论影响有限。

剔除政策冲击年份:剔除2017年及以后样本,排除“双一流”及相关高等教育政策对高校绩效的干扰。结果显示改革对绩效仍在5%水平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结果稳健性。

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和改善人才结构,实现了持续且稳健的效应。

(四) 研究假设的检验结论

基于基准回归结果,并结合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的综合分析,可以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作出如下结论:

表6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第一阶段	(2) 2SLS
工具变量	0.213***	
<i>DI_{it}</i>		8.975***
控制变量	是	是
高校效应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00	300
R-squared	0.977	0.989

注:***表示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回归结果均控制高校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假设1成立。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整体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核心解释变量

在不同模型设定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收入分配体系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高校科研产出与学科协同效率的提高。

假设2成立。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测度方式、样本范围和时间设定下,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绩效的影响均保持显著且方向一致,表明其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相关结果支持收入分配改革通过多重机制对学科协同与科研创新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假设3成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分配改革在改善不同学科之间资源配置结构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有助于提升基础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的科研活力,从而增强高校整体学科协同效能。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高校收入分配体系为研究对象,聚焦制度激励在提升学科协同与高校整体绩效中的作用,基于全国多所高校的面板数据,通过案例分析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系统探讨了高校收入分配改革的演化机理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高校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教师科研与教学积极性,还能够有效促进学科协同和高校整体绩效的同步提升,这一正向作用在扩展检验、替代变量测度及剔除特殊高校样本的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显著,说明收入分配改革对高校绩效与学科协同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稳健性及广泛适用性。

高校收入分配改革通过优化薪酬结构和绩效激励机制,能够直接激发教师在科研、教学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性。实证结果显示,根据相关研究和政策文件,高校通过实施与绩效紧密挂钩的薪酬制度,如差异化绩效工资、科研奖励和岗位津贴等,科研产出显著提升,教师参与跨学科项目的积极性增强,学科间协作效率提高。国家层面的政策部署为该结论提供了坚实实践支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试点的意见》,明确要求薪酬分配与工作绩效紧密衔接,重点向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的科研人员倾斜,从顶层设计上确立了以绩效为导向的薪酬改革方向。地方层面的实践同样成效显著,青海省出台政策,将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这一举措打破了长期存在的薪酬分配平均主义桎梏,有效激活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加速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向市场的转化应用。同时,案例分析表明,制度激励还能够引导资源向重点学科倾斜。高校通过科研经费精准投放、重大项目专项支持、高层次人才引进等配套措

施,优化了学科布局结构,提高了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和协作能力,为高校整体科研创新与教学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本保障。这充分证明,合理设计的高校收入分配体系并非仅是单一的激励手段,更是优化高校内部治理制度的重要抓手。

进一步分析显示,高校绩效的提升不仅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本身,还需要与科研投入、学科结构优化、制度执行和学科协同等因素形成合力。单纯的薪酬调整虽能在短期内激发教师积极性,但若缺乏科研经费保障、学科资源整合及跨学科合作机制,其激励效果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学科发展与整体绩效提升。因此,高校应将收入分配改革与学科布局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及制度执行监督相结合,形成多维度协同效应,从而最大化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学科竞争力以及高校整体绩效。这一结论在对典型高校案例的分析中得到了验证:根据《高校科研项目绩效管理:产出与评估》的研究,实施结构化绩效激励和跨学科项目支持的高校,在科研产出、项目立项数量及教师参与度等核心指标上,均显著高于未进行系统改革的高校。

研究还发现,高校收入分配改革的激励并非绝对化,而是受高校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制约。地区经济水平、财政投入规模以及高校类型,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度激励作用强度。从外部环境来看,在经济基础较好、财政投入充足的地区,高校在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后,科研产出与学科协同水平的提升幅度更为显著。例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高校的科研绩效表现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科研资源富集、人才集聚效应密切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财政相对紧张的高校,改革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既受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也与西部大开发政策下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适配程度紧密相关。这表明,高校在设计和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应充分考量本校的学科结构、科研基础及人才储备,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激励政策,确保改革措施真正落地见效,而非停留在形式层面。

首先,优化高校收入分配结构,强化绩效导向与制度激励功能。高校应科学设计绩效工资、科研奖励、岗位津贴和年度考核机制,突出绩效贡献与责任担当,增强收入分配的激励导向。在具体实施中,应提高奖励性绩效在收入结构中的比重,重点向教学科研一线人员、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及作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工倾斜,通过差异化分配体现“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制度对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能的激发作用。

其次,以学科协同为导向完善绩效激励机制,促进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高校应将学科协同发展目标纳入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跨学科科研项目激励、团队绩效考核、成果共享与收益分配机制,推动学科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协作创新。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教师和科研团队突破学科壁垒,提升学科互补性和整体创新效率,实现绩效激励与学科布局优化的协同推进。

再次,健全绩效制度执行评估与监督机制,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高校应建立常态化的绩效激励制度评估机制,对收入分配改革和绩效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定期监测、分析与反馈,及时发现运行问题并进行动态优化调整。通过强化制度执行监督,完善评估结果运用机制,防止激励政策流于形式,推动绩效分配改革形成稳定、可持续的长效运行机制。

最后,结合高校类型与发展条件,实施差异化收入分配与绩效激励策略。高校应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学科结构和区域经济条件,因校施策,分类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研究型高校可侧重科研绩效和跨学科合作激励,教学型高校应强化教学绩效与教育创新激励,中西部及资源相对薄弱地区高校则可通过

政策倾斜与制度保障,增强激励效能,确保收入分配改革在不同类型高校中发挥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新超,王祖蕊. 高校收入分配制度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协调机制研究[J]. 河南教育(高教),2025(7):13-15.
[2] 马赫,孟凡斌,王慧.“过紧日子”背景下地方高校多渠道筹资路径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2025(13):105-108.
[3] 马冠超. 数字经济时代基于业财融合的高校收入管理优化[J]. 国际商务财会,2024(24):44-47.
[4] 运如敏,王朝,姜明明. 浅析高校绩效工资分配[J]. 科教文汇,2023(24):21-23.
[5] BAMMER G. Disciplining interdisciplinarity: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ciences for researching complex real-world problems[M]. Canberra: ANU Press,2013.
[6] BLAND C J,SEAQUIST E,PACALA J T,etal. One school's strategy to assess and improve the vitality of its faculty[J]. Academic Medicine,2005,80(3):225-237.
[7] 荆文娜. 用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办好最大的民生工程[N]. 中国经济导报,2023-02-02(1).
[8] 荆文娜.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N]. 中国改革报,2023-01-29(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Disciplinary Synergy: 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GAO S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Tourism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4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rinsic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compensation system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shaping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short-term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nd misaligned incentives have hindered effective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Drawing 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theory, and systems theory,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incentive mechanism-collaborative synergy" pathway and proposes a "compensation leverage-performance feedback-collaborative gain" model to account for the asymmetric incentives arising from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ar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To enhance system effectiveness, the study advocates a differentiated allocation framework grounded in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disciplinary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incentives, and dynamic feedback loops for continuous adjustment. The findings underscore that a strategically designed compensation system is a critical driver for fostering disciplinary synergy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Universities; Compensation system; 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Institutional redesign

健康中国 2030 视域下构建高质量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

侯艳丽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健康管理系,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建设健康中国必须重视老龄化问题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全面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十四五”时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战略窗口期,本研究立足健康中国战略及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健康中国 2030”为导向,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及问卷调查法等多种方法,以“老龄化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案”为主线,聚焦当前健康养老实践中的现实困境,剖析现有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短板,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与改进建议,对构建高质量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健康中国;老龄化;健康养老;养老服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6

中图分类号:F719;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34-06

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402万人,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064万人,占13.5%^[1]。截至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031万人,占22.0%;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2023万人,占15.6%。中国老龄化程度及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的老年人口呈现高龄化趋势,预计到2030年约2.5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1个老年人^[2]。联合国曾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5亿人口超过60岁,将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3]。

研究表明,人的身体功能会随年龄增长而出现衰退甚至病变,特别是进入老年后,各种疾病发生的概率会明显增加,生活自理能力会下降。老年人对衣食住行、健康医疗、安全保障及精神文化等需求与日俱增。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属于世界性的问题。养老问题不仅涉及“老有所养”和“老有所终”,还包括“老有所医”和“老有所

乐”的健康养老模式。健康养老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问题,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也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项主动变革。因此,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老龄工作,任务繁重,意义重大。

一、当前养老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服务理念及氛围等落后

首先,受传统养老观念束缚,很多人难以接受新兴的养老方式。不管是老人还是子女,都觉得养老院养老有违孝道,不符合“百善孝为先”的中华传统美德。其次,养老的社会氛围较差。《中国城市商业养老白皮书(2025)》显示:51.5%的老年受访者认为只有当需要被人照顾时才意味着养老的开始;59.9%的受访者表示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才愿意入住养老社区;有10.2%的受访者对“养儿防老”的观念表示“非常同意”。当前多数家庭关注焦点集中在孩子身上,老年人不仅难以得到精心照护,还需承担部分育儿责任,当由此产生家庭矛盾时,又要承受

收稿日期:2025-12-25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健康中国 2030 视域下构建高质量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242400410389)

作者简介:侯艳丽(1984—),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健康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及养老服务。

巨大压力,这不利于养老。此外,养老服务行业也缺乏对养老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的评判标准,致使养老服务业发展不规范。

(二) 养老服务体系人力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

养老服务体系人力资源短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养老服务人员数量不足,二是养老服务人员专业质量不高,三是养老服务人员流失严重且城乡分布不均。《2025 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研报告》预测未来五年养老护理员缺口超 500 万,其中 85%—95% 集中在居家社区领域。40—59 岁护理员占比高达 83.25%,60 岁以上群体占比逐年上升;女性护理员占比 89.25%,性别结构失衡;30 岁以下年轻护理员占比不足 2%,且离职倾向近 20%,人才断层风险加剧。2025 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养老机构健康管理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 44.2% 的养老机构有专职健康管理师,44.5% 的养老机构反映专业人才短缺是主要困难。2025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陈玮指出:“全国仅约 200 所高职院校开设养老服务专业,且课程与实践脱节,该专业从业者仅约 20% 持有资格证书;农村多数从业人员未受过系统培训,且年龄偏大;90% 以上专业护理人员集中在城市。”

(三) 养老资金需求攀升而资本投入乏力

我国有超过 1.9 亿名慢性病老人,平均带病生存期为 8 年。60 岁及以上老人中至少患一种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多病共存情况占 43%。老年群体因自身疾病具有患病率高、病种多、病症复杂且迁延持久的特点,就医行为更为频繁,医疗开支随之攀升。此外,慢性病与抑郁倾向关系密切^[4],我国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45.3%^[5]。鉴于此,我国养老领域财政将面临巨大支付压力。但从投入来看,2022 年全国养老服务业财政投入占 GDP 的比例不足 0.1%,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24 年中央财政安排 54.8 亿元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对于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来说,该资金相对有限。养老服务财政投入较少,使得各项工作进展缓慢,高质量的养老需求与低配置的养老供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 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

中国老年医学会发布的蓝皮书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老年医院数量虽增至 3062 所,但三级老年医院仅有 439 所,占比 14.3%。受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短缺等因素影响,“重治疗、轻护理”的现象较为突出。多数养老机构存在医护人员匮乏、专业水平偏低的问题,医疗服务范围局限、质量参差不齐,

服务内容以基本生活照料为主。针对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多发病,养老机构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诊疗服务;面对突发疾病、严重疾病,更无法开展及时有力的救治,从而形成“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的困境。此外,当前养老服务政策法规体系虽逐步完善,但部分政策文件缺乏明确实施细则,可操作性较差;养老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速度较慢,面临多重阻碍。各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民生保障投入存在局限,部分养老优惠政策难以落地。如 2024 年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调查显示,全国有 20 多个省份发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措施,但仅有 12 个省份涉及适老化改造^[6]。

(五) 老年人科学素养偏低且健康养生知识匮乏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而言,更是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所必备的基础素质。2022 年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科学素质的具备率仅为 4.42%。健康素养是评判公众获取科学养生信息能力的重要指标,2024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为 31.87%,其中 65—69 岁组健康素养为 12.02%。老年人迫切需要健康养生知识指导生活方式与行为,但由于其信息素养较低,致使获取科技信息偏被动,且渠道狭窄^[7]。在自媒体时代,面对参差不齐的养生信息,老年人易盲目轻信,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六) 老年体育发展缓慢

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均非常有益。近年来,老年人自主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虽日益高涨,但总体上老年人体育的参与度较低,且服务主体支持不足,支持手段单一^[8],针对老年人的体育市场不够发达,相关的运动场地、器材、资源等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9]。2021 年发布的《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60—79 岁及 80 岁以上老人经常锻炼的比例分别为 26.1% 和 14.7%;运动项目以健步走为主,占 41.0%,跑步和广场舞,分别占 14.7% 和 8.0%,形成“有氧主导、力量缺失”的运动结构;公共体育场馆和公园健身场地建设虽日趋增多,但使用率仅占 26.9% 和 9.0%;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指导站点匮乏,老年人身边的健身指导人员严重不足。

二、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研究基础

(一) 政策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经过多次修订,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及《“十四五”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九大、十八大、十九大及二十大报告中均指出要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加快养老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和《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为我国老龄事业及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明确方向。

(二) 理论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是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理论基础。基本养老服务旨在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料需求,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涉及养老服务模式、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养老资金保障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学术参考。

(三) 实践基础

各地在养老服务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探索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颐养广陵”养老服务体系;聚焦居家养老,推动服务精准化、市场化,打造菜单式供给模式,探索建立“三床融合”管理体系;聚焦社区养老,推进养老机构“量质双升”,推动项目“建管统筹”,积极拓展“物业+养老”“家政+养老”等服务模式。此外,全国范围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由局部试点迈向全面推进阶段,截至 2023 年底,参保人数达 1.8 亿,累计 236 万失能人员享受相关待遇,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经验。

三、高质量健康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路径

(一) 提高全民认知,完善落实政策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要始终坚持党对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全面领导,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明确目标,细化方案,使政策落地生根。

一方面,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各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使公众充分认识到构建高质量健康养老体系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确保公众对基本养老服务应知尽知、应享尽享,让政策实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拥护;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障政策有效落实。此外,要切实关注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为优化养老资源配置争取更多社会支持。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责,全面推进养老服务工作。例如:坚持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因地制宜、重点突出地推进工作,力争实现城乡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发展;优化审批流程,简

化医养康养类机构的审批登记手续;切实解决公办养老机构人员编制问题,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薪酬待遇;将特殊家庭老年人纳入基本养老服务统一保障范围;支持医务人员到养老服务机构就业,保障其在职称评定、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依托各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建立医疗与养生相结合的养老服务示范点,打造特色养老品牌项目;对符合政策的民办养老机构给予经济补贴,支持其优化养老养生环境和服务条件;因地制宜创建区域养老品牌。

(二) 强化人才支撑,增强职业认同

首先,提升养老服务人才质量。关注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在岗人员培训全流程,结合老年人实际需求,科学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制定课程目标、筛选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同时强化技能培养与岗位实践锻炼,实行严格的专业技能考核制度,确保从业人员学有所成、业务精良,能够胜任岗位工作。加大社会养老服务应用型人才的培训进修力度,开展定期分类分级培训,确保从业人员“人人持证件、个个有技能”,打造德技兼备、结构合理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推动养老服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开展。

其次,扩充养老服务人才数量。依托各地医学院校的师资力量及继续教育培训基地,扩大招生规模,重点培养老年保健与管理、中医养生保健、社区康复、护理、营养等专业人才,充实专业养老服务队伍。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借助家政服务企业等社会主体培育养老服务人员,同时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把控服务质量关。

最后,制定并落实养老服务人员的薪资待遇与福利保障制度。合理安排工作任务,拓展职业发展通道,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多晋升机会。引导人才到养老服务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人才的政策支持力度,优化人才区域布局,切实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三) 完善保障制度,加大资本投入

尽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完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对特困老人的兜底保障水平应进一步提高。无论是制度设计、保障水平设定,还是养老基金运行模式的构建,都要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作为重要依据,全面且充分地融入各决策环节。依据老年人的需求偏好与风险属性,针对性开发医养保险等专属金融产品;着力优化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路径,通过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人寿保险及养老储蓄计划

等形式,完善自我保障体系。

同时,注重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建立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宏观经济调控战略,关键要根据劳动力老化情况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不能一味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应在各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另辟蹊径,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多渠道引入资金,如针对养老服务产业进行招商引资、号召社会爱心人士进行捐赠、设立养老服务基金等,使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资本互为补充,以形成强大合力,在充沛的资金支持下将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工作落到实处。此外,对于资金的使用也应有合理的规划,其中有一部分应用于养老机构入住人员的补贴,使愿意到养老院养老的老人能够“住得起”养老院。

(四)完善老年医疗,关注心理健康

制定出台养老服务行业的统一标准,改变“重治疗、轻护理”的医疗模式,推动“医养康养”深度融合。通过岗位培训或继续教育等形式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为老年人普及养老防护知识。针对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和多发病,有计划地开展知识宣讲,达到“未病先防”的效果。完善医养康养结合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整合及服务衔接,强化医院、医生及中医服务的统筹发展。针对“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的困境,医院应根据实际需求,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增设康复、护理及养老床位,适时引入康复理疗设备;另一方面支持养老机构与附近的医疗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全面合作,也可在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配备医养结合服务设施;研究出台上门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标准及规范等,为居家老人开展上门服务奠定基础。

对于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及突发病的征兆、症状和初步应对措施进行科普宣传;采用电视讲座、广播播音、印制宣传页、张贴宣传板等形式,普及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和行为等相关的养生知识,引导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科学养生理念。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到社区及养老机构开展宣讲座谈会,解答老年人在健康养生知识方面的疑虑;针对网络上不时出现的虚假养生知识及时进行辟谣,帮助老年人树立科学的养生观。季节性疾病预防知识的科普应具备超前性和预见性,围绕老年人喜爱的传播形式强化宣传,推动健康养生知识实现“线上+线下”全面渗透——既上得了墙面、网络和媒体,又进得了家庭、院落与社区,切实提升传播效果。

同时,重点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人及养老机构的直接护理人员最容易通过老年人的情绪、神态、行为及语言等方面感知其心理变化,当发现老年人存在负面情绪时,需及时沟通、疏导。基层组织(城市居委会、农村村委会等)要定期为老年人,尤其是独居、丧偶及残疾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服务者在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时,要善于倾听老年人心声,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严防不良后果发生。此外,应引导老年人“老有所为”,让其心中有寄托、案头有清欢,主动建立社交圈,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避免陷入孤独、无聊的状态。

(五)加强基础建设,丰富老年活动

在政策及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持续优化城镇养老服务设施的功能配置,尤其要着力补齐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短板。一方面,严格落实政策要求,确保每个社区建成一处养老服务场所,每个街道设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每个县建成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具备条件的农村敬老院可改建为老人服务综合体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卫生间、洗浴间、供餐室、医疗室、活动室等必备生活设施要齐全,采暖、纳凉设备及无障碍通道等要落实到位,为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借鉴优秀范例,因地制宜推进家庭及社区适老化改造,例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时要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老年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科普讲座中心及学习娱乐中心等;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为智能化养老服务实施奠定基础。在有条件的区域,大力发展老龄文化产业,打造“老有所学”的老年教育平台;力争每个城市至少建成一所老年大学,在丰富授课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强化老年人薄弱知识板块,如健身知识、营养知识、互联网应用知识及法律援助知识等,同时提升其信息素养与虚假信息辨识能力。鼓励书店、学校、商场等场所为老年人提供专属文化服务空间,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依据国家政策,在社区、村统筹规划设置适宜老年人的体育设施,包括室内外运动场馆、适老化健身器材及专业服务人员等,全面满足老年人健身锻炼与社交沟通的双重需求。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应配备专业健身指导人员,优化吸纳体医结合复合型专业人才,为老年人提供科学健身指导、个性化健康运动处方制定等服务。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需主动发挥引导作用,推动老年体育运动从“被动参与”向“主动践行”转变。一方面,可邀请体育、健康领域专家开展专题讲座,普及

科学健身观念知识,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健身观念;另一方面,组织专业体育人才或体医结合人才定期开展现场指导,降低老年人健身门槛,引导其将健身理念转化为健身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配备多样化体育用品,丰富体育项目供给,适时举办适宜老年人的体育竞技活动与健身展演,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其中,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此外,积极培育老年旅游与娱乐业态,将“旅居养老”“文化养老”深度融入养老服务体系。老年旅游娱乐不仅能增加老年人体育锻炼频次、填补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空白、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更能激活“银发经济”,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旅游项目应突出风景观光、文化体验、古迹游览、特产品鉴等核心亮点,避免爬山、登高、长途徒步等高强度项目,全面保障旅途餐饮、住宿的舒适度与安全性;休闲娱乐项目可设置戏曲赏析、书法绘画、舞蹈排练、琴棋交流等多元内容,确保活动场地设施齐全、交通便捷。

(六) 加快数字赋能,创新服务模式

高度重视信息化在养老服务中的支撑作用,全面构建一体化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完善智慧养老平台功能,推广应用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度、质量与效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养老服务线上平台与线下实体服务深度融合、创新迭代,通过强化双平台联动效应,实现养老服务无缝衔接,构建老年人快速获取服务的“一刻钟”养老服务圈。依托网络平台实现养老机构备案“一站通办”;搭建养老机构隐患排查治理与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数字化体系,落实责任到人,筑牢养老服务安全防线。此外,借助网络信息平台创新老年教育形式,大力发展老年远程教育、“互联网+老年教育”,丰富课程供给,提升老年教育服务能力,助力老年人提高科学素养与健康素养。

以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为基础,将“互联网+养老”作为当前养老模式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健康养老领域,重点建设智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养老服务体系深度融合,在优化养老服务网络的基础上,打造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场景,例如依据老年人健康数据、生活诉求等信息,提供精准化健康监测、上门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围绕特殊老年群体需求,构建困难老人精确识别与动态管理系统,深入落实“服务找人”“政策找人”举措,打通养老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衔接通道。与此同时,着力破解当前智慧养老发展中存在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隐患、智能技术适老化不足、服务供需匹配度

不高、跨部门协作效能不强及老年人数字鸿沟等突出问题,推动远程医疗、健康监测、安全监控等智慧服务落地见效,真正发挥“互联网+养老”的模式优势,精准匹配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四、结语

构建高质量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坚持党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凸显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秉持“党委总抓、政府主责、社会出力、全民参与”的联动原则,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方面,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主动学习借鉴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的前沿研究成果,吸收先进理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各地区在参考借鉴其他地区宝贵实践经验时,需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人口老龄化特征及老年群体需求特点,出台并实施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政策法规与配套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取得实效。随着政府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公众养老观念不断更新、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全面建成,必将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N]. 中国信息报,2021-05-12(2).

[2] 郭梦,班悦,孙千惠,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疾病的经济负担[J]. 医学与哲学(A),2015(4):32-34.

[3] 陈微. 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成因、负面影响及应对措施[EB/OL]. (2020-03-06)[2025-10-28]. <https://www.huaon.com/detail/515805.html>.

[4] 杨红燕,陈鑫,宛林,等.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潜在类别与影响因素[J]. 社会保障研究,2020(2):20-28.

[5] 官为民,葛怀举,于晴,等. 我国中老年人增发慢性病与自评健康和抑郁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2024,51(22):4212-4218.

[6] 付振强. 一份调查报告助解“养老之问”[N]. 人民政协报,2024-12-06(8).

[7] 黄乐乐,胡俊平,欧玄子,等. 我国老年人科学素质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分析:基于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J]. 科普研究,2023,18(3):40-48.

[8] 常凤,李彦龙.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人体育服务实效提升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23(7):47-54.

[9] 郑贺,蒋启飞. 城市老年人体育锻炼活动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市民与老市民的比较[J]. 中国体育科技,2023,59(5):52-5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Building a High Quality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y China 2030

HOU Yanli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Nanyang Medical College, Nanyang, Henan 473000, China)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build a healthy China,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aging probl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system, to provide all-round and diversified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window period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pulation ageing.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and The 20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s guided by Healthy China 2030,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expert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ing-existing problems-solutions" as the main line,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in contemporary healthy aging practices,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shortcomings and inadequacies inherent in the exist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nd further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this carries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t thereby provid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Healthy China; Aging; Healthy old-age care; Elderly care services

(上接第 11 页)

- [13] 金圣叹. 小题才子书[M]//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6).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14] 金雍,集撰. 鱼庭闻贯[M]//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1).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15] 俞剑华. 中国画论类编[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 [16] 方薰. 山静居画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7] 况周颐. 蕙风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18] 金圣叹. 唱经堂杜诗解[M]//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2).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19] 黄伯思. 东观余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0] 唐岱. 绘事发微[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 [21] 苏轼. 苏东坡集(3)[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22] 程千帆. 诗画漫谈:和西安国画院青年画家的谈话[J]. 文艺理论研究,1984(3):59-62.
- [23] 金圣叹. 唱经堂左传释[M]//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5).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Jin Shengtan's Incorporation of Painting Theory into Commentary

LIU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commentator Jin Shengtan was also a painter well-versed in the principles of painting. His commentaries exhibit frequent incorporation of painting theories, including analyses of literary texts possessing pictorial qualities or traits of visual art, the application of painting principles to examine literary descriptions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as well as explorations of the shared aesthetic sensibilities between painting and literary works. Furthermore, he employed painting terminology such as "line drawing" (baimiao), along with dialectically related concepts like "outlining" (luogu) versus "textural strokes" (cunran), and "leaving blank" (liubai) versus "washes and shading" (hongran), to articulate the aesthetic effects and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brushwork technique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reflects Jin Shengtan's personal aesthetic orientation but also enriches commentary theory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poetic methodology. His integration of painting theory into textual commentary influenced subsequent commentary practices and even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Jin Shengtan; Painting theory; Commentary

融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 困境及破局策略研究

李 柯^{1,2}

(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期刊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44; 2.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信息研究所 农业融合出版知识挖掘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1)

摘要:融媒体时代,农业期刊作为连接农业科技与乡村振兴的关键纽带,面临多重堕距问题。其本质是需求侧乡村振兴与融媒体发展和供给侧期刊自身的系统性错配。从制度供给维度看,其与乡村振兴实践存在供给与迭代失衡;从主体能力维度看,其与融媒体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从文化价值维度看,传统办刊文化与现代传播文化存在价值冲突;从传播资源维度看,要素配置与产业振兴需求存在适配失衡。因此,需通过在制度层面完善激励规范执行机制,优化评价体系与行业规则;在主体层面构建多元联动体系,提升复合型能力与需求感知能力;在文化层面重塑“学术为基、服务为本、传播为翼”的价值导向,融合农耕文化与现代技术;在传播层面打造全渠道精准传播生态,通过场景化适配与数字化赋能,以协同弥合路径摆脱多重堕距困境。推动农业期刊从学术出版载体向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转型,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关键词:融媒体;农业期刊;乡村振兴;堕距现象;成果转化;协同服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7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40-06

一、引言

农业期刊是连接农业科研与产业实践的核心纽带,在服务农业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支撑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助推力量。2021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学术期刊出版要加强出版能力建设、优化出版资源配置、推进集群化建设、加快融合发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要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引导学术期刊适应移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进行内容精准加工和快速分发,推动学术成果大众普及和应用转化^[1]。2022年9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全社会科

普责任……各类媒体要发挥传播渠道重要作用”^[2]。2024年9月26日,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建设一批农业科技孵化器,稳定提升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效能,推进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下大力气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4]国家决策部署的核心要义在于建设农业强国,其利器为科技,导向是应用,关键在转化,手段则是传播。这为农业学术期刊擘画出强刊兴农

收稿日期:2025-11-10

基金项目:2025年度农业融合出版知识挖掘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农业期刊集群化发展研究专项课题(KMKS-qk-2025-17)

作者简介:李柯(1982—),女,河南漯河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期刊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出版学。

的美好愿景,赋予其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大使命,也指明了科技惠农的路径与方向。

在信息时代,文化和科技相生相促,数字技术带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的重大变革,极大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文化产品的附加值,以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为特征的新型文化消费成为消费领域的热点和亮点^[5]。随着融媒体技术的发展,农业期刊借助数据库平台、学术会议直播、产业对接论坛等形式拓宽了服务边界,在推动产学研协同、助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对照乡村振兴对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的要求,农业期刊仍面临制度供给与迭代失衡、主体间多元协同机制断裂、学术传统与产业需求脱节、融媒体传播效能与服务对象需求的差距等多重阻碍,形成复杂的堕距现象。新时代应以协同式合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协同科研与产业要素共同发展、优化服务生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健全支撑体系,构建融媒体服务矩阵,全面提升农业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效能。

二、堕距理论及农业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堕距现象

(一) 堕距理论

堕距理论是对社会变迁动力研究反思的结果,其理论基础是奥格本(Ogburn)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理论,该理论强调文化堕距是指社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出现的时间差^[6]。该理论后续延伸至制度、能力、服务等领域。堕距理论主要是理论界用来阐释重大社会变革或变迁出现时,部分领域变化出现明显迟滞、落后现象,导致实然、应然和当然之间出现的差距状态^[7]。融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的堕距现象是指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农业期刊因未能同步适配科技创新速度与产业转型需求,在内容生产、成果转化、服务模式等方面出现的滞后、错位或失衡状态。

(二) 农业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多重堕距现象

1. 制度堕距:供给与迭代失衡

制度堕距方面,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迅速渗透,但乡村地区适配技术应用的治理模式、制度供给相对滞后,二者形成明显落差。数字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远快于乡村社会制度、规范及群体心理的适应节奏。例如,智慧农业技术已然问世,但与之配套的土地流转制度、数据产权界定规范等却未能同步建立,致使技术应用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甚至引发了制度供给碎片化等新问题。

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着眼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明确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将其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以及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举措。我国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批具体落实举措,推动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和工作推进机制,旨在规范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生产力,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然而,地方层面针对期刊服务产业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的“政策执行异化”也会造成政策目标偏离、政策执行阻滞等问题^[9]。

2. 主体堕距:多元协同机制断裂

缺乏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是行业普遍痛点。期刊主体方面,服务链条与产业需求脱节。大部分农业期刊以论文发表为核心功能,对成果转化环节关注不足,仅少数期刊设立技术推广专栏,且内容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编辑团队对乡村实业需求的调研不足,导致内容策划与农户痛点脱节。传统的编辑队伍在新媒体运营、数据分析、视频制作、社群互动等方面的能力也普遍不足,这导致其在融媒体转型中力不从心,内容创新乏力。农民受众方面,农民作为期刊服务的对象,因自身科学素养存在差异,加上供需两端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难以将生产中的实际需求传递给期刊,形成单向传播困境。科研主体方面,存在成果供给过剩与转化缺位并存的问题。农业科研领域发表的论文中,大部分成果因技术成熟度不足、产业适配性低等问题难以落地,涉农企业参与度低,导致期刊难以获取市场动态及产业需求等鲜活信息,进而造成成果转化链条断裂。

3. 文化堕距:学术传统与产业需求冲突

文化堕距具体表现为三重失衡。办刊理念与融媒体文化的失衡,部分农业期刊仍秉持以刊养刊的传统理念,重纸质发行轻新媒体运营,缺乏互动性与传播力,与融媒体多元互动、以用户中心的文化理念相悖。内容文化与农民认知的失衡,期刊内容多采用学术化表达,推送的大多是专业性内容,缺乏行业动态^[10],以及向图文、视频形态转化的通俗化表达,导致很多农民看不懂、用不上。同时,内容策划忽视农耕文化中的传统经验传承,过度强调现代技术,形

成技术供给与农民经验之间的文化隔阂。价值文化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失衡,部分期刊过度关注学术排名,将提升学术影响力作为首要目标,忽视科普服务、产业支撑等乡村振兴核心需求,形成学术价值优先与社会价值优先的价值取向失衡。

4. 传播堕距:融媒体传播效能与服务对象需求的差距

农业期刊具有时效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是农业科技普及推广过程中的重要媒介^[11]。农业期刊虽然一直走在融合的路上,但实效欠佳。传统期刊线性的、深度的内容生产模式难以适应融媒体时代用户碎片化、视频化、交互式的阅读习惯,导致传播效能大打折扣。在媒体融合的当下,虽有期刊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论文,提升了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12],且许多期刊建立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但平台间缺乏有效整合与联动,资源聚合度低,未能形成融媒体传播的矩阵合力。互动性服务和个性化内容推送仍有提升空间^[13],公众号留言的回复率偏低,未建立农民、编辑、专家三方互动社群,导致期刊无法及时获取农民需求,也无法解决农民在技术应用中实时出现的问题。缺乏用户画像分析,未区分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各地区农户的需求差异,内容推送采取“一刀切”模式,与当地产业发展实际脱节。

三、融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多重堕距的成因分析

农业期刊的多重堕距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转型期作为需求侧的乡村振兴战略、融媒体技术变革与作为供给侧的期刊自身发展逻辑在技术、制度、文化、资源等维度出现系统性错配的结果,其深层成因可归结为四大结构性张力的交织耦合。

(一) 期刊制度供给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制度性张力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以多元化、创新化、动态化的政策供给予以回应^[14]。制度层面的堕距源于激励、规范、执行三层体系的协同失灵。在激励机制维度,现行科研评价与期刊评级体系仍以学术影响力指标,如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情况作为核心依据,并未将社会服务效能指标,如农技推广覆盖率、农民技术采纳率、产业带动效益等纳入考核范畴,形成重论文发表、轻成果转化的路径依赖。这种激励错位导致期刊缺乏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内生动力,即便部分期刊尝试开展融媒体服务,也因无法转化为学术考核优势而难以持续。在规则体系维度,融媒体内容的

生产与传播缺乏专门规范,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 用户生成内容) 的版权授权机制、科普内容科学性与通俗性的平衡标准、技术误导的责任界定等核心规则尚未明确,期刊在实践中面临合规风险与创新困境的双重约束,陷入怕违规而不敢为、缺标准而不会为的被动局面。在执行层面,基层主管部门对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存在认知偏差,将数字化转型简化为硬件设备,比如电脑、摄像机等设备的购置,忽视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软环境支撑,导致政策执行与目标的象征性耦合,而非实质性落地。

(二) 办刊主体能力与融媒体需求的结构性张力

融媒体技术的迭代对农业期刊的办刊主体能力提出了兼具农业专业素养、数字传播技能与用户需求洞察力的复合型要求,而现有办刊主体的能力结构存在显著缺口。从技术胜任力看,农业期刊传统编辑团队多为农业学科背景,其知识体系聚焦学术论文撰写与审稿规范,缺乏短视频脚本设计、交互界面开发等数字内容生产技能,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受众偏好挖掘等跨领域技能的用户行为分析,导致无法适配融媒体多模态内容生产、多渠道分发、多场景互动的全链条服务需求。从需求感知力看,期刊主体的需求获取机制存在间接化倾向,依赖文献综述、政策文件等二手资料推导农民需求,而非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直接方式精准捕捉乡村受众对轻简化农技指导、本地化种植方案等技术痛点与碎片化阅读偏好等媒介使用习惯,这种自上而下的需求认知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质言之,主体能力的单一性与融媒体需求的复合型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堕距产生的主体性根源。

(三) 传统办刊文化与现代传播文化的价值性张力

文化层面的堕距本质是学术权威观与用户中心观的价值冲突,以及农耕文化保守性与现代技术创新性之间的认知鸿沟。传统办刊文化以学术权威性为核心价值,强调知识的单向传播与内容的严肃性,将通俗化传播视为对学术品质的消解,部分编辑存在短视频科普会降低期刊学术性的认知,拒绝开展适配乡村受众需求的场景化内容生产,这种“学术洁癖”与融媒体时代用户参与性的核心诉求形成根本对立。现代传播文化以用户为中心,要求内容适配受众的认知水平与使用场景,而农业期刊未能将现代农技嵌入乡村生产生活实践,进而导致内容与农民需求之间形成认知隔阂。同时,农耕文化的经

验主义传统加剧了这种隔阂,农民更倾向于信赖传统经验的口耳相传,对新媒体传播的现代农技存在不信任感,比如有的农户认为无人机打药不如人工喷洒均匀等。期刊若不能通过文化适配构建信任机制,将会进一步放大文化堕距。

(四)传播要素配置与乡村振兴需求的资源性张力

乡村振兴对农业期刊的传播需求已升级为全渠道覆盖、高互动体验、精准化服务的复合型生态,但期刊的传播要素配置存在显著失衡。在资源投入维度,融媒体建设的预算占比偏低,难以满足诸如高清视频拍摄、VR 虚拟场景开发等支撑数字内容生产及社群维护、数据分析工具采购等平台运营的长期需求,陷入有想法、无能力的资源约束困境。在技术应用维度,多数期刊仍采用纸质内容数字化的迁移模式,未建立一次采集、多端分发的数字化工作流程,无法实现将学术论文等内容转化为科普图文、短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多模态呈现与适配,技术应用的滞后性制约了传播效能。在网络协同维度,期刊未能与抖音“三农”账号、农技推广 APP 涉农新媒体平台,及乡镇农技站、农民合作社等基层服务机构形成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局限于自有平台,在精准推送、符合个人需求方面的表现也有待提升,难以覆盖分散化、差异化的乡村受众,这种单打独斗的传播模式导致覆盖面与影响力不足。

四、融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践行乡村振兴使命的协同弥合路径

针对上述多重堕距的成因,需以协同式弥合为核心思路,从制度体系优化、主体能力重构、服务文化重塑、传播生态升级四个维度构建多维联动机制,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动态平衡,推动农业期刊从学术出版载体向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转型。

(一)制度协同: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制度层面的弥合需重构规则,破解路径依赖,构建支撑期刊转型的制度环境。在顶层激励机制设计上,推动科研评价与期刊评级体系的导向调整,国家新闻出版署、农业农村部可联合出台融媒体农业期刊服务乡村振兴的评价指引,将成果转化案例数、农民满意度、产业带动值等乡村服务成效指标纳入核心期刊评选、期刊考核的硬性指标。设立农业期刊融媒体转型专项基金,对乡村服务成效显著的期刊,给予平台开发、技术采购等数字化建设补贴以及跨学科团队引进等人才扶持,通过正向激励引导期刊重视社会价值^[9]。在中层行业规范构建上,强化标准引领与风险防控,由农业期刊协会牵头,联合高

校、科研机构制定农业期刊融媒体内容生产规范,明确科普内容专家初审、农民代表评议、实践验证三级审核流程,以及专业术语转化标准的通俗性表达边界。建立融媒体内容版权保护体系,规范内容授权、转载使用等行为,通过集体维权降低期刊合规风险。发布农业期刊融媒体伦理指南,界定技术传播中诸如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的追责机制与责任主体,引导期刊既敢为且善为。在基层政策执行优化上,推动政策落地与效能评估,地方主管部门需建立期刊服务乡村振兴台账,将数字化覆盖率、农民培训场次、成果转化效益等指标纳入年度考核,避免重形式轻实效。开展政策执行“回头看”工作,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监测政策落地效果,对硬件闲置、培训走过场等问题及时整改,推动期刊与农家书屋、期刊与益农信息社融合,将期刊内容接入基层农业服务网络,实现政策资源与乡村需求的精准对接^[14]。

(二)主体协同: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能力提升体系

主体能力的弥合需要打破期刊单一主导模式,构建期刊、农民、科研主体多方参与的协同网络,实现知识互补与能力整合。在期刊主体层面,需推动编辑团队的知识结构重构,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具备强烈的自驱力和变革力^[15]。建立编辑田野工作站制度,要求编辑深入乡村开展驻点调研,通过跟随农民劳作参与式观察、与新型经营主体和传统农户座谈等深度访谈方式,构建农民需求数据库,将间接认知转化为直接洞察。增设媒介融合编辑岗位,组建由农业技术专家、乡村发展顾问等构成的跨学科团队,打破单一学科背景的能力局限。在农民主体层面,需激活其参与式治理角色,搭建农民需求反馈云平台,整合公众号留言、社群问卷、田间访谈等多渠道数据,形成动态更新的需求清单。实施农民科普达人培育计划,遴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民技术员、种养大户作为内容共创者,参与农民讲农技等系列短视频拍摄、田间地头问诊直播答疑,增强内容的亲和力与可信度。设立农民读者会,邀请不同类型农户代表参与期刊选题策划、内容审核,确保内容接地气、能应用,从单向传播转向双向互动。在科研主体层面,需强化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与科研机构共建科技成果转化驿站,将期刊作为农技推广首发平台,同步开展论文发表、科普解读、技术培训等环节的立体化传播,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与涉农企业合作开发产业服务专栏,通过企业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与资金支持,期刊提供技术内容与传播渠道,形成从技术到市场对接的

良性循环。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共建线下服务站,将期刊内容转化为田间培训课程、技术明白纸,通过农技员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推广,实现从传播到应用的闭环。

(三)文化协同:推动文化价值重塑

文化层面的弥合需要打破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二元对立,构建适配乡村振兴的服务文化。在办刊理念更新上,确立学术为基、服务为本、传播为翼的价值导向,通过融媒体转型成功经验案例分享会等形式,引导编辑认识到通俗化传播是学术价值的延伸而非弱化,将融媒体传播视为提升学术影响力与社会服务力的双重路径。将服务乡村振兴纳入期刊发展战略,在年度选题规划中明确应用类内容占比,从源头上扭转论文至上的路径依赖。在农耕文化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上,构建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的对话机制,开设老农妙招与专家解读专栏,将农民的具体实践经验与科学原理结合,既尊重农耕文化又传播现代农技。制作方言版农技短视频、田间场景 VR 课程乡土题材等内容产品,将技术指导嵌入农民熟悉的生产生活场景,降低认知门槛,消解文化隔阂。

在用户中心文化培育上,建立从内容生产到反馈迭代的闭环机制,通过数据分析工具监测不同内容的阅读量、互动率、转化量等传播效果,淘汰低价值内容,优化高需求主题。定期举办农民读者节,通过线下技术交流会、线上直播互动等形式增强农民对期刊的认同感,培育主动获取知识、参与技术创新的文化氛围,实现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四)传播协同:打造全渠道覆盖、精准化服务的融媒体传播生态

传播要素的弥合需以数字赋能为核心,构建适配乡村需求的传播体系。在全渠道矩阵建设上,实现多平台协同与场景化适配。以微信公众号的深度图文、抖音等平台的短视频教程、视频号直播答疑及喜马拉雅的音频节目为核心,形成内容分层生产到跨平台分发的传播链条。针对不同乡村场景开发适配内容,例如为西部网络薄弱地区推出适配田间劳作场景的农技广播节目,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适配决策需求的产业政策解读长文,为传统农户制作适配碎片化学习的 1 分钟技术小视频,实现千人千面的场景化覆盖。对期刊上发表的科技成果进行多层次加工,在保证内容通俗易懂的同时,不失农耕、农情、农趣^[16],从而弥补纸媒时效性差、互动性弱、内容枯燥的缺陷。还可以引导用户在评论区提出疑问、展开讨论、反馈意见,这不仅能实现对科技成果的立体化传播,还能促进学术交流。在数字化赋能

与国际化传播上,推动技术应用与开放合作。争取专项经费支持,搭建农业期刊融媒体云平台,集成内容管理、多端分发、数据分析功能,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端适配。积极探索 AI 技术应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学术论文自动转化为科普短文,通过 VR 技术构建虚拟田间技术应用模拟场景,降低内容生产成本。完善英文网站建设,翻译优质农技内容,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合作,推动中国农业技术“走出去”。

传统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更多强调的是单向赋能,也就是把乡村社会视为被改造的客体,而在融媒体时代,应不断突破传统理论范式的思维制约,借鉴符合当下环境的理论范式,在激发乡村振兴多元主体的作用方面持续发力,借助技术力量在传播层面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五、结语

融媒体背景下农业期刊的多重堕距,本质是转型期创新速度差异在制度供给、主体能力、文化价值、传播资源等维度的集中体现。从表层看,是期刊传统模式与融媒体需求的不适应;从深层看,是学术逻辑与服务逻辑的价值博弈。唯有以协同式弥合为核心思路,优化制度供给、打破主体壁垒、重塑服务文化、升级传播生态,才能推动农业期刊实现从学术出版载体到创新服务平台的范式转型,使其真正成为连接农业科技创新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科技信息桥梁和产业发展引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参考文献:

- [1] 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J].中国出版,2021(14):3-5.
- [2]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EB/OL].(2022-09-04)[2025-06-16].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9/04/content_5708260.htm.
- [3]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大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EB/OL].(2024-09-26)[2025-06-16].https://www.moa.gov.cn/xw/zwdt/202409/t20240926_6463479.htm.
- [4]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J].科协论坛,2016(6):4-9.
- [5]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5:113.
- [6] 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
- [7] 邢中先.乡村产业振兴应对多重堕距现象的核心思路

- [J]. 北京社会科学,2022(6):91-100.
- [8] 本书编写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23.
- [9] 张欣,欧谷.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策堕距研究[J]. 管理学刊,2024(6):18-32.
- [10] 徐琳君,陈国荣,逯连静. 融媒体环境下农业核心期刊微信公众号发展探析[J]. 中国编辑,2019(1):58-62.
- [11] 鲁博,武星彤,李梅玲,等. 新时代背景下农业科技期刊如何助力乡村振兴[J]. 编辑学报,2019(S2):108-109.
- [12] 吴祝华,洪淳薇,徐迎春,等. 我国农业科技期刊论文社会影响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4(12):1795-1803.
- [13] 朱丽娜,马丹丹,何锴,等. 农业科技期刊公众号用户需求调查与分析[J]. 编辑学报,2025(S1):174-177.
- [14] 吕晓梅,刘迎春,杨爱东,等. 农业期刊集群赋能编辑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以“中国农业期刊网”为例[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5(10):1397-1403.
- [15] 陈建. 超越堕距:乡村振兴中的农家书屋政策优化研究[J]. 领导科学,2021(12):105-108.
- [16] 华云,王卿. 数字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能力素质框架及其应用价值[J]. 出版广角,2023(22):65-69.
- [17] 陈燕,兰宗宝. 践行乡村振兴使命:农业学术期刊的困境及破局策略[J]. 江苏农业科学,2025(15):271-276+28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he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Journal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Media

LI Ke^{1,2}

(1. Editorial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Knowledge Mining and Knowledge Services in Agricultural Convergent Publishing,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grated media, agricultural journals, as a key link connect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face multiple gap issues. Essentially, these gaps stem from a systemic mismatch betwee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media development on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journals themselves on the supply 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 body capabilities, there is a structural misalignment with integrated media demands;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there is a failure to coordinate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s; in the cultural value dimension, traditional journal publishing culture conflicts with modern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n the dissemination resources dimension, the allocation of elements is imbalanced with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system at the main body level to improve composite capabilities and demand perception;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o improve the execution mechanism of incentive norms, and optimize evaluation systems and industry regulations; at the cultural level, reshap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foundation, service-oriented, and communication as wings", integrate agricultural culture with modern technology; and at the dissemination level, to create an all-channel precision ecosystem for scenario-based adaptation and digitally empowered collaborative solutions. These measures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journals from academic publishing carriers into platform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jecting sustainable momentum into 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grated media; Agricultural journals; Rural revitalization; Gap phenomenon; Result transformation; Collaborative services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系统性建构

王 彤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在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并围绕“为什么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什么是党的文化领导权、如何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主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意义在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指向在于“使党的理论真正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要求在于“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障在于“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文化领导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8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46-06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围绕如何实现新的文化使命、从守正创新的角度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命题。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七个着力”,其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摆在首位。此后,学界兴起了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研究热潮。从当前研究来看,学界大多集中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进路等方面进行探讨,对其逻辑体系的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试从整体性视域分析其逻辑体系,以期深化相关学理研究,并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借鉴。

一、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意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

政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政党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它的一个核心任务便

是积极寻求并赢得人民群众对政党的“文化认同”。当一个政党的政党意志和政党文化得到党内外民众广泛认同并引领其思想与行动时,这个政党自然会在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而当无产阶级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就会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2]536}。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构建和加强文化领导权,从而夯实党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将其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这也为推动全党

收稿日期:2025-11-19

作者简介:王彤(1999—),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研究。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奠定了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因此,在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到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各方面,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党和人民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和精神主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最根本就在于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3]342}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3]340}。在习近平看来,思想领域的迷失往往是一个政党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开端,一旦“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防线很难守住”^{[4]21}。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以及党的领导虚化弱化的现实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坚决捍卫意识形态阵地,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着眼于巩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深化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举旗亮剑、正本清源,有效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侵蚀,切实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信息化程度加深,科技革新与文化发展交流交织,催生出了多元的文化样态,也共同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与氛围。这既为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为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提供了广阔空间。“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5]67}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去开展,才能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吸引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意志和党的文化形成广泛认同,夯实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力,使中国的文化结晶突破西方思想文化的封锁,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使先进的思想文化被人民群众掌握,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指向:“使党的理论真正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6]

政党文化包含政党认知、政党使命、政党意志、政党情感和政党理想等,其蕴含的政治理念和价值

取向主要通过政党理论得以彰显。“社会主义理论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必须以高度的热情研究它、传播它”^[7],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同、所掌握”,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8]9}。列宁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正确表达群众的想法并真正为群众所认同时,才能完成其管理的任务”^{[9]695};只有当其理论“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9]646}。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欲获取、巩固文化领导权,达成全体群众对党的理论的意见一致,不仅要善用群众语言、表达群众想法,而且还要扎根群众生活、满足群众需要,从而引导群众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实现“使党的理论真正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要目标。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以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的认知为前提,必须以人民群众的价值需要得到满足为支撑。一方面,“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10],党的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使得党的意志和党的文化能够最大限度地被民众认知和理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11]在新时代推进党的理论大众化进程中,我们党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根本目标,扎根基层生活、面向基层群众,构建了有朝气、接地气的大众话语体系,创作了一系列集中反映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展现的新思想新风貌的精品力作;架起了科学理论通向人民群众的坚实桥梁;增强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覆盖面和时效性。另一方面,“党的理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12]16}。因此,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着眼人民生活、聚焦人民向往、满足人民需要。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需要”是文化领导权发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民众是否愿意接受和认同政党理论,关键在于政党理论是否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以及是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价值需要。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2]438},进一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

能获得“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对于“巩固执政合法性至关重要”^[13]。因此,我们党始终坚持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动力推动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广泛实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从“量”到“质”的转向,想人民群众之所想、解人民之所忧、干人民之所盼,努力实现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持续增长,着力推动人民群众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政治理念上紧密团结在一起,并在为人民群众“立德”“立言”“立行”中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4]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秉承利民为本、助民为要、安民为基的基本理念,聚焦理论生产、理论表达、理论传播的重要环节,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化、通俗化、大众化的理想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让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形成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热潮,增强理论的辐射力、影响力和传播力;才能让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达成广泛的“同意”,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才能进一步让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拥有,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使其在更广泛更自觉的实践层面上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核心要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5]79}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点。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5]事实上,“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16],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7]。自此,我们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664},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我们党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不仅要做到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作出新的理论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要论述,更在实践中予以深化落实,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达到新高度。一方面,“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8]。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守,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笃信,源于他对既往历史经验的总结,源于他对时代发展的研判,也源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的政治自觉,还源于他对苏共垮台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审思。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苏共“失败”并不在于物质基础被撼动,而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性被消解,即“文化领导权”的率先丧失,导致整个社会逐步陷入了信仰迷失、信念崩塌、信任危机的泥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凝聚思想共识、提升政治认同。因此,在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在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大问题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指引和价值导向;在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的问题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实现“熔铸古今”和“汇通中西”;在面对一些领域长期存在的“价值观之乱”和“思想之乱”的问题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滋养初心和正本清源。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压缩了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空间,壮大了主流思想的舆论阵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引领力。另一方面,“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19]9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5]65}“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20],也是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逻辑前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3]315}。唯有在实践的指引下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当下的现实条件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并在探索中总结、在总结中创新,方能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水”在新时代充分涌流。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党聚焦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目标,做到既“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又“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

心、落地生根”；既“坚持‘两个结合’”，又“推动传统和现代有机衔接”，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正确理念、辩证思维和科学方法深深熔铸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之中，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持续激发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我们党面对新事物和处理新情况的根本思想武器，又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旗帜引领，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才能实现文化认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凝聚人民力量；才能实现意识自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筑牢思想防线。

四、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关键环节：“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4]109}

政党价值观是政党所属阶级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表达了政党的价值追求和发展使命，彰显了政党的价值取向和重要职责，是政党对自身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法性的确证。政党价值观标明了政党的价值内核，决定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及其发展质量，具有社会影响力和整合力。通过政党价值观的感召和引领，民众对政党产生精神认同和政治支持，从而加强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我们知道，任何社会、任何阶级都存在多种价值观念。其中，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最本质最持久最深沉的思想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发挥效能，关键在于将其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实践养成促使人们增强感知和理解，进而做到不自知、不自觉地运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强调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一方面，“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3]59}，让其融入生活，使其像空气一

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事实上，社会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也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生发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社会生活，自然也必须融入社会生活。那么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5]109} 具体而言，日常化不仅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与理论精髓深入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强调使其形成常态化的实践模式与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具体化明确指向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方法；形象化强调要将抽象的价值观念、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灵活的传播方式统一起来以增强其感染力和影响力；生活化的本质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形态转化为生活状态，即“注重人的生活经验、生活态度、生活需求、生活体验”^[21]。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立足时代发展、面向人民群众，注重正面宣传、加强正面引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固本培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4]118}。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119}，于实处用力，并使其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具体而言，调动实践主体，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核心引领作用、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撑作用和榜样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切实激活社会公众的自觉意识与能动特质；贯通实践场域，加强实践阵地建设，融通家庭、学校与社会等实践场域，使其既独立发挥涵育功能，又在实践交互中联动，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与践行；创新实践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盘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抓好“四史”教育，全面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打造重点突出、价值鲜明、架构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和推动下，我们党充分运用文化熏陶、教育引导、实践养成的方式，在落实、落细、落小方面下深功，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内化、转化，经过长期努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加强，进一步向“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理想状态大步迈进。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和践行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4]113} 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需要我们巩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巩固全国

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切实抓紧抓好。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引领力,形成广泛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鸣;才能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意识和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普遍的思想认同和文化认同;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成日常的行为准则,形成强烈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五、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根本保障:“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9]8}

意识形态是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标明了政党文化的性质和目标。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22]。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取代资产阶级,成为并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了思想一致,并通过科学有效的“形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之,当一定阶级的统治不再以社会制度的形式予以强化,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8]181}。因此,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以根本制度的全局性、决定性、长期性和规定性予以确证和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形势、聚焦意识形态领域发展新态势,提出了“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根本保障,它以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作为筑牢制度之“魂”,以提升制度执行力激活制度之“用”。一方面,“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4]22},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属性、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属性共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发之源。因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那么据此衍生的制度自然也具有根本性。因此,在新时代文化领导权建设中,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包括组织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而获得科学智慧和提升理论素养;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阐释和传

播马克思主义;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铸魂育人等。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更加鲜明。另一方面,“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通过提升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效能”^[23]。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这一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基座,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别显著的制度优势。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对这一根本制度的制度体系予以配套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各领域主体坚决执行这一根本制度及其统领下的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党充分发挥这一根本制度的“主体优势、理论优势、执政理念优势、历史主动优势”^[24],坚持以根本制度定方向、保战略、管全局、立长远,并着力构建和完善与根本制度相配套的思想理论学习制度、思想文化传播制度、文化艺术发展制度、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制度等,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宣传思想战线工作者等各领域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建立健全监督体制机制,实现制度效能的充分释放。经过长期努力,总体上看,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呈现出昂扬向上的态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巩固,新时代的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

当前,“两个大局”交织演进,各种因素交互耦合使得思想文化领域态势愈发复杂多变。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频繁向我国输出西方意识形态,企图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看到,新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根基也是十分必要的。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以制度威力保证政治定力,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才能以制度理性遏制思想任性,警惕和防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重大风险,做到面对危局游刃有余;才能以制度势能激发治理效能,形成和深化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民族复兴蹄疾步稳。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文

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00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6]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8.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9]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列宁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67.

[11] 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N]. 人民日报,2020-01-22(001).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3] 张士海,施秀莉. 文化领导权的本质、作用与实现[J]. 科学社会主义,2012(1):100-103.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1.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99.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13-1514.

[1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477.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33.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5.

[20]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

[21] 吴静,颜吾倬.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J]. 红旗文稿,2017(7):26-27.

[22]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7.

[23]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03.

[24] 张国启.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张力及其调适[J]. 学术界,2024(7):56-6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WANG To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governance, Xi Jinp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and propositions centering on the theme of "why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what is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how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Xi Jinping’s view,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cultural leadership lies in the fact that "propaganda, ideology and culture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the goal of building cultural leadership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Party’s theories are truly loved, recognized and owned by the people";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cultural leadership lies in "unifying the adherence to Marx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constantly making new theoretical creations in light of new practices"; the key link in building cultural leadership lies in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social life, so that people can perceive and comprehend them in practice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used by the people every day without being aware of them"; 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cultural leadership lies in "establishing and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Marxism’s guiding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provide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Xi Jinpi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w Era; Cultural Leadership

论动产抵押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

王惠敏¹, 邵其琪²

(1. 江苏师范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2.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民法典》第404条所设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其构成要件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乱象,故而应对《民法典》及关联性司法解释进行规范重述。鉴于平衡该规则所涉三方主体利益,应对规则中条文作如下解释:其一,将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排除出适用范围,将“已支付合理价款”明确为“支付了合理价款”,在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的权利归属认定上,应囊括全部交付样态;其二,对“正常经营活动”应秉承限缩解释原则,将租赁、设定担保和以物清偿等情形排除在外,买受人履行合同中的主观要求应为善意;其三,对于《担保司法解释》列举的排除情形应谨慎适用,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来衡量交易是否异常,有必要对“生产设备”“控制关系”均作限缩解释,同时在司法解释未作修改时,应将兜底条款解释为买受人明知其购买行为会侵害抵押权人权利的情形。

关键词:动产抵押;正常经营活动;构成要件;买受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09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52-10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04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此即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1]。该规则起源于《美国统一商法典》^①,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现已失效)第189条第2款关于正常经营买受人成立要件的主干表述,唯一变动之处在于将该规则由仅适用于浮动抵押的特殊规则,上升为适用于全部动产抵押的一般性规则。这一变化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免除全部正常经营买受人受担保物的追及,这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缩短交易周期,提高经济效率^[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就《民法典》第404条的规定进一步

细化,以列举方式明确排除了不适用买受人规则的情形。不过,上述法律条文不仅在概念界定和外延划分上较为模糊,部分条文亦属附赘悬疣。本文以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法理基础与构成要件,结合比较法经验与国内司法实践,重点分析以下问题:其一,如何界定“正常经营”的范围,是否涵盖买卖以外的租赁、易货交易等经营行为,是否需考量动产的种类和性质等因素;其二,买受人“善意”要件的判断标准及适用要求;其三,对《担保司法解释》所列举的排除情形的反思,尤其是兜底条款“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与关联关系条款“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上述问题也引发学者关于规则正当性的质疑与反思,论者多从买受人规则所设定的提高交易效率的制度目的出发,易忽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的权益平衡。本文以抵押人(出卖人)为交易中心点,抵押权人和买

收稿日期:2025-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立体机制研究”(23CFX057)

作者简介:王惠敏(1989—),女,河南安阳人,法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受人为交易两 endpoint,通过对买受人规则中的构成要件进行类型化划分,整合《民法典》、司法解释中买受人规则相关的条文,旨在实现三者之间的权益平衡。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为完善我国动产抵押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提升交易效率提供理论参考与实务建议。

二、客观要件:“动产范围”“出卖人”以及“已支付合理价款”等的界定

抵押物转让是抵押权制度中的一个传统难题,《民法典》将动产浮动抵押规则扩大至全部动产,按照立法者的阐释,该转变主要基于动产抵押制度的局限性与市场交易的便捷性考量。倘若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限于动产浮动抵押,将倒逼买受人在交易之前查询此动产上是否存在抵押,如此便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规律,会降低交易效率^[3]。从促进交易、保护买受人的角度而言,该规则无疑有助于促进买卖行为的达成,两者都会因此而受益。但《民法典》第404条设定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还包含抵押权关系,其打破了抵押优先制度,阻断了第406条的抵押权追及效力,可能导致抵押权人的优先权益落空。因此,在适用《民法典》第404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时,需平衡抵押权人、抵押人(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关系。本文拟从动产范围和“出卖人”身份的界定、已支付合理价款和动产交付类型等要件展开系统阐述。

(一) 动产范围之界定:排除特殊动产

有学者指出,《民法典》第404条中的动产应作限缩解释,仅限于“存货”^②。该限缩解释未突破买受人的交易预期,且能在不损及买受人利益的前提下,显著提升对抵押权人的权益保护力度。从比较法视角来看,在美国动产担保实践中,正常经营范围下的动产转让主要发生于存货销售^[4]。《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20(a)条所规定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明确区分了担保客体为存货与生产设备的不同情形。若买受人购买的是存货,才有适用该规则的余地^[5]。倘若出卖的是生产设备则不适用^③。此外,在动产担保领域,以同类存货作为担保物的情形占比较高,将担保动产限于存货,亦符合多方交易主体的合理预期——抵押权人通常也希望抵押人能将该抵押货物销售给买受人。此时,抵押权人虽丧失对存货本身的担保权益,但其希望的是抵押人用销售所得货款来偿还其借款以实现债权。而当担保物为存货以外的动产时,担保权人往往不会存有此预期。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排除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适用^[6],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7]。

本文认为,《民法典》第404条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主要针对一般动产(存货),而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其物权变动及对抗效力由《民法典》第225条和《机动车登记规定》专门调整。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机动车交易应优先适用登记对抗规则,而非一般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法律对于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在抵押权设立、所有权取得等方面有着明确且特殊的规定:首先,在登记机构与登记方式上,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与一般动产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机动车而言,不论是所有权的转移还是设立担保登记均已成为证明其权利权属的“必要性”凭证^④。在机动车交易实践中,办理登记手续已被社会大众普遍认可和接受,在从事相关交易的同时,登记所有权证书往往作为完成交易的要件,社会大众普遍对此具有较强的认知意识。其次,根据《民法典》第225条,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生效要件,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一规则本身已构成对《民法典》第404条的例外,即机动车买卖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需以登记为条件,而非单纯依赖“正常经营”外观。另外,机动车的高价值和权利公示需求的特殊性与普通动产不同。机动车价值较高且流动性强,法律通过登记制度强化权利公示,避免无权处分风险。若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可能架空登记制度的公示功能,导致原权利人(如保留所有权卖方或抵押权人)利益受损。机动车销售方多为4S店或专业经销商,其经营权范围明确,消费者通常需核对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所有权证书)、发票等权属文件,负有更高注意义务。若允许未经登记的买受人对抗原权利人,将不合理地免除买受人的审慎核查责任。此外,机动车登记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具有公信力。登记信息(如抵押、查封状态)是公开可查询的,买受人应优先信赖登记而非占有外观。这与一般动产交易中依赖占有的公示效力也存在本质区别。因此,在价值平衡与风险分配中,应注重保护抵押权权益。机动车融资交易(如所有权保留买卖、抵押)中,债权人往往依赖登记保障权益。若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原权利人可能因无法控制车辆转售而面临无法追偿的风险,破坏融资秩序。相较于抵押权人,机动车买受人的风险防范成本更低,相较于一般动产,机动车买受人可通过低成本查询登记状态(如交管部门App)确认权属。要求其履行登记手续或核查登记信息,比牺牲原权利人利益更符合效率原则。在此背景下,将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排除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范围,并不会影响交易效

率;相反,此举不仅能有效减少交易纠纷的发生^⑤,还有助于保障抵押权人优先权益的实现,促进机动车抵押交易的有序开展,盘活企业资金流动,进而推动机动车市场的良性流转。

(二)已支付合理价款的理解:并非必备要件

“已支付合理价款”作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核心要件,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暴露出诸多争议与适用困境,直接影响规则适用的确定性与公平性。对于“已经支付合理价款”这个要件,目前的争议表现为价款是否必须“已经”支付。否定论认为,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要求买受人必须已经支付价款在国际上无此先例^[8],应对“已支付合理价款”作宽泛理解,不应以“已经支付”作为该要件的先决条件^[9]。肯定论则从平衡抵押权人与买受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价款必须已经支付^[10]。

本文赞同否定论。理由如下:一是对支付时点要求过于僵化。《民法典》第404条明确要求买受人需“已经支付”合理价款,而《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则表述为“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二者在支付时点的要求上存在文义差异。如严格按《民法典》字面解释,价款必须在抵押权人主张时已经实际支付完毕,这将不合理地排除那些已达成交易但采用分期付款或延期支付等常见商业安排的买受人。在商事实践中,尤其是大额商品交易中,赊销、账期等信用交易方式十分普遍,若僵硬地要求价款必须“已经支付”,将导致大量正常商业交易无法受到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保护,违背该规则促进交易效率的初衷。二是支付时点与风险负担失衡。现行规定未区分不同交易场景下支付安排的合理性,导致法律保护与风险承担失衡。例如,在买受人已受领交付且取得所有权,但约定后续支付价款的情形下,若因未满足“已经支付”要件而无法对抗抵押权人,将使买受人面临既失去标的物又难以追回已支付部分款项的风险。这种结果明显有违公平原则,也与商事主体的合理预期相悖。实践中,部分法院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在裁判中对“已经支付”作扩大解释,认可符合商业惯例的支付安排的效力,但因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三是支付时点与担保物权实现存在冲突。要求价款必须“已经支付”才能对抗抵押权人,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抵押权实现程序启动后,买受人为满足该要件可能突击支付剩余价款,而抵押人为逃避债务可能配合此类支付行为,损害抵押权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现有规定未设置防止此类规避行为的机制,使得支付时点要求既可能因过于严格而伤及正

当交易,又可能因存在漏洞而被不当利用,呈现规制效果上的矛盾性。支付合理价款要件反映了法律对既有担保权益的静态保护,而现代商业实践强调资产流动与动态经营。企业常需将已抵押资产投入流通获取运营资金,过于严格的支付要求可能阻碍这种合理经营需求。尤其在供应链金融等新兴领域,担保与交易紧密交织,传统支付要件可能无法适应快速流转的商业现实。这种矛盾要求对支付合理价款条款进行更具弹性的设计。

(三)“取得”抵押财产的交付类型:应囊括交付样态

“取得”抵押财产作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核心要素之一,与“正常经营活动”和“已支付合理价款”共同构成了规则适用的三大支柱。从法律效果看,满足这三个要件的买受人能够切断动产抵押权的追及效力,取得无权利负担的“清洁”所有权。这种制度设计实质上是对传统物权追及效力原则的突破,其正当性基础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提升交易效率和维护消费者利益。在抵押财产交付类型的法律定位上,交付要件发挥着多重功能:一方面,它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标志着所有权从出卖人转移至买受人;另一方面,它也是判断买受人是否真正“取得”抵押财产的关键标准。从比较法视角看,美国《统一商法典》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同样要求买受人取得对货物的占有(possession),但并未严格限定占有的具体形式。我国《民法典》虽未明确限定交付形式,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交付对交易安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交付与登记的关系在动产担保交易中尤为复杂。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对抗要件,而所有权变动则以交付为生效要件。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实质上是在特定条件下赋予交付优先于登记的效力,这种制度安排反映了立法对交易效率的优先考量。然而,不同类型的交付在公示效果上的差异,使得这一规则在适用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制度价值平衡角度看,交付要件的设定需要在抵押权人利益保护与交易便捷之间寻求平衡。过于宽松的交付认定标准可能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而过于严格的标准则会削弱规则的实用价值。因此,对交付类型的合理界定成为确保规则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

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中,关于“取得”抵押财产的交付类型存在显著的理论分歧与实践困惑。传统物权法将动产交付分为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两大类,后者又包括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三种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交付在公示效果、权

利变动明确性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导致其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中的定位成为争议焦点。

现实交付的优先性,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已形成基本共识,这种交付形式具有高度公示性,能够清晰展现物权变动状态,因而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中最无争议。相比之下,观念交付的适用性则引发广泛争议。简易交付的公示效果与现实交付相近,指示交付存在明确的占有指示变更,多数观点认为应承认其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的适用性。而占有改定引发的争议最为激烈,有学者认为其因缺乏公示效果而不能适用^[11]。不得不关注的是,观念交付的滥用还可能导致优先权冲突的加剧。当同一抵押财产被多次转让,且各次转让采用不同的交付形式时,如何确定各买受人的权利顺位成为难题。例如,第一次转让采用占有改定,第二次转让采用现实交付,两个买受人均主张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此时应优先保护哪一方的利益?现行法律缺乏明确指引,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一。有观点主张应按照交付形式的公示性强弱确定优先顺序,即现实交付优于指示交付,指示交付优于占有改定;也有观点认为应严格限制观念交付的适用,仅承认现实交付能够满足“取得”抵押财产要件。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对观念交付的态度呈现分化趋势。部分法院采取相对宽松的立场,认为只要交易真实、价格合理,不同交付形式不应影响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另一部分法院则持谨慎态度,尤其对占有改定情形施加严格审查,要求买受人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交易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这种裁判分歧不仅增加了交易不确定性,也为选择性司法提供了空间,亟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统一。

本文认为对于“取得”抵押财产的理解应囊括交付样态。一是《民法典》第404条未限定交付方式,第224条明确交付包括现实交付与观念交付,从体系解释来看,应包含占有改定。二是符合商事交易实践需求,供应链金融中常见“售后回租”“保理”等交易模式,均依赖占有改定完成权利变动。若排除占有改定,将导致大量正常经营交易被排除在保护范围外,违背规则设立初衷。同时需注意,应通过严格认定“正常经营活动”(如买受人需证明已支付合理价款、出卖人持续占有具有正当性)平衡各方利益,赋予买受人更高的善意证明责任。

三、主观要件:“正常经营活动”的理解与“善意”要素的佐证

“正常经营活动”和“买受人善意”作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的核心要件,其界定直接关系规

则适用的范围与效果。当前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这两个要件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地带,不仅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也可能影响规则预期效果的实现。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是完善相关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一)正常经营活动之界定

“正常经营活动”的认定标准是解决当前买受人规则适用混乱的关键^[12],《民法典》第404条仅作概念陈述,未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界定了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单一的买卖行为,尚且存疑。

1. 正常经营的形式:秉承限缩解释的原则

其一,租赁、设定担保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支持的观点认为,租赁、设定担保与买卖系同一属性的经营性行为,均为维持生产经营之所需,都应当属于“正常经营活动”^[13]。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租赁。一是租赁与买卖性质不同。租赁合同仅产生债权性使用权转移,不涉及所有权的处分行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以所有权变动为保护前提,与租赁法律关系的客体(使用权)存在本质冲突。根据《民法典》第745条,租赁权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体现立法对担保物权的优先保护。二是风险控制机制存在本质差异。动产租赁具有持续性,承租人长期实际控制标的物,将显著增加抵押物毁损、价值减损的风险;而正常买卖行为具有即时性,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抵押物即脱离原经营链条,风险形态更具可控性。三是商事外观识别标准不同。动产买卖具有明确交易外观(支付对价、交付占有、所有权转移),而租赁关系中标的物仍登记于出租人名下,缺乏可供外部识别的权利变动外观,不符合“正常经营活动”应具备的公示性要求。其次,关于设定担保。一是加剧权利冲突,破坏优先权体系。新设担保将导致同一标的物上产生多个担保物权,直接改变原有权利顺位关系。根据《民法典》第414条确定的清偿顺序规则,允许后设担保将破坏既定的优先权体系,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保护交易安全的目标相悖。二是非对价性特征。担保设定通常不具备等价有偿的交易实质,与正常买卖行为的经济本质存在差异;且《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已明确将“为经营活动设立担保物权”排除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范围之外。三是商事习惯排除。行业惯例中,接受他人财产设定担保需履行审慎审查义务,与即时买卖交易中的注意义务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允许未经查询的担保设定,将颠覆既有的风险防控体系。最后,从体系解释与价值衡量

角度分析。一是受文义解释的限制。《民法典》第404条明确使用“买受人”概念,结合体系解释可知,立法者有意将规则适用范围限定于买卖法律关系,排除租赁、担保等衍生法律关系。二是风险分配的合理性考量。动产抵押人继续占有抵押物的特殊架构下,买卖行为产生的风险具有可控性;而允许租赁或再担保,将导致风险呈几何级数放大,超出制度设计的风险承受边界。综上,租赁与担保设定行为因权利性质差异、风险形态不同、制度目标冲突及体系解释限制,应排除在动产抵押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

其二,易货交易和以物清偿是否属于“正常经营活动”?本文认为,易货交易与买卖性质一致,应属于“正常经营活动”。易货交易虽以货物而非货币为对价,但《民法典》第647条规定互易参照适用买卖规则。动产抵押规则关注的是抵押人是否在常规业务中处分财产,而非对价的具体形态。易货交易的受让人与货币支付的买受人,在查验抵押登记方面面临相同的注意义务标准;只要交换货物具有合理市场价值且符合行业惯例,即满足“支付合理价款”的实质要求。动产抵押权公示不足的天然缺陷,决定了法律需优先保护动态交易安全,易货交易作为商事实践中常见的交易形式,理应纳入规则保护范围。而以物清偿不同于易货交易,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首先,交易性质与目的不同。以物清偿的本质是债务履行行为,属于非典型、偶发性交易,其目的并非通过持续经营获取利润,而是以实物抵销既存债务。此类交易缺乏公开性和可预见性,与“正常经营活动”的持续性、重复性特征不符,超出规则保护初衷。其次,法律关系属性有别。以物清偿是债务人以他种给付替代原定金钱债务的单务行为,本质为债务履行方式的变更,不构成新的买卖关系;而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以买卖关系为前提,二者法律基础不同。最后,存在道德风险与制度冲突隐患。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要求买受人支付“合理价款”,需符合市场公允价格,避免恶意串通损害抵押权人利益;而以物清偿中,标的物价值通常与债务金额直接挂钩,可能存在折价抵债等偏离市场定价的情形,缺乏独立对价审查基础,易诱发道德风险。此类交易超出正常经营风险范围,若将其纳入“正常经营活动”,将破坏动产抵押制度的风险分配机制,损害抵押权人合法权益,且会导致抵押权人无法预见担保财产减少,动摇担保物权稳定性。故在法律解释与适用中,应以目的性限缩方法将其排除于规则适用范围之外。

2. 正常经营的查证:免除买受人查询义务

《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将正常经营活动限制在“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其立法初衷在于明确动产抵押中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范围,保护善意买受人的交易安全。然而,将正常经营活动机械限定于登记经营范围,并不符合商事实践需求。

我国自2013年起推行商事登记改革,《民法典》第505条已明确“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不当然无效”,强调交易自由。司法解释固守经营范围作为正常经营活动的唯一认定标准,与上位法精神相悖。实践中,企业实际经营常突破登记范围,如临时销售非主营产品、开展跨界经营等,若仅因超出登记范围即否定“正常经营”属性,将导致大量交易被认定为无效,损害善意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普通交易相对人在交易前核查出卖人营业执照记载内容,既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不符,也会大幅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因此,破解上述困境的关键在于引入动态判断标准,回归保护善意第三人与提升交易效率的立法本旨。司法者需在个案中灵活运用实质判断标准,结合出卖人经营惯例、交易频率、行业常规等因素综合认定,避免形式主义对市场活力的不当压制。未来修订司法解释时,可删除“以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为限”的表述,代之以“符合出卖人通常经营行为”等开放性条款,确保与《民法典》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更好适配商事实践的复杂需求。

(二) 买受人履行合同中的主观要求:应为善意

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买受人的主观善意问题是一个兼具理论争议与实践复杂性的命题。根据《民法典》第404条,动产抵押的抵押权人不得对抗符合“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然而,该条未明确要求买受人须具备“善意”主观状态,由此引发学界与实务界对“买受人是否需为善意”的长期争论。从文义解释看,该规则并未将买受人的“善意”(即不知或不应知抵押存在)作为构成要件。即便买受人明知抵押存在,只要符合上述条件,抵押权人仍无法对抗买受人;只要交易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完成,抵押权人的追及效力即被阻断。这一设计的立法意图在于:其一,保障交易效率,要求买受人逐一查询动产抵押登记将增加交易成本,阻碍正常经营活动;其二,保护合理信赖,买受人可信赖正常经营环境下的商品无权利负担,无需额外关注隐蔽的抵押登记;其三,平衡利益冲突,通过限制抵押权的追及效力,优先保护动态交易安全(买受人利益)而非静态担保权益(抵

押权人利益)。

尽管《民法典》第 404 条未明确要求善意,但《担保司法解释》第 56 条第 1 款通过列举例外情形,间接引入了善意要求,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些例外情形。《担保司法解释》第 56 条第 1 款第 5 项将“应当查询而未查询”作为排除保护的情形,实质上是将买受人的“应知”视为恶意,从而要求买受人需具备“不知且不应知抵押存在”的善意。由此,《担保司法解释》通过反面限制,将买受人的主观状态纳入考量,形成“客观行为+主观善意”的双重适用标准。例如,若交易存在异常(如大宗购买生产设备),买受人被推定负有查询抵押登记的义务,未履行查询义务则构成“应知”,进而丧失规则保护资格。有学者支持引入善意要件的立场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助于维护担保权益安全,若买受人明知抵押存在仍购买,允许其对抗抵押权人将鼓励恶意串通,损害担保制度的功能^[14];二是协调登记对抗规则,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效力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为原则,若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完全排除善意要求,可能导致登记制度虚化,而善意要件可弥补这一规则不足,是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必然逻辑延伸^[15];三是避免规则滥用,若无善意限制,抵押人可能通过与他人串通虚构“正常经营”交易转移抵押财产,损害抵押权人及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16]。反对引入善意要件的立场则认为:一是冲击交易效率,要求买受人判断交易是否异常并主动查询抵押登记,将增加交易不确定性与操作成本,违背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保障交易效率的立法初衷,还可能引发逻辑混乱^[17];二是混淆制度功能,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旨在保护交易流程的客观正当性,而非买受人的主观信赖,其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本质差异,后者解决无权处分问题^[18];三是不利于浮动抵押设立与运行,在浮动抵押中,抵押人需通过持续处分抵押物以维持经营周转,若要求买受人具备善意,将大幅限制抵押物的流动性^[19]。

本文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善意要求旨在平衡抵押权人利益与市场交易安全,具有正当性基础。信赖保护理论构成了善意要件的核心法理基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任是整个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尤其在与陌生人交易中,信赖直接支撑着交易安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所保护的,是买受人对经营者处分权的合理信赖:一方面,买受人信赖在正常经营活动中经营者对标的物享有完整处分权;另一方面,买受人尤其是消费者,有理由相信经营者出售的商品上不应存在隐蔽担保负担。这种信赖保护不同于传统善意取得制度中对占有人处分权的信

赖,而是对“交易过程正常性”的信赖,即买受人信赖在正常的商业环境中,商品流通不应受到隐蔽担保权利的干扰。交易安全价值是善意要件内涵要求的另一重要体现。现代社会中,动产种类日益丰富、价值不断提升,动产担保制度亦随之愈发发达,若允许已登记的动产抵押权无条件追及正常交易中的买受人,将极大冲击交易安全。普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既无查询习惯也无查询能力逐个核实商品是否设定抵押,其所处的正常经营环境,自然促使其合理信赖所购商品无权利负担。若不要求买受人善意,则可能导致恶意买受人利用规则漏洞损害抵押权人利益,进而破坏整个担保交易秩序。因此,善意要件发挥着过滤恶意交易、维护诚信商业环境的关键功能。效率与成本考量同样是支持善意要件的重要价值判断。担保制度现代化要求动产抵押通过登记完成公示,若完全免除买受人的查询义务,可能大幅增加抵押权人的风险成本;但若对所有交易都强制要求查询,则会极大提升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善意要件的确立,实际上是在这两种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点——仅在交易存在异常情况时(此时可推定买受人非善意)才要求其履行查询义务,既避免了正常交易中的不必要查询负担,又防止了规则被恶意滥用。从体系解释角度看,善意要件还发挥着协调相关规则的重要作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民法典》第 403 条(登记对抗规则)、第 406 条(抵押权追及效力规则)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若不要求善意要件,可能导致第 404 条完全架空第 403 条的登记对抗规则;而引入善意要件后,三者关系更为协调:抵押权人向抵押人出具借款的保障就是在抵押人拒不偿还到期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用以抵押的动产优先受偿,而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打破了这一体系规则,致使在抵押人出售抵押物后又拒不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下抵押权人丧失对抵押动产的担保权,从而可能导致抵押权人不愿意接受抵押人用其动产作为抵押向其借款。已登记抵押权原则上可对抗恶意第三人,但不能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的善意买受人。这种协调既维护了登记制度的公示效力,又保障了正常商业流转的特殊需求,实现了制度功能的有机衔接。

如何认定善意,是要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善意认定的核心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基本共识。根据《民法典》《担保司法解释》体现的精神及学界观点,认定买受人是否善意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买受人是否实际知道标的物存在抵押权、交易环境是否足以引起合理怀疑、买受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以及交易本身是否具有异常性。这种认定标准既不同于传统善意取得制度中的严格善意要求,也不同于完全客观化的交易判断,体现了对商事交易特点的特殊考量。“知道或应当知道”构成善意认定的关键分界线。所谓“知道”,指买受人实际知晓标的物上存在抵押权;“应当知道”则指根据交易环境和买受人身份,其负有查询义务而未履行,构成重大过失。《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情形,正是对“应当知道”的具体化。值得注意的是,仅知道标的物存在抵押并不必然排除善意,关键在于买受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购买行为会侵害抵押权。这种区分保护了那些虽知悉抵押存在,但合理信赖抵押人会正常处分财产、不会损害抵押权的买受人,契合交易安全保护的立法初衷。交易异常性判断是推定买受人应知的重要依据。异常交易情形主要包括:购买数量明显超出正常经营规模;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控制、关联等特殊关系;买卖标的物与出卖人正常经营业务无关;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公允价格等。当交易呈现这些异常特征时,法律推定理性买受人应产生合理怀疑并主动查询抵押登记,若未履行查询义务则构成重大过失,进而被认定为非善意。例如,一家服装零售商突然大批量出售工业设备,设备买受人若未查询抵押登记,可能被认定为非善意。这种客观化的判断标准,既减轻了抵押权人的举证难度,又增强了规则适用的可操作性,避免了主观认定的模糊性。买受人类型差异是影响善意认定标准的重要参考。对于普通消费者,因其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和便捷查询渠道,法院通常采取较为宽松的善意认定标准,除非存在明显异常情况,一般不认定其负有主动查询抵押登记的义务。而对于专业商事主体(如经销商、金融机构等),因其具备更高的风险意识、专业判断和调查核实能力,则适用更为严格的善意认定标准。这种区分对待的方式,既体现了法律对弱势交易方的倾斜保护,也符合不同交易主体间的合理风险分配预期,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四、排除要件:《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第1款的理解

从立法上看,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所规定的抵押物转让制度,大多是在确认抵押物的追及效力的基础上设计相关配套制度。同样,我国《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第1款旨在平衡动产抵押权人与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的权益,该条款的核心在于明确何种情况下买受人可以优先于抵押权人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司法解释从购买商品数量、出卖人的生产设

备、订立合同的目的、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五个方面,列举了“不适用优先权”的情形。不可否认此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争议,下文将对《担保司法解释》中列举的五个排除要件进行逐一分析。

(一)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

《担保司法解释》设置此排除要件的制度目的,在于平衡担保物权与交易安全,防止抵押人通过虚构交易或异常行为损害抵押权人利益。若买受人购买商品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可能超出正常交易需求,存在抵押人与买受人恶意串通转移抵押财产的风险,故排除其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该条款通过设置“明显超过一般”的排除条件,遏制以规避抵押权为目的的大宗交易行为,确保担保物权的优先效力不被异常交易架空。此条款在文义上接近于《美国统一商法典》原第1编-201条(1)项中的大宗货物转让^⑥。美国法院通过对比出售货物占全部存货和设备的价值比例来界定其是否属于大宗货物转让。《担保司法解释》正是考虑买受人行为异常(如大宗采购)可能损害抵押权人利益,故需限制其对抗效力。但《担保司法解释》中仅以数量多寡作为判断标准,实则是对该条款的误解,容易诱发阻碍自由交易的不利影响,国内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

本文认为,《担保司法解释》未对“一般买受人”的通常购买数量提供量化标准或具体指引,导致司法实践中判断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理由如下:一是忽略行业差异。不同行业的交易习惯差异显著,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单次交易量本就有天壤之别。若仅以“明显超过”作为排除标准,可能将正常的大宗交易(如批发商采购)误判为异常交易,违背规则保护正常经营活动的初衷。二是动态交易习惯难以统一。企业经营规模可能随时间扩大,若机械适用固定数量标准,可能抑制企业发展的合理需求。例如,某企业因业务扩展而增加采购量,却可能被认定为“异常”,导致交易安全受损。三是抑制正常商业效率与交易自由,引发增加交易成本的隐患。为避免被认定为“数量超标”,买受人可能被迫分拆交易或增加审查义务,导致交易效率降低。例如,企业需频繁查询抵押登记或调整采购计划,与动产担保制度促进融资便利的初衷相悖。四是限制企业经营自主。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采购规模是正常经营行为,但若因数量问题被剥夺权利保护,可能迫使企业采取保守策略,抑制商业活力。因此,应避免机械适用该条款,结合行业惯例、交易历史、企业规模等因素综合判断“一般买受人”的合理数量范围。

（二）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

《担保司法解释》设定此排除要件,核心目的在于防止抵押人通过处分关键生产设备损害抵押权人利益。生产设备作为企业正常经营的核心资产,其交易本身并非绝对脱离“正常经营活动”范畴,实践中企业通过出售设备实现更新换代、盘活资金周转等情形,均属于合理经营行为。例如,模具公司出售其生产的模具,可纳入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保护范围;若其出售的是用于生产模具的车床,则超出了常规经营处分的范畴。本文认为,若一概否定买受人购买出卖人生产设备的全部情形,可能阻碍企业正常资产处置,与保护正常交易效率的立法初衷相冲突。若严格按照文义解释适用该排除要件,还可能存在过度保护抵押权人的嫌疑——如生产设备已通过合理价格转让且完成公示,买受人无任何过错却无法对抗抵押权,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同时,《民法典》第404条并未明确将生产设备排除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担保司法解释》增设例外缺乏上位法依据,存在违反上位法原则的嫌疑。此种绝对化排除规定,还可能导致企业难以通过处置闲置设备融资,进而影响其正常经营周转。在司法解释未作修改前,应对生产设备的排除适用范围予以限缩:仅将与企业生产经营不可分割、具有唯一性的核心生产设备(如专属生产线、定制化生产机组)纳入排除范畴,对于电脑、普通办公设备等通用型设备,应视为一般动产,允许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因此,《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第1款对“生产设备”的排除性规定,虽旨在保护抵押权人利益,但因存在概念界定模糊、利益保护失衡及与上位法潜在冲突等问题,可能阻碍正常商业流转。建议通过限缩解释的方式,精准界定排除适用的生产设备范围,实现抵押权人与买受人的利益平衡,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与效率的统一。

（三）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

该条款针对实践中当事人通过订立买卖合同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情形,常见于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⑦,旨在防止债权人通过形式上的买卖关系规避债务履行义务。本文赞同该条款的立法取向,在适用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内容:其一,坚持实质审查大于形式审查。若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债务履行提供担保,如约定债务人到期回购标的物、债权人有权以买卖价款抵偿债务等,应穿透合同形式,认定双方构成担保法律关系,而非真实的买卖关系。其二,明确非典型担保的效力与实现路径。该担保行

为本身若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应认定为有效;但债权人不得直接主张履行买卖合同,要求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即使标的物已交付至“买受人”名下,其亦不能直接取得所有权。债权人仍须通过拍卖、变卖标的物方式实现债权,并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超出部分的价款应返还债务人。该条通过穿透式审查,将“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行为纳入担保制度框架,既平衡了担保功能与禁止流质的立法目的,又承认了非典型担保的合法性,同时规范了其实现程序,有效保护了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

该条“控制关系”的界定较为模糊,未明确“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具体认定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易产生争议。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买受人与出卖人通过控制关系规避担保物权,但如何判断此类交易是否“异常”,实践中存在分歧:即使交易符合“正常经营活动”的其他要件(如在营业执照范围内、持续销售同类商品),若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是否一概排除买受人的规则保护?若交易价格合理且无其他异常情形,是否仍因控制关系而否定买受人的权利?有学者提出,仅凭“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单一要件不足以作为排除规则适用的条件,否则公司法人制度的目的就无法实现^[8]。笔者对此予以赞同。买受人为避免被认定为存在控制关系,可能被迫进行复杂的尽职调查,如股权结构追溯,尤其在供应链金融等高频交易场景中,将严重阻碍交易效率;也可能一并将企业集团内部的正常交易排除在外,如母子公司间的设备采购,可能因控制关系被排除在正常经营活动之外,导致动产抵押的追及效力优先于交易安全,打击关联企业间的合法交易积极性。应对“控制关系”作如下限缩解释:第一,审慎认定企业集团内部的控制关系。不宜将集团内部的正常交易排除在外,避免过度干预关联企业的合法经营流转。第二,完善公示与预警系统等配套机制。建立动产抵押登记关联方标识,如在统一登记平台标注抵押物关联交易风险。金融机构等抵押权人应加强动态监控,对关联企业融资设置更严格的审查标准,从源头规避担保的风险。第三,弱化担保权人的举证责任分配。此情形下,抵押权人救济途径受限,抵押权人需证明关联交易“非正常经营”,但举证难度极高。因此,司法审查中应倾向于保护交易外观,要求抵押权人初步证明控制关系存在即可,由买受人举证证明交易符合正常商业条件(如价格公允、符合经营惯

例),避免举证责任倒置导致的不公平。综上,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通过关联交易规避担保物权的公示要求,但模糊的“控制关系”认定标准,可能导致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与交易安全风险。未来可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控制关系”的认定规则与适用边界,实现担保物权与交易安全的平衡。

(五)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

这一排除要件旨在防止关联交易损害担保物权人的利益,但其适用标准、法律依据及实务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以下从问题分析和法律论证两方面展开。

有学者认为买受人不应被施加过重的调查负担,否则将偏离善意地把握标准^[9];也有学者甚至直接提出这一消极要件是对出卖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保护制度严重误读的结果^[8],是因果倒置的错误选择^[7],缺乏法理基础^[11]。只有极少数学者认为有必要设置兜底条款。这一条款主要引发三方面的担忧:一是可能导致裁判者在解释和适用时恣意扩大其范围,容易被误解为买受人普遍负有查询义务,进而影响正常交易秩序。二是容易使人产生“买受人具有查询义务,未经查询即为恶意”的误解。单从买卖关系的角度来看,确无设定兜底条款的必要,该条款显然更多是从抵押关系出发,通过为买受人设立一定的查询义务来避免抵押权人的权益被过度侵蚀。三是影响交易效率与市场预期。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旨在豁免买受人的查询义务,若再以“应查询而未查询”否定对其的保护,则与该规则的立法初衷相悖。若要求买受人在交易前查询登记,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流通效率,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而言,负担较重。

本文亦认为确无设置此兜底条款的必要,但鉴于《担保司法解释》已设置该兜底条款,在理解和适用上应作以下区分:一是针对动产类别进行区分。结合该解释赋予买受人在购买上文所述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时的查询义务,因为在这类特殊动产交易中,要求买受人在交易前查询机动车上是否存在抵押并非强人所难,对交易效率的影响较小,也符合交易习惯。二是针对买受人的主观状态进行区分。引入买受人的恶意因素,避免裁判者在解释和适用时恣意扩大条款范围,对于其他普通动产,在买受人明知其购买行为会侵害抵押权时,可排除买受人规则的适用。

综上,《担保司法解释》第56条第1款第5项的“应当查询而未查询”条款,虽旨在防止规则滥用,但其模糊性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未来

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其适用标准,以平衡担保物权人与买受人的利益,同时维护交易效率与市场预期。

五、结语

我国《民法典》第404条在吸收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动产抵押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其作为平衡抵押权人权益与交易安全的重要制度,体现了现代商事立法对效率与公平的双重追求。

这一规则虽已搭建起基本框架,但适用中仍存在“正常经营活动”“动产范围”“已支付合理价款”等概念界定模糊、部分条款设置缺乏正当性基础等问题。在实践中适用应当注意:其一,在客观层面,应将机动车这类特殊动产排除出适用范围,对“已支付合理价款”应作宽泛解释,包括尚未支付但符合买卖双方交易习惯的可得支付情形,在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权利归属上应囊括交付样态;其二,在主观层面,对“正常经营活动”应秉承限缩解释原则,将租赁、设定担保和以物清偿等情形排除在外,买受人履行合同中的主观要求应为善意;其三,对于《担保司法解释》列举的排除情形应谨慎适用,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来衡量交易是否异常,有必要对生产设备的外延进行必要限缩,应对“控制关系”作限缩解释,在司法解释未作修改时,应将兜底条款解释为买受人明知其购买行为会侵害抵押权人权利的情形。

注释:

- ①比较法上,《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320(a)条、《欧洲共同框架参考草案》第102条以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34条的表述虽有差异,但实质上均确立了“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免受担保物权约束”的规则。
- ②美国统一商法典将存货定义为:物品,如果其在某人的控制之下被用以销售、出租或基于服务合同供给,就是“库存”。
- ③但此处的生产设备若根据担保目的被解释为存货,仍属于其正常经营活动。
- ④例如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31条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设立抵押权时,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办理抵押登记。再如《机动车登记规定》第3条第2款的规定,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应当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并按规定查验机动车,只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才办理机动车登记。
- ⑤截至2025年5月1日,笔者在法信上检索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案例128件,其中有50件为涉机动车纠纷,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拓展至机动车不仅会滋生抵押权人与买受人之间的纠纷,同时也会遏制抵押人通过抵押机动车的方式获得融资的良好势头。
- ⑥“大宗转让”是指转让存货中的主要部分而不通知债权人

人,由此可能伴随债务人携款潜逃的风险。该条款可能借鉴自《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正常经营买受人定义:“正常经营过程中的买受人不包括通过大宗转让货物或为担保金钱债务而获得货物的人,或者以全部或部分清偿金钱债务而获得货物的人。”

⑦该条款可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编中的“将全部或部分满足金钱债权担保的活动从正常经营买受活动中予以排除”。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下][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1082-1083.

[2]纪海龙. 动产担保权益延伸的合意路径[J]. 现代法学, 2022(3):3-18.

[3]黄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504.

[4]李军,赵丽萍. 动产抵押财产转让中担保权益实现的困境与纾解[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10):61-77.

[5]龙俊. 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J]. 法学家,2016(3):42-52.

[6]刘智慧. 《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适用解构[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3):132-144.

[7]纪海龙. 《民法典》第404条(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评注[J]. 清华法学,2023,17(4):158-174.

[8]董学立. 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保护制度及其一

般化[J]. 法学论坛,2025(1):104-118.

[9]郑永宽. 论“正常经营买受人”的善意要求[J]. 中国法学,2023(4):183-199.

[10]王利明. 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J]. 东方法学,2021(4):93-106.

[11]张素华,李鸣捷. 《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解
释论[J]. 北方法学,2021(3):5-18.

[12]李宇昊. 《民法典》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探析[J]. 三峡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86-90.

[13]钟维.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释评与
完善[J]. 广东社会科学,2018(4):232-238.

[14]董学立. 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J]. 法学
论坛,2010(4):88-92.

[15]纪海龙,张玉涛.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
营买受人规则”[J]. 云南社会科学,2019(5):106-115.

[16]高圣平,叶冬影. 民法典动产抵押物转让规则的解释论
[J]. 比较法研究,2020(4):78-90.

[17]李莉. 浮动抵押权人优先受偿范围限制规则研究[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3):43-51.

[18]邹海林. 民法典上的动产抵押权规则体系解释论[J].
法律适用,2021(5):28-37.

[19]庄加园. 探析抵押动产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J]. 法
学,2023(1):108-12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for Normal Operating Buyers in Movable Property Mortgages

WANG Huimin¹, SHAO Qiqi²

(1.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Xuzhou, Jiangsu 221000, China; 2. Xuzhou Yunlo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Xuzhou, Jiangsu 2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Normal Business Buyer Rule" established under Article 404 of the *Civil Code* are complex and ambiguous, leading to chaos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address this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restate the *Civil Code* and its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In view of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three parties involved in this Rule, the provisions of the Rule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First, special movable property such as motor vehicles should be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 requirement of "having paid a reasonable pric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s "paid a reasonable price"; an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ttribution of the buyer's rights to the mortgaged property, all forms of delivery should be included. Second, "normal business activiti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a restrictive manner, excluding transactions such as leasing, creation of security interests and debt settlement by goods, and the buyer shall act in good faith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Third, the exclusion circumstances enumerated i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Guarantee* should be applied cautiously. The abnormality of a transaction cannot be judged only by the quantity of goods purchased.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both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control relationship" restrictively. Meanwhile, before the revision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miscellaneous clause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situation where the buyer clearly knows that his purchase will infringe upon the rights of the mortgagee.

Keywords: Movable property mortgage; Normal business operations; Constituent elements; Buyer

周恩来与抗战胜利后中共苏联关系的嬗变

——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龚宇, 杜俊华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41)

摘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雅尔塔体系主导的国际关系格局下,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愈加复杂。本研究聚焦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苏联三国四方在重庆谈判、东北停战等重大事件中的政治博弈,以苏联档案等资料为中心,重点探讨了周恩来在中共苏联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为推动中共与苏联关系改善,争取苏联军事、政治支持,周恩来始终工作在对苏统战一线,以会谈等方式,持续增进苏联对中国形势的认识、不断增强苏联与中共合作的信心,为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良性发展,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俄)友好关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抗战胜利;中共与苏联关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0

中图分类号:D27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62-07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嬗变,实质上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苏联这三国四方的政治博弈为主线。这一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始终奋斗在外事工作前沿。在中共对苏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能积极与苏联展开交流,在中共军事实力还相对弱小、被苏联严重预估不足的时期,为苏联真实了解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国民党政治意图作出巨大努力。本研究拟以周恩来的对苏统战工作为线索,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中心,对抗战胜利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嬗变作一剖析。

一、三国四方矛盾与雅尔塔体系下的中共苏联关系

二战结束之际,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与各国国内政治关系。1945年1月12日,斯克沃尔佐夫(时任苏

联驻华临时代办)拜访刚赴华就任的赫尔利(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在简短的交谈后,赫尔利邀请斯克沃尔佐夫共进午餐,并特别强调“不愿意邀请”其他国家的在华人员。斯克沃尔佐夫在会谈纪要中分析道:美国人“竭力想把我们拉到自己一边”,“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与自己在华敌人进行斗争中的地位以及使我们与在华的美国的敌人之间产生某种猜疑和纠纷”^[1]。美国加强自己在华的存在感,以及削弱其他国家在华存在感的意图初显。

蒋介石也有自己的算盘。1945年1月24日,蒋介石回避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指使国防最高委员会迅速通过了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斯克沃尔佐夫指出:“此决议实质上是蒋介石意图进行独裁统治的幌子”,“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感到极度不安。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所有进步阶层中,还是在国外,中共的这个要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2]。带着美国政府“扶蒋

收稿日期:2025-11-21

基金项目:2025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提高重庆城市社区服务水平研究”(25SKJD001);2025年度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提高重庆城市社区服务水平研究”(2025CDJSKDPT28)

作者简介:龚宇(1995—),男,重庆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杜俊华(1971—),男,重庆人,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学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反共”政策使命的赫尔利大使的到来,无疑助长了蒋介石的野心。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严正指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3]。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同时发表声明:“来到重庆是为了与政府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随后,国民党对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进行了攻击。斯克沃尔佐夫致函莫洛托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在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2]2月14日,周恩来在同斯克沃尔佐夫会谈时,旗帜鲜明地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是为了“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而国民党的举措将使“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动员和联合起来”,这样下去“不可能有利于民族事业”^[4]。然而,苏联有自己的考虑。在周恩来与斯克沃尔佐夫交谈的6个月后,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国家主权,为何以中国“国家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却选择隐忍接受?除了美、苏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准备以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以达到打击中共的目的。蒋介石要求苏联提供的三点书面保证中,“中国共产党”被明确列出^[5]。《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同日,蒋介石便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又多次催促,从未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斯大林也连续向中共发出两封电报施加压力。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政治活动却都体现出蒋介石争取苏联支持、赢得中国国内舆论支持,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博弈的用心。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中共中央采取了两手措施:一方面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拟定并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6]728-729};另一方面,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晚最终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参加谈判^[7]。这就表明,在与蒋介石争取国际国内舆论上,中共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

在国际战略考量之下,美国表面上支持蒋介石,而苏联在与蒋介石和中共的关系上,以利益攫取为主要导向,对中共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并保持一定的距离。1945年8月30日,在与彼得罗夫(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会谈中,周恩来在通报重庆谈判情况后询问苏联相关情报与一些建议时,彼得罗夫只是

含混回答,他认为周恩来具有很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可以正确评价局势并作出最优的选择^[8]。苏联声称不对中共进行外交上或者军事、物资上的援助。但同时,苏联又给中共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方便。比如,1945年8月起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具有苏军军官、东北抗联和进驻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三重身份,1945年9月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配合作战并接受日本投降。这在客观上为中共抢先一步进入东北中心区域,以及日后接收东北部分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重庆谈判成为苏联、美国、中国国民党、中共三国四方博弈的结点,最终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这一条约在国统区群众了解中共政治主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后来蒋介石悍然撕毁条约,发动内战,但“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9]。中共成功破解了蒋介石设下的政治难题,回应了美国、苏联在选择支持蒋介石或中共方面的态度。

重庆谈判虽名义上是中共与中国国民党的对话,实则美、苏幕后的影响无处不在。1945年9月6日,赫尔利就在与彼得罗夫的会谈中不加掩饰地提出“如果谈判陷入僵局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自己支持国民政府”。这样的顾虑源于赫尔利意识到谈判的优势不在国民党一边,而是在“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10]。9月21日,重庆谈判进入僵局之时,赫尔利甚至直接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6]738}。不同于美国坚持的“扶蒋排共”,苏联此时的态度是“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10]。同一天,中共与苏联大使会谈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询问苏联立场时,彼得罗夫只是含混强调苏联希望国、共两党的谈判有很好的结果,而不再透露更多的信息^[11]。苏联的态度给蒋介石造成了间接压力,也间接保护了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安全。

在三国四方的博弈中,周恩来的斡旋对中共争取苏联支持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10月5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彼得罗夫谈话中,周恩来告知了重庆谈判的情况,承诺将《会议纪要》给苏联方面参考,在对当前局势、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进行分析后,周恩来对苏联强调了“苏美相互关系这个国际因素的重要性”,指出蒋介石“实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周恩来在会谈中再一次对苏联最敏感的问题——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进行了强调。

周恩来指出,美国人正是国民党背后的保障者。随后,周恩来询问,如果美军试图直接插手时苏联会持什么态度?彼得罗夫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12]。但这个问题显然直接触动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甚至将进一步威胁苏联的国防安全。

1945年10月1日,苏联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致电国民政府,表示:苏军将开始撤离,预计于11月前撤离完成^[13]。国民政府在回应中表示,国民党军队将“乘美国船只”登陆大连^[14]。“美国船只”四字极大地触动了苏联的神经,苏联立即提出反对^[15],国民政府与苏联方面随即就此开始争执。在10月接下来的日子里,苏联对国民政府态度急转直下,为了对抗美国与国民党,苏联决定延缓东北退军并开始暗中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

二、东北问题博弈下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嬗变

1945年10月,在东北苏军的支持下,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人民自卫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负责维持东北治安。由此,中苏双方在东北的部队很快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这一时期,苏联表面上与中国国民党、美国继续合作,以最大化地确保其在华利益,暗地则对中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对苏联而言,这样既可以不与中国国民党、美国直接交恶,又可以打破美军觊觎下中国东北的力量平衡。总而言之,苏联在实质上打破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客观上帮助中共在东北站稳了脚跟,中共得以有机会在东北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表面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重庆展开谈判,却仍然企图在战场上以武力解决问题。双十协定签订后的10月中旬,局势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山海关、华北、山东等地运送大量军队,扩大了解放区进攻的规模,接连挑起战火。然而,在解放区军民的英勇自卫反击下,国民党部队接连失利。这使蒋介石意识到华北地区的兵力依然不足,为了争取时间调取兵力,也因为国内外各方压力,蒋介石又开始号召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下称“旧政协会议”)。1945年12月15日,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调停声明下,马歇尔^④接替赫尔利出使中国,负责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面对这一局势,周恩来在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分析指出,蒋介石企图“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应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也应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6]751}。18日,周恩来又作报告,详细分析了一年以来三个阶段的谈判情况,点明蒋介石“表面谈判,实际大打”的真

相,指出仍要坚持“七大”基本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最终实现联合政府^{[16]166}。中共中央以“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为全国战略并积极部署^{[16]682},结合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力量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态度,中共迅速从山海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了一部分部队和党政军干部进入东北,开始在东北构筑稳固的根据地。毛泽东在1945年12月28日起草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明确指示,要在东北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并且“一九四六年一年以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16]887}。1945年1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运动,通过一系列反汉奸、特务、警探的控告,清账运动,以及土地运动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16]895}。东北解放区对群众的广泛发动、深入动员促成了强大的支前力量,为后来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自1945年10月1日苏联得知美军将以军舰登陆大连以来,便以各种理由推脱,延迟撤军,致使11月美国与中国国民党都未能进入东北。而国民党方面通过暗杀、造谣等一系列手段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在格明德尔的报告中对此有过分析,“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日军、伪军的残余力量)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灭遗迹,掩盖自己的罪行。”^[17]12月29日,洛佐夫斯基(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提交报告给斯大林,该报告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迫切希望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二、企图暂时为长春铁路提供军事保证;三、不能接受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四、希望积极参与东北经济。这份报告中还提到蒋经国访苏会同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并判断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18]。这表明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松散的政治联盟已经开始坍塌,但实现在中国东北的战略目标、攫取利益仍然是苏联的主要目的,只要美国不触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政治交易依然可以进行。

为此,1945年12月30日、31日,斯大林与蒋经国在莫斯科、彼得罗夫与蒋介石在重庆分别展开会谈。莫斯科的会谈中,由于前期话题始终围绕着对

中共进行调停等方面,斯大林的回答简短并逐渐失去耐心。直至开始对在华利益的协商,会谈气氛才融洽起来。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并且“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并承诺“中国政府将把(东北)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等。协商中斯大林表示可以将这些转交战利品的流程“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甚至还主动问道:“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即指可以将中国东北转交给国民党。对于新疆问题的调停,斯大林也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在讨论中国东北的问题时,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19]。在重庆,蒋介石与彼得罗夫的会谈主要围绕国共停战谈判方面,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提交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行动的草案。该草案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这个三人小组来确定停战的条件。参加三人小组的应该是:一名国民党的代表、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和马歇尔将军——作为第三方,即调解方。为了打消苏联的顾虑,蒋介石表示,马歇尔拒绝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做好准备,在交战双方停战方面帮助中国”^[20]。

通过这两场谈判,苏联与国民政府僵化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回暖。1945年12月,国民政府与苏方畅谈东北经济合作和东北接收方面的工作,苏联许诺,约好东北各城市的具体撤离日期^[21],而回避与中共高层的接触。1946年1月1日,在叶剑英、王若飞前往苏联大使馆时,苏联驻华大使称病不便会谈,于是由大使馆一等秘书代为进行。这一会谈十分简短:中共方面就是否应该参加马歇尔的谈判询问苏联建议,并提出三方会谈中“马歇尔和蒋介石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涉及东北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与苏联利益有关,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应有苏方代表参加”。苏联方面则含混回应,表示相信中共中央“一定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民主团结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同时明确表示苏联方面“不会提供任何建议”^[22]。中国国民党一边与苏联进行政治交易,一边利用美国介入调停,在外交方面使中国共产党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周恩来积极争取中共在多方博弈中的有利地位

在蒋介石提议进行重庆“旧政协会议”以及停战谈判后,中共再次以极大的诚恳态度接受协商。

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参加旧政协会议并发表致辞,与各界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23]。会上,蒋介石作出“保障人民自由”“承认政党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四项承诺^[24],同时进行的国共停战谈判也谈妥并约定1月13日停战。1月31日,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关于“旧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作了哪些基本让步这一问题时,周恩来回答,军队方面“改变了军队的制度”;改组政府方面,“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会中占二分之一”;制度方面,“接受英美式的民主”;国民大会问题上,作了巨大让步,“容许始终为人民所反对的十年前的代表继续存在”^{[6]758-759}。周恩来在2月1日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25]

中国共产党的让步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这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然而,却不符合蒋介石的愿望。在“旧政协会议”连续举办演讲会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屡屡起哄、捣乱,甚至狂呼乱骂,大打出手,抛掷石块、爆竹。随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1946年1月到2月期间发生了多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事件^{[6]760}。2月6日,周恩来与彼得罗夫交谈中,直接提到这一问题,“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首先要击退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们已开始进行撕毁这些决议的工作”。周恩来提到,国民党最近召开了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CC派代表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代表”,最后还“演出了一场把会议变成公开谩骂的闹剧”^[26]。

在国内谈判形势不容乐观的同时,国际形势也急转直下。在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从1946年2月开始,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开始陷入僵持,苏联方面则一再延期撤军。同年,苏、美、英于2月11日突然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引起了国内外一片哗然。蒋介石与美国顺势发表一系列报纸文章指责苏联对东北利益的侵占。大国间的政治交易、苏联以不撤兵对国民政府的要挟,激起了全国范围内对苏的不满情绪。再加上国民党一部分人有意将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国民政府官员,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被杀害事件往反苏反共上挑唆的引导,2月16日起,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苏运动。苏联对此事展开内部调查,“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破坏苏中关系”^[17]。2月21日,美国进一步发表声明,指责苏联谋取超过中苏条约外的利益^[27]。在美

国公开支持下,中国国民党态度更加强硬,随即终止了与苏联的东北经济合作谈判。

而此时正是“旧政协会议”进行军事部分协商的关键时期,国民党特务暴徒在学生就东北问题游行期间,趁机冲砸中共与民主党派报纸营业部,企图达到破坏协商的目的。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道:“这些挑衅的反动分子企图在军事协商就要完成时加以破坏。”“决不受这类反动阴谋分子的挑衅,或因此而退却。”^[28]周恩来在会见马歇尔时指出,国民党中的一些人正在破坏和推翻协商的成果,马歇尔也承认游行示威是“为了某种目的而精密组织起来的”,“他们在做断然的努力”^{[6]762}。1946年3月1日至17日期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展现出撕毁决议的态度,推翻一系列政治协定决议案。国民党的欺骗与破坏活动,使政治事态再次严重升级。《新华日报》在3月19日的社论中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在继续坚持“独裁原则”^[29]。周恩来尖锐地抨击国民党道:“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周恩来指出,这就是在欺骗老百姓!^[30]旧政治协商最终以国民党的欺骗与全面推翻结束。而同时,中国国内大游行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舆论也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东北经济谈判破裂,蒋介石不顾斯大林警告执意让美国插手东北问题,美国为国民政府公开站台,蒋介石对美苏争端推波助澜。1946年3月起,苏联对国民政府态度迅速恶化,随即推翻与国民政府的东北交接约定并展开报复。国民政府驻苏联人员在对国民政府的报告中称:3月13日,苏军在事先未告知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下撤出沈阳,并破坏沈阳以北铁路;3月16日苏军撤离四平,中共部队于17日中午解放四平,控制了四平以南至铁岭一带铁路沿线地区^[21]。3月21日,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致电中写道:“苏军自东北某地区撤退时,事前并未通知我方。我预定担任接防之军事人员,遂感受重大困难。”电报提出希望苏军在撤离时给予国民党军队协助^[31]。次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将于4月底撤退完毕,同时回避了交接时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协助的要求^[32]。此时,长春、哈尔滨城内仅有少量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周围中共部队已集结完毕,再加上沈阳北上道路被中共部队控制,国民党方面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国民政府驻苏联人员在其报告中称:苏联将防务径直交给中国共产党军队,而不待国民党军队接防,“现在将长春以北各地交付其培育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势力”^[21]。受形势压迫,4月6日,国民政府不得

不派代表向苏联要求暂缓撤离部分城市,被苏联拒绝^[33]。不同于国民政府的混乱与一筹莫展,中共中央作出的判断则十分果断。3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判断蒋介石必从沈阳出兵向北与我方争夺长春、哈尔滨”,要“不计牺牲反对蒋军向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目的,“速与辰兄(苏联红军)交涉,允许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16]166}。中共部队在苏军撤离后迅速夺得了先机。4月14日苏军完全撤离长春之时,中共部队立即抓住时机击败国民党保安部队,攻占长春,随后攻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市。

正在东北局势陷入胶着之际,一场“四八”空难震惊中外。1946年4月8日,中共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李秀文等13名民族英雄全部遇难。这次空难事故疑点重重,究竟是天灾还是阴谋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正如周恩来在悼文中所说:“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中国人民为求和平民主的实现,已付了极大代价,没料到还附上这样惨重的代价,并且还未付完;反动派正在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和接收主权等表面文章后面,进行着更大的独裁、分裂和屠杀的阴谋活动呢!”^[34]在巨大的悲痛中,中国共产党依然坚定地争取民主与和平。

如何解决东北问题成为影响各方关系嬗变的关键。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向周恩来发出电报指示,“力争以谈判争取东北停战及解决政治问题”,“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的态度与抗议形式”^{[16]225}。4月24日,国共重开谈判以期解决东北问题。民盟向周恩来提出一个方案: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党只派行政人员和和平接收长春,不得派军队进入。周恩来表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将请示延安决定。马歇尔也表示第二天会见蒋介石讨论,而后马歇尔却不辞而别回到美国,民主同盟就协商所作努力又告失败^{[6]770}。蒋介石声称,将竭尽全力拿下长春。对于马歇尔的调停协议,蒋介石直接拒绝,中共原则上同意,只是对协议做出一些修改。4月26日,在与彼得罗夫会谈中,周恩来指出,马歇尔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壮大了,因此他才会同意修订军队改组的协定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决议。“蒋介石对苏联持敌对态度,他害怕苏联;对中共他是敌视的。至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是目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欺骗美国人,以便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人“不便直接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他们将用迂回的

方法支援蒋介石”^[35]。周恩来与彼得罗夫的谈话内容在苏联内部报告中也得到证实。5月11日苏联报告,国民党东北部队“完全是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全部接受过在美国教官指导下的培训”;“美国人还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向这些部队全面提供各类军事给养”;“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最实质性的帮助,是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干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山海关、沈阳铁路线的最重要枢纽站上的部署”^[36]。对苏联来说,美国是其战后最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随着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逐渐显现出来。纵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但随着撤军板上钉钉,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逐渐成为苏联的必然选择。5月23日,苏联大使通知苏军已于5月3日完全撤退^[21],中国东北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峙的局面,而苏联和美国成为双方背后的支持者。

四、结论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对中国东北经济的控制、对东北工业体系的拆解是对其国防安全的保障。中国东北问题与苏联国防问题高度相关,这是苏联与中共关系嬗变的核心因素。由于一直以来对中共军事实力预估的严重不足,加上中国国民党与美国愈发紧密的联系,苏联基于其远东利益和国防安全的考量,做出了一系列看似矛盾的选择:既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交还东北,又暗中限制国民党并在交还东北过程中施以阻碍;既不与中共明确合作、不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外事工作人员提供情报,又在交还东北的关键时刻暗中向中共倾斜。客观来说,苏联在事实上为中共在东北发展力量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在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外事工作人员,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与忍耐力。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当时党的外事工作始终坚持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在复杂的三国四方关系中,艰难寻求对苏统战,一方面极大助力了中共中央及时获取国际情报并作出正确决策;另一方面力求使苏联了解中共政策方针与民心向背,为中共争取国际支持、获得国际援助并最终获取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 [1] 斯克沃尔佐夫.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ABHPΦ, φ. 0100, on. 336, n. 244, π. 14, π. 56-58.
- [2] 斯克沃尔佐夫.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ABHPΦ, φ. 0100, on.

35, n. 237, π. 11, π. 34-40.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5.
- [4] 斯克沃尔佐夫.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ABHPΦ, φ. 0100, on. 33, n. 244, π. 13, π. 66-70.
- [5] 彼得罗夫译.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ABHPΦ, φ. 06, on. 7, n. 35, π. 506, π. 33-34.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传(1898-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3-1154.
- [8] 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ABHPΦ, φ. 0100, on. 33, n. 244, π. 14, π. 205-20.
- [9]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4.
- [10] 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ABHPΦ, φ. 0100, on. 33, n. 244, π. 12, π. 218-219.
- [11] 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ABHPΦ, φ. 0100, on. 33, n. 244, π. 12, π. 218-219.
- [12] 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ABHPΦ, φ. 0100, on. 40, n. 248, π. 7, π. 120-123.
- [13] 彼得罗夫. 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为苏军撤退事面陈行政院长宋子文照会(1945年10月1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16.
- [14]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中国军队大连登陆的照会(1945年10月1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17-118.
- [15] 傅秉常. 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17-118.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 格鲍德尔. 格鲍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ПИХИИМ, φ. 17, on. 128, π. 1013, π. 42-69.
- [18] 洛佐夫斯基.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АИРФ, φ. 3, on. 86, π. 146, π. 20-26.
- [19] 帕夫洛夫.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АИРФ, φ. 45, on. 1, π. 322, π. 98-121.

- [20]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2月31日). ABIIPΦ, φ. 0100, on. 40, n. 248, π. Kn-032, π. 1-3.
- [21]董彦平.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报告书(1946年7月12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218-223.
- [22]列多夫斯基.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AIIPΦ, φ. 3, on. 86, π. 146, π. 20-26.
- [23]周恩来同志致词[N]. 新华日报,1946-01-11(02).
- [24]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礼昨日在国府隆重举行[N]. 新华日报,1946-01-11(02).
- [25]中共代表团昨招待记者由周恩来同志答复问题[N]. 新华日报,1946-02-02(02).
- [26]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ABIIPΦ, φ. 0100, on. 34, n. 253, π. 20, n. 16-22.
- [27]施麦斯.美国驻华大使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1946年2月21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453-454.
- [28]陪都又一大暴行大血案 暴徒昨日行凶捣毁本报[N]. 新华日报,1946-02-23(02).
- [29]出尔反尔:评国民党二中全会[N]. 新华日报,1946-03-19(02).
- [30]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周恩来同志重要谈话[N]. 新华日报,1946-03-19(02).
- [31]王世杰.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预先通知撤军日期致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照会(1946年3月21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88.
- [32]彼得洛夫.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四月底撤退完毕照会(1946年3月22日)[M]//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88.
- [33]当局又要苏军缓撤 苏方表示不能同意[N]. 解放日报,1946-04-07(01).
- [34]“四八”烈士永垂不朽[N]. 新华日报,1946-04-19(02).
- [35]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ABIIPΦ, φ. 0100, on. 34, n. 253, π. 20, n. 16-22.
- [36]莱基奇科.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PIIXHIHM, φ. 17, on. 128, π. 1013, π. 70-7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Soviet Archives

GONG Yu, DU Junhua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ttern dominated by the Yalta System,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became increasingly complex.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games among the CPC, the KM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major events such as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s and the Northeast Truce. Centering on Soviet Archives and other materials, it particularly explores Zhou Enlai's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to secur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Soviet Union, Zhou Enlai was alway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talks and other means, he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Soviet Uni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strengthened its confidence in cooperating with the CPC. His effort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eve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Zhou Enlai;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C and the Soviet Union

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收入、 工作条件与阶级意识的历史形塑

——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中心

王梦楠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20世纪20年代的京汉铁路工人属于当时社会中的中等以上收入群体。他们积极参与工会及罢工行动,并非主要源于生活困窘,而是源于其阶级意识的觉醒。京汉铁路工人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巨大的战斗力必须依靠工人自身的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宣传教育下,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逐渐苏醒。他们在参加工会组织后,认识到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增强了为捍卫自己权利和利益而斗争的勇气。在工会组织领导的火热斗争实践中,工人群体原本模糊的阶级意识逐渐清晰起来,并且不断强化,阶级意识的强化反过来推动了工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最终促成了规模空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

关键词:“二七”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群体;阶级意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1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69-06

中国的工人阶级形成于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已发展到约三百万人,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然而早期工人参与运动多出于道义支持,阶级意识尚未普遍觉醒。阶级意识的唤醒不能仅靠宣传,更需通过实际的工人运动来激发,进而推动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1923年2月,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也是早期中共党史辉煌的一笔。在“冲击—回应”范式的影响下,学术界多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归因于生活贫困。然而,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梳理及与其他工人群体的比较可以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京汉铁路工人在工作条件、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上均属工人阶层中的中上水平。京汉铁路的工人群体积极参与工会运动并非只为物质条件,更多是因为京汉铁路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通过工人运动强化阶级认同,从经济权利斗争转变到争取政治权利斗争。工人群体通过工会组织强化自身政治权力与利益,

而自身政治利益又推动着工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新的工人运动浪潮。在这一过程中,工会组织既是阶级意识塑造的载体,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一、京汉铁路工人经济收入分析

(一)京汉铁路工人群体内部收入不一

京汉铁路在中国铁路网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工人是铁路系统中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工人阶级群体之一。截至1923年,京汉铁路系统约有工人22000人,主要集中在长辛店、汉口江岸、郑州三地,京汉铁路工人约占当时铁路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由于民国早期铁路隶属不同,各个铁路营业状况差异较大,而京汉铁路营业状况较好,工人的工资也高。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平均月薪为18.82元,要高于河南的陇海、道清铁路的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1]。平均工资仅具有统计意义,难以反映工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分化。京汉铁路工人内部也会因为工种的不同有较大的收入差异。1923年京汉铁路工

收稿日期:2025-11-11

作者简介:王梦楠(1982—),女,河南郑州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

人最高月薪为 81 元,最低的只有 6 元,二者相差 13.5 倍,时年京汉铁路技术工人的平均月薪为 25.62 元,半技术工人为 16.21 元,无技术工人为 13.22 元^{[2]532}。同时工人收入也因工龄年限有不小的收入差异,1921 年京汉路长辛店工厂工人每月平均月薪为 15 或 16 元,而资格老的工匠为 30 元,低级工匠为 9 元,学徒更少,但火车司机或少数技术工人可达 60 元。也就是说,拥有 2 万余人的京汉铁路工人群体内部,收入也不尽相同,工人群体中的高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京汉铁路员工中的其他人。

(二)京汉铁路工人群体收入多元化

月工资水平并不能简单反映京汉铁路工人的全部收入,因为大部分京汉铁路工人的收入是由工资加上奖金、加班费、津贴、临时补助金、包工所得等共同构成的。这些额外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低收入工人的工资不足,改善了其整体生活状况。同时除去可观的加班费以外,部分工人还有额外的其他收入,随着铁路工程管理制度的发展,包工制成为铁路工人的重要收入来源。路方会把一部分工作包给部分工人,有盈余时,承包工人利润均分,亏损时,仍由路方负担^[3]。包工制等收入分配方式,充分调动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也使得工人的收入得到了保障和提高。至北伐前,京汉路小工程也多为工人承包^[4]。这种管理制度在提高工人总体收入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可能导致工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其实京汉铁路工资水平并不比其他劳工阶层高出许多,但京汉铁路工人还享有铁路局给的其他一些福利待遇。如京汉铁路在北京、琉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地盖有官房,以便工人住宿^{[2]533}。此外,京汉铁路工人也经常利用铁路千里网络在不同城市之间贩卖各类生活用品,其获利也颇为丰厚。

(三)京汉铁路工人群体收入横向对比

实际上京汉铁路工人的收入足够维系其在当地的生活所需。1923 年,京汉路下辖的三十个部门中,除了电务工厂,其他部门的最低工资也高于当地群众的最低生活费^[5]。京汉路长辛店工人,每月工资自 9 元至 30 元不等,生活费用只需三四元至十五六元^[6]。但是,由于铁路系统的工资并不是当时社会劳工阶层的最高收入,与北平(北京)的部分地区的普通家庭收入相比,铁路工人收入并无明显优势。社会学家陶孟和对北平(北京)48 家普通家庭进行调研,其统计包括了家庭全部成员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支出也是家庭成员的所有开支,对比京

汉铁路工人的收支与北平(北京)家庭生活的开支,调研显示京汉铁路工人的收入只是与北平普通民众的收入持平,但明显高于北平人力车夫平均收入 12 元的月工资,略低于小学教员 41.25 元的月平均收入^{[7]88}。因此,只从工资收入看,北平的京汉铁路工人平均收入水平与社会其他阶层的收入水平相比并无明显优势,但明显高于出卖劳动力的车夫阶层,略低于教员阶层。鉴于北平(北京)的生活成本高于郑州、武汉等京汉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可以推断,在京汉铁路的核心区域(如郑州、汉口等地),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应居当地中上水平。

事实上,20 世纪 20 年代的铁路工人的工资是高于其他行业一般工人的工资的。1927 年上海一工会所做的各行业工人月薪调查显示,铁路、邮政工人月薪平均为 25 元,超过其他各行业^[8]。可以说,民国早年间的铁路工人群体的收入,是要高于普通的工人群体的,即使军阀混战导致经济问题重重,也没有影响作为中国核心铁路的京汉铁路的中心地位。综上,数据分析表明,京汉铁路工人总体属于当时社会的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其生活并非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因此,“二七”大罢工中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应置于其阶级意识觉醒和政治权利追求的更大框架中来理解。罢工的深层动力,更多源于对组织工会权力、人格尊严和政治地位的主张。

二、京汉铁路工人工作条件分析

(一)京汉铁路工人劳动强度相对不高

传统的看法认为京汉铁路工人虽待遇好,但其工作劳作时间长,强度大。实际上北洋政府时期,以天为单位,大部分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1925 年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调查了 11348 位京汉铁路工人,其中 6262 人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占总数的 55.18%,工作时间最少的为 6 小时,最多的为 12 小时^[9]。这个劳动时间并不比其他劳工阶层多多少,根据统计,北平(北京)普通家庭的劳工劳动时间平均为 9.1 小时^{[7]31}。从晚清以来,京汉铁路工厂的工人,工作时间大都在 10 小时左右。根据 1923 年农商部的资料,铁路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大都在 10 小时,少的 8 小时^[10],因此大部分铁路工人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时长感到不满,虽然稍高于社会一般劳作时间,但其获得的福利待遇足以弥补。1922 年 8 月的京汉路工人罢工期间,工人们所提的要求仍是加薪和改善生活条件,没有一项内容涉及减少工作时间^[6]。在劳动时间上,京汉铁路工人都并没有明显超过同行业或其他行业工人的劳动时

间。晚清以来,许多现代化工厂和矿山都是采用两班倒的制度,每班12小时。因此大部分劳工的工作时间一天都在12个小时以上,甚至最高可以达到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低于10个小时的,并且全月的休息日也很少,不少工人甚至是每月全勤地进行劳作,除因季节影响、气候关系以及市场变动、劳动纠纷而停工或减时外,平时例假休息时间很少^[11]。因此,相比同一时期社会其他劳工阶层,京汉铁路工人的劳动强度适中,并不比其他劳工阶层高。

(二)京汉铁路工人工作环境相对优越

京汉铁路工人与北平(北京)的人力车夫相比,人力车夫则明显辛苦得多,调查36个人力车夫,他们在181日内,平均有174日靠拉车生活,甚至还有半年中不得一日休息者^{[7]77}。人力车夫高强度的劳作和微薄的收入让人力车夫与铁路工人之间出现明显的阶层差异。实际上,京汉铁路工人无论是收入,还是待遇,抑或劳动强度,均属当时工人阶层中的上层,因此京汉铁路出现招工的情况时,民众蜂拥而至,重金求职,出现“欲得京汉路一位置者,比肩相望”的情况。但同时期的安源煤矿工人与京汉铁路工人相比则悲催许多,矿井常常有倒塌、穿水、起火的严重事故发生,工人常常被压死、烧死或淹死。一个死者的代价是十六元钱的“安葬费”,而当时一匹马的价格则是六十元。所以遇有事故发生,矿方救马多于救人。工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一个小房间住五六十人,得了病无医药治疗,冬季三九天气还身穿破烂单衣^[12]。可见,铁路工人相比其他行业的工人而言,薪资待遇、劳动强度、安全保障等是优于其他行业工人群体的,但这种待遇上的优越并没有改变工人群体在社会上地位低下的劣势,社会上黑帮行会、雇地主等黑恶势力欺负铁路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京汉铁路工人的工作环境只是略好于其他群体而已,并非工人群体整个社会地位的提高。

(三)京汉铁路工人仍旧处于被剥削地位

民生凋敝的民国时期,工作的辛劳和危险性并不是民众选择工作的规避标准,普通民众更多考虑的是是否有足够的薪资支付家庭生活开销。作为民国初年的热门职业,铁路员工无疑成为民众最优的选择之一。放眼民国时期工人阶级可选择的职业中,相比人力车夫、纺织女工、煤矿工人等工种职业,铁路工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即使是最为普通的铁路工人其薪资和待遇也高于其他普通行业,且工人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等也会因为工人工作年限的增长和岗位的调换有所改善,这也成为铁路工人的职业优势。但是铁路工人群体待遇的提高并不是其社

会地位的提高。郑州驻军经常欺压铁路工人,工人平时均忍耐不言。1922年1月2日,郑州驻军一连长带领多名士兵,不问青红皂白对工人大施暴力,致使机工遭受重伤,致头颅破裂者数名,同时被抓去多名工人^[13]。进入铁路工人职业的背后也是工人受剥削的开始,普通民众必须先向工头缴纳一笔贿赂金,进厂后为保住工作,还需给工头一笔酬劳金,并在逢年过节送礼物^[14]。但在经历过工人阶级意识启蒙和若干规模不一的工人运动之后,较高的职业门槛和尚可的经济待遇并没有阻碍京汉铁路工人自身阶级意识的形成,也未阻挡京汉铁路工人群体斗争意识的产生。

三、京汉铁路工会逐步构建并持续强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一)铁路工会组织唤醒工人阶级意识

即使有着高于普通社会群体的经济收入,京汉铁路工人仍属下层群体,社会地位不高,一样面对着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早期京汉铁路工人中各类秘密组织林立,不仅有进步组织,也有帮会组织,纷乱复杂。随着进步思想的传播,1921年5月至1922年年底,京汉铁路全线已经成立了16处分工会,全路工会会员达到2万多人,在逐步建立起京汉铁路各地工会后,开始广泛开展罢工活动,争取权益,铁路工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京汉铁路工会的简史验证了汤普森所提出的观点,阶级是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15]。工会是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产物,同时工会也是工人阶级维持阶级意识的产物。一是铁路工会能够团结工人争取更好的经济收入,并提高工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在铁路工会建立后,无技术的小工参加工会的积极性很高,因为工会也同时提高了小工的社会地位^[16]。工会的存在不仅使得工人的工资能够直接得到保障,也有利于改善工人们的工作、生活环境,并且在进人和开除人方面也拥有了话语权。二是铁路工会对于受到不法侵害的工人也能起到救助作用。由于政治腐败,阶级矛盾突出,时常会出现一些工人被陷害入狱的情况,工会往往出面解救。“郑州工人俱乐部发起后,俨然为郑州工界的明星,预计有种种为工人谋幸福的事件,所以加入的人非常踊跃,捐款的和办事的都非常热心。”^[17]京汉铁路工人从工会的发展中得到了人身安全和福利保障,进一步加强了工会在工人群体中的威望,也促使工人积极加入工会组织,使得工会组织迅速扩大起来。

(二)共产主义宣传唤醒工人阶级意识

“工人集体或系列的工人阶级由大多数分享相

同的环境或生活在相同条件下的个体组成”,他们“在相同的处境中会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或做出反应”^[18]。在历经多次保护工人权利的事件后,早期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在京汉铁路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共产主义宣传,早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便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名义到长辛店联系工人,后通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派张国焘、罗章龙、邓康、李梅羹、吴汝铭、李实、贾祝年、张纯、吴容沧、罗运麟、王铮、杨人祀、张志刚等人前往任教,进一步融入工人中去^[19]。1921年7月,邓中夏、张国焘发展了王俊、陈励茂等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长辛店早期党组织成立,中共派去的学生党员吴汝铭任组长。1922年8月,京汉铁路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长辛店党支部成立,但人数偏少的共产党人面对着数万名工人群众显得杯水车薪,因此在1000余公里长的京汉铁路沿线初步建立了党与工人联合的战斗堡垒:工会。以工会为核心的群众组织成为工人运动的核心,工人群众对于工会组织的活动非常热心,逐渐形成京汉路工人组织工会的高潮。以京汉铁路工人为核心骨干的中国铁路工人群众认识到铁路工人不分区域都是一个整体,要团结一致。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不仅给陇海工人予以经济上的援助,同时发表声明与陇海工人共进退^[20]。1922年,由于交通部总长主张用武力解决京汉、京绥两路罢工问题,京奉、津浦、沪宁各路工会决定在上海组织五路职工联合会,以便沟通信息,联合行动^[21]。阶级意识的觉醒正是由于工人们深刻认识到,他们的整体利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团体,才能拥有与对立阶级谈判的筹码。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存在于群体内部,但不会自然出现,需要工人群众的先锋队有所引导才能唤起。

(三) 阶级冲突进一步强化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

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工人阶级成熟的表现,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诉求,代表不同阶级的北洋军阀与京汉铁路工人阶级早晚也会发生冲突。“二七”大罢工之前,京汉路长辛店、江岸、郑州的5次罢工均取得胜利。罢工者虽有较多有利条件,但阶级冲突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京汉铁路工人对北京政府和吴佩孚缺少清醒的认识,“在本会方面,未尝不知与吴佩孚终不免有一日决裂,但未料及有如是之速”^[22]。在罢工之前,大多数工人相信吴佩孚是不会用武力镇压工人的,1921年吴佩孚发布了“保

护劳工”的通电,工人代表均认为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吴佩孚,虽然没有认同工人开会,但是最低限度也不至于解散工会,杀戮工人^[2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阀的认识还很不成熟,吴佩孚对于共产党在铁路工人中的各种举动,不过是利用而已。罢工前夕,领导者并没有对吴佩孚以及北洋政府的动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吴佩孚对于劳工的宽容态度是基于京汉铁路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唯一来源,对于京汉铁路劳工的宽容也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需要,一旦工人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始对政治权力提出诉求,那么作为军阀的吴佩孚很快就表现出军阀残忍镇压劳工的一面,而早期的共产党人显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一旦工人运动从经济利益转为政治利益诉求,工人阶级自身意识开始不断苏醒,工人阶级必将不断走向反抗之路,军阀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就变得无法调和。

四、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强化助推工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二七”事件后,北洋政府交通部认为,“罢工工人中十成有九成全是盲从,那一成之中也是受人蛊惑,一时失检做出来的”^{[24]36}。现实教育了京汉铁路工人,铁路工会的存在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保障,因此,他们保护工会不是出于盲从,而是在捍卫自身的权益。

(一) 维护工会成为阶级意识的体现

京汉铁路工人提出的五项最低条件中,有三项内容是为了保存铁路工会,促进其更好地发展^[25]。随着工会不断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逐步强化了其政治地位。工人阶级自身意识的提升,与政府当局发生极大的冲突,劳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1923年1月,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京汉铁路总工人斗争情绪顿时高涨,按原计划举办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阶级意识的高涨加剧了京汉铁路罢工斗争的复杂性。无论是工人还是共产党员代表都认为延期或降低开会标准会导致铁路工会的威望受损,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成立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标志,成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苏醒的标志。阶级意识的高涨也带来了负面作用,高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忘记了工人阶级的罢工并不能抵挡敌人的枪炮。在这种工人阶级集体意识之下,京汉铁路总工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标志,如果总工会无法成立,那就代表工人阶级的全线溃败。

(二) 工人自身的团结成为阶级意识的象征

并非只有处于最底层的普通工人才踊跃参加工会组织,收入也不是决定工人是否愿意参加工会的

主要原因,事实上,收入较高的技术工人由于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反而更容易成为工会工作的组织者。京汉铁路16处分工会负责人以及总工会的3位委员长均是技术工人。50位“二七”大罢工的烈士中有41人为技术工人或半技术工人,有5位是在铁路工人中最有发展前途和收入最高的司机、升火^{[24]297-303}。同样,铁路工厂中的技术工人也是斗争性强的工人代表。“二七”大罢工主要发生在工厂工人集中地:长辛店、汉口江岸、郑州。可以看出收入高的技术工人的革命热情多数高于普通工人,而技术工人带头加入工会,也极大影响了普通工人群众对铁路工会的认同,加入工会维护自身利益成为铁路工人群众的普遍共识。在长期的斗争中,京汉铁路工人逐渐认识到工人阶级巨大的战斗力必须依靠工人自身的团结。维护工会就是维护工人的政治利益,政治利益就是经济利益的保障,所以“二七”大罢工中的工人阶层并没有出现分层,而是无论阶层高低都积极参与罢工,形成了空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高涨起来。

(三) 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助推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京汉铁路工人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工人群众只有依靠自身的团结才能成功,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逐渐苏醒。他们在参加工会组织后,明确认识到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增强了为捍卫自己权利和利益而斗争的勇气。在工会组织领导的火热斗争实践中,工人群众原本模糊的阶级意识逐渐清晰起来,并且不断强化。阶级意识的强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了规模空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运动。在这一罢工的过程中,工人运动再次促使工人群众不断提升阶级意识。所以“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工会虽然被封禁,但是工会的观念依然存留在全体工友脑海中。还有不少觉悟分子在“二七惨变”后,仍为工会努力。足见“二七”大罢工虽遭重大打击,工会运动却依然进行不已^[26]。可见,经历过惨痛失败教训的中国工人群众,不可能重新走回任人宰割的老路。被唤醒阶级意识的中国工人阶级不断重拾信心,继续寻求新的革命方式和革命同盟。

五、结语

尽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谷,工人阶级整体呈现出消沉状态,零散的自发斗争亦多告失利,未能立即扭转局势,但这场斗争绝非工人运动的终点,而是其走向新阶段的

重要转折点,同时也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彰显历史使命的关键契机。

“二七”大罢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人群众本身,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京汉铁路工人的同盟罢工及其展现出的组织性与斗争性,使孙中山等革命派深切认识到工人阶级与青年中蕴藏的巨大力量,进而推动其改组国民党、坚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的决心,客观上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既印证了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基本动力的历史地位,也表明“二七”大罢工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积极作用。

“二七”大罢工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中一次标志性的壮举,使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集体行动扩大了政治影响,赢得了其他革命力量的关注,更在于它深刻地唤醒并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通过这场流血斗争,工人群众真正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形成了明确的阶级认同与政治诉求。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最坚定、最彻底的力量源泉,也为之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奠定了重要的阶级基础与精神积淀。

因此,“二七”大罢工不仅是一次争取权益的经济斗争,更是一场阶级意识觉醒的政治启蒙。它的精神遗产与历史教训,持续影响着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了自觉斗争与政治成熟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刘心铨. 华北铁路工人工资统计[J]. 社会科学杂志, 1933,4(3).
- [2]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 交通路政[M]. 1935.
- [3] 许元启. 唐山劳动状况(二)[J]. 新青年,1925,7(6).
- [4] 灵雀. 共产党在京汉铁路活动之情形[J]. 国闻周报, 1926,3(6).
- [5] 心美. 长辛店旅行日记[N]. 晨报,1920-12-21(06).
- [6] 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N]. 晨报,1922-08-25(3).
- [7] 陶孟和.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 [8] 张瑞德. 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905-1937)[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1:201.
- [9] 统计股整理十四年各路职工调查表(续)[Z]. 铁路职工教育委员会会报,1926(4).
- [10]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 第十次农商统计[Z]. 1923: 89-90.

- [11] 刘明逵.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1840-1949): 第一卷 第一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231-233.
- [12] 刘立凯, 王真. 1919-1927 年的中国工人运动[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57: 10.
- [13] 京汉路又起罢工风潮[N]. 申报, 1922-01-08(08).
- [14] 罗章龙. 椿园载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149.
- [15]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 钱乘旦,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004.
- [16] 包惠僧. 包惠僧回忆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94.
- [17]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 中国工运史料[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4: 61.
- [18] 雷蒙·阿隆. 论治史: 法兰西学院课程[M]. 冯学俊, 吴泓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399-400.
- [19] 罗章龙. 罗章龙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M]//中国革命博物馆.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9).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16.
- [20] 张浩. “二七”的意义与经验教训[J]. 中国工人, 1940(1): 506.
- [21] 五路职工已实行联合[N]. 大公报(天津), 1922-08-30(03).
- [22] 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94.
- [23] 陈素秀.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 951.
- [24]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等. 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3.
- [25] 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路总工会联合办事处. 二七工仇[J]. 近代史资料, 1955(1).
- [26] 张特立. “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M]//中国革命博物馆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37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Shaping of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the "February 7th" Strike —Centered on the Jinghan Railway Workers

WANG Mengnan

(Nankai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0035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920s, the Jinghan Railway workers belonged to the middle or upper-middle income group within society.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labor unions and strikes was not driven by poor living conditions, but rather by the awakening of their class consciousness. Through prolonged struggles, the Jinghan Railway workers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immense combat strength of the working class must rely on their own unity, coupled with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s, which led to the gradual awakening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worker group. After joining labor unions, they clearly recognized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ghts, gaining the courage to fight for the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intense struggles led by labor unions, the initially vagu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er group became increasingly clear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is reinforcement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urn, propell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abor unions. It was through this interaction that the working class grew and expanded, ultimately culminating in the unprecedented large-scale strike movement of the Jinghan Railway workers.

Keywords: The Great Strike of February 7; Beijing-Hankou Railway; Working class; Class consciousness

虢文化的区域特征及活化传承研究

冯乐辉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121)

摘要: 虢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植根于西周虢国的历史文化沃土,是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兼具周文化的礼制内核与中原文化的外在表象。虢文化的特征是区域融合性强、依托的环境优势突出、受周边文化影响较深。当前,为破解虢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不断推进虢文化的活化传承,可以采取加强政策指引、创新方式方法、树立大遗址保护理念、增强虢都保护与研究、弘扬姓氏文化与根亲文化、推进文旅融合等措施,守护文化根脉,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关键词: 虢国;虢文化;区域特征;活化传承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2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6)01-0075-05

虢文化源自西周时期分封的虢国,是典型的地域性文化,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虢国原址大量考古成果的出土,虢文化相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热点。“虢文化承前启后,对两周以至后世历史影响广泛而深刻。其在周代众多诸侯国中颇具代表性。”^[1]对虢文化的研究,不仅是对两周时期社会形态的深度剖析,更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有力印证。而虢文化的活化传承,有助于提升人民的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一、虢国历史及虢文化概说

(一) 虢国历史概说

虢国有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及小虢五个分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后,分别封其叔虢仲、虢叔于西虢(定都雍邑,地处今陕西省宝鸡市东)、东虢(定都虢邑,地处今河南省荥阳市),以此起到拱卫国都镐京的作用。周平王东迁洛邑(前770年)后,西虢向东迁移,改称南虢(定都上阳,地处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东南李家窑),于春秋时期为晋国所灭。原西虢故地被称为小虢,在

春秋初期为秦国所灭。东虢则向北迁移,改称北虢(定都下阳,地处今山西省平陆县),后为晋国所灭。虢国最为人知的典故是假途伐虢。虢国与其邻国虞国本是互为辅助的盟国,因虞国国君不听宫之奇等人的劝谏,执意与晋国合攻虢国,最终落得虢、虞两国相继亡国的下场。《左传·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下阳,即夏阳,在山西平陆县。传曰:“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晋国联合虞国先攻灭下阳,也就是北虢。不久后,据《左传·僖公五年》载:“晋侯假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2]据此可知,北虢当灭于鲁僖公二年(前658年),南虢当灭于鲁僖公五年(前655年)。虢国从最初西周的分封到最终的覆灭,历经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

(二) 虢文化概说

虢文化狭义上是指西虢文化,广义上则指从西周建立到春秋初期存在的五虢所承载的文化,其覆

收稿日期: 2025-10-08

基金项目: 2025年度教育部人才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职体与数智技术双重驱动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建设研究”(2025YJAZH248)

作者简介: 冯乐辉(1981—),男,河南洛阳人,博士,郑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农业史。

盖区域包括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山西省平陆县、河南省三门峡市、河南省荥阳市等三省四地,内容主要涵盖虢国的青铜器、玉器、车马器、城邑遗存、礼乐制度等各个方面。本文研究的是广义的虢文化。虢文化作为周文化的重要分支,其对应的虢国原址——三省四地均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此它同时也是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与创新的宝贵财富。“虢国所形成的尚德、尚文、尚忠、尚勇的西虢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以其深邃内涵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是独具特质的中华民族地域文化。”^[3]学者李久昌将虢文化的内涵总结为“崇礼守制、尚武善战、自强不息、技艺求精、开放多元”^[4]。

20世纪50—60年代,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清理出虢都上阳城遗址,以及包括虢太子墓在内的238座墓葬、4座车马坑和若干马坑等遗存,湮没已久的虢文化由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次考古的报告由林寿晋先生主持编写并出版,书中指出:“这个墓地属于同一个国家,内涵丰富,年代下限明确,是研究两周之际,特别是当时虢国文化面貌的一批典型材料,也提供了科学的断代标准。”^[5]这段话印证了虢国墓地对虢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郭沫若也曾撰文,对墓葬中出土的虢季氏子段鬲、铜镜、虢太子元徒戈分别加以介绍,他指出:“虢季子白盘,传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县虢川司,其地望为西虢。其地望说如属实,则当是北虢之器转赠于西虢者。”^[6]这一研究打破了以往虢国地望研究仅停留在文献考证层面的局限,掀起了虢国史研究的热潮。

至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虢国墓地北区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发掘,发现包括虢国国君墓在内的墓葬18座、车马坑4座、马坑3座。俞伟超、李学勤、安志敏、邹衡、马承源等知名专家参与了当时《中国文物报》组织的虢国史专栏研讨,使虢文化研究上升到独立的学术高度。第二次考古发掘的报告,经考古工作者耗时九年整理完成并出版,分为图版、彩版与文字三部分,全书共90余万字,配图精美、内容翔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主编:《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进入21世纪,随着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的建成,以及相关研究者的不懈努力,虢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力度持续增强。虢国博物馆研究人员整理出版了《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第一辑)(虢国博物馆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虢国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2023年版)等相关著作。当前,虢文化研究已进入考古发现与文献文本相结合的新阶段,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二、虢文化的特征

有关“文化”的定义林林总总,很难完全统一。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1871年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称:“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7]这一经典诠释正逐渐为现、当代东西方学者广泛认可。冯天瑜等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8]由此来看,文化是人类由内及外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文化人、德治教化是华夏文明维持繁盛不衰的根基。而虢文化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区域特征。

(一)“广纳百川”,极佳的区域融合性

虢文化由虢国的人民群众所创造。在历史上,中国地域广阔,区域间文化差异显著。虢文化内涵丰富,得益于虢国人民与周边地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这使其能够吸收本土及其他地域文化的养分,不断发展完善。虢文化是“以在诸虢疆域内的姬姓周人文化为主体,并吸纳当地商文化、土著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逐渐融合而成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性文化”^[9]。虢国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地带,虢文化从中汲取了秦文化、晋文化、中原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区域性文化特质。

西周建立后,周人凭借先进的华夏文明与家族观念,直接影响了周边少数民族,促成“夷夏杂处”的局面,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范围不断扩大。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10]民族融合往往伴随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促进。虢文化所吸收的秦文化、晋文化里的崇武好战风俗,实际上源于西羌、犬戎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秦、晋两国因紧邻异族,受游牧民族影响而骑射

好战之风盛行。而虢文化崇德尚文的特点,则与周文化崇尚礼乐文明、恪守礼制家法、强调等级秩序的特质密切相关。虢国自建国伊始,便自上而下注重吸纳和融合各类文化,进而推动了自身文化的发展。

(二)“地利万物”,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

虢文化的兴起,有其突出的环境与资源优势。列宁曾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11]虢国地处今陕、晋、豫三省交界处,黄河、崤山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储备,函谷关则兼具屏障与关卡的功能。加之境内多小盆地的自然结构、适宜耕作的气候,以及区域重要的战略位置和执政者的重视与经营,虢国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虢国地区多样化的自然景观、适宜的气候、优越的区位,为虢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温床。”^[12]虢文化的兴起与其自然环境优势息息相关。

虢国所在区域整体属暖温带,气候特点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雨雪,适宜多种农作物、林木和动物生长繁育;同时,这里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生物多样、环境优越,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发展。虢国地处黄河中游,由黄河上游陕北平原冲积而来的肥沃黄土与充沛的黄河水,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条件与水利保障,推动了虢国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使虢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三)“以文化人”,受周边文化影响较深

虢国邻近周王室,始终与周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保持紧密联系,虢文化作为周文化的一个分支,具备周文化的典型特征。虢国是周王室的方国,从地理位置来看,地处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之间,与周文化本为一体。从已出土的墓葬文物来看,虢国拥有迄今为止发现的、从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工艺水平最高的青铜器与玉器,代表着当时手工业生产制造技艺的顶峰。

西周王室确立的制度等级分明、礼乐制度完备,而虢国作为拱卫周王室的诸侯国,其礼乐文明皆效仿周朝,这一点可以从虢国墓地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铁器及车马坑等遗存中得到印证。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虢国遗址历经多次考古发掘,均取得重大成果。1996年,虢国墓地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虢是虢文化研究的重镇,西虢文化所代表的正是典型的周文化。李久昌认为西虢“在保持河洛文化传统基因的同时,发生、叠压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最终形成了以河洛

文化为主体,融汇关中文化、三晋文化因素和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崤函文化”^[13]。西虢文化归属于崤函文化,纳入河洛文化的分支范畴是恰当的,从大的文化范畴来说,仍属周文化一脉。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虢文化并不局限于西虢一地,除三门峡地区外,其他虢国故地也应当留存有大量虢文化的物质遗存与精神遗产。因此,虢文化研究应进一步拓展地域范围与研究范畴,这当然还有待于今后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文本展开更为深入的合理论证。

三、新时代活化传承虢文化的建议

当前,虢文化传承面临着文化内涵挖掘不深、遗产保护与利用脱节、公众认知度偏低等现实困境。如何推动虢文化的活化传承,亟待系统性谋划与布局。

(一)加强政策指引,统筹规划三省区域联动

活化传承虢文化,需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部署下,树立大局意识,整体推进虢文化的传承发展。虢文化隶属于黄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近年来,党中央高瞻远瞩,积极部署考古工作的长远发展目标,也为虢文化的传承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

当前虢文化研究多侧重于西虢,研究重心集中在河南三门峡、陕西宝鸡等地。而实际上虢文化涵盖“五虢”,应将“五虢”文化资源整合起来,加强陕、晋、豫三省的区域联动,以推动虢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此外,相关部门还需加强对虢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工作,让优秀的虢文化成果辐射影响更多人。同时,通过出台系列政策措施,紧密联动三省相关文保部门及此领域专家,摒弃划片分割、单兵作战的模式,以整合思路协同发力。

厘清虢文化的发展脉络与传承谱系,以西周时期为重点研究阶段,以西虢为研究重镇,以考古工作为重要推动力。并站在战略高度,将虢文化发展纳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打造虢文化品牌效应。通过多措并举开展学术资源的合理调配与有机整合,构建虢国史与虢文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二)突出“新”与“活”的方式方法

虢文化的传承与融合,关键在于方式方法的创新,需主动创新,充分调动大众的参与兴趣。虢文化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非空口无凭、脱离实际的虚幻概念,既有考古出土的器物可用于文博展览,亦有传世经典文本可供研读。

文化传承工作需贴近生活、贴近市场,持续推进

社科普及读物的开发与推广。例如,将《左传》《国语》《周礼》《史记》等涉及虢文化的古典文献翻译成白话文;对“三省四地”地方志、档案中记载虢文化的相关内容加以整理出版,让群众充分了解虢国与虢文化的内涵,并主动参与传承工作。

还可策划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如开展以虢文化宣传为主题的广告语、图案、短视频、文案、文创徽章等作品的有奖征集活动;结合虢国考古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车马坑遗存,对照《周礼·考工记》的相关记载,拍摄彰显“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与“大国工匠”精神的视频短片,开展“最美虢国工匠”寻访活动。同时,借助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邀请传播正能量、弘扬国家主旋律的网络红人走进虢国遗址开展文旅宣传,进一步引起大众关注。

(三)持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实现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树立大遗址保护的整体观念。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重文物、轻遗址遗存的倾向,需从国家层面组织协调,统筹规划,将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策略同步推进,破除以往大遗址分散管理的格局,使大遗址得到更为完善的保护,并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化的开发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14]

三门峡虢国墓地是虢文化遗存的核心,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崤函故道的重要遗迹,加大对其保护力度,与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高度契合。具体而言,考古工作者需切实做好虢文化遗址的日常管护工作,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积极策划组织博物馆专题展览活动;同时,要在基层做好虢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引导群众树立大遗址保护观念,增强其文物保护意识,自觉参与虢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其次,加强虢都的保护与研究。

只有加强对虢都的保护与研究,才能充分挖掘并彰显虢都的文化内涵。虢都是虢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正是三门峡西虢遗址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推动虢国史与虢文化研究迈上了新的高度。2018至2020年,陕、晋、豫三地社科联分别牵头,相继在三

门峡、宝鸡、郑州举办了三届虢文化论坛,这一举动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后续可定期召开学术年会与专题研讨会,组织专家学者围绕虢文化的传承创新展开深度研讨,以促进虢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近几年来,荥阳官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收获颇丰,出土大量精美器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学术界对于东虢都城是否位于今官庄遗址,尚存争议有待考证。但官庄在两周之际地处东虢境内则确凿无疑。今后,需进一步推进虢都地望考古实证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探索性研究,为虢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动力。

再次,大力弘扬姓氏文化、根亲文化。

提升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树立自觉的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华夏民族同根同源。要将姓氏文化、根亲文化发扬光大,并借此加强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沟通交流。近年来,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地都曾举办黄帝、炎帝祭祖大典。继组织专家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央又牵头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我国文明史向上追溯至传说时代。

虢文化实则是黄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虢国更是虢、郭、姬、姜等姓氏的重要发祥地。要大力弘扬姓氏文化,紧密联结海内外同胞,充分发挥虢国故地的文化优势与凝聚作用,打造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郭氏出自姬姓。……于是平王求虢仲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15]虢国国君本姓姬,为周王室支系,其后裔多改姓虢或郭,今天的郭姓族群中最主要的一支便源自虢国后裔。三门峡虢国博物馆自成立之初,便对虢、郭二姓参观者免收门票,以此彰显同姓族人的亲近与文化认同。

最后,文旅融合助推产业发展。

要让虢文化真正“活”起来,需持续推动虢国故地“三省四地”的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为虢文化研究找准了落脚点与发展方向,以此为契机,还能带动第三产业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文化遗迹保护与文化品牌建设相结合,既依托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指引,也依靠当地民众的自觉参与,统筹协调传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关系。三门峡市已将虢国博物馆作为试点,探索文物遗址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融合的路径。陕西宝鸡、山西平陆、河南郑州等地也应积极跟进,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文旅融合,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虢文化根植于“三省四地”,地域辨识度极强,

诸如“虢国故都”三门峡、地方名酒“虢酒”、特色小吃“虢国羊肉汤”、经典成语“假途灭虢”等元素,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可通过加强区域间的沟通协作,构建虢文化全域旅游。此外,虢文化在文化传播层面具备天然话题性,无论是学术界的争论探究,还是民间的话题讨论,其始终是热点之一。

虢文化中的部分文化遗存,例如考古出土的虢季子白盘、师戟鼎、师丞钟、郭虚己墓志、郭家庙碑等,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这些文物在出土之初曾引发社会轰动,却因缺乏持续的后续报道,未能吸引民众的长期关注,今后亦可继续开发利用。

虢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需要结合其独特的区域特征开展深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虢文化活化传承的相关研究,将虢文化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推动文化振兴的动力,助力虢国故地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郭胜强,郭永安.试论虢国的历史地位[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10.
[2]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1-192;202-204.
[3]张雨.西虢文化精神内蕴的价值审视[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54.

[4]李久昌.关于虢国史与虢文化研究的几点见解[J].宝鸡社会科学,2019(1):51-57.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
[6]郭沫若.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J].文物,1959(1):14.
[7]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8]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6.
[9]李久昌.关于虢国史与虢文化研究的几点见解[J].宝鸡社会科学,2019(1):52.
[1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21.
[11]列宁全集(第38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59.
[12]李久昌.三门峡地区早期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影响[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489-493.
[13]李久昌.崤函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兼及崤函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66-74.
[1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EB/OL].(2020-09-30)[2025-05-15].<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80355>.
[15]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1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italization Inheritance of Guo Culture

FENG Lehui

(School of Marxism, Technical College of Zhengzhou, Zhengzhou Henan 450121, China)

Abstract: The Guo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rtile soil of the Guo State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 is a highly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e, combining the ritual core of Zhou Culture with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uo Culture are strong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advantages, and deep influence from surrounding cultures. Currently,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inheritance process of Guo Culture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Guo Cultur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innovating methods, establishing a concept of large site protection,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of Guo capital, promoting surname culture and ancestral culture, and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an be taken to safeguard cultural roots and serve the overall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Guo State; Guo Cultur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Revitalize inheritance

90后作为年代剧的“主角”

——电视剧《北上》的文学改编及文化张力

余宗霖^{1,2}

(1.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24; 2. 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电视剧《北上》作为一部以90后为主角的年代剧,通过聚焦千禧年前后的社会变迁与青年成长,开创了“重返2000年代”的怀旧叙事模式。该剧以五位90后青年的成长史为核心,构建起兼具历史纵深与时代共鸣的叙事框架,确立了年代剧中90后青年一代的主体性情感结构。剧中以小城“洪淮”与大城市北京为地缘纽带,借助运河意象,深入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地方经验与城市化浪潮的碰撞,以及集体记忆与个体命运的交织。相较于传统年代剧的类型化叙事,《北上》以现实主义手法重勘千禧年前后的社会肌理,营造“中式梦核”的怀旧氛围,精准呼应90后对市场经济初期淳朴生活的集体追忆。同时,该剧以“进行时”视角连接历史与现实,为年代剧的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北上》;年代剧;文学改编;重返2000年代;新北京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3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80-05

2025年3月3日,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北上》引发80后、90后青年观众的强烈共鸣,他们首次在年代剧中看到自己这代人成为“主角”。与以往年代剧不同,《北上》突破性地将叙事时间节点锚定近二十年。主角夏风华设定为1990年出生,其与伙伴们高考的2008年、在北京工作后返乡的2015年(恰逢大运河成功申遗不久)等关键剧情节点,均与社会历史节点紧密衔接。《北上》开创了青年群体的年代怀旧型叙事模式,推动电视剧文本进入集体性的当代怀旧语境。

电视剧《北上》改编自徐则臣的同名小说,剧集对小说的故事时间进行了延展,小说中的核心角色转化为电视剧的背景人物:马思艺、夏风华、周海阔、邵星池、谢望和五位青年角色,为小说主人公的后代。故事从五位青年的童年时代展开,大幅增加青春成长与家庭生活的叙事篇幅,仅在结尾处揭示花街宏大的家族史——即小说的故事主体。这种高度

浓缩、留白的运河叙事,勾勒出具有边城特质的乌托邦图景。与此同时,电视剧《北上》以故乡小城“洪淮”与北京为核心地标,二者均与大运河文脉深度关联;随着主人公物理空间的“北上”,剧集引入北漂生活、商业竞争等命题,与徐则臣文学创作的问题意识形成呼应。《北上》的热播,反映出大众对剧中千禧年情感表达的高度认同;剧中回望2000年初大众对未来的热切期待,为社会历史上升期作出文化注解,与当下社会形成深度对话。

一、对“重返90年代”的“接着说”

近年来,聚焦“重返90年代”的优秀影视作品数量众多,如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繁花》《漂白》《隐秘的角落》《大江大河》,电影《白日焰火》《钢的琴》等。这些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地方性与类型色彩,从不同维度建构起关于90年代的叙事图景。与这些“重返90年代”的类型化作品不同,电视剧《北上》首次将怀旧叙事焦点移至千禧

收稿日期:2025-10-09

基金项目:202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家庭伦理电影的道德叙事研究”(24YJC760050)

作者简介:余宗霖(1994—),女,江苏南通人,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年前后。《北上》以既有“重返 90 年代”叙事作品为理解当代的重要资源,接续怀旧书写脉络,既延续了温情的叙事基调,又打破了传统年代剧历史与现实相对割裂的局限,以更贴近现实的描述连接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让“过去”在当代语境中灵活显隐,实现回顾历史与重勘现实的双重功能。

电视剧《北上》绘制出一幅气质温暖、健康、明亮的时代图景,带领观众重返纯真且兼具历史变局特质的千禧年,这与部分“重返 90 年代”作品呈现的纷繁、晦暗时代气质形成鲜明反差。故事发生在具有乡土传统的小城,运河边的人们既感受到水运衰落的趋势,也感知到即将到来的生存危机,始终以积极姿态寻求改变。第一集中,花街土生土长的小主人公们的童年生活图景徐徐展开:他们冒险从高桥跳到船上抢夺行船的西瓜,船主第一时间担忧的仍是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当孩子们看到船上举办婚礼时,便开心地手舞足蹈,大喊“新娘子”为新人祝福。在电视剧最后一集,夏风华与谢望和在黄浦江的轮船上举办婚礼,二人向岸边望去时,导演穿插剪辑了他们小时候在岸上奔跑“看新娘”的片段,夏风华对童年的自己轻声说“慢点跑”——这段情节蕴含人生的复杂况味。尽管 90 年代的中国已进入现代化商品经济社会,但《北上》刻意呈现出一种未被商品经济侵蚀的生活质感,还原“花街”时空中简单、淳朴的民间生活方式。电视剧《北上》的出现,在中国当代历史书写中具有特殊意义:它试图复原一个怀旧空间,并对既有历史叙事进行修正与延展;同时,它遵循年代剧的叙事传统,成为“重返 90 年代”叙事脉络的重要延续。

在人物设计上,电视剧《北上》一脉相承地塑造了两代人的精神品格:剧中赋予 90 后青年一代传统精神,使其与父辈(60 后)的性格形成延续性。女主角夏风华在近二十年的人生中,始终秉持在小城形成的善良本性,成为“新北京人”后,面对资本竞争仍未动摇内心的道德准则——这种源自小城的“憨劲”,是她坚守初心的人生信条。此外,剧中还保留了年代剧经典的“小文化人”形象,这一特质集中体现在文化馆职员邵秉义身上:邵秉义清高自负,日常行事看似斤斤计较,但内心存大善,不仅愿意接纳走投无路的街坊刘玉玲为妻,更数十年如一日地爱护非亲生的儿子。新一代 90 后“小文化人”陈睿,从高中时期到从事考古工作,始终以“行不由径”的生活态度稳步成长,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知识分子。《北上》对“小文化人”当代人文精神的细腻书写,使观众能够体谅他们的性格弱点,将其置于一个略低于“圣人”却高于普通大众的道德位置^[1]。

“小文化人”形象的塑造,延续了 1992 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所传递的价值取向,体现出大众对知识及知识权力的信任。从这一角度而言,《北上》的文化品位具有鲜明的传统复归特质。

“重返 90 年代”的各类叙事作品,通常以改革开放后的商业社会进程为背景,聚焦人性角逐,类型化特质清晰——多以悬疑剧、商战剧、创业剧、家庭剧等形式呈现,这种类型化创作使其易成长为具有可复制性的“爆款剧”。相比之下,以《北上》为代表的“重返 2000 年代”叙事,却极力凸显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市场经济初期未被商业逻辑渗透的生活的怀旧思绪。这种创作思路既接续了“重返 90 年代”的叙事传统,又实现了内核的倒置,其背后的文艺创作思想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探讨。

《北上》的影像风格与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中式梦核”高度呼应。区别于感伤主义的怀旧叙事传统,剧中对千禧年的怀旧书写始终贯穿乐观、宽容的情感基调。主创团队通过暖黄色调、柔光滤镜、孩童视角的低机位长镜头、复杂的场面调度等影像手法,实现对 2000 年代情感的重新诠释。剧中的运河大院、河边等场景,被赋予完美无瑕的乌托邦特质;孩子们在运河畔逐渐长大,长辈始终以慈爱安详的形象出现,故去的长辈则通过影像技法被永久定格在社会快速转型的特定时期。此外,《北上》还多次运用“花絮”穿插剪辑——这些“花絮”源自剧中主角自行拍摄的低分辨率 DV 手持录像,形成独特的“媒介怀旧”,与以“中式梦核”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形成呼应。这类亚文化产品“典型地表现为经由技术模拟手段做旧的低保真图像。这种梦核实践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鲜明的反思意识:创作者通过对过时媒介技术的‘再中介化’,试图复原出一个有关往昔生活的‘阈限空间’,但又往往刻意破坏此空间的真实性”^[2]。

《北上》的温暖底色,精准契合大众对千禧年的时代想象:1997 年香港回归、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等重大事件,让新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整体呈现出崭新、昂扬的精神气质。这一时期,经济进一步开放,大众普遍怀有“乘风破浪”的进取心态。对于这种独属于千禧年的情感结构,《北上》的表达极为到位。剧中多处呈现角色为谋生计历经坎坷的剧情:夏风华急于赚钱,险些被模特公司老板欺负;被邻居解救后,又险些卷入更多麻烦。这段情节真实还原了当时年轻人渴望成长、急于踏入成人社会的心态。剧作在书写这类具有年代特征的段落时,特意增加辩证色彩,充分考量千禧年人物行为动机的合理性。电视剧《北上》通过对千禧年情感结构的呈现所激发的怀旧情绪,承载了大

众对社会上升期的深切眷恋。

二、运河与小城：空间地缘的记忆共识与协商

电视剧《北上》作为首部以 90 后一代生活史为核心的影视作品，其文本内部存在与大众文化的缝隙。网络上对该剧的持续讨论，既体现出观众对“重返千禧年”的高度关注，也反映出真实的观剧诉求。

《北上》通过对小城风物与地域特色的运河书写，构建起“人与城同构”的边城式乌托邦。从剧情层面看，《北上》较为完整地还原了 2000 年前后社会生活的面貌，呈现出真实的时代气质；同时，剧作并未局限于“温暖现实主义”的单一叙事，而是力图对 2000 年初的社会进行客观、具有反思性的书写。运河的衰落直接指向人们的经济困境与生计危机，家庭矛盾的逐步展开，隐约揭示出当代社会在经济发展与传统精神之间的张力。

《北上》对运河的刻画具有具体的地理空间指向，并非单纯“消费”集体怀旧情感。水的意象蕴含多重寓意：流动象征变迁，生生不息代表传承，时间暗示历史纵深，变通与共融则体现文化特质——河流的这些特质，为花街人家赋予了天然的在地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理念在《北上》的在地性表达中得到充分体现。在电视剧中，运河既是重要的空间场景，也是诗意化的叙事修辞：花街青年在运河畔长大，运河承载着他们的童年记忆；抵达北京后，他们在通州运河边聚会时，会觉得这条河与家乡的运河有着相似的气质。此外，马思艺多年出走留下的“踪迹”、周爷爷因病症导致的记忆“错乱”，被赋予重新诠释时间的功能——剧情试图通过这些情节，让主人公在特定维度上回到过去，与童年的自我“对话”。这种感伤主义的书写，清晰地凸显出今日社会的“变”。但略显遗憾的是，青年主人公北漂时期的集合地——北京通州运河，尚未与家乡运河形成深度的精神命脉勾连。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书写，剧中试图通过沉船打捞、器物考古等情节进行“以小见大”的历史钩沉，剧集的历史厚重感仍显不足。

导演姚晓峰对小城空间具有独特的创作偏好，在其近期影视作品中，2024 年播出的《微暗之火》同样以千禧年小城为背景，对小城空间进行了影像化探索：剧中呈现了各式店铺林立的老街、石板路、旧时居民楼等典型场景。在姚晓峰的影像叙事中，小城的地名通常被抽象为化名，影视美术对在地性进行“无限度虚焦”处理，以此为观众营造怀旧的质感与氛围。在“县城文学”于社交媒体走红的当下，姚晓峰等导演敏锐捕捉到 80 后、90 后热议的怀旧文化现象，其创作的虚构小城在影视领域广受观众喜爱，借助这些场景唤起观众真实的怀旧情感并非难

事。“大同小异的县城意象和县城故事，千差万别的情感内涵和需求，造成了聚焦和失焦同时发生的状况——在巨大的舆论热度中，县城被看见了，也被架空了”^[3]。电视剧《北上》已最大程度地将小城进行具象化呈现：剧中虚构的“洪淮市”，经追剧爱好者社群的“考古”研究，被认为与徐则臣的家乡淮安市较为接近，运河场景的主要取景地则为苏州昆山市。《北上》通过鲜明的地域表达，直指中国当代的地方性与地方经验，力图抹去 90 年代叙事电视剧为时代画上的句号，代之以开放式结局，将年代感与现实感并置，实现对历史叙事的“接着说”。

《北上》将“县城文学”引入大众媒体，围绕小城环境、器物等元素，结合千禧年文化符号与中式梦核图像，呈现出世纪之交蓬勃生长、价值多元的生活实践。剧中多次出现具有标志性的社会大事件，这些事件构成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主创团队精准捕捉历史节点与社会气象，以 90 后一代人的生活史为载体，致力于实现对千禧年中式梦核的“怀旧”表达，通过媒介拼合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目前，“中式梦核”在部分亚文化领域已形成一定影响力，但在大众文本中，它是否仍能有效激发狂欢式的怀旧热潮？独属于 90 后的“怀旧”是否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是否属于带有意识形态话语指向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结构又如何从“县城文学”中更好地展开褶皱？学者刘大先指出，乡土人物与现代城市经验共同塑造了文学化的县城，“‘文学县城’可能需要摆脱与特定年代感之间的密切关联，摆脱怀旧、惆怅、失落这些主导性情绪，而指向于一种对县城的考古学和未来学”^[4]。

电视剧《北上》的复杂特质，难以仅通过影视技法的内部研究进行充分辨析，还需结合大众文化现象，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张力。“中式梦核”亚文化常以社交媒体平台的图片、视频、语言对话等形式呈现，构建一场返回 2000 年代的“梦境”，其中还夹杂部分戏仿元素。在这场“梦境”中，创作者常以特定空间场景（如滑梯、空楼道、空文具店）为背景，搭配文字，并辅以电子音乐——尽管“中式梦核”在“Z 世代”中引发较大反响，但品读这些数字作品时，仍会感受到一种诡异的氛围。《北上》开篇被众多影迷称赞的九分钟长镜头，便蕴含类似的“梦境感”：年幼的夏凤华带着马思艺挨家挨户“认门儿”，演员调度极为复杂，但摄影机调度相对简洁，始终如幽灵般跟随孩子们的背影——这种对背影的长时间“凝视”，试图带领观众进入千禧年的“梦境”：摄影机反复向观众强调自身的“在场”，暗示观众“你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时代的灵晕”。

《北上》不仅通过“重返 2000 年代”的叙事连接过去与现在,还隐含对未来“速朽”文化的担忧。当下,正值青年时期的人们不自觉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开始感叹自己“变老”,与之相对应,他们对十多年前的生活产生“集体怀旧”情绪。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个趋势:人们回溯过去的时间间隔逐渐缩短,文化的“速朽”特质越发凸显。这一趋势与 21 世纪前 20 年中国社会经历的剧烈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集中体现了社会现实影响下“怀旧”与“展望”两种心态的激烈对抗。

小说原著《北上》构成了电视剧的核心“背景”。剧中的谢、周、邵等几个家庭,分别是小说人物谢平遥、周义彦、邵常来、小波罗的后代——历经百年历史沉浮,他们的后代再次在花街运河大院相聚。通过这种历史的“耦合”,电视剧既表达了家乡故土人们血脉相连的亲近关系,又通过邻里互助、家族共担风险等情节,重构了“集体情感”的价值。剧中人物的生活如同运河般相互联结、难以分割,这种互助并非无条件的奉献,而是有分寸的、互惠式的支持——他们在风雨中携手同舟共济,在荣誉与挫折面前荣辱与共。这种对集体主义的回归,延续了《人世间》中“光字片温情”的叙事传统,呼应了当代社会对“小共同体”缺失的迷惘。同时,电视剧将原著中运河承载百年变迁的宏大命题,转化为小人物与时代共振的命运史诗。

三、重勘千禧年:对类型化叙事的反拨与回望

电视剧《北上》细致呈现了 20 世纪末至 2015 年近 20 年间花街社会的肌理。剧集以 90 后群体特有的少年气象回望历史,通过塑造家族中父辈与子辈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代际精神图谱。电视剧对原著的续写与再造,呈现出徐则臣文学风格的笔法。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新北京人”叙事具有回望 2000 年代的功能;《北上》虽脱离原著小说的核心情节,但在细节上与徐则臣的其他小说高度贴合——从内容与叙事格调来看,该剧可视为对徐则臣“新北京人”叙事的仿写与续写,是一种对“新北京人”叙事的创造性再造。

学者贺桂梅指出,以《山海情》《人世间》《风吹半夏》为代表的电视剧,“将 90 年代叙述作为观照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起点或源头”。这类作品的大量情节以历史时间为标识,清晰展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时序,“立足当下而给出一种关于过去历史的总结性叙事”^[5]。贺桂梅认为,这类叙事作品采用不同形式的回望视角,“从一种‘完成时’的视角来重新讲述 90 年代”^[5],较好地实现了回溯、追忆过去的功能。与这类“90 年代叙事”文艺作品不同,电视剧《北上》对 2000 年的重勘,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它

将“完成时”的历史叙事重新转化为“进行时”的创作视角,融入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意识。

电视剧通过 90 后主人公的成长史,展现了徐则臣小说序列中常见的互助伦理、家庭伦理与乡土情怀,凸显出 90 后的主体人格特质。谢望和从孩童时代到青春期,始终是花街上善于出谋划策的人:他乐观善良,充满勇气与智慧,每当街坊邻里、同学朋友遇到困难,总能第一时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中也带有顽劣的一面,一旦将聪明用错地方,就可能走上歪路。幸运的是,谢望和在发小夏风华、邵星池等人的相互关照下,逐渐成长为健康、成熟的青年。这种典型形象的塑造,使谢望和成为“箭垛式”人物——他集聪明才智于一身,其形象与江南地区民间传说人物“徐文长”相似:二者均具有聪敏活泼的特质,且时常做出恶作剧式的行为,属于民间故事中典型的“机智人物”^[6],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夏风华的形象与谢望和形成鲜明对比:她表面大大咧咧,内心却十分善良,对家庭亲密关系极为敏感,既渴望尽早帮父母改善生活,也希望能为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提供帮助。夏风华的形象与以往年代剧中“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她既乐于奉献,又追求个人价值,性格中兼具敢爱敢恨的特质。尽管电视剧中的主要角色存在一些性格弱点,但总体而言,这些 90 后角色均具有“君子式”的平民人格。剧中多处悲喜交融的段落,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基于“心学”传统的深厚“中国精神”品格^[7]。

对于 90 年代以后时代的描摹,电视剧并未将类型化叙事置于历史真实之上,而是对 2000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作出客观、具有历史深度的判断,体现出对历史真诚回望的态度。这种“重返 90 年代”的叙事方式,既是对历史的重新讲述与历史现场的找寻,也是对既有 90 年代叙事的反拨——它摒弃了戏剧性、脸谱化的叙事特征,以贴近真实的方式回归历史本质。

大量“重返 90 年代”的叙事作品,常以改革开放时期快速转型的中国当代社会为背景,将悬疑、黑帮等类型化故事嵌入其中,以实现社会批判的目的——但这些作品对 90 年代历史的追溯或反思,往往存在片面性,甚至以艺术之名裹挟、误读历史。与之不同,《北上》构建了一种真挚的千禧年叙事:剧集详尽呈现 2000 年初的社会大事件,并以这些大事件为叙事推动力,使其与主人公的命运紧密交织。可以说,《北上》更贴近当代中国现实主义叙事的本质。

开篇处,2000 年初运河人家的相对落后状态,使花街人家的生活水平整体低于同期城市普通百姓。但故事从运河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切入,反而

为花街人家提供了想象未来的更多可能性。第二集中,“集体买船”引发各家争议,但争执很快平息,每个家庭都选择服从“船老大”谢天成的决定——他们既带着对当下物资匮乏的不满,也怀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景。《北上》对花街几个家庭的书写,延续了90年代叙事中对“新与旧”的强烈辩证态度,与90年代叙事中常见的工厂改制、下岗潮等议题形成呼应“船老大”谢天成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在航运衰退后转型物流业,这一情节暗含时代变革下传统生计消亡的阵痛。正如第十六集儿子谢望和对他的描述:“曾经人人敬畏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船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漂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谢天成的沉沦与重新振作,并非完全由个人特质决定,而是与时代变革紧密相关。《北上》精准捕捉到人与时代的关系:它不预设主人公的行为动机,也不对历史进行后设性评判,而是力图在历史的缝隙中探寻理想的人与社会共轨模式。相较于许多影视剧片面强调时代对人的“塑造”或“摧毁”,《北上》将这种关系柔化为时代对人的“推动”与“兜底”,体现出对历史与个体的双重尊重。

《北上》对千禧年重勘的独特性,在于其实现了多重叙事维度的融合:它将“未完成的历史化”与现实主义书写深度衔接。体现了原著对民族精神的深刻思考。

四、结语
作为首部以90后为主角、聚焦千禧年前后社会

图景的影视作品,《北上》在年代剧叙事范式上的突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寻根诉求。剧中呈现的“中式梦核”美学,不仅重构了千禧年记忆,其对小城生活质感的诗化书写,也并非对过去的单纯美化,而是对现代性“速朽”困境的主动回应。《北上》跳出“重返90年代”的类型化叙事框架,以“进行时”视角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并置;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与运河的兴衰同构,共同绘制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地图。

参考文献:
[1] 罗雅琳. 能否在“文化公司”中建设“另一种人文精神”? :《编辑部的故事》再解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5(2).
[2] 黄顺铭,刘欣庭. 制造“梦境”:技术怀旧视角下的中式梦核实践[J]. 新闻记者. 2024(9).
[3] 肖楚舟. 从“县城文学”到赛博故乡:社交媒体的“县城”想象[J]. 三联生活周刊. 2024(28).
[4] 张楚,刘大先. “县城文学”与“文学县城”[N]. 文艺报. 2025-01-06(2).
[5] 贺桂梅.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近年现实题材剧90年代叙事解析[J]. 北京文艺评论. 2025(1).
[6] 梁珊珊. 多主体共议和民间故事的市场化转型:以徐文长《都来看》故事为例[J]. 民族文学研究. 2025(1).
[7] 王一川. 通向中国当代文学新形态:以“中国精神”为视角[J]. 中国文学批评. 2025(1).

(责任编辑 林川)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s the "Protagonist" of Era Drama: Literary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TV Drama *Northward*

YU Zonglin^{1,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Ethnic Culture and Arts,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0, China)

Abstract: As an era drama featuring the post-90s generation as its protagonists, the TV series *Northward* constructs a "return to the 2000s" nostalgic narrative by focusing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growth of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rough portraying the coming-of-age stories of five post-90s individuals, the series establishes a narrative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historical depth with contemporary relevance, shaping the subjectiv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ost-90s generation in era dramas. Using the small city of "Honghuai" and Beijing as geographical anchors, along with the imagery of the canal, the drama explores the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dur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clash between local experiences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dividual destiny. Unlike conventional era dramas that often rely on stereotypical narratives, *Northward* reappraises the social fabric of the millennial era through realistic techniques, creating a nuanced nostalgia for the simple lif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at resonates with the post-90s generation's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a dynamic, present-progressive perspective that connects history with the present, *Northward* offers new possibilities for innovation in era dramas.

Keywords: *Northward*; Era drama; Literary adaptation; Return to the 2000s; New Beijingers

失衡 or 共振？自媒体述评中官方与个人话语权的变革

刘英翠,孙畅泽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以自媒体时代舆论场内容述评化为背景,以案例分析与文本比较为方法,文章对自媒体述评中官方与个人的话语权博弈关系展开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受制度性资源优势与流量倾斜机制影响,双方在重大公共议题的话语建构上呈现出一定程度失衡;第二,通过叙事风格创新与社群深度互动,自媒体代表的个人话语权能够在特定议题领域与官方话语形成共振,为公众提供多元的解读框架;第三,二者关系既非替代亦非对立,而是在持续博弈中趋向一种动态的“失衡性共振”,共同推动述评话语生态重构。研究表明,自媒体述评领域的话语权格局已从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互补,这不仅为当下的话语权变迁提供了分析框架,也对丰富述评文体演变、构建多元话语生态、促进公域理性讨论等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自媒体述评;官方话语;个人话语;舆论场;话语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85-06

在深度融合的时代,自媒体话语不仅全面参与舆论建构,更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舆论场域,呈现出“双刃剑”式的复杂性。一方面,自媒体技术极大“激活个体话语能量”^[1],拓展了表达空间,推动多元声音充分呈现;另一方面,话语的活跃态势也伴随着结构性挑战——信息生产的零散与无序会加剧公众认知碎片化,而“自媒体话语意义重构”^[2](如隐喻表达等),则对主流叙事框架与情感认同构成直接挑战。与此同时,自媒体平台引发的“话语权集中现象”及其导致的“群体极化”^[3],还会进一步挤压理性对话空间。这种复杂性不仅冲击了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事务的管辖权”^[4],也使得如何在动态博弈中实现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与再中心化,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目前,既有研究已从宏观结构与微观策略两个层面揭示了上述变化,但对于自媒体话语的核心代表——自媒体述评,学界缺乏足够聚焦与关注。尤其在舆论场话语普遍呈现述评化特征的当下,这种融合事实与观点的具体文体实践,本身

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而其中“官方”与“个人”两类话语主体在实践中的互动与博弈,更凸显出深入探究的迫切性。因此,本文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研究,探讨二者在述评场域中失衡与共振的复杂关系及其内在形成机制。

一、核心的命题:话语权重构下的失衡与共振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公众话语权的回归提供了渠道支持”^[5],话语权失衡与共振作为观察话语权重构进程的一对核心矛盾,指向不同命题取向:前者揭示在资源、制度与历史惯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相对稳固的结构性权力差异;后者则指向特定情境中,借由内容、形式与关系创新实现影响力突破的实践可能。二者之间的持续张力与动态交织,构成了自媒体述评场域中话语权流动、博弈与再分配的根本动力,也是理解官方与个人主体复杂互动的逻辑起点。

(一)失衡与共振的内涵

所谓失衡,指不同话语主体在获取注意力、设置

收稿日期:2025-10-20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百年新闻述评的文体流变研究”(20CXW008)

作者简介:刘英翠(1986—),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文体史、出版与传播;孙畅泽(2005—),女,河南信阳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学生。

公共议程、塑造叙事框架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失衡不仅体现为数量差异,还包括两个核心维度:一是流量差异。官方媒体在重大政治、科技等硬新闻议题上,其述评内容通常能获得远超个人账户的点赞、评论、转发等数据,而自媒体往往只能“通过公开创作后台、分享创作过程等方式吸引流量”^[6]。二是议题覆盖差异。官方媒体凭借资源网络,能对全国两会等重大议题进行全方位、矩阵式传播,个人账户则多聚焦特定领域或单一视角。此外,平台规则的倾斜性和叙事框架的稳固性,进一步强化了官方媒体在流量获取与曝光度上的初始优势,形成马太效应,使其在诸多关键议题上建立起难以撼动的话语主导地位。

与之相对,共振指尽管存在结构性失衡,但部分个人或特定类型的自媒体述评,能通过内容创新、视角独特、情感共鸣或对特定社群的有效触达,在特定议题、特定圈层或特定传播情境下,产生超出常规影响力范围的、深度且积极的社会反响与认同效应。这一概念既呼应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理性沟通”的要义,体现为多元主体围绕公共议题的有效意见互动;也契合协商民主理论对“共识形成”的追求,即在差异化表达的碰撞中逐步凝聚共识;同时离不开情感传播理论强调的“情感联结”,这为共振发生提供了关键心理基础。共振的测量可依据以下指标展开:一是互动质量,指相关述评引发的用户评论长度、独特性观点数量与讨论深度;二是圈层穿透力,指在特定专业或兴趣社群内被高度认可、引用和二次传播的范围与深度;三是框架创新性,指能否提供区别于惯常叙事的新颖解释框架并被受众接受;四是情感连接强度,指基于平等互动与个性化表达建立的信任关系及其引发的情感共鸣水平。

(二)失衡与共振的关系

失衡与共振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共生于自媒体述评场域的两种动态力量。要深入分析自媒体述评中的话语权变迁,首先需厘清话语权的内涵及其核心矛盾。在公共话语空间中,话语权通常指不同主体在“谁能够发声”“说什么内容”以及“其言说能否被听见”等方面具备的能力;从传播视角看,话语权可分解为意义框架构建、舆论导向影响、公共传播渠道访问等核心能力。

自媒体述评场域的话语权变迁,始终围绕失衡与共振两大核心状态展开。传统话语格局中,官方主体凭借结构性优势形成的单向主导,构成了失衡的历史基础;而互联网带来的传播平权化与“采编人员自媒体化现象”^[7],促使个人账户崛起,推动多

元互动,催生了共振的现实可能。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话语博弈中动态交织。例如,抖音平台上,官方账号“新华视评”在政治、科技等核心议题上占据显著声量,一条关于“航天重大成就”的短视频往往能迅速获得超 50 万点赞和近万条评论;相比之下,个人账户“李记者的日常”聚焦民生领域,其报道“老旧小区改造”的视频播放量可能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但评论区针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异常激烈。这种对比直观体现了传统优势的延续与新互动模式的出现。

自媒体述评不同于传统新闻评论,其文体边界更为模糊,风格更具主体特色。例如,微信公众号“胡锡进观察”以鲜明个人视角,在国际政治议题上构建了独特叙事框架;知乎平台的“西街以西”则典型体现平台特性,直接进行观点剖析,形成去叙事化的研判式述评。文体的适应性变化,本身就是话语权争夺的产物——不同主体通过文体创新,争夺定义议题和解释世界的权力。因此,分析话语权必须结合述评文体的这些新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失衡与共振发生的具体场域。

二、失衡的争议:传统格局的延续与新表现

作为“一种能够以更为宽广、全面的途径传递信息的方式”^[8],融媒体环境看似为消解话语失衡提供了可能,但基于二元博弈逻辑,传统话语格局中的失衡状态并未消失,而是在自媒体时代呈现出延续性与新表现形态。尽管 Web3.0 技术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传播可能性,但结构性权力失衡依然是自媒体述评场域的底色。因此,研究失衡现象不仅要关注显性数据差距,更要揭示隐性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机制。

(一)根源:官方话语主体的结构性优势

在自媒体述评格局里,官方话语主体占据结构性优势。例如,微信视频号的“央广网”,依托制度资源、品牌背书与平台推荐权限,形成了稳重理性、视野宏阔的传播风格,制度性优势直接转化为传播数据上的领先。再以“RUC 新闻坊”为例,虽然其运营主体是高校团队,但其事业单位属性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品牌背书,使其在探讨社会民生议题时天然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和曝光度。其作品《自动续费,你欠我的拿什么还》通过专业的数据可视化和社会调查,将复杂的消费陷阱议题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公共讨论,篇均阅读量可达 10 万以上,这种将学术资源转化为公共话语的能力是多数个人账户难以比拟的。至于纯粹的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其影响力更是呈现出黑洞效应,几乎对所有热点

议题都能形成覆盖性传播,篇均阅读量长期维持在10万+,使得个人账号在同一议题下的声音极易被淹没。

(二) 新变:流量分配与议题覆盖的失衡

在自媒体时代,失衡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核心在于流量分配与议题覆盖的不对等。一方面,官方账号如“新华视评”发布的短视频可“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一套提升话语质效的方法论”^[9],而个人账号如“李记者的日常”,尽管内容贴近民生,但流量上限相对有限,且往往难以超越个案进行宏观引领与普遍性提炼。另一方面,议题覆盖的失衡尤为明显:官方主体凭借遍布全国的采编网络和强大资源协调能力,能对全国两会等重大政治议题进行矩阵式、全景式报道。牢牢掌控议程设置权。

相比之下,即便是颇具影响力的个人账号,其覆盖能力和视角也相对有限。例如,“胡锡进观察”作为前总编辑运营的账号,虽能在个别外交、军事热点上形成刷屏效应,但内容更依赖主理人的个人洞察和判断,无法像官方媒体那样进行系统性议题策划和全方位资源投入。这便形成了“主流议题由官方主导、热点议题靠个人突围”的不对等格局。个人账号如微信公众号“扯氮集”,虽以语言犀利、风格多样见长,能灵活点评科技、文娱等热点,但其影响力更多局限于特定圈层,难以在宏观政策解读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官方媒体抗衡。

此外,平台自身的算法推荐机制和资源倾斜政策,客观上固化了这种失衡格局。算法通常倾向于推荐内容稳定、来源权威、互动数据高的账号,使官方媒体账号更容易进入推荐池,获得初始流量,形成“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例如,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平台上,带有官方认证标识的账号在相同内容质量下,通常能获得更高基础推荐权重;在付费平台如喜马拉雅上,官方背景的媒体节目(如“半月谈快报”“界面新闻”等),也更容易获得首页推荐或专题合作机会,接触更广泛付费用户群体。反观个人或小组团队运营的账号(如喜马拉雅的“声动早咖啡”“东亚观察局”),尽管内容质量精湛,但要突破圈层、触达大众,需要付出数倍于官方账号的运营努力,且成功率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平台规则因此成为话语权分配中“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仲裁者”,使失衡状态在技术层面不断被再生产。

三、共振的生成:个人崛起与互动机制的催化

在既有失衡格局之外,个人主体的话语突破与互动机制的完善,为话语权共振提供了现实路径,同时缓解了“官方话语更容易淹没在网络空间意识形

态斗争的喧哗之中”带来的传播阻力^[10]。尽管传播格局表面固化,但个人创作者仍能在细分领域产生显著影响——那些擅长制造认知突围的个人创作者,往往通过建构独特解释框架,与公众认知形成共振。由此可见,共振效应的产生依赖三大条件:一是内容产品具备跨圈层解读潜力;二是传播策略能精准匹配目标群体认知图式;三是互动机制可有效降低参与门槛。

(一) 基础:个人述评主体的话语突破

个人主体的共振能力,首先源于话语策略的创造性突破。与官方账号稳重理性的风格相比,“扯氮集”以语言犀利、风格多样见长,“小强传播”则将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这类风格往往更具亲和力与传播穿透力,其优势常体现在用户互动质量上。例如,分析“开放 AI 新模型”这一科技热点时,“扯氮集”文章的用户评论长度、独特性观点数量,明显多于转发官方通稿的微博评论,表明其内容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与交流。

具体而言,个人述评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视角个人化。如“晏秋秋”在微信视频号上对文娱事件的点评,常从个人生活经验切入,逻辑清晰、言辞稳重,打破了官方媒体四平八稳的叙事腔调,更易引发普通观众情感共鸣;二是知识跨界整合。如“小强传播”账号分析热点事件时,善于将传播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作品《喝点丝瓜汤降降火气吧!新媒介事件视域下代际矛盾与认知偏差的符号化爆发》的标题,便体现了学术表达与网络语感的碰撞,为理解社会事件提供了新颖框架,吸引了大量对深度内容有需求的读者;三是互动姿态平等化。抖音账号“李记者的日常”由一线记者运营,内容直接来自新闻现场,语言通俗易懂,且在评论区与网友频繁互动,这种“朋友圈式”传播模式,极大消解了传统媒体的距离感,逐步建立起信任基础。

(二) 路径:表达的协同与传播的互动

共振的实现依赖表达上的协同与传播上的互动。以“弱传播邹振东”对“武大图书馆事件”的评论《“不人不”与“不不主义”》为例,该文绝对阅读量可能不及当地官方的情况通报,但在学术圈和深度媒体读者中被广泛引用和讨论,其“在看”数和收藏率(收藏数/阅读数)可能远高于平均水平,体现了在特定圈层内强大的理念渗透力和框架塑造力,可视为一种深度共振。同样,“RUC 新闻坊”在作品《自动续费,你欠我的拿什么还》中,通过数据可视化将复杂政策议题通俗化,收获大量“点赞”和“收藏”,成功将官方议题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讨

论的内容,实现了传播效能的共振。

上述分析表明,共振并非要取代官方话语,而是以独特数据表现在舆论场中开辟新空间。共振的有效性,往往不体现在全网性流量爆炸上,而在于对特定圈层的深度渗透——这正是个人或垂直类账号的优势所在。在高影响力圈层内形成的思想共振,其长远话语塑造能力可能远超一次性高流量曝光。

同样,付费平台如知乎上的“西街以西”,回答以直接、深刻的观点剖析见长,不追求叙事详尽,但在政治、教育等特定议题下,答案总能获得高专业度用户的认可和“专业徽章”。这种基于平台社区共识的认可,是实现深度共振的又一典型路径。

四、生态的重构:在动态博弈中走向“失衡性共振”

失衡与共振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促成了自媒体述评话语结构的深层重构。要理解这一重构过程,需将其置于“话语主体关系—述评文体—平台生态”三者互动构成的分析框架中。当前自媒体场域的话语权竞争,本质上是不同权力逻辑的博弈——官方媒体的制度性权威与个人创作者的场景化适配,在算法推荐构筑的信息茧房中形成动态平衡。

(一)主体关系的变化

在传统传播模式中,个人表达常处于边缘地位;而在自媒体语境下,话语主体关系正展现出复杂的多元化趋向。这种多元化不仅体现在个人与官方的二元区分上,更表现为大量混合型主体的出现。

1. 官方媒体的角色调适与话语策略转变

面对自媒体冲击,官方媒体已不能安于传统“传声筒”角色,开始调适话语策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姿态放低。如《人民日报》开设官方微博、微信,初期容忍评论区的激烈言论,通过保持开放对话姿态,尝试建立与受众的双向沟通机制;二是文风改进。反对“党八股”,避免套话、空话,例如使用“给力”等网络词汇,采用更贴近网民阅读习惯的“微博体”进行报道,提升内容可接受度;三是功能重塑。官方媒体正从单纯的信息发布者和政策宣传者,转向信息筛选者、情绪疏导者和社会稳定剂,更强化解释、沟通与共识整合功能。

2. 个人主体的专业崛起与边界探索

个人主体在话语权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并非仅靠数量优势,更依赖专业性和独特价值的彰显。一批具备专业知识背景(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丰富从业经验的创作者,其述评因深度、锐度或独特视角获得认可,形成“知识赋能话语权”的现象。例如,公共政策讨论中,具有相关学术背景的博主提供的分析,往往比情绪化宣泄更具说服力。

与此同时,个人主体也在探索表达边界。话语权的实现需建立在自律与责任基础上——非理性、情绪化甚至散布谣言的“围观”,虽可能短时间聚集大量关注,但难以持续,甚至可能引发治理层面收紧,反噬其表达空间。因此,只有理性、建设性的个人述评,才能真正与官方话语形成有效互补,而非简单对抗。

3. 知识精英与平台方的调和作用

在官方与个人之间,还存在一股重要的调和力量——知识精英与平台方。高校研究机构运营的账号(如“RUC 新闻坊”)、知名学者开设的专栏等,凭借相对中立的位置和深厚学养,往往能提供更具公信力的分析,成为连接官方与民间话语的桥梁。平台方则通过算法设计、社区规则、流量分配等“看不见的手”,深刻影响何种声音能被放大、何种议题能成为焦点。平台方在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内容审核、生态治理的社会责任,其规则调整往往直接引发话语权格局的再调整。

(二)述评文体的演变

随着传播环境从传统媒体主导走向数字媒介融合,述评文体经历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文本形式上,还涉及话语表达、传播逻辑与互动机制等多个层面——尤其在自媒体时代,述评已逐渐突破单一文字表达局限,走向载体形式、话语风格与互动方式的系统性创新。

1. 从“文体”到“体例”:形式的极度融合与创新

自媒体述评的文体边界日益模糊,呈现高度融合性。一则爆款述评可能融合数据可视化(图文)、现场短视频(影像)、主播口语解说(声音)等多种形式,形成“全媒体”述评。这种多形态融合并非简单拼接,而是根据内容需要和平台特性进行的有机融合。例如,“RUC 新闻坊”的数据新闻述评,将严谨的社会调查转化为直观图表和通俗解读,实现了学术资源与公共议题的有效对接。形式创新本身,就是争夺话语注意力和解释权的有效策略。

2. 话语风格的频谱化与场景适配

自媒体述评的话语风格并非“官方”与“民间”的简单二分,而是呈现丰富光谱:一端是努力贴近网民的“官方口语体”(如部分政务新媒体的“小编”体),另一端是保持专业深度的“个人学术体”(如“弱传播邹振东”),中间充斥着各种个性化表达(如“犀利评论体”“温情故事体”“反讽幽默体”等)。不同风格适配于不同议题、平台和目标受众,成功的述评者善于根据传播场景选择最有效的话语风格,

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3. 互动性从“附加”到“核心”的转变

如今,互动性已内化为自媒体述评文体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微信公众号的“精选留言”区、知乎的“赞同/反对”机制,还是直播中的弹幕,都使述评文本从创作者的单向输出,转变为多方参与的对话场域。创作者通过精选留言引导讨论方向,甚至根据反馈调整后续内容;受众则通过互动直接参与文本建构。深度互动机制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归属感和忠诚度,也使述评本身成为动态生成、不断丰富的开放文本,话语权在互动中被共享和协商。

(三)平台与生态的重构

推动话语权重构的最深层力量,来自自媒体平台机制及其生态结构的全面重构。不同平台通过独特技术架构和社区规则,塑造了截然不同的话语权分配模式:知乎的问答机制和投票排名,激励了“西街以西”这类直接输出核心观点的“研判式”述评,话语权来自社区的理性认同;抖音的算法推荐和短平快特性,让“新华视评”的权威形象和“李记者的日常”的生活视角都能找到各自受众,话语权更依赖内容的瞬间吸引力和算法垂青;喜马拉雅作为音频平台,催生了“声动早咖啡”的资讯浓缩模式和“东亚观察局”的深度漫谈模式,话语权与主播的声音魅力、信息密度和陪伴感紧密相关。

平台的算法规则、内容审核尺度以及流量分配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政策要求、商业目标和用户体验持续调整,这直接决定了何种述评主体、何种内容风格能在特定时期获得更大声量。因此,官方与个人主体的话语博弈,实质上是在平台主导的、动态变化的技术-社会生态中进行的,任何一方的优势都可能是阶段性、情境化的,而生态的复杂性,正是“失衡中有共振”这一动态交织特征得以形成的底层逻辑。

1. 算法逻辑下的注意力分配与信息茧房

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是塑造话语权格局的关键力量。算法基于用户偏好和互动数据进行内容分发,在高效匹配信息的同时,也可能强化信息茧房效应——立场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聚集并强化,异质性观点则难以突破圈层限制。对于述评而言,算法倾向于推荐符合大众口味或易于引发情绪共鸣的内容,可能导致理性、深度但“不好看”的述评被边缘化。如何理解并善用算法逻辑,是各类话语主体必须面对的课题。

2. 平台治理的尺度与话语空间的伸缩

平台的内容审核规则、社区公约和治理尺度,直

接划定了话语表达的合法边界。内容治理规则通常需要平衡言论自由、社区和谐、法律法规等多重目标,其松紧变化会直接导致某些议题的“热”与“冷”、某些表达方式的“存”与“亡”。例如,对极端言论、虚假信息的治理有助于净化讨论空间,但过于严格的“误伤”也可能抑制正常批评。平台治理的实践,实际上是在不断动态界定自媒体述评的言论空间范围。

3. 迈向多元共治的话语生态:提升述评质量与规范的可能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要构建更健康、富有活力的自媒体述评生态,促进共振并缓解负面失衡,需要迈向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这并非单一主体所能主导,而需多方协同努力:

(1)对于官方媒体:应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从舆论引导转向舆论对话,更主动地进入民间舆论场,以平等、开放、坦诚的姿态参与讨论。在重大公共议题上,不仅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更要善于设置议题、提供框架,并勇于在互动中修正和完善自身观点,发挥稳定舆论场的作用。

(2)对于个人创作者:应珍惜话语权利,强化媒介素养和自律意识。话语权的提升最终依赖内容质量和理性表达,因此需致力于提供独特视角、深度分析和建设性意见,避免陷入泛娱乐化、泛政治化或民粹化的表达陷阱,通过专业、负责的创作赢得可持续影响力。

(3)对于平台方:应优化算法机制,在追求用户黏性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探索为优质、深度、多元的述评内容提供更多曝光机会,打破“信息茧房”;同时提高内容审核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建立畅通的申诉渠道,为良性辩论提供空间。

(4)对于受众与社会:应积极提升媒介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不盲从、不轻信,学会辨别信息真伪,理性看待不同观点——例如通过主动选择优质内容、进行理性反馈,用“点击”和“关注”为良性生态投票。

(5)对于监管层面:应完善法律法规,既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表达自由和监督权,又依法打击网络谣言和诽谤等违法行为;同时,监管重心应在于制定公平规则和维护良好秩序,而非直接干预具体内容,为自媒体述评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综上所述,借助“失衡 or 共振”的二元框架,本文考察了自媒体述评中官方与个人主体的话语权关系。案例剖析显示,官方主体(如“新华视评”)在流量和议题覆盖上优势依旧,而个人主体(如“弱传播

邹振东”)则通过框架创新实现了意义层面的共振。述评文体的嬗变受表达方式变化的推动,而话语权结构的整体转型则由平台生态与传播机制的重构所驱动。因此,实现官方与个人主体的有机互动,构建多元共治的话语生态,对促进公共议题理性讨论、提升自媒体述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技术,对海量自媒体述评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主题建模和网络传播路径追踪,更精确地量化不同话语主体的影响力范围、互动模式以及框架竞争的效果,为构建健康、理性、富有建设性的网络公共话语空间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学理支持。

参考文献:

[1] 张一新,郝雨. 自媒体场域下公众话语形态的演变,重构与表达[J]. 出版广角,2023(20):60-63.
[2] 白永生,赵佳怡. 自媒体话语的意义重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其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2024(10):121-126.

[3] 尹寒,杨军. 试论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群体极化及其引导机制[J]. 湖北社会科学,2023(2):163-168.
[4] 李耘耕,胡翼青. 重申管辖权:对新闻专业合法性论争的思想史再考察[J]. 社会科学辑刊,2024(5):228-236.
[5] 段海涛,张玉. 网络公众话语权存在的问题与规制[J]. 传媒论坛,2020,3(23):153-154.
[6] 王梓. 社交媒体平台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叠加产生的危机与反思[J]. 记者摇篮,2023(4):150-152.
[7] 袁理. 广电新媒体采编人员自媒体化的内容创新与受众互动研究[J]. 传媒论坛,2025(20):87-89.
[8] 陈文勇. 浅析融媒体背景下的个人话语表达与真实性建构的平衡:以纪录片《寻找小糖人》为例[J]. 文化与传播,2021,10(6):27-30.
[9] 黄瑛. 解码全媒体时代的官方话语困境与突围之道[J]. 当代广西,2025(11):62.
[10] 薛玉梅,高晓玲. 新时代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特征、问题与对策[J]. 社科纵横,2021,36(3):51-57.

(责任编辑 林川)

Imbalance or Reso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fficial and Individual Discursive Power in Self-media Commentaries

LIU Yingcui, SUN Changz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rend toward review and commentary in the public opinion sphere in the we-media er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ame relationship of discourse power between official and individual subjects in we-media review and commentary by adopting case analysis and text comparison metho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points: first,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traffic tilt mechanism, the two sides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imbalance i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major public issues; second,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narrative styles and in-depth community interaction, the individual discourse power represented by we-media can resonate with official discourse in specific issue fields,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a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neither substitution nor opposition, but tends to a dynamic "imbalanced resonance" in the continuous game, jointly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ecology of review and commentary.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discourse power pattern in the field of we-media review and commentary has shifted from a single dominance to a diversified complementarity. This not only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urrent changes in discourse power, but also exert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review and commentary genre,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discourse ecology, and promoting rational discussions in the public domain.

Keywords: We-media review and commentary; Official discourse; Individual discourse; Public opinion sphere; Discourse power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重点内容及实践路径

王自芳^{1,2}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要加快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厘清其重要意蕴,深度阐释其形成背景、核心要义、内在逻辑。围绕“讲准”“讲透”“讲活”“讲实”要求,从深化思想认识、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环境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坚定全面依法治国信仰。推动完善学科体系、重构教学模式、提高教师素质、营造法治文化氛围,助力学生树立法治理念、强化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神,自觉认同法治、信仰法治、践行法治,全面提升法治素养水平。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思政课;价值意蕴;路径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91-05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担负着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主渠道重任,必须理解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实践路径等系列问题。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教育的战略之举

科学的思想一旦被接受和掌握,就能激发行动,从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习近平法治思想

来自实践,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新的视野、新的认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接受和掌握。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旗帜引领作用,更加准确把握其科学理论体系,更加凝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高校思政课作为公共必修课,理应有作为、不缺席,理所当然地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从现实情况看,青年学生是国家未来之栋梁,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是学习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最活跃、最有生机的力量。高校大学生已经初步构建了一定的法治思维和一定的法律知识储备,并且有进一步探求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体制机制、法律内容的渴求和期望,如果通过思政课进行恰到好处的引导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此同时,针对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一些错误思潮试图歪曲我国法治建设成就、误导青年学生价值判断等问题,习近平法治思

收稿日期:2025-11-20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2ZSZ124);2023年度郑州西亚斯学院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3-XDJ-03)

作者简介:王自芳(1978—),女,河南濮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

想是批判错误法治观的有力武器,能够帮助大学生明辨是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应有之义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而法治素养是新时代人才必备的核心素质之一。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首先,以法治思想铸魂育人,强化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2]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释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明确“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一个坚持”。将这些核心内容融入思政课,能帮助学生深刻把握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把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精神内化于心,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其次,以法治精神涵养品德,塑造青年学生的道德人格。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其融入思政课,能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联,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过程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和责任担当,形成崇德向善、遵纪守法的良好品格,实现德法兼修、全面发展。再次,以法治实践锤炼能力,增强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习近平法治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将其融入思政课,可结合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社会调研等实践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参与法治实践中深化理论认知,强化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投身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法治中国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推进思政课守正创新的力量之源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融入思政课,契合当前高校思政课与党的创新理论协同共进的時代要求,能够及时有效回应高校思政课面临的时代之问和现实关切,因此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深入融入。首先,有利于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将其全面深入融入思政课,就是要系统彰显这一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为思政课教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学理支撑。其

次,有利于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思政课教师必备的核心知识储备和关键能力素养,将其融入思政课建设,能为广大思政课教师全面提升业务能力水平注入新动能,推动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本领硬的思政课师资队伍。再次,有利于拓展法治教学资源、创新育人模式。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融入思政课教学资源体系的核心内容,能推动构建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育人新模式,助力形成协同育人格局,强化实践衔接与技术赋能。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提升学生法治素养的现实之需

法治素养是新时代青年适应社会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核心素养之一,涵盖对法治理念的认知认同、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运用、对法治实践的参与能力等多个维度。当前,青年学生虽具备一定法律常识,但在复杂社会环境与多元思潮冲击下,仍存在“知法但不懂法治精神”“懂法但不会用法治思维”“守法但缺乏法治信仰”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作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系统回答了法治建设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更蕴含着与青年成长需求高度契合的法治价值观与方法论。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能够突破传统法治教育“碎片化知识传授”的局限,以科学法治理念引领学生树立正确法治观,以系统法治内容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知识体系,以实践为导向教学提升学生法治应用能力,构建“理念引领——知识赋能——能力培养——信仰塑造”的完整素养提升体系,精准回应青年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现实需求,推动法治教育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深刻变革。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要点内容

(一)深度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实践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将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2]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必须深刻把握、深度阐释其形成的背景逻辑。首先,要阐明法治中国实践的时代背景。2018年,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党中央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按下快进键。高校思政课要向大学生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新时

代伟大法治实践,是对法治中国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正确把握。其次,要阐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相结合,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高校思政课要向大学生讲清其理论渊源、传承脉络与原创性贡献。再次,要阐明其深厚历史底蕴。习近平法治思想既广泛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的精华,又合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经时代化提炼升华,既展现出融通古今中外的广阔视野,更彰显守正创新理论品格^[4]。高校思政课要以大历史观为视角,向大学生阐明其历史渊源、融通传承与创新升华的内在逻辑。

(二)深度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基本方针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集中体现为“十一个坚持”,总抓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必须向大学生阐明其核心内容、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首先,要讲清核心要义,需要深刻阐释“十一个坚持”中每个“坚持”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联,进行整体性呈现、系统化解读,让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避免出现相互割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偏差。其次,要解读总抓手,重点阐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特别是系统解读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等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及内在联系,帮助大学生形成对我国法治体系的总体认知与系统把握。

(三)深度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全面、系统、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思想体系。^[6]首先要阐明其历史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法治文明的历史长河,孕育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精华,又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是我们党推进法治建设事业的必然产物。其次要阐明其理论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律文化相结合,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7]最后要阐明其实践逻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积极回应新时代法治实践难题、总结法治建设新鲜经验中形成的重大创新成果,又反过来指导和推动法治实践深化发展,彰显出鲜明的实践品格和强大的实践伟力。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必须阐明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互联系、内在融通的有机整体性,帮助学生通过系统学习法治理论、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深刻感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更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一)深化思想认识,坚定全面依法治国信仰

信仰、信念、信心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只要坚守信仰、坚定信念、筑牢信心,就永远不会被打垮,只会越战越勇直至胜利。法治信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根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全社会对法治的坚定信仰。法治教育绝非单纯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方式的知识灌输,其核心要义在于培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因此,高校必须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高度,加强对思政课的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高校法治教育和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入思政课教学核心任务。要结合不同课程的具体内容与侧重点,统筹优化各类资源,形成具体化、精细化的课程理念与施教方案,持续深化学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法律至上、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法治理念,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二)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思政课程学科体系

高校开设的各门思政课程内容各异、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完整的思政育人体系。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需以各类思政必修课、选修课为核心载体,结合每门课程的定位与特点,从不同维度精准融入、差异化呈现,实现统筹兼顾、各有侧重、一体推进的融入目标。具体而言:“思想道德与法治”应侧重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与科学内涵,重点阐明其形成背景、核心要义、方针要求,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清晰呈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助力学生筑牢法治认知根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与内在逻辑,着重阐明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分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等核心问题,引导学生把握法治理论的哲学底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要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探索历程,侧重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与传承创新,突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的结合历程,帮助学生从历史维度理解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必然性与优越性,坚定法治自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应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与时代价值,着重阐明其创新发展脉络及最新理论成果,展现其中的新思路、新内涵、新论断,凸显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学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坚实的法治思想指引。^[8]

(三)改进教学方法,重构思政课课程教学模式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核心在于讲清、讲明、讲透其中的道理。要立足“思政小课堂”主阵地,充分挖掘多元教学方式,真正把道理讲准、讲深、讲透、讲活、讲实。一是转变教学理念,强化学理阐释。突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政治性与学理性的有机统一,深入探寻“道理”背后的学理支撑与哲理意蕴,锤炼思政课教学中的哲学思维与法治思维,强化观点的总结提炼,用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之问、时代之问,引导大学生运用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二是推动专题教学、系统教学与体验教学深度融合。打破传统思政课的时空边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多维度育人场域,创设参与式、沉浸式教学生态。例如:在课堂主阵地构建“理论阐释—案例解析—实践体验”的递进式教学模式,通过主题教育、社会实践、法律志愿服务、模拟法庭、专题辩论等形式,训练学生法治思维,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绿色原则”等具体条款,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精神;邀请基层法官等法律实务工作者参与“法治中国建设”专题研讨,增强理论教学的现实解释力。三是探索“互联网+法治教育”创新路径。依托“智慧校园”建设,打造名师在线课程,运用“网、端、微”等现代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吸引力、代入感与互动性。例如:构建“智能+法治”融合平台,开发“法治思想智能学习系统”,集成AI导学、VR场景模拟等功能,通过VR技术还原宪法宣誓仪式、模拟立法听证会等场景,打造“全时域、全场景、全人群”的法治教育生态;建设“法治资源云库”,整合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国普法网等权威资源,构建“基础理论—典型案例—政策解读—互动问答”四级资源

体系,扩大优质法治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与可及率,强化技术赋能育人实效。

(四)多措并举,提高思政课教师素质

思政课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二者通过有效互动实现教学相长。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思政课教师需率先提升“学深、讲明、善教”的专业素养。一要学懂弄通核心理论。“吃透”是“讲透”的前提,思政课教师必须先自身学深悟透,才能向学生讲深讲透,进而引导学生真正领会。要开展全覆盖学习与原创性研究,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法理、辩证思维与核心要义,努力成为这一思想的深度研究者、全面解读者与坚定传播者。二要精准厘清教学重点。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做好教学转化,通过教学研讨、集体备课、专业培训等途径,突出教学重点,在有限课时内讲清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让学生形成整体性认知。三要创新话语传播体系。遵循“三个贴近”原则,将理论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再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青言青语”。通过整合适配的课程资源,合理运用慕课、超星资源库等网络平台,把专业法律语言转化为鲜活思政语言,让课堂真正触及学生灵魂、入耳入脑入心,增强学生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筑牢法治信仰根基。四要强化法治实践培训。学校需完善教师法治素养提升工程,支持思政课教师参与法律实战实践,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的合作交流。例如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参与司法实践挂职、法治政府建设调研等活动,提升其法治专业水平,推动“非法律专业”思政课教师向“法治素养过硬”的复合型教师转型。

(五)优化教学环境,营造法治教育文化氛围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育需创新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拓展教育空间、深化教育内容,推动法治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法治教育绝非局限于思政课堂,更要拓展“融入”的深度与广度,营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法治育人氛围。一是常态化开展法治互动实践活动。定期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征文”“法治沙龙”等主题活动,丰富教学资源供给,加深学生对法治理念的理解与把握,培养其运用法律武器妥善处理矛盾纠纷的法治习惯。可借鉴基层立法联系点与高校合作模式,开设“校园议事厅”,引导学生围绕网络安全、校园治理等议题建言献策,在实践中体悟法治精神。二是丰富校园法治文化元素。一方面,购置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书籍与电子资料,打造法治宣传栏、电子

显示屏、校园法治成果展厅等文化阵地,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浓厚法治氛围;另一方面,定期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法律咨询、校园法治文化节、模拟法庭等活动,在真实场景中体悟“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三是深化法治校园建设。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法治引导,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校园氛围;打造法治文化中心、法治文化广场,将法治元素融入校园日常建设与重大节日活动,厚植校园法治文化底蕴;优化校园官网、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资源,推送法治案例解读、政策宣讲等内容,让学生直观感受法治社会公平正义与温度。

四、结束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立足全面发展、个性成长与时代发展需求,多方协同、持续创新。广大高校及思政课教师要秉持政治引领、立德树人根本理念,推动思政课与党的创新理论同步推进、同频共振,持续用新思想、新理论、新精神铸魂育人。要及时回应社会热点与学生之问,增强思政课的时代感、吸引力与学生获得感,不断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质量,为法治中国

建设培养大批德法兼修的高素质人才,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 人民日报,2020-11-18(1).

[2] 付子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的理论支撑[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1-06(4).

[3] 范进学.“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概念何以证立[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3):28-49.

[4] 阮博,刘曼.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逻辑理路[J]. 中国大学教学,2023(1):33-63.

[5] 马怀德.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 山东人大工作,2021(9)56-58.

[6] 邸乘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几个关系[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39-47.

[7] 陈大文.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思考[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1(4):14-17.

[8] 李滨芬,乔大丽.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8).

(责任编辑 许峻)

Value Implication, Core Content, and Practical Paths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WANG Zifang^{1,2}

(1.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and action plan for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aw in the new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re the key courses for foster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larify it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deeply explain its formation background, core essence, and internal logic, and focus on the requirements of "presenting accurately", "explaining thoroughly", "vividly expressing" and "applying practically". Starting from deepening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updating teaching content,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we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belief in comprehensive law-based governance,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reconstruct the teaching model, improve teachers' quality, create a legal culture atmosphere,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legal concepts, strengthen legal thinking,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consciously recognize, believe in and practice the rule of law,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ir legal literacy.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Value implication; Practical path

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筑牢高等教育强国之基的实践路径探索

王丽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 河南郑州 450044)

摘要:立足高等教育场域,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教育家精神在高校教师群体中的核心内涵与实践价值;分析当前高校教师队伍在精神引领、育人模式、科研创新等方面存在的现实挑战,提出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包括构建“认知—认同—践行”三维培育机制、深化“立德树人—学术创新”双翼并举模式、完善“评价—支持—文化”支持体系等,为高校落实教育强国战略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高等教育强国;高校教师队伍;立德树人;学术创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6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096-06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任何一个教育强国都是高等教育强国。”^{[2]219}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教育部2024年统计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8%,规模扩张成效显著,但“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高等教育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成为教育强国建设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2023年9月9日,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3]这一论述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

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六个层面,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构建起完整的价值体系,标志着教师队伍建设理念的重要升华,为新时代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精神方向。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强调教师应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将个人发展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紧密结合,彰显教育报国的使命担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凸显为人师表的品德风范,要求教师以德立身、以德施教,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道德根基,助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推动教育生态良性发展。“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明确教育绝非简单的知识灌输,教师需尊重学生个性特质与发展潜力,关注学生全面成长,通过因材施教实现个性化育人目标。“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体现教师的职业素养与责任担当,其中勤学是基础,笃行是关键,求是是追求,创新

收稿日期:2025-10-20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强省项目“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下河南省教育强省综合改革与创新实践”(2025JYQS0414);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育家精神融入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研究”(ZGJG202442B)

作者简介:王丽丽(1981—),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是动力,推动教育不断适配时代发展需求。“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彰显教师高尚的职业道德与教育情怀,号召教师以“仁而爱人”的初心无私付出,用关爱滋养学生成长,成就学生美好未来。“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则既展现教育的宏大视野,又凸显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价值,要求教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高等教育强国以“高质量、创新型、引领性”为核心特征,其建设需构建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参与全球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中,锤炼“报国情怀、躬耕教坛、育人智慧、文化担当”为代表的精神特质。

二、教育家精神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定位

(一)政治引领:锚定高等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方向

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教育家精神牢牢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根本方向,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指明了前进道路,彰显出鲜明的政治引领功能,保障高等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西方中心主义”试图将西方学术体系、价值观念渗透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扰乱高校教育理念与学术导向,阻碍高等教育自主发展和人才培养。部分高校教师在开展科学研究、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中,不自觉受这一话语体系影响,盲目推崇所谓西方学术前沿,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导致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需求脱节,进而造成部分学生政治认同弱化、家国情怀淡薄、社会责任缺失,背离了国家人才培养的初衷。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不仅是教育家精神的内在驱动力,更是高校教师抵御“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侵蚀、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坚实精神支撑。实践中,真正践行这一理念的高校教师,始终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以批判性思维审视和反思现有学术体系,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战略需求。他们勇于挣脱西方教育范式的束缚,打破传统思维局限,严格遵循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发展新路径。由此可见,这一精神不仅是引领国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更在深层次上彰显

了精神引领的实践意义与时代担当。

(二)文化浸润:塑造高等教育“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价值内核

我国高等教育正行进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伟大征程中,以“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核心维度为指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紧密联结,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隐性基因”逐步转化为现代高等教育的“显性动力”,赋予后者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鲜明的价值导向。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彰显了中国教育“和合共生”的宇宙观,倡导教育者立足全球视野,致力于构建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体系,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念既体现出学术研究需融通中外文明,又强调要立足国情、契合社会现实、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导向。正因如此,中国高等教育在参与全球知识治理、应对当下诸多复杂挑战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方案,充分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战略定力。

因此,教育家精神视域下的文化浸润,本质在于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融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垄断,规避盲目移植西方大学模式带来的文化失语问题,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高等教育范式,进而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风格与教育模式,使其在世界高等教育之林中彰显东方智慧,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向着“世界一流”的目标稳步迈进。

(三)实践驱动:破解高等教育“大而不强”的关键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向内涵式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高校面临诸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与功能性失衡的挑战。“重科研轻教学”造成育人质量下滑,“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导向导致原始创新不足、成果转化率低。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学术内涵与实践智慧,为破解当前高校发展难题提供了深邃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重构了教学学术的价值内核,助力育人质量提升。在现行高校评价体系中,科研成果的多寡往往直接决定资源分配、职称晋升与学术声誉,致使部分教师将精力全部倾注于科研项目申报和论文发表,忽视教学投入,进而催生大量“水课”,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启智润心”超越了传统“知识传授”的教学框架,强调对学生认知结构的重构,要求教师摒弃单向度的知识灌输模式,转

型为学习设计师与认知引导者,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而回归教育的本质——价值引领与人格养成。“因材施教”构建了个性化、差异化的教学新范式,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发展需求,据此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生态。“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两大理念相辅相成,通过价值重塑与范式重构,为改革高校评价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重构了学者伦理与学术规范,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的“两唯”导向,激发创新活力。在“两唯”评价导向下,高校过于看重论文发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热衷引进各类带高层次人才头衔的教师以提升声誉,追求短期效益,导致学术浮躁之风泛滥。部分学者为迎合评价标准,一味追求短平快的研究成果,忽视学术研究的本质,仅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行简单改进或微调,造成原创性研究成果匮乏。同时,研究成果脱离实际需求,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满足行业发展需要,难以有效破解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勤学笃行”回归学术研究的本源动力,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实现“知行合一”。它强调学者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甘于寂寞、潜心治学,专注于学科理论的深耕与人类知识的永恒探索,尊重学术研究的长周期性 with 不确定性,敢于十年磨一剑。同时,要将研究成果与产业需求、社会发展紧密对接,真正做到以问题为导向,为解决实际需求开展研究。“求是创新”是学术活动的灵魂,确立了学术创新的元规范与评价标准,倡导遵循科学规律、追求真理,引领学术评价改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深化高校人才评价改革,破除人才‘帽子’制约,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科学认定标志性成果。”^[4]这一要求鼓励跨专业、跨学科、跨院校的协同创新,激发学者的原始创新潜能,面向社会复杂问题开展研究,最终实现找准问题、做深学问、产出高质量成果的目标。

弘扬教育家精神,实质上是教育领域的一场系统性变革。对于高等教育而言,需要在理念、制度、文化、资源、实践等层面进行协同重构,最终回归大学教育的初心与使命——育人育才、知识创新、价值引领、服务社会。这不仅是破解当代高等教育发展难题的“金钥匙”,更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向“世界一流”的关键路径。

三、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家精神培育的现实挑战

(一)精神认知层面:部分教师对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理解存在偏差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家精神对于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践行高等教育使命具有根本性支撑作用。然而,在精神认知维度,高校教师队伍依然面临严峻挑战,部分教师对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与价值逻辑存在认知模糊的问题。他们将“教育家精神”简单等同于“师德规范”,视其为教师职业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并未真正理解其价值体系的深层内涵。“教育家精神”是一个兼具综合性、系统性与引领性的完整价值体系,强调教育者的理想信念、使命担当、创新意识与社会贡献,是与学术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高等教育核心职能的深度融合,是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与职业境界,不应局限于师德师风建设的范畴。

当前学术环境的竞争日趋激烈,科研成果产出效率、职称晋升与学术声誉等已成为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准。这一评价导向驱使教师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论文发表、项目申报等可量化领域,却忽视了作为教育者在人才培养、学术传承以及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责任。他们对自身“教育家”的身份认同感逐渐淡化,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弱化了作为教育者理应承载的育人使命与社会责任感。

(二)实践转化层面:教育家精神与高等教育核心任务衔接不足

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育人和科研,但当前教育家精神与这两大核心任务之间,存在明显的衔接断层。

在育人方面,价值引领与专业教学融合不足,“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度亟待加强。教育家精神强调“启智润心”,要求教学过程中注重方法论的渗透和价值观的默化熏陶。当前教学往往偏重知识技能的传授,却忽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学术诚信等核心素养的培育,也缺乏将家国情怀有机融入专业教学的能力,致使育人过程缺乏深度与温度,学生在专业学习中难以树立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承载着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多重重任。但在实践中,其形式化、表面化问题较为突出:部分教师在课程中为凸显“思政”元素进行生硬植入,未能将价值引领贯穿课程讲解全过程,缺乏叙事逻辑的连贯性,导致课程思政与专业内

容相互割裂,无法实现“以文化人”“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难以达成“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在科研领域,教师群体的学术理想与量化评价导向产生冲突,严重侵蚀着他们的学术坚守。目前,我国SCI论文总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真正具备国际影响力、具有颠覆性的顶尖成果占比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少教师以考核评价机制为导向,更倾向于选择“短平快”、易刊发的研究课题,而对于需要长期积累、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原始创新研究,缺乏主动探索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现象不仅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也阻碍了高校在关键领域的创新发展,使得高校科研难以真正满足国家和社会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需求。

(三)制度保障层面:支持教育家精神生长的生态尚未完善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引导教师职业发展方向的“指挥棒”,理应全面、科学地反映教师的综合贡献,为教育家精神的孕育提供正向激励。然而,当前许多高校的评价导向片面强调科研成果,对教师考核仍过度倚重“论文、项目、奖项”等易于量化的指标,系统性地弱化甚至边缘化了师德师风、教学投入、育人成效、社会服务等难以量化的“软”指标。其结果是,将教育家精神所倡导的“立德树人”“潜心教学”“以文化人”等核心育人导向挤压至次要地位。“非升即走”的聘任制、频繁的聘期考核及年度报告制度,共同催生出追求即时绩效的“短期主义”导向,与教育家精神所提倡的“长期主义”视野——即“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坚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耐心探索、对国家战略目标的不懈追求——形成鲜明冲突,进而抑制了教育家精神所倡导的、以弘道追求为核心的学术理想。

培育教育家精神蓬勃发展的制度生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凭调整单一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高校必须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为突破口,完善制度保障机制,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评价体系,将价值导向有机融入制度化培养平台和大学文化,从而实现教育家精神从理念倡导到制度嵌入的根本转变。

四、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精神铸魂:构建“认知—认同—践行”的三维培育机制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家精神对于提升教师素养、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为

有效培育教育家精神,构建“认知—认同—践行”三位一体的培育机制势在必行。

认知是价值认同与自觉实践的逻辑前提,也是教育家精神培育的起始点。博士及博士后是高校师资储备的关键力量,在其培养过程中,应将“教育家精神”作为核心课程模块纳入培养方案,但要规避浅层次的师德规范宣讲,深入阐释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历史演进及时代价值,阐明其与学术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间的共生关系,使这些准高校教师对教育家精神形成正确认知。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应发挥核心作用,承担起教师入职后的“组织社会化”职能,通过嵌入学科情境的专题培训与研修,引导教师将教育家精神的理论知识融入日常教学、科研工作实践,完成从知到行、从外在规范到内在信念的深刻转变。

认知并不代表认同,认同是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内在价值追求的过程,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内化”的关键环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构建日常浸润、项目赋能、平台支撑的教师发展良好生态。”^[4]为帮助青年教师快速实现对教育家精神的认同,高校需精准落实这一要求,搭建多元化浸润式培育平台。定期举办“大师讲堂”“名师面对面”等活动,邀请两院院士、教学名师等教育榜样,分享其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初心历程与实践经验,通过真实故事播撒教育家精神的种子,引发情感共鸣,唤起教师对教育家精神的主动认同。组织“教育家精神主题沙龙”,为教师提供平等交流、思想碰撞的空间,促使教师从多元视角审视教育家精神,深化对自身职业身份与责任的认知,形成个性化的理解并融入价值判断,进而建构起对教育家精神的内在认同。

践行是教育家精神培育的落脚点,也是认同的最终归宿。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将精神转化为清晰的行动路径,辅以有效的激励反馈机制,建立持续行动的正向循环,确保教育家精神能够可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实际行动。将教育家精神践行成效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向教师传递清晰而强烈的信号:践行教育家精神既是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担当,也是自身职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更能获得高度认可与实实在在的回报。以此促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践行教育家精神,将其融入教育教学、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等各个环节,真正实现教育家精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落地生根,形成“勇于践行——获得激励——持续践行”的良性循环。

构建“认知—认同—践行”三维培育机制,形成从理论传授到情感激发、再到行为强化的完整链条,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培育高校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将其内化为坚定的职业信仰与持久的行动自觉,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精神动力。

(二) 双翼并举:促进“立德树人”与“学术创新”的有机融合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课程思政”改革是践行这一价值导向的核心路径,将教育家精神融入专业教学则是深化此项改革的核心举措。教育家精神蕴含着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对学生的终极关怀及对教育使命的自觉担当,能够将价值引领转化为专业教育的内生性要素。这意味着教学需要从知识本身的逻辑中,挖掘其蕴含的历史脉络、伦理维度与内在规律,从而实现价值塑造从外在灌输到内在启迪的教学范式转变,使价值观教育自然融入“润物无声”的学术过程,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本体性统一。

“学术创新”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贯穿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各个环节,决定着高校在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与生命力。这就要求高校推动学术研究从“跟风式”模仿转向“引领性”创新发展。高校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制度层面发力、推进创新。一方面,要支持教师开展“有组织科研”,避免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可根据实际需要构建跨学科协同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社会关键现实问题整合多方资源,高效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难题。另一方面,鉴于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探索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要着力营造“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氛围,深化评价体系改革。“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1]

“立德树人”与“学术创新”是高校核心使命的一体两面。“双翼并举”以教育家精神为轴心,通过深化育人体系强化价值引领,依托优化评价激励机制激发原始创新活力。卓越的教学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支撑,前沿的科研又为教学注入最鲜活的知识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从而实现高校“育人与创新”并重的使命,为建设教育强国与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制度与文化保障。

(三) 生态优化:构筑“评价—支持—涵育”的协同支持体系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建设成败。^{[2][22]} 传统以论文、项目等量化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式,难以全面反映教师的综合贡献,无法适应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需根据各类高校的发展定位,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完善质量、特色、贡献导向的监测评价体系,引导高校差异化发展、发挥优势、办出特色。首先,师德师风不仅关系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更关系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根基,应置于评价体系的核心位置,实行师德失范“一票否决”制,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其次,突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评价体系需建立以学生学业发展与育人成效为核心的考核内容,激励教师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的成长成才路径,切实提升育人质量。最后,突出创新的重要性。注重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学方法创新、实践创新等方面的原创性成果,形成多元激励格局,引导教师不忘育人本源,持续追求卓越创新。

完善支持机制,构建全周期发展保障体系。教师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成长成才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育与发展,亟须建立多维度、可持续的支持机制作为保障。构建“导师+团队+平台”三位一体的全周期支持模式,是为青年教师搭建系统性发展通道的核心举措。这一举措的实施,需要建立一对一导师制,由资深教授担任导师,通过个性化指导帮助青年教师快速适应教学节奏、筑牢学术根基;以教学科研任务为载体组建团队,充分培养青年教师的协作意识与团队融入能力;高校还要打造多元化发展平台,为教师提供学术交流与实践锻炼的机会,帮助他们拓宽学术视野、丰富实践经验,助力其在不同阶段实现专业成长与突破,充分释放专业潜力与创新活力。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4] 这种文化氛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教师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培养造就一批高水平师资和学术大师。从实践层面而言,高校可依托“高校名师馆”等载体,使师道传统具象化,为师生提供沉浸式感知前辈教育智慧与人格风范的场所,树立精神标杆。通过举办“教育家精神宣传月”等主题活动,深入

挖掘与传承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谱系,集中宣传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与价值,进而引导教师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职业信念与行为准则。这一过程持续强化教师的身份认同与职业荣誉感,引导教师潜心治学、倾心育人,自觉践行教育使命,从而为高等教育生态注入深厚而持久的精神支撑。

构建“评价—支持—涵育”三位一体的协同支持体系,是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工程。三者相互依存、环环相扣,形成强大的聚合效应,为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制度根基和环境支撑。通过三者的有机联动与协同发力,最大程度激发教师队伍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助力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

五、结束语

教育家精神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精神引擎”,其涵盖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六大维度,对高校教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然而,当前对教育

家精神虽多有理论倡导,却尚未形成广泛的实践自觉。亟须通过精神铸魂、双翼并举、生态优化三条路径,推动教育家精神从理论层面切实转化为实践自觉与行动自觉,全面融入高等教育各环节,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而深厚的生命力,助力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J]. 求是, 2025(11): 4-9.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五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3]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N]. 人民日报, 2023-09-10.

[4] 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11-20) [2025-1-19].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on the Practical Path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Educators' Spirit

WANG Lili

(Offic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combined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on the core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e educators' spirit among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university faculty in aspects such as spiritual guidance, education model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actical paths to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with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ese paths include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Cognition-Identification-Practice", deepening the model of advancing "moral cultivation and student nurturing"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in parallel, and improving the support system of "Evaluation-Support-Culture",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ors' spirit; Leading country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faculty; Moral cultivation and student nurturing; Academic innovation

新时代“大思政”理念的应然图景与实践指向

——基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分析

张党诺^{1,2}

(1. 郑州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1200; 2.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

摘要:人的问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关切。马克思通过“现实的人”,将人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中解放出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大思政”理念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探索,与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中强调的人的实践性、社会性、全面发展等特质相互契合。以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为指引,物质与精神的协同发展、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理论与实践的互证,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大思政”理念丰富的育人内涵。以塑造“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思政”理念的践行可从育人生态、育人主体、育人路径、育人方式多维度协同发力,提升思政育人实效。

关键词:“现实的人”;“大思政”理念;育人理念;实践指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7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102-05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要通过道理阐释和活动组织,让青年大学生在厘清“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后,进一步明确“我应该干什么、怎么干”。马克思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的人学逻辑,以“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实现了“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在现实指向上,实现了从“片面的人”到“全面的人”的转变;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思辨的人”到“实践的人”的超越。

一、“现实的人”:在对“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批判与发展中生成

人的问题一直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曾对人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黑格尔把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与人是分离的,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黑格尔颠倒了人的存在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将自我意识作为主体,人被赋予天然的精神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曾批评:“黑格尔把人变成

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1]费尔巴哈作为旧唯物主义的代表者,反对黑格尔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现实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强调:“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2]费尔巴哈开始把人看作现实存在,但他也只是半截的唯物主义者,他仅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所以他看到的也只是人自身,一个个孤立的、单个的个体,而不是真正的、有着丰富社会关系的现实的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认知的人,都是先天既定的,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社会历史变化无关,无论现实社会如何变化,人的本质都不会变化。这种永恒的、固定的人,终归是孤立的、抽象的、自然的、形而上学的人,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范畴。将人看作“单个

收稿日期:2025-10-12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大思政课’理念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研究”(2024SJGLX1017)

作者简介:张党诺(1983—),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下被物的关系所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主流认知。

马克思在关于人的问题上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时代问题的冲击激励着马克思重新认识人。尤其是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当遇到物质利益凌驾于理性原则之上、个人天生的自由和权利被物质利益所绑架的现实困惑之时,马克思开始重新审视人,通过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前人的思想,开辟了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人的新路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针对旧哲学的片面性,马克思把“现实的人”作为观察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具体阐发“现实的人”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有生命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将人置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所建构的复杂关系中去认知,从变动不居的现实性出发来阐释。自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认识人和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使其挣脱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羁绊,以新的视角认识和解释人,为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根基,为唯物史观找到了逻辑起点。

第一,“现实的人”是有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人。“现实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这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之为人的自然基础,是人得以形成和开展活动的自然前提。但人的自然属性与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人与动物的共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为了满足自然需要,维持其肉体组织的存在,人必须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摆在首位的是物质生产活动。当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人就与动物区别开来。至此,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人”是有自然需求的,并能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在改造自然中满足其需要的人。此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是人所独有的精神属性,即人的情感、意志、心理等主观能动性,使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3]。具体体现为在实践中人对知识的追求、对道德的坚守、对美的欣赏等精神需要。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论强调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统一,新时代“大思政”育人理念不仅关注学生的物质生活保障,更重视精神世界的塑造,既满足了学生的成长需求,也注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与马克思

的思想高度契合。

第二,“现实的人”是指处在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只能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类特征,无法解释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此,马克思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有生产。”^{[4]724} 正是在摆脱自然束缚的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便能够相互交往并发生联系,即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等,这些关系丰富了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共同构成了人的社会性存在,使其拥有社会属性。因此,现实的人不是一个单个存在的自然人,而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产生社会关系的个人,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抽象的、固定的自然属性的理解。“现实的人”正是通过社会关系与他人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形成自身的本质。新时代的“大思政”理念强调“社会即课堂”,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要在丰富、紧密的社会关系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这种理念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育局限于课堂的模式,使学生在社会中感受时代脉搏,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体验、思考和成长,彰显了人的社会性。

第三,“现实的人”是指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中的人。马克思把历史视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实践活动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指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128} 现实的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能动性有效彰显,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实现。但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创造,而是要在既定的、前人已经创造的历史条件中来推进。因此,“现实的人”不是超脱历史之外的抽象、被动的个人,而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历史发展中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新时代的“大思政”理念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注重人的主体性和历史创造力的发挥以及历史责任感的培养,不仅尊重人的主体性,还激发了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深刻彰显了人的历史主体性。

二、关照“现实的人”:“大思政”蕴含的应然图景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和教育需求,

“大思政”理念应运而生,而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可以为“大思政”育人理念提供学理支撑和行动指南。

(一)在物质与精神的协同发展中塑造人

“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需要推动着生产的发展,低层次需要满足后,人们就会追求高层次需要,从而促使生产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因此,需要,作为“现实的人”的本性,既包含吃穿住用等直接物质需要,也包含不断丰富和精神追求。教育活动是否合理,首先就要看是否关注人的需求。新时代“大思政”理念突破传统思政小课堂育人的“一亩三分地”,尤其是社会大课堂的融入、网络云课堂的应用,拓展了思政教育的空间、延展了教学时间,将抽象的理论讲授与活泼的社会实践大课有机结合,可以满足不同个体对思政课的需求,并为其提供多样的平台和载体。“大思政”理念打破思政课教师“单打独斗”的育人局面,由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等构成联动育人团队,可以更准确把握学生身心发展需要,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成长成才之惑。此外,社会先进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以及朋辈的榜样引领,推动理论指导与德育实践的“多轮驱动”,形成校内校外的育人合力。因此,“大思政”理念可以在实践中为时代新人的培育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和更为生动的精神滋养,使学生在物质与精神的协同发展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二)在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中塑造人

“现实的人”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必然会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个人的特性、行为模式会在生产、政治、文化等多维度的社会关系中被形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塑造人的教育形态,必须考虑社会关系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作用,需要将受教育者投放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在丰富的社会关系里,帮助其清晰地认识到“我是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依托的社会关系单一,无法真正实现对人的社会性的关注与丰富,培养出的人才要么视野狭隘,难以适应社会,要么只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不明白人存在的社会价值。“大思政”理念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单向度关系的样态,充分利用社会大课堂的育人优势,拓展受教育者的社会关系。受教育者的身份角色可以随时转换,与他人的交互随时发生,摆脱了人际关系中的原子化状态。只有在真正的实践协作中,受教育者才能认清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中,达到思想政治教

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三)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链接中塑造人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实的个人”不是纯粹的无力个体,而是在广泛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不断改造世界,并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5]。关于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创造历史,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669}因此,前人创造的既定历史条件制约着人们的创造活动,预先规定着他们创造活动的方式和特点。此外,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将辩证法充分运用于人类历史研究,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即唯物史观所阐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只有遵循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立足历史方位,顺应历史大势,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实践、开辟未来。

(四)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契中塑造人

“现实的人”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的,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实践得以展现和确证。人在实践中发展自身,产生一切社会关系,创造出人之为人的一切特征,因此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成为真正“现实的人”。理论凝聚着人类实践成果,代表着比具体实践更为深远和普遍的人类实践经验,可为具体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依据。理论源自实践,实践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引领。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7]“大思政”理念本质上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基础,通过活用社会育人资源,让学生在观察社会、体验生活、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完善人格、确证自我,进而深化理论理解、激发真挚情感、升华价值观念,破解思政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在理论思政与实践思政的融合互契中塑造时代新人。

三、模塑“现实的人”:“大思政”理念落地的实践指向

“大思政”理念要以模塑“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多场景共情、多主体联动、多路径并进中推进,协力培养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基于“大环境”,打造“大思政”育人的良好生态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人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塑造着人的生存状态和成长轨迹。“大思政”理念打破了育人空间的局限性,将育人空间从校园——思政课堂延伸至现实社会和虚拟网络空间,形成家庭、社会、网络、校园为一体的协同育人体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家庭是人的第一社会关系,是人社会化的起点,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承担着重要的育人责任。在家庭教育方面,要突出家风家教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8]让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成为新时代的社会新风尚,为“大思政”育人生态奠定坚实的家庭基础。社会是人进行实践活动的主要场所,在社会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强化各类公益性社会实践和教育基地的社会教育责任,理直气壮地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网络环境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思政教育不可忽视的阵地。在网络空间,要着力净化网络育人环境,积极引导向上向善的网络社会文化,深入研究网络育人新特点和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的成长新问题,打造有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良好网络生态。在学校方面,要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体制机制,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螺旋上升的育人路径,高质量建设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要打破课程育人的单一性,通过整体统筹谋划,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融通各类课程资源,形成系统效应,在良好育人环境中汇聚更大育人合力。

(二)培育“大师资”,丰富“大思政”的育人主体

作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需要通过现实生产生活中的交往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来确证自身存在,而交往实践也是丰富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打造丰富的育人主体,一要坚持系统观念,围绕“大师资”建设,打破“一门课一位教师”的单一育人格局,超越思政课教师单一主体的育人范畴,实现育人主体范围的扩大化和社会化,构建多元融合的思政育人队伍,打造覆盖学生成长全过程的“大思政”育人共同体。二要结合育人工作和人才培养需求,建强“大思政”队伍,打造以思政

课教师、辅导员、校外基地导师、相关专业群教师为主体,以学生朋辈导师、社会实践团队负责人为补充,以校外专家、先进模范、优秀志愿者等为特色的联合育人团队,将其有机嵌入思政课及思政教育主题活动中,以“内外联动、师生同讲”提升育人效果的感染力、引导力和说服力,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新态势。

(三)坚持“大历史观”,拓展“大思政”的育人路径

“现实的人”具有历史性,其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都受到历史条件的深刻影响。青年大学生虽生活在当下,但其思想和行为受到历史的塑造,并对未来产生影响。“大思政”育人通过“大历史观”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坚持用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开展教育,通过引导学生走进博物馆、走近红色历史、了解历史故事、创设历史情景等方式,帮助青年从历史的长时段、社会的宽视角、人类的大格局中把握时代脉搏、坚定理想信念,有效塑造当代青年的大历史观。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思政教育中体现为“历史主动精神”的培养。历史主动精神从来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锻炼和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大思政”育人通过“大历史观”引导大学生理解唯物史观,使他们认识到个人的成长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紧密联系,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历史主动精神。通过社会实践项目,号召和带领青年大学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在对时代的洞察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理解。在志愿服务、社会调研的实践中,引导青年在现实生活中主动作为,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四)突出实践性,探索“大思政”育人新方法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6]134}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和核心特征,“现实的个人”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获取所需生活资料,进而生产自身。因此,实践是人之为本质的规定,实践育人也应是思政育人的重要途径。“大思政”理念的践行,需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构建实践育人工作体系,切实提升育人质量和效果。一方面,学校要

为实践顺利开展出台完善的制度文件,从学时、学分、目标要求、形式内容、成绩考核、经费保障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配备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担任实践导师,将教师指导社会实践的工作量纳入职称晋升考评体系,对教师的实践方案设计及其具体实施等给予专业指导,对实践指导效果优秀的教师予以公开表彰和奖励。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实践育人方式方法,通过理论宣讲、社会调研、“三下乡”、支教、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形式,让学生在动手动脑中增进知行合一、增强责任担当。

四、结束语

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理论,超越了唯心主义抽象谈论人的缺陷,将人置入现实的物质世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时代“大思政”理念,正是回应了思政建设的人学关怀,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和主体地位,关照人的现实生活,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契合人的情感共鸣,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是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的时代彰显。以马克思“现实的人”理论为指引,把握“大思政”蕴含的育人理念,明晰“大思政”建设的原则、任务及方法,提

升“大思政”建设成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245.
[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荣震华,李金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6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0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40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45.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86.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Proper View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Thought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ra

——An Analysis based on Marx’s "Real Individuals"

ZHANG Dangnuo^{1,2}

(1.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2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human being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cer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Marx liberated human beings from the "inherent abstractions of isolated individuals" through "real individuals" and laid a scientif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a new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ig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beings such as practicality, socialit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mphasized in Marx’s theory of "real individuals". Guided by Marx’s theory of "real individual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y, reality and the future, and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jointly constitute the rich educa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aking the shaping of "real individual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goal,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make concerted effor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educational ecology, educational subjects, educational path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Real individuals"; Concept of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connotation; Practical orientation

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分层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王明风

(郑州大学 河南音乐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在高校的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中,学生因钢琴基础、音乐素养、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齐步走”教学方式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针对数码钢琴集体课面临的问题,笔者实践了一套系统的分层教学模式,涵盖学生分层标准、分层教学目标与内容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实施和动态多元的评价体系构建等核心内容,实践成效显著,为优化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分层教学;教学改革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107-05

一、引言:数码钢琴集体课的优势与弊端

数码钢琴是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产物。与传统声学钢琴相比,数码钢琴体积小巧,重量不到传统声学钢琴的十分之一,轻盈便捷,质量稳定,适用于集中排列。数码钢琴音色逼真,触感键盘随弹奏者的力度发生变化,手指弹奏力不同,音响强弱不同。因此,数码钢琴成为高校面向音乐专业非主修钢琴学生(如声乐、器乐、作曲、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学生)乃至公共艺术教育开设键盘集体课程的理想载体。

数码钢琴集体课融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钢琴教学于一体,“数码钢琴集体课由一架主琴带动其他数十架副琴进行集体授课,是音频远程教育技术、数字处理技术、光电技术等结合,利用多媒体和计算机系统,引入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课件进行教学,其教学系统是一种现代化的电脑音乐多媒体系统”^[1]。由于数码钢琴具有多种功能,数码钢琴集体课也就有了明显优势,“对于教师而言可以减少工作量,保证了较高的教学效率。而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利用这些功能进行更加高质量的学习……在‘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中,既能够保证整个课堂的规范性,也能够保证整个课堂的科学性,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果具有很重要的帮助”^{[2]17-20}。集体授课模式有效缓解了师资与琴房压力,提高了教学效率。

然而,“数码钢琴集体课引入中国高校仅仅20多年的时间,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因此,不论从课程设置、教材编排,还是师资力量、教学方式、课程评价等方面,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完整体系,仍存在着一些问题”^[3]。高校的生源背景多元化,数码钢琴课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部分学生自幼习琴,具备扎实基础;也有部分学生仅在升学前短暂学习;更多学生则是零起点。由于数码钢琴集体课学员较多,而相比“个别课”“小组课”,集体课存在着教学质量无法保障、学生对于统一教学进度的态度不一、技能训练效果不理想等弊端^[4]。在统一的教学目标、内容、进度与评价标准下,基础薄弱者疲于追赶,易产生挫败感;基础较好者则可能因内容重复或挑战不足而丧失兴趣,导致“优生吃不饱,中生吃不好,弱生吃不了”的状况。传统集体课的“标准化”供给与学生个体“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因此,探索适应学生个体差异的教学模式,实现集体授课框架下的个性化发展,成为高校数码钢琴

收稿日期:2025-07-16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一般课题“高校钢琴基础课程分层教学改革实践研究”(2024ZZUJGXM158)

作者简介:王明风(1973—),男,河南郸城人,郑州大学河南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钢琴教学与音乐教育。

课程改革的迫切需求,而分层教学为破解此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分层教学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

分层教学并非简单地将学生划分为三六九等,其精髓在于尊重个体差异,力求使教学要求与不同层次学生的现有水平和潜能相适应,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充分发展。

(一) 分层教学的理论基础

“分层教学模式是以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和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依据而设计的教学模式。分层教学模式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针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层;二是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班级,针对学生学习能力进行分层。”^[5]

由孔子提出并实践、后经朱熹总结概括的“因材施教”,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瑰宝,重点强调根据学习者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可以说,分层教学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具体应用和创新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智能观念。该理论指出,人类的智能是多元的,主要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等;同时强调每个人的智能组合不同,智能结构存在差异,教育应尊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在关注学生音乐智能(如听觉、节奏感、手指技巧)现有差异的同时,也为其他不同智能优势(如逻辑、空间、人际智能)的发挥提供空间,例如在合奏、编配任务中分工协作等。

(二) 分层教学在高校集体数码钢琴课中实施的必要性

在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中实施分层教学是非常必要的,具体原因如下:

1. 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高校钢琴学习者来源多样,部分学生有专业训练背景(如音乐生),具备识谱、演奏基础;另一部分可能为非音乐专业选修生,零基础或仅接触过简单乐理,统一的教学方式难以兼顾。

2. 学习进度分化明显。同一教学内容下,基础好的学生可能快速掌握演奏技巧,而基础薄弱的学生可能在识谱、手型等基础环节停滞,统一授课易导致“优生吃不饱、后进生跟不上”。

3. 高校培养目标的多样性。音乐专业学生需掌握演奏技巧、音乐表现力,以从事表演或教育工作;非音乐专业学生可能更侧重兴趣培养、艺术素养提升,分层教学可根据不同目标设定教学重点(如专

业组强化演奏难度,兴趣组侧重乐曲赏析与简易弹奏)。

4. 避免“一刀切”导致的效率低下。统一教学中,教师需兼顾不同水平的学生,常被迫放缓进度或简化内容,影响整体教学效率。分层后可针对各层次制定合理目标(如初级层主攻基础指法,高级层学习复调作品),提升教学针对性。基础薄弱的学生在适合自己水平的层次中更易获得成就感,减少挫败感;优等生在更高难度的学习中保持挑战欲,避免因内容简单而失去兴趣。

总之,集体课形式需要高效组织,教师必须在有限课堂时间内,让不同层次学生均能有效学习。分层教学在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中的实施,本质是对“学生个体差异、教学资源特性、教育目标多元化”的针对性回应,既能优化教学效果,也能更好地匹配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

三、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分层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笔者在数码钢琴集体课(面向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非钢琴主修学生)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分层教学改革实践。具体研究实施步骤和主要内容如下:

(一) 科学分层:动态评估与灵活分组

分层是教学实施的前提,关键在于标准科学、过程动态、态度积极。由于钢琴集体课自身的局限性和教师能力的局限,钢琴集体课的班额不宜过大,美国的钢琴集体课一般不超过10人^[6]。“我国的中央音乐学院曾经做过20人班额的试验,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这要求教师、学生的素质能力都比较高。”^[7]本研究科学分层具体安排如下:

1. 对全体大一新生(上第一次课时)进行问卷调查、考查及观察等综合“摸底”。根据“摸底”情况,按照不同维度,如通过入学标准化测试(包含音阶、琶音、视奏、简短乐曲演奏)评估现有技能水平;通过对乐谱符号、节奏和声基础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的考查,评估其音乐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观察其接受新知识的速度、练习效率、解决问题的方法、专注度等了解其学习能力与习惯;通过调查学习钢琴的目的(必修要求、兴趣拓展、未来教学应用等)了解其学习动机与目标等。

2. 教师在分层方法上注意采用“摸底测试+课堂观察+学生自述+教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仅凭一次测试定终身。可初步划分为以下三层:

A层(发展层):基础扎实,接受能力强,有较强音乐表现欲望和拓展潜力。目标在于深化技巧、提升音乐性、拓展曲目风格与难度(如包含复调作品、

一定难度的古典或现代作品),鼓励创造性表现(如即兴伴奏片段、简易编配)。

B层(提高层):具备一定基础(如能较流畅演奏简单练习曲和小型乐曲),但技巧或音乐表现有待巩固提高。目标在于系统规范技术(如音阶跑动均匀性、和弦连接连贯性),提升视奏能力,理解基本音乐结构,能较有表现力地完成中等难度曲目。

C层(基础层):零起点或基础非常薄弱。目标在于建立正确的手型、基本触键方法,掌握五线谱基础,建立稳定的节奏感,能双手协调演奏简易练习曲和乐曲片段。

3. 分层要动态管理,并非固定不变。建立“成长档案”,定期(如每4—6周)进行小范围技能展示或评估。根据学生进步速度、努力程度、新显现的能力或遇到的瓶颈,在充分沟通和鼓励的基础上,进行组间微调(如B层表现优异者可尝试A层部分挑战任务,C层进步显著者转入B层)。强调分层是为了“更好地学”,而非等级标签。每次调整都伴随对进步的肯定和对新目标的说明。

(二)目标分层与内容重构:同中有异,异中求进

在保证课程核心目标(如掌握基本键盘技能、理解基础乐理在键盘上的应用、培养音乐感知力)一致的前提下,为不同层次设定具体可达成的、具有挑战性的子目标,并据此设计、选择或改编教学内容。

A层(发展层)目标及内容:熟练掌握各大小调音阶、琶音(双手四个八度,一定速度),能视奏中等偏上难度的新谱,具备一定的音乐分析能力,能较有表现力地演奏不同风格(巴洛克、古典、浪漫、流行及爵士)的代表性作品片段,掌握为简易旋律配弹正三和弦及其转位伴奏的能力,了解并尝试简单的钢琴即兴手法;学习车尔尼849后半部分或299前半部分选段,巴赫《初级钢琴曲集》或《小前奏曲与赋格》选段,莫扎特和海顿奏鸣曲简易乐章,简易爵士及流行钢琴曲,移调练习,为指定旋律配写并弹奏伴奏(I-IV-V-I)。

B层(提高层)目标及内容:掌握主要调式(C, G, F, D, 降B大调及关系小调)音阶、琶音(双手两个八度),能较流畅地视奏简单的新谱,规范手指技术(如连奏、非连奏、跳音),提升演奏的流畅性与准确性,理解乐曲的基本结构(乐句、段落),尝试进行简单的音乐表现,认识和弦标记(C, F, G, G7等),能在教师指导下为极简易旋律配弹;学习车尔尼599后半部分或拜厄后半部分;布格缪勒《25首简易练习曲》;汤普森《现代钢琴教程》第三册选曲;简易中外名曲改编;基础伴奏音型(柱式、半分解)练习。

C层(基础层)目标及内容:掌握正确坐姿与基本手型,认识五线谱(高音谱号、低音谱号基本音域),掌握基本节奏型(全、二分、四分、附点二分、八分音符及其休止符组合),学习非连奏、连奏基本触键方法,能双手协调演奏简易练习曲和乐曲(分手练习熟练后合手),建立稳定的基本拍感;学习并应用基础乐理知识,入门手指练习(如《哈农》第一课慢速练习),学习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或类似入门教材选曲,极简易的双手配合练习曲,使用单指和弦功能配合右手旋律演奏简易歌曲。

(三)教学实施策略:分层导学、合作互动、技术赋能和分层辅导

课堂组织是分层教学成功的关键。充分利用数码钢琴实验室的技术优势,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具体教学实施策略安排如下:

1. 实施分层导学的教学策略。讲解新技巧或布置新曲目时,教师应针对A、B、C三层分别进行要点提示、难点示范和练习要求说明。例如,讲解“跳音”时,C层重点在于理解跳音记号并做出清晰短促的离键动作;B层强调手腕的弹性运用和不同风格跳音的区别;A层则可引入更复杂的跳音组合或探究不同时期作曲家对跳音的诠释差异,但讲授核心概念(如某种节奏型、新的音乐术语)时应面向全体统一讲解。另外,教师还要向不同层次学生推送分层练习内容和目标要求。比如,布置给A层任务的是流畅演奏完整乐曲(包含表情记号)+尝试用不同伴奏音型(如分解和弦)或移调演奏+分析曲式结构;布置给B层任务的是双手配合弹奏(右手旋律,左手柱式或半分解和弦伴奏音型)+关注乐句呼吸+尝试基础力度变化;而布置给C层任务的应是右手旋律视唱+右手单音旋律弹奏(确保音高节奏准确)+左手单指和弦根音弹奏(配合节拍器)。这样才能体现分层导学的作用。同时,在实施分层导学的教学策略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小助教”制,即鼓励A层优秀学生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经教师指导,协助辅导B、C层同学(如帮助识谱、检查节奏、示范动作),这既锻炼了A层学生的能力,也减轻了教师个别指导的压力,促进了学生间的互动。

2. 实施合作学习、差异互补的教学策略。对同层次学生可以安排2—4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首合奏曲(如四手联弹、双钢琴简易作品)或进行同一练习曲的相互观摩、讨论、纠错,增强归属感,相互促进;对不同层次同学应设计不同程度技能配合的任务。例如,为歌曲配伴奏:A层学生负责设计或弹奏较复杂的伴奏织体;B层学生弹奏旋律或简化伴

奏;C层学生可负责使用打击乐音色打节奏或演唱。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体验合作的乐趣。

3. 实施技术赋能、精准反馈的教学策略。教师通过主控台监听系统,可随时监听任何一位学生的练习情况,学生戴耳机独立练习互不干扰,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实时指导或发送文字提示,实现集体课中的“准个别课”效果。另外,学生可以随时录制自己的练习片段回听,进行自我反思,教师可录制典型问题或优秀示范,在集体点评环节播放分析,使反馈更直观精准。

4. 实施分层辅导的教学策略。教师在课堂上可以有重点地巡视各层小组,对C层学生给予更多基础性的手型、识谱指导;对B层学生进行技巧细节打磨和音乐处理引导;对A层学生则提出更高要求,启发其音乐表现力和创造性思维。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分层推荐曲目库、针对性技术练习包、不同深度的音乐赏析资料、线上微课链接等,满足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拓展需求。

(四) 动态多元评价:过程为重,层级参照

课堂组织是分层教学成功的关键。充分利用数码钢琴实验室的技术优势,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策略,具体教学实施策略安排如下:

1. 实施分层导学的教学策略。讲解新技巧或布置新曲目时,教师应针对A、B、C三层分别进行要点提示、难点示范和练习要求说明。例如,讲解“跳音”时,C层重点在于理解跳音记号并做出清晰短促的离键动作;B层强调手腕的弹性运用和不同风格跳音的区别;A层则可引入更复杂的跳音组合或探究不同时期作曲家对跳音的诠释差异,但讲授核心概念(如某种节奏型、新的音乐术语)时应面向全体统一讲解。另外,教师还要向不同层次学生推送分层练习内容和目标要求。比如,布置给A层任务的是流畅演奏完整乐曲(包含表情记号)+尝试用不同伴奏音型(如分解和弦)或移调演奏+分析曲式结构;布置给B层任务的是双手配合弹奏(右手旋律,左手柱式或半分解和弦伴奏音型)+关注乐句呼吸+尝试基础力度变化;而布置给C层任务的应是右手旋律视唱+右手单音旋律弹奏(确保音高节奏准确)+左手单指和弦根音弹奏(配合节拍器)。这样才能体现分层导学的作用。同时,在实施分层导学的教学策略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小助教”制,即鼓励A层优秀学生在完成自身任务后,经教师指导,协助辅导B、C层同学(如帮助识谱、检查节奏、示范动作),这既锻炼了A层学生的能力,也减轻了教师

个别指导的压力,促进了生生互动。

2. 实施合作学习、差异互补的教学策略。对同层次学生可以安排2—4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首合奏曲(如四手联弹、双钢琴简易作品)或进行同一练习曲的相互观摩、讨论、纠错,增强归属感,相互促进;对不同层次同学应设计不同程度技能配合的任务。例如,为歌曲配伴奏:A层学生负责设计或弹奏较复杂的伴奏织体;B层学生弹奏旋律或简化伴奏;C层学生可能负责使用打击乐音色打节奏或演唱。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体验合作的乐趣。

3. 实施技术赋能、精准反馈的教学策略。教师通过主控台监听系统,可随时监听任何一位学生的练习情况,学生戴耳机独立练习互不干扰,教师进行“一对一”的实时指导或发送文字提示,实现集体课中的“准个别课”效果。另外,学生可以随时录制自己的练习片段回听,进行自我反思,教师可录制典型问题或优秀示范,在集体点评环节播放分析,使反馈更直观精准。

4. 实施分层辅导的教学策略。教师在课堂上可以有重点地巡视各层小组,对C层学生给予更多基础性的手型、识谱指导;对B层学生进行技巧细节打磨和音乐处理引导;对A层学生则提出更高要求,启发其音乐表现力和创造性思维。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分层推荐曲目库、针对性技术练习包、不同深度的音乐赏析资料、线上微课链接等,满足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拓展需求。

经过一年的分层教学实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访谈、技能前后测对比、课堂观察记录分析等方式进行效果评估,结果显示在以下几方面效果明显:其一,技能水平提升显著,各层学生均有发展。A层学生在演奏技巧的精细度、音乐表现深度、视奏速度及即兴伴奏能力上提升明显;B层学生演奏流畅性、准确性及音乐表现意识增强;C层学生基本克服了畏难情绪,掌握了入门核心技能,能较自信地演奏简易作品。其二,学习动机与兴趣增强。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5%的学生认为分层教学使自己学习目标更明确,任务难度更适中,学习压力更合理,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得到提升。A层学生表示挑战性任务激发了学习热情;C层学生反馈“终于能跟上了”,“感觉自己也能弹好”。其三,课堂参与度与效率提高。课堂观察发现,学生无效练习时间减少,专注于自身任务的时间延长。生生互动、师生互动频率和质量提高。利用数码钢琴技术进行分层指导,使教师在有限时间内能更精准地关注到不同学生的需

求,指导更具针对性。其四,综合音乐素养得到培养。通过分层合作任务(如合奏、伴奏编配),学生不仅提升了键盘技能,在协作能力、听觉训练、音乐理解、简单创作等方面也得到了锻炼。学生对音乐学习的整体认知更为积极。

四、结论与反思

高校集体数码钢琴课程实施分层教学改革,是应对学生个体差异、提升教学实效、实现因材施教的必然选择和有效路径。本研究构建的涵盖“科学动态分层、差异化目标内容设计、灵活教学策略实施、动态多元评价反馈”的实践框架,经过一年的教学验证,在激发学生潜能、提升技能水平、增强学习动力、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等方面呈现出显著优势。在总结分层教学成效的同时,还要进行几点反思:

- (一)教师工作量与能力要求
- 分层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分层备课(设计差异化任务、准备分层资源)、课堂组织管理、动态评估记录、个别指导。教师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灵活的课堂驾驭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素养。如何有效减轻教师负担,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如共享分层教学素材库等,是持续推广的关键。
- (二)分层的科学性与动态性
- 如何制定更全面、客观、易操作的分层评估标准?如何在动态调整中既保护学生自尊心又能激发其进取心?这需要教师持续探索更精细化的评估方式和更艺术化的沟通技巧。

(三)评价体系的持续优化

如何更科学、便捷、全面地记录学生的过程性表现?如何将发展性评价理念更好地融入期末总结性评价?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评估方式。

深化高校数码钢琴分层教学改革,需提升教师分层教学理念与能力,加强相关培训和教研支持;深度开发与整合针对不同层次的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利用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探索更智能化的学生分层诊断、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和学习效果动态监测;进一步完善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兼顾层级性与发展性的评价体系;探索分层教学与模块化教学、项目式学习等其他教学模式的融合创新。

参考文献:

[1]程洁.高师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18:7.

[2]王巍.浅析高校数码钢琴教学方法创新[J].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科研,2023(5).

[3]王晗.高校数码钢琴集体课现状及改革的思考[J].艺术评鉴,2021(17):130-132.

[4]刘昕.数码钢琴集体课的优势、困境与出路[J].音乐探索,2011(1)

[5]楼悦超.钢琴集体课分层教学模式研究[J].音乐创作,2016,(11):165-167.

[6]张丹.大学钢琴副科教学形式的新方向:对美国大学音乐专业钢琴集体课的思考[J].乐府新声,2015(1).

[7]宋歌.钢琴集体课分层教学研究[J].绥化学院学报,2018(8):124-12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Stratified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 Digital Piano Group Classes

WANG Mingfeng

(Hen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piano group clas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e to students' differences in piano foundation, musical literacy, and learning ability, the "uniform progress" teaching approach struggles to meet their individualized need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faced by digital piano group classes, the author has implemented a systematic stratified teaching model, covering student stratification standards, design of stratified teaching goals and content, implementation of flexible and divers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he practical effects have been remarkable, providing a referential path for optimizing digital piano group clas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College; Digital piano; Group classes; Stratified teaching; Reform in education

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 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以郑州轻工业大学为例

赵建波,秦肖雲,田 宽,李亚坤,彭东来,张晓静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综合分析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地方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要立足自身特质,并以郑州轻工业大学为例,通过调整优化契合区域和行业发展需求的专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建设层次递进的实践平台、建强师资队伍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中心、二保障、四融合”的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路径,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新工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19

中图分类号:G642;TQ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112-06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社会发展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创新驱动。国内外实践表明,拥有一流的创新型人才是掌握创新主导权的关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3]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跃升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一、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化学工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经济总量大,产业关联度高,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中

国是世界化工产值第一大国。据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Cefic)统计,2022年中国化工企业销售额约2.39万亿欧元,占全球的44%左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化学品销售额较2021年增长34.74%;2022年全球化工行业投资额达到2732亿欧元,其中我国贡献了约45.74%的投资。全球化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长带动了化工产业投资发展,也必然急需大量化工类创新型人才。高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阵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蓄水池”,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后劲和未来。截至2024年6月,我国高等学校共计3117所,其中地方高校数量庞大,占比约95%,在为国家、地方和行业培养创新型人才中承担着重要使命^[4]。

我国化工行业存在“一热一冷”现象,“一热”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高素质化工类专业人才,“一冷”则指不少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的化工类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旧的人

收稿日期:2025-11-08

基金项目:2024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135)

作者简介:赵建波(1975—),男,河南洛阳人,博士,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催化材料设计与性能研究工作。

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和支撑国家、地方及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为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建立适应产业和科技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体系,2017 年教育部启动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成为新时代工程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也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为实现与国际工程教育的顺利接轨,我国于 2006 年启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2016 年成为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议》组织正式成员,这意味着我国培养的毕业生可在《华盛顿协议》成员国申请工程师执业资格,为我国工程制造业走向世界创造了便利条件^[5]。2018 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强调要以新工科建设为重要抓手,全面落实“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理念,持续深入推进工程教育改革,加快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6]。2024 年 5 月,我国第十四届数智化人才培养暨产教融合发展大会提出:“要锚定教育强国目标,坚持效果导向、目标导向,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大力推进高校数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在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探索构建适应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随着教育部新工科建设和“双万”计划的实施,各高校均投入专项资金,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然而,受地缘、资源等条件限制,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

(一)人才培养与区域及行业发展需求匹配度不足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显著快于专业调整周期,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例如,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以及与化工密切相关的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人才需求强劲,但高校人才培养存在较大数量缺口。此外,部分传统专业未能结合科技与产业发展及时调整专业内涵、培养目标及培养过程,导致毕业生职业能力不足,在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陈旧

课程内容与当前工程实践需求不匹配,例如无

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等重要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内容仍以 20 世纪经典理论为主,缺乏对新能源材料、生物医药、电子化学品等新兴领域的覆盖,也未及时融入重大教研成果、重大科学问题、前沿科学进展及技术成就,最新科研成果和行业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的贡献度不足;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落后,“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未完全确立,相当一部分课程仍采用“填鸭式”教学,课堂抬头率低、互动性差,项目式教学、翻转课堂、沉浸式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未得到有效应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学习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薄弱

不少课程仍以单纯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不深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落实不到位,学生学习内驱力不足,甚至存在“躺平”现象,课程的价值引领功能亟待加强;部分高校存在工科教育理科化、实践教育形式化等问题,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尤其是企业实践的机会较少,导致实践能力薄弱;部分教师仍以课本知识讲授为主,以知识为载体、以问题为导向的复杂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训练不足,对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育力度不够,同时未能有效引入学科前沿内容,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等科研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缺乏大胆质疑的精神与创新思维。

(四)教师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不足

近年来,不少地方高校师资队伍在学历、职称等方面进步显著,但仍存在工程实践经验丰富、创新能力突出的教师占比不高,师资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支撑力度不足等突出问题。^{[7][8]}一方面,许多博士毕业生“从校门到校门”直接进入职高校,且在当前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体系下,青年博士进入企业开展工程实践的意愿不强,因而缺乏企业任职经历与工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滞后,尤其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并产生深远影响的背景下,教师知识更新缓慢,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的能力亟待提升。

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如何通过优化调整专业布局与人才培养体系、重塑教育理念、改革课程体系、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完善考核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优化师资队伍等举措解决上述问题,完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重构与优化,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对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郑州轻工业大学化工类

专业主动响应国家新工科建设号召,坚持“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深化校地、校行、校企合作,以区域及化工行业需求为导向推动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构建了“一中心、二保障、四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围绕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以雄厚的师资队伍和一流的创新实践平台为保障,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赛教融合、专思融合同向发力、协同育人,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见图1、图2。



图1 “一中心、二保障、四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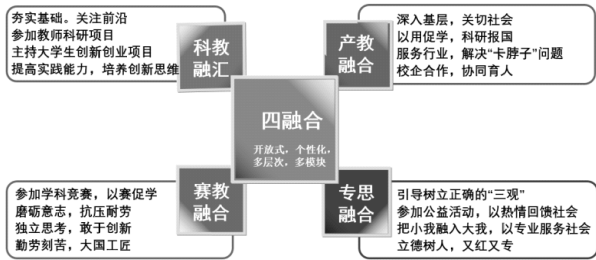


图2 “四融合”赋能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

三、新工科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与成效

(一) 对接区域和产业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阵地,专业是培养人才的基本单元。根据教育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教高〔2023〕1号)及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河南省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优化专业设置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要以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为牵引,优化专业设置,加快布局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等急需紧缺专业,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升级传统本科专业,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优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首先,结合产业需求,调整优化专业布局。郑州轻工业大学于1977年设立日用化工专业,是国内最早开设该专业的三所高校之一,后更名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在国内日用化工尤其是化妆品领域

具有较大影响力。为强化服务人民生命健康重大战略需求,学校于2022年新增化妆品技术与工程专业,传承并强化专业特色优势,彰显郑州轻工业大学的轻工特色,培养化妆品领域高水平复合型创新人才。依托学校在新能源材料等领域的深厚积淀,学院于2023年增设河南省首个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后并入新能源学院),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满足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其次,强化顶层设计,构建“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四链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主动对接河南省产业链中的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深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工博研测试技术(河南)有限公司、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头部企业调研行业及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学习兄弟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经验,邀请企业技术专家、教指委委员等共同参与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专业特色优势,构建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牵引、区域和化工产业需求驱动的毕业要求,以及与之形成有效支撑的课程体系。最后,设立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微专业,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新途径与新模式。学院于2023年开设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践行个性化、小班化、导师制培养理念,单独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引导本科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研究团队,聚焦学科前沿和制约行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难题,着力培养科研能力与创新思维,探索“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新模式,培育胸怀祖国、理论基础扎实、科研能力突出、善于创新创造的拔尖创新人才。同时聚焦高分子材料与柔性电子技术交叉融合、化工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开设“柔性电子材料与技术”“智能绿色化工”微专业,搭建与企业、行业深度合作、协同育人的平台,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满足产业对柔性电子、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及智能化化工领域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 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影响学生发展最直接的中介与变量,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根据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以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简称“两性一度”)为根本抓手,着力打造“金课”,淘汰“水课”,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两性一度”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提出的课程建设核心标准,旨在通过深化课程系统建设,全面落实课程“两性一度”要求,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以郑州轻工业大学化工类专业为例,学校构建了“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自主发展模块”层次递进的课程体系,强化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注重理工融合、工工贯通,深化课程全要素改革,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首先,以价值引领为主线,强化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育人。以通识课程、专业导论课、学科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及专业实践课为载体,充分挖掘科研思维方法、科研报国、开拓创新、节能环保、安全意识、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思政元素——例如屠呦呦从发现青蒿素到优化强化、再到改进药物并以身试药的历程等,将思政案例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课程,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同频共振,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学生使命担当,培养新时代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人才^[9]。

其次,坚持 OBE 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秉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教育理念,将传统线下课堂教学重构为“课前在线学习基础知识、课堂精讲重点难点、引导分析讨论实际案例、课后开展实践教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探究式、项目式学习激活课堂活力,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与学习效果;借助课前测验、课堂测验等方式及时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实施个性化指导。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坚持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并重;加大过程性考核的种类与权重,在终结性考核中增设一定比重的非标准化综合应用性评价,提升课程挑战度。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课程数智化建设,加强课程知识图谱、问题图谱、能力图谱、课程思政图谱及 AI 助教场景建设,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与方法,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使用^[10]。

最后,坚持科研反哺教学,注重科教融汇育人^[11]。鼓励并引导中原学者、中原教学名师等牵头开展基础课与核心课程建设,为本科生授课;推动教师将学科前沿成果与最新行业实践转化为教学资源——例如将单原子催化、微填充床技术,以及学院获得的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成果“裂解乙烯碳四碳五资源高效利用酸酐类电子材料新技术”中的螺旋锥形反应器等内容融入“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教学,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以高水平科研支撑创新人才培养。近年来,学校化工类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进入国家级一流课程评审 2 门,获评省级一流课程 9 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3 门、省级本科高校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 1 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 门、省级首届通识教育示范课程 1 门。

(三) 构建一流实践平台,深化多维协同育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迫切需要实践创新能力强、综合素养高的人才。当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取决于课堂教学,更需依托高水平创新实践平台。高校需持续加强实践平台建设,整合并共享校内外各类优质资源,完善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探索多元协同育人新模式。尤其针对当前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地方高校应结合自身办学定位与特色优势,加强与头部企业、行业的交流合作,与企业共建实践实习基地、校企研发中心、中试基地等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实践平台,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12]。同时营造良好竞赛氛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干,在实践中提升综合素质与能力水平。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在这方面开展了有益尝试。首先,构建层次递进、虚实结合的一流实践平台。依托学院的省级化学化工基础实验示范中心、河南省表界面科学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化工分离过程强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0 个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以及与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共建的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等,打造“基础实验中心——专业实验室——科研室——科研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实践基地”层次递进、虚实结合的一流创新实践平台。依托该平台,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如“纳米氧化锡的合成、表征与气敏特性研究”“有机二元酸的酯化反应条件优化及过程监控”等)转化为综合性实验,同时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科研活动,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实践教学中存在的潜在安全隐患、大型仪器设备偏少等问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学院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涵盖化工实验安全虚拟仿真平台、精细化工单元操作模块化虚拟仿真平台、自主研发的仪器分析虚拟仿真平台,开设化工实验操作与安全虚拟仿真实验、松香提取及精制生产工艺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原子吸收光谱虚拟实验、质谱虚拟实验、核磁共振虚拟实验等课程,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学生随时随地操作练习,提升实验技能与问题解决能力。

其次,与轻工企业深度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育人。依托学院学科专业优势,通过校友资源、科研项目合作等途径,围绕化工及相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产业技术创新等需求,由校企共同指导学生参与项目开发,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行业产业的能力。例如,学院与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长期合作,校企联合指导学生开展降冰片烯衍生物生产关键技术、质量监控方法等研究,首创直接利用混合碳五生产降冰片烯衍生物的成套工业技术并在濮阳惠成实现产业化,市场占有率达70%;与中平能化神马集团合作建成河南省环己醇催化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指导学生开展环己烯水合制环己醇新型催化体系及环己醇高效分离等技术开发,有望解决尼龙-66原料环己醇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这一过程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为学生就业拓宽了渠道。

最后,完善双创体制机制,深化赛教融合育人。学院成立双创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双创导师与师生共创团队,协同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系列竞赛、学科竞赛等赛事,保障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有序开展。结合学生学业阶段与能力特点,教师分类指导学生参加不同类型比赛。例如,大二学生可参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等;大三学生可参与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依托教学科研平台,学院每年举办化工实验大赛、化工安全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相技能大赛等活动,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校级—省级—国家级学科竞赛的梯度选拔,实现多层次、多环节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目标。近3年,学院本科生100%参与科研训练,50%以上参加学科竞赛;主持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30余项;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级奖项2项、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总决赛特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100余人次;参与申请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16件;参与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论文7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篇。

(四)政策引导多措并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高等学校要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型人才,根本在于打造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加快补齐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短板,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打造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13]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多措并举,持续加强师资队伍队伍建设。一是推进教师名师化工程。针对缺少学科领军人才的问题,制定国内外领军人才引进制度文件,一人一议,积极引进化工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到学院工作,为其配备优秀青年博士,开展有组织的教学科研活动,以此带动学科专业发展。二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纳入日常管理,在人才引进、职称评聘、岗位晋升、评优评先等工作中,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对师德师风表现优秀者优先推荐。三是为教师搭建成长平台。为青年教师配备经验丰富、教研水平高的指导教师,通过“传帮带”,帮助其站稳讲台。建立教师加入科研创新团队制度,支持教师加入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等,解决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教师提供技术、资金等支持,助力教师快速成长。四是实施教师国际化工程。鼓励教师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到国外知名高校深造、访学,开阔学术视野,提升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近3年,学院引进4名院士担任战略科学家,引进2名国家杰青担任学科特聘教授,及20余名博士等高层次人才;选派30余人次加入省博士服务团、担任科技副总,10余人次赴国外研修访学;新增中原科技领军人才等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约20人次;获评全国石油和化工教育优秀教学团队1个,教师队伍结构不断优化。

四、结束语

当前,全球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尤其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急需大批一流创新型人才。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以新工科建设为契机,秉持OBE教育理念,主动对接中原经济区建设与我国化工行业发展需求,通过优化专业布局与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平台建设、建强师资队伍等系列改革,探索构建了“一中心、二保障、四融合”的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助力5个化学化工类本科专业全部入选“双万”计划,其中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应用化学(工)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化学、环境工程入选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学生的专

业素养、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团结协作精神得到用人单位高度认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永远在路上。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深化校企合作,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培养契合区域及化工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力与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5-11-23)[2021-5-28]. http://m.cnr.cn/news/20210528/t20210528_525498856.html.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5-11-23)[2022-11-01]. 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2-11/01/c_1129089160.htm.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11-23)[2025-01-19].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4] 王超,迟耀丹,杨佳,等. 数字时代地方院校工科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J]. 高教学刊,2024(19):58-61.

[5] 田海锋,查飞,郭效军,等. 新工科背景下“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 当代化工研究,2021(19):122-124.

[6]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 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EB/OL]. (2025-11-25)[2018-10-17].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42/s3860/201810/t20181017_351890.html.

[7] 张凤宝,夏淑倩,李寿生. 问“产业需求”和“技术发展”,开展化工类专业新工科建设[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6):14-17,32.

[8] 吴雪梅,叶俊伟,潘艳秋,等. “一体两翼,四轮驱动”的化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和实践[J]. 化工高等教育,2023,40(4):13-16.

[9] 东为富,董玉明,倪邦庆,等. 融合价值观塑造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项目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J]. 化工高等教育,2021,38(5):32-35.

[10] 秦肖雲,赵建波,贾春晓,等. AI 赋能的智慧课程在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实践与探索[J]. 中州大学学报,2025,42(3):106-112.

[11] 王云鹏. 走好科教融汇育人路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J]. 中国高等教育,2023(Z2):16-19.

[12] 王丹,康雅琦,谭娅,等. 基于学科竞赛与产教融合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探讨[J]. 化工高等教育,2024,41(2):104-109.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4-08-27(001).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ultivation Path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ZHAO Jianbo, QIN Xiaoyun, TIAN Kuan, LI Yakun, PENG Donglai, ZHANG Xiaojing
(Department of Materi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vital significan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have been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ak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ing the needs of regional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 cultivation path of "one center, two guarantees and four integrations" for innovative talent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has been proposed through reforms such as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and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that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reconstructing curriculum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building hierarchically progressive practice platfor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faculty team. This path provides references and enlighten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Key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Innovative talents

某跨江既有桥的拆除及新建桥梁的设计

黎述亮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本文围绕某位于老城区、环境条件复杂的跨江桥梁工程展开研究。该桥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繁重的交通功能,同时具备较高的城市景观要求。桥梁设计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制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其一,桥梁建设需分期实施,一期工程保留既有桥维持正常通行,在其右侧新建右幅桥;待右幅桥建成并实现交通导改后,再进行既有桥的拆除与左幅桥的建设;其二,依据最新城市规划,新建桥梁需满足较既有桥更高的通航能力要求。本文在分析上述关键控制因素的基础上,从设计阶段即充分考虑方案选择的合理性与施工实施的可行性。通过对既有桥拆除方案及新建桥梁设计方案的系统介绍,明确了设计思路与关键技术路径,为类似城市桥梁改建工程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既有桥拆除;空腹式连续梁;设计方案;分期建设;市政项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20

中图分类号:U44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118-05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道路上的跨江桥梁经过多年运行,其设计标准、通行能力与桥梁结构功能往往已难以满足现代交通需求。尤其在老城区,桥梁所处环境复杂,景观约束强,对通行能力、通航条件和城市形象均有较高要求。因此,对既有桥梁的拆除与新建改造已成为城市交通更新中的重要工程形式。在该类工程中,桥梁需分期实施,以保障交通不中断;拆除旧桥结构必须兼顾安全性与施工便捷性;新建桥梁要满足更高的通航净空、景观协调性和结构耐久性等多重要求。这些控制因素在工程设计阶段就必须统筹考虑,否则后期施工极易受限或产生风险。

桥梁拆除与改建工程在国内外已有一定研究积累。Avei等^[1]讨论了非爆破拆除技术在连续梁公路桥梁上的应用过程,包括拆除顺序、设备选型及经济性分析。谢东升等^[2]以沪渝高速公路湖北段内一座拟拆除的斜腿钢架拱桥为例,从经济效

益、安全施工的角度比较了爆破法、SPMT(模块车驮运)法和切割法的优劣,为拆除工程提供重要参考。在桥梁新建与结构形式研究方面,空腹式连续梁桥凭借其轻量化、线条优美、截面通力性好等优点,逐渐被工程界所关注。卢斌等^[3]就空腹式连续刚构桥中腹板挖空率、弦梁刚度比等参数对内力分布的影响进行数值分析,为设计参数取值提供参考。然而,现有研究多数^{[4][5]}集中于新桥设计中的结构分析,对于改建中拆除-再建一体化的方案比选、景观兼顾、施工可行性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则较少。

基于此,本文依托实际工程,分析既有桥的结构特性与拆除难点,提出安全可行的拆除方案;在通航、景观、施工可行性等多重控制条件下进行桥型比选,明确最优结构形式;对选定方案进行详细结构设计与静力计算,重点研究空腹式连续梁的关键截面应力行为;设计施工组织方案,确保分期拆除与新建的互不干扰与安全性。

收稿日期:2025-09-05

作者简介:黎述亮(1985—),男,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桥梁结构的设计和研究。

2 工程概况

某桥位于城市主干道上,是连接城区南北的重要跨江通道。该桥建成时间较早,原设计标准及道路等级较低,导致当前通行能力不足,道路状况较差,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已无法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交通需求。此外,既有桥在通航净空方面亦不符合现行河道规划要求。因此,亟须对其进行改扩建,以提升通行能力及通航安全性。

该工程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如下:

- (1)道路等级:城市主干路;
- (2)设计速度:主线 60 km/h;
- (3)道路标准横断面宽度:47.5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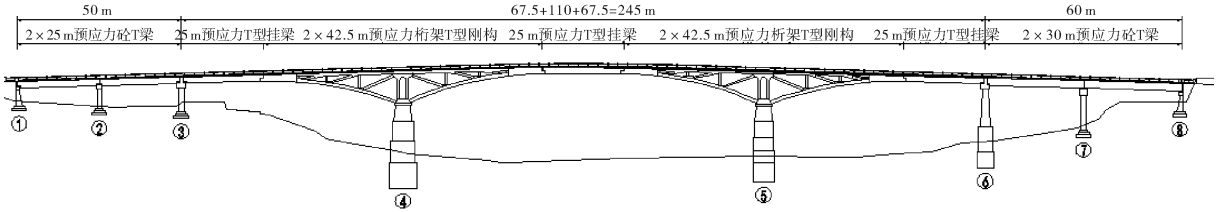


图1 既有桥桥型布置图

桁架 T 构结构上弦杆由预制空心板组成,形成整体空心箱形截面,截面高度为 0.75 m,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下弦杆由预制工字形构件组成整体空心箱形截面,高度 1.0 m,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斜腹杆与竖腹杆均采用空心箱形截面,断面尺寸为 0.65 m×1.3 m,横向均布设 4 道。其中斜腹杆为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竖腹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T 型刚构端部为整体现浇单箱六室箱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3.2 既有桥拆除方案

3.2.1 拆除重难点分析

- (1)周边环境复杂,制约因素多

既有桥位于老城区,周边建构筑物密集,各类管线错综复杂,施工空间受限。此外,拆除作业需待新桥右幅建成并将交通导改至新桥后方可进行,而新、旧桥梁间距仅约 9 m,如何在有限空间内确保既有结构、新建结构及周边构造物的安全,是方案制定需重点考虑的因素。

- (2)结构体系特殊,力矩平衡控制是关键

既有桥为 T 构桁架结构,其拆除过程,尤其是悬臂部分的拆除,将引起结构内力重分布。严格控制拆除过程中的力矩平衡,防止结构失稳,是本工程的重大技术难点,也是拆除施工监控的核心内容。

- (3)结构承载能力不足,大型设备使用受限

由于既有桥技术状况不佳,限载使用(20 吨),这严格限制了大型起重、破碎机械在桥面上的直接使用,也对拆除设备的选择、站位布置以及施工工法

- (4)地震基本烈度:Ⅶ度区,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 g;

- (5)桥梁通航等级:国家内河Ⅳ级航道标准。

3 既有桥拆除方案

3.1 既有桥结构概况

既有桥桥型布置如图 1 所示,总长为 363.36 m,引桥部分采用 25 m 和 30 m 的预应力混凝土 T 梁结构,主桥采用(67.5+110+67.5)m 三跨预应力混凝土上承式桁架 T 型刚构。主墩采用沉井基础,属重力式墩体结构,两侧主墩悬臂长度均为 42.5 m,主跨中部及边跨与主跨之间各设 25 m 长挂梁。桥面布置为 12 m 净宽车行道+双侧各 1.6 m 人行道。

提出了更高要求。

- (4)环保要求严格,施工控制标准高

桥梁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对施工过程中的扬尘、水体污染及建筑垃圾处理均有极严格的限制。拆除方案必须制定周全的环保措施,确保施工活动不对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3.2.2 拆除总体流程

该既有桥总体采用“后建先拆”的逆向施工逻辑进行拆除,即先拆除桥面系,后拆除 T 构中间挂梁,再拆除 T 构、边引桥,最后拆除下部结构。上部结构采用静力切割、分块吊装方式拆除,主桥主跨部分(4~5 号墩)使用浮吊设备,其他跨段则采用履带吊或汽车吊完成。下部结构则统一采用链锯切割后,通过履带吊完成吊装。水中作业区搭设钢平台作为操作平台,陆域区域场地硬化后供作业使用^{[6][7]}。

3.2.3 各构件拆除方案

- (1)引桥 T 梁

如图 2 所示,引桥 T 梁拆除采用“逐片切割—整体吊装”方式:首先搭设工作平台,随后使用盘锯切割梁间铰缝、链条锯切割横隔板,最后由履带吊整体吊装下放。

- (2)主桥 T 构

主桥 T 构部分按照原施工的逆序方式进行分步拆除,如图 3 所示:中跨与边跨挂梁同步切割、吊装、转运;主跨悬臂部分按对称原则依序拆除;边跨采用履带吊,主跨采用浮吊吊装至正下方平台,再运

输至岸侧临时平台进行破碎处理;T 构端部箱梁按横向划分为 7 段进行链锯切割;桁架结构上弦杆、

下弦杆纵向分为 3 段、横向 7 段切割,腹杆按单根拆除,保证分块质量满足单机吊装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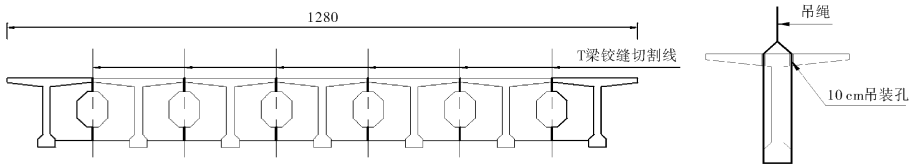


图2 引桥 T 梁拆除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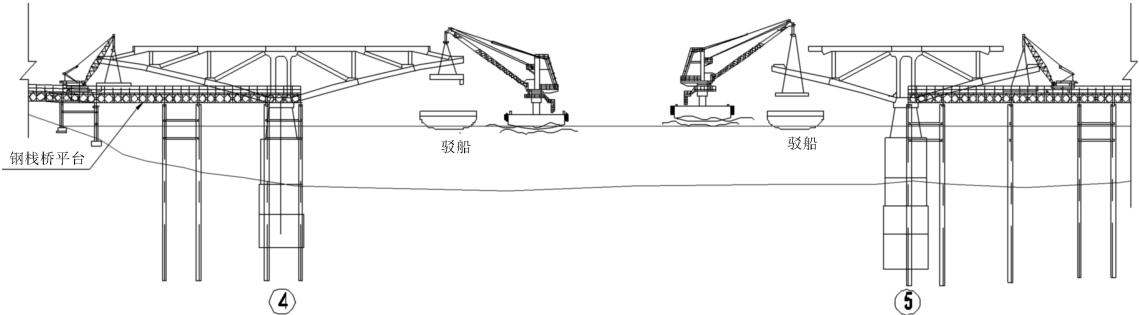


图3 主桥 T 构拆除示意图

主桥 T 构三个节段拆除过程中,在每节段下弦杆拆除前,在相邻侧设置安全绳临时锁扣,安全绳缠绕过相邻节段上弦杆后,通过钢丝绳拉住相邻下弦杆节段。

(3) 下部结构墩台

桥台部分采用液压破碎锤配合挖掘机进行逐级破碎,岸跨桥墩(2~3#)和河跨桥墩(4~7#)均采用链锯切割与履带吊吊装方式,河跨墩柱需拆除至河床泥面线,并彻底清理碎渣。

3.2.4 环保措施

桥梁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环保要求高。本项目桥梁拆除施工过程由于切割混凝土产生的废水采用流水槽集中收集,经由钢便桥上的排尿管排入位于岸边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设备,施工废水通过一体化废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排放。

对于拆除的废弃小型结构及破碎物,应进行环保型处理,散落河道矸渣子采用抓斗船打捞处理。

4 新建桥梁设计

4.1 桥型方案比选

该桥设计方案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种约束条件与控制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分期建设要求:工程需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保留既有桥维持交通通行,在其右侧新建右幅桥;右幅桥建成后转移交通至右幅新桥,再拆除既有桥,并在原址建设左幅桥。

(2)通航条件要求:依据最新城市规划与通航论证成果,新建桥的通航净宽需大于 120 m,上底宽不小于 109 m,通航净高 8 m,侧高 5 m,采用单孔双

向通航布置。

(3)城市景观要求:本项目位于城市主干道,且为跨河桥梁,桥梁造型需兼顾结构功能与城市景观协调性,提升城市形象。

由于左幅桥需在既有桥原址上新建,而原桥水中墩基础为 8 m 宽沉井,拆除难度大,因此新建桥墩应避免让既有沉井基础,并满足桩基净距及防撞安全要求。综合通航净距、结构宽度与流速因素,确定主桥通航孔跨径不小于 132 m。

考虑到两幅桥无法同期施工,若采用索塔结构体系,则需布置四索面体系,不仅景观协调性较差,且主跨跨度相对有限,经济性不足。综合技术、施工、景观与造价因素,在研究阶段提出三种可行桥型方案供比选^[8]。

方案一:空腹式变截面连续梁桥(72+132+72 m)

采用单箱双室截面,在中墩位置形成上下箱室孔洞造型。梁底线条流畅,整体形态稳重简洁,造价较低,既能满足通航与功能要求,又与既有桥的形态保持呼应。

方案二:斜撑式变截面连续梁桥(72+132+72 m)

采用单箱单室截面,悬臂长度达 6.5 m,悬臂端与腹板间设置斜撑,使桥梁立面形似拱桥,结构轻盈、动感强烈,视觉效果突出。

方案三:双层桥面连续梁桥(72+132+72 m)

采用单箱单室“Ⅱ”形截面,上层为车行道,下层为行人及非机动车通道。该方案兼顾两岸景观廊道衔接,有利于市民通行与滨江景观一体化,具有较强的社会与景观效益。

4.2 结构设计

经综合考虑,最终确定主桥采用双层桥面连续

梁桥(72+132+72m)空腹式变截面连续梁桥,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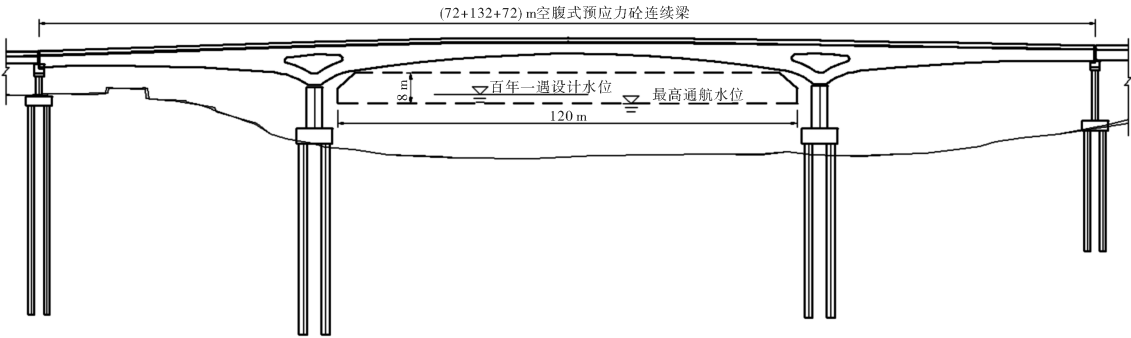


图 4 主桥设计方案

主桥上部结构为单箱双室变高度三向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梁底线采用 1.8 次抛物线渐变,距中墩支点 10.5m 处采用圆曲线与抛物线顺接,支点处为空腹箱体。全桥共分 65 个梁段;0 号块长 21 m,悬臂段共 15 节,合计 54.5 m;边跨现浇段各 6.8 m;中跨合拢段 2.0 m。

主桥单幅箱梁顶宽 23.5 m,底宽 15.5 m,悬臂长度 4 m,跨中梁高 3.0 m,支点梁高 10.2 m(约为主跨跨径的 1/12.94)。空腹上、下箱梁之间设置斜撑,高 3.5 m,中部孔洞高度 4.5 m,上箱梁高 2.2 m。

跨中顶板厚 0.3 m、底板厚 0.32 m、腹板厚 0.5 m;支点处底板厚增至 1.3 m、腹板 1.1 m。全桥设 4 道横隔梁,分别布置于中、端支点截面处。

考虑中支点处斜撑受力要求,其内设置 28 根

19-ΦS15.2 永久预应力钢束,锚固于 0 号块端部,根据施工阶段分批张拉锚固。

主墩采用实体墩,截面尺寸 15.5 × 4.0 m,迎船方向设导流倒角。承台平面尺寸 21.6 × 9.3 m,厚度 4.0 m,迎船侧设 123°倒角,每承台下布置 8 根 Φ2.2 m 端承桩。

4.3 静力计算与分析

主桥整体结构分析采用 Midas Civil 软件,按照分段悬臂施工工况进行全过程受力分析,考虑施工荷载、自重、预应力效应、徐变收缩、温差、活载、支座沉降及风荷载等因素。横向采用平面框架法分析,综合考虑自重、预应力、温度、收缩与畸变等因素。

计算结果如图 5 和 6,表明主桥各关键截面的抗弯与抗剪承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



图 5 承载力极限状态弯矩及抗力包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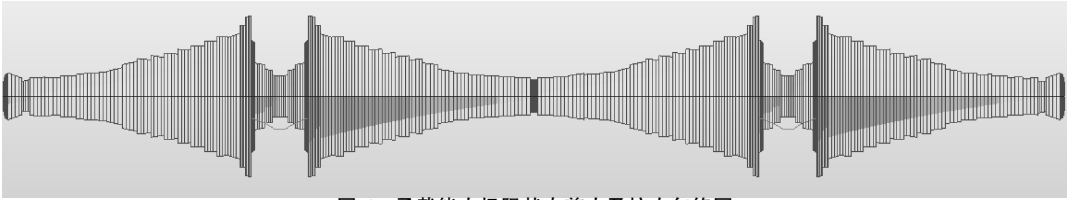


图 6 承载力极限状态剪力及抗力包络图

针对结构复杂的 0 号块空腹段,采用实体有限元建模分析其局部应力分布^[9-11]。模型在空腹上部箱梁外侧增加两节段,根据圣维南原理削弱端部加载对应力的影响^[12]。计算结果显示:空腹上部箱梁最小应力储备为 2.5 MPa,下部斜撑最大压应力为 15.5 MPa,梁腿连接部应力过渡平顺,结构安全裕度充足。

4.4 施工方案

主桥共有两主墩、两边墩。水中墩施工采用钢管

桩栈桥与水上平台相结合的方式钻孔桩作业,栈桥布置于右幅桥右侧,以满足分期施工和通航要求。

主墩承台采用钢吊箱围堰法施工,西侧边墩采用钢板桩围堰法;东侧边墩为岸上墩,采用常规明挖施工。

上部结构采用悬臂浇筑施工。由于 0 号块长度达 21 m,需在承台两侧增设水中支撑体系进行现浇并与主墩固结。挂篮施工从 0 号块起始,逐段向外悬浇至 15# 节段。施工期间设置安全防护网,防

止坠物影响通航安全。在合拢段施工时需临时实施航道管制。

0 号块施工时应重点控制斜撑及上箱梁现浇阶段的变形与应力,设置水平拉杆并实时监测结构变形,确保施工过程满足设计受力要求及规范限值。

5 结语

本桥位于老城区,跨越重要水系,是城市主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所处位置景观敏感,周边环境复杂,设计需兼顾交通功能、通航条件、施工可行性及城市景观等多重控制因素。因此,设计阶段必须统筹考虑各类影响因素,确保桥型方案的科学性与实施的可行性。

本工程需在确保通行的前提下,分期实施既有桥拆除与新桥建设。既有桥主桥结构为三向预应力上承式桁架 T 型刚构加挂梁,结构复杂、施工年代久远,拆除工程难度较大。新建桥梁方案最终选用 (72+132+72)m 空腹式变截面连续梁桥,该桥型不仅满足通航净空、施工组织及景观协调要求,其梁底线条流畅,造型稳重典雅,兼具延续性与创新性,与既有桥形成呼应与提升。

本文结合工程实际,系统阐述了既有桥拆除技术方案及新建桥梁的结构设计与施工组织思路,为今后同类城市桥梁改扩建工程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和工程借鉴。

参考文献:

[1]AVCI O,BARSOTTELLI M. Nonexplosive deconstruction of steel girder highway bridges[J]. Journal of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ed Facilities,2017,31(2): 04016087.

[2]谢东升,杨仁平,黄齐龙,等. 上跨高速公路斜腿刚架拱桥快速拆除施工技术[J]. 公路,2025,70(09):143-148.

[3]卢斌,王凯华,李高超,等. 设计参数对空腹式连续刚构桥关键截面内力的影响[J]. 公路交通科技,2014,31(12): 73-77.

[4]丁少凌,陈宏卓,南军强. 伦洲大桥主桥结构设计[J]. 桥梁建设,2012,42(02):73-78.

[5]武电坤,杨兴,朱玉. 马尾大桥跨江段主桥结构选型与设计[J]. 中外公路,2016,36(05):162-165.

[6]朱慈祥,姜传刚. 基于静力切割的混凝土箱梁桥拆除方法研究[J]. 公路,2013(01):7-12.

[7]来猛刚,陈金涛,牛宏,等. 论桥梁拆除工程[J]. 公路,2013,(09):80-83.

[8]范立础. 桥梁工程[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7.

[9]张亚东,张依睿. V 形墩连续刚构桥结构设计与分析[J].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15(5):29-33.

[10]李海涛. V 形刚构梁拱组合桥最不利位置局部受力分析[J].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2011,28(02):54-57.

[11]李晓克,刘世明. V 形墩连续刚构桥[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

[12]徐芝纶. 弹性力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李玉玲)

Demolition of an Existing River-Crossing Bridge and Design of a New One

LI Shuliang

(China Railway Siyuan Survey and Design Group CO., Ltd., Wuhan, Hubei 43006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river-crossing bridge project located in an old urban district with complex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city’s main arterial road network, the bridge not only bears heavy traffic functions but also meets high urban landscape requirements. The bridge design process is comprehensively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mainly in two aspects. First,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must be implemented in phases: Phase I retains the existing bridge to maintain normal traffic while constructing a new right-span bridge on its right side;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ight-span bridge and traffic diversion, the existing bridge will be demolished and the left-span bridge will be built.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urban planning, the new bridge must meet higher navigation capacity requirements than the existing on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key control factors, the rationality of scheme select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have been fully considered from the design stage. Through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lition scheme of the existing bridge and 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new bridge, the design thinking and key technical paths are clarifie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similar urban bridge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Keywords: Existing bridge demolition; Hollow continuous girder; Design scheme; Staged construction; Municipal bridge project

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制备及其凝胶性能研究

段冰潮¹, 屈灵鸽², 王紫薇¹, 王丽¹, 徐梦真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1.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2. 食品与健康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利用海藻酸钠的羧基和多巴胺的氨基发生酰胺缩合反应, 制备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采用红外光谱(FT-IR)、核磁共振(¹H-NMR)和紫外光谱(UV-vis)等对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结构进行表征。通过添加不同离子来分析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与离子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明胶水凝胶性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多巴胺可通过酰胺缩合反应成功接枝到海藻酸钠上, 海藻酸钠和多巴胺以不同摩尔比进行反应得到的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接枝率分别为 13.14%、16.19% 和 17.57%; 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可与 Ca²⁺、Fe³⁺、Zn²⁺ 通过螯合作用形成水凝胶, 尤其是 Ca²⁺、Fe³⁺ 的引入可以提升明胶水凝胶的硬度, 降低明胶水凝胶的弹力和黏力, 改善明胶水凝胶的质构性能。

关键词:海藻酸钠; 多巴胺; 螯合作用; 明胶; 水凝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1.021

中图分类号:TS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1-0123-06

明胶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天然绿色材料, 具有来源广泛、环境友好和成本低廉、可生物降解和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等优势^[1], 其原料来自皮革工业废料或自然界, 有效避免了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当热的明胶水溶液降至室温时, 其蛋白分子链构象会发生变化, 由无规线团结构逐渐转变为三股螺旋结构。这些三螺旋可充当交联点, 促进明胶形成水凝胶。明胶水凝胶具有可再生、成本低、易制备以及易调控等特性, 使其成为组织工程、药物递送、离子皮肤、柔性传感、创伤敷料和包装材料的良好选择。然而, 纯明胶水凝胶的力学性能往往难以满足实际需求^[2]。因此, 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对明胶水凝胶网络进行增强改性, 是当前的研究热点^[3-5]。

海藻酸钠(SA)是由β-D-甘露糖醛酸(M)和α-L-古洛糖醛酸(G)构成的一种天然多糖共聚物, 由于其具有良好的亲水性、无毒、可生物降解和生物相容性等特性^[5,6], 在生物医药、环境保护、电化学、

食品等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7,8]。海藻酸钠可与Zn²⁺、Cu²⁺和Ca²⁺等金属阳离子发生交联反应, 其中, Ca²⁺可促进海藻酸钠分子链聚集, 其与糖链中G单元的相互作用可以引起凝胶化^[9]。Fan等^[10]开发了一种由果胶、黄原胶和海藻酸钠组成的复合薄膜, 利用海藻酸钠与Ca²⁺之间的螯合作用促进糖链交联, 增强薄膜的机械性能。

海洋生物贻贝能牢固地黏附在各种礁石表面, 主要归因于其足丝蛋白中含有大量的3,4-二羟基-L-苯丙氨酸(即多巴胺)和赖氨酸, 其中多巴胺是实现黏附性能的关键因素。多巴胺又名儿茶酚乙胺或二羟基苯乙胺, 是一种邻苯二酚类氨基酸。它通过各种物理和化学相互作用如氢键、静电相互作用、π-π堆积、疏水作用、阳离子-π相互作用和金属配位作用等, 与不同类型的表面化学物质结合, 从而表现出优异的黏附性能^[11]。多巴胺的邻苯二酚基团结构可以与Zn²⁺、Fe³⁺、Cu²⁺和Mg²⁺等金属离子发生

收稿日期: 2025-06-15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多肽抑菌药物的设计合成及其活性研究”(24B150042,); 2024年度郑州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基于β-葡聚糖与核酸相互作用构建靶向递送载体及治疗结肠癌功能研究”(郑科[2024]86号); 2024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应用化学综合实验”(教高[2024]403号)

作者简介:段冰潮(1990—), 男, 河南林州人,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天然高分子改性与应用

很强的螯合作用。施冬健等^[12,13]利用多巴胺改性聚乙烯醇,通过儿茶酚的氧化络合与金属螯合性,制备了一系列 pH 敏感的非共价键交联复合水凝胶。研究表明,金属离子与邻苯二酚之间的配位作用是一种高强度的非共价相互作用,兼具类似共价键的稳定性与非共价键的动态重构能力。每个金属离子最多可形成 1~3 个交联点,从而赋予多巴胺类水凝胶良好的性能和自愈特性^[14]。

本文基于海藻酸钠上丰富的羧基官能团进行化学改性,通过羧基与多巴胺上氨基之间的缩合反应制备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并对其结构和接枝率进行表征分析。利用海藻酸钠上羧基、羟基和多巴胺上邻苯二酚结构可与离子发生螯合作用,研究 Ca^{2+} 、 Fe^{3+} 和 Zn^{2+} 对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性质的影响,同时将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和不同金属离子引入明胶水凝胶中以期改善明胶水凝胶的性能。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仪器

盐酸多巴胺(DA·HCl,98%)、N-羧基琥珀酰亚胺(NHS,98.0%)、1-乙基-(3-二甲氨基丙基)碳二亚胺盐酸盐(EDC·HCl,98.5%);海藻酸钠(Alg)、无水氯化钙(粒)、六水合三氯化铁、明胶(Ge)、氯化锌、无水乙醇,均为分析纯;透析袋(截留分子量 3500Da)。

GL124-1SCN 电子精密天平, TY2020001799 型磁力搅拌器, 98-3 型恒温磁力搅拌器, DF-101S 型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 VORTEX-5 型漩涡振荡器, MJ-10DT 型超声波清洗机, DL-1 型电子万用炉, DZF-6050 型冷冻干燥机, DZF-6053 型真空干燥箱, RE-52AA 型旋转蒸发器, FT-IR6600 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TM-1901 型观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CT3 型质构仪, 769YP-15A 型粉末压片机。

1.2 实验过程

1.2.1 海藻酸钠-多巴胺(AD)缀合物的制备:

称取海藻酸钠粉末溶于去离子水,搅拌成 1% (w/v) 淡黄色溶液,加入缩合试剂 EDC·HCl 和 NHS 并充分搅拌 1 h,然后加入适量的 DA·HCl (Alg 与 DA 的摩尔比分别为 1:0.5、1:1、1:2),体系抽真空后注入氮气,避光继续搅拌 48 h,得到淡黄色液体。将反应混合液装入 3500 Da 透析袋中透析除杂,然后旋蒸浓缩,通过液氮冷冻后使用冻干机冻干,得固体样品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AD)。

1.2.2 海藻酸钠-多巴胺水凝胶的制备

为了研究不同金属离子对海藻酸钠-多巴胺(AD)溶液成胶特性的影响,进行了以下实验。首

先,制备了浓度为 10 mg/mL 的 Alg 溶液和 30 mg/mL 的 AD 溶液,同时配制了浓度分别为 0.83 g/mL 的 CaCl_2 、2.5 g/mL 的 $\text{FeCl}_3 \cdot 6\text{H}_2\text{O}$ 以及 1.25 g/mL 的 ZnCl_2 溶液作为成胶调节剂。从 Alg 溶液中取 100 μL ,并加入 5 μL CaCl_2 溶液(体积比 20:1),形成成胶样品;同样方法处理但分别添加 Fe^{3+} 和 Zn^{2+} ,以形成对应的成胶样品,各混合物经涡旋后静置观察其形成凝胶的情况。将 100 μL AD 溶液与 5 μL CaCl_2 溶液(体积比 20:1)混合并进行涡旋 10 s 后静置观察成胶效果;采用相同实验操作,使用 Fe^{3+} 替代 Ca^{2+} ,通过对比各组样品的成胶表现,分析了不同金属离子对海藻酸钠及其与多巴胺复合体系成胶行为的具体影响。

1.2.3 明胶混合水凝胶的制备

明胶水凝胶的制备:将 2 g 明胶固体溶于 10 mL 去离子水中,使用集热式恒温磁力搅拌器在 45 $^{\circ}\text{C}$ 下搅拌制成 200 mg/mL 的黄色明胶溶液,冷却静置至完全凝胶化后,得到明胶(Ge)水凝胶。取 Alg(30 mg/mL)与 Ge(20 mg/mL)溶液,按 2:1 体积比混合,45 $^{\circ}\text{C}$ 搅拌 10 min,得 GA 溶液,静置冷却得到 GA 水凝胶。取 AD(30 mg/mL)与 Ge(20 mg/mL)溶液,按 2:1 体积比混合,45 $^{\circ}\text{C}$ 搅拌 10 min,得 GAD 溶液,静置冷却得到 GAD 水凝胶。

1.3 表征与测试

FT-IR 测试:称取海藻酸钠、多巴胺盐酸、海藻酸钠-多巴胺粉末于离心管,50 $^{\circ}\text{C}$ 真空干燥后,与溴化钾以质量比 1:100 比例混合研磨压片,4000~500 cm^{-1} 扫描。

^1H -NMR 测试:称取样品于 50 $^{\circ}\text{C}$ 真空干燥后,以 D_2O 溶解,置于核磁管内扫描测试。

UV-vis 测试:配置不同浓度的多巴胺溶液和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溶液,用紫外可见光光度计扫描,扫描范围 200~400 nm。

质构测试:将凝胶切成 $1 \times 1 \times 1 \text{ cm}^3$ 的块状样品,采用 TPA 模式进行测试。探针以 1 mm/s 速度进行两次 4 mm 的压缩,其间有返回触点过程,再回到初始位置,获取硬度、弹力、粘度等数据。

2 结果与讨论

2.1 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 FT-IR 表征

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结构通过 FT-IR 表征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海藻酸钠在 3490 cm^{-1} 处的峰为羟基的伸缩振动吸收峰,1617 cm^{-1} 和 1420 cm^{-1} 处的吸收峰归属于羧酸盐 COO^- 的不对称和对称伸缩振动,1030 cm^{-1} 处为 C-O 键的吸收峰^[15,16]。多巴胺的红外光谱中的 1498 cm^{-1} 和 1279

cm^{-1} 的吸收峰归属于苯环的 C=C 振动和 N-H 振动的重叠以及酰胺基团中 N-H 的伸缩振动,在 3347 和 3032 cm^{-1} 处是多巴胺中-OH 和 N-H 的拉伸振动吸收峰^[17]。相比 Alg,AD 缀合物-OH 伸缩振动吸收峰位移至 3419 cm^{-1} 处,并且在 3032 cm^{-1} 处未出现氨基的特征吸收,说明多巴胺的氨基被反应消耗。同时,AD 缀合物在 1743 cm^{-1} 、1507 cm^{-1} 和 1246 cm^{-1} 分别出现新的吸收带,分别归属于-CONH-中的-C=O 和-NH-的伸缩振动特征吸收峰,且 1507 cm^{-1} 处的特征峰随着多巴胺投料的增加而增强,表明海藻酸的羧基与多巴胺的氨基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酰胺键。

2.2 海藻酸钠-多巴胺的¹H-NMR 表征分析

图 2 为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的核磁氢谱图。AD 的核磁图显示,化学位移 $\delta = 3.65 \sim 3.86$

ppm 之间的峰是海藻酸钠糖环上 C1-C5 的质子峰^[6],表明 AD 缀合物中海藻酸钠的结构完整没被破坏,此外其在 6.3~6.8 ppm 处的多重峰归属于 DA 中苯环结构上的质子峰^[18],表明小分子多巴胺成功链接于海藻酸钠多糖分子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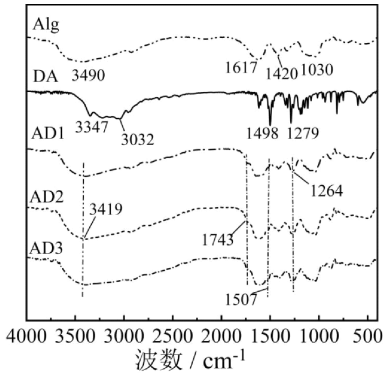


图 1 Alg、DA 和 AD 的红外光谱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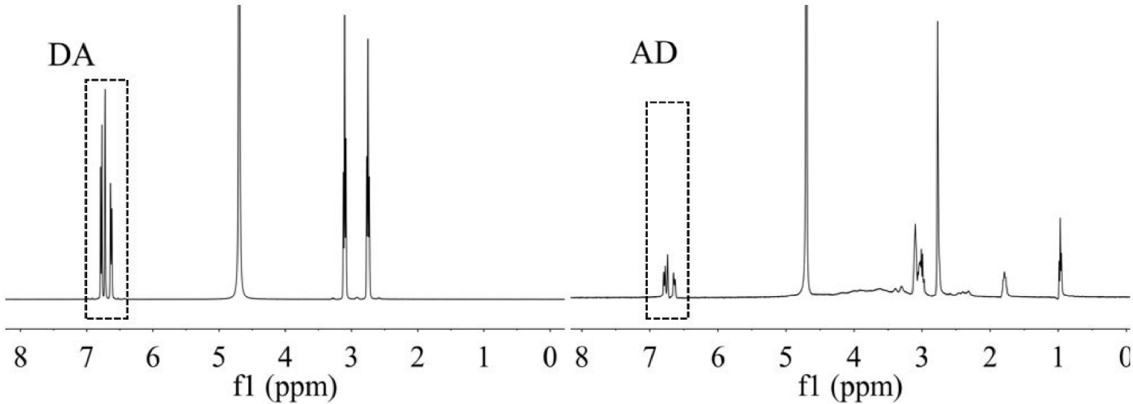


图 2 DA 和 AD 的¹H-NMR 谱图

2.3 海藻酸钠-多巴胺的 UV-vis 表征分析

海藻酸钠为多糖糖环结构,其没有特殊的紫外吸收峰,多巴胺含有苯环结构,紫外光谱中显示苯环的特定波长紫外吸收信号。如图 3a 所示,DA 在 279 nm 处有紫外吸收峰,同时 AD 在 279 nm 处也显示出多巴胺的特征吸收信号,表明多巴胺被成功地链接在海藻酸钠分子链上。

图 3b 和 3c 展示了不同浓度多巴胺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以及其浓度与最大吸光度之间的线性关系。该标准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0.0119x + 0.0133$, R^2 值为 0.9998。基于此标准曲线计算得出 AD1、AD2 和 AD3 样品的多巴胺接枝率分别为 13.14%、16.19% 和 17.57%。结果表明,随着多巴胺投料浓度的增加,其在海藻酸钠上的接枝率也随之提高。

2.4 海藻酸钠-多巴胺水凝胶的制备与红外光谱分析

海藻酸钠多糖在钙离子的交联作用下可以形成无色透明水凝胶^[19],多巴胺可以与 Ca^{2+} 、 Fe^{3+} 、 Zn^{2+}

进行交联螯合^[20],所以在 AD 样品中分别添加不同的离子,可以发挥海藻酸钠和多巴胺与离子的螯合作用,制备含有多重作用的水凝胶。结果显示,AD 在 Ca^{2+} 、 Fe^{3+} 、 $\text{Ca}^{2+}/\text{Zn}^{2+}$ 组合离子作用下均可以形成稳定水凝胶样品。

采用红外光谱对形成的水凝胶样品表征,结果如图 4 所示。Alg 中添加 Ca^{2+} 、 Fe^{3+} 、 Zn^{2+} 之后,红外光谱信号均发现不同程度的变化,说明 Ca^{2+} 、 Fe^{3+} 、 Zn^{2+} 均可以与 Alg 发生相互作用诱导凝胶的形成^[21]。Alg 添加 Ca^{2+} 之后,1250~1500 cm^{-1} 波数处的吸收峰明显减弱,说明 Ca^{2+} 成功诱导了海藻酸钠分子链进行交联形成了水凝胶,而 AD 中添加钙离子之后,其红外光谱没有明显变化,说明多巴胺的引入不影响 Alg 与 Ca^{2+} 之间的相互作用。添加 Fe^{3+} 之后,AD 在波数为 1265 cm^{-1} 处吸收峰的减弱甚至消失,表明多巴胺的邻苯二酚基与 Fe^{3+} 发生配位,形成了配位键^[22]。AD 中添加 Ca^{2+} 和 $\text{Ca}^{2+}/\text{Zn}^{2+}$ 组合离子后,凝胶样品的红外光谱一致,说明 Zn^{2+} 的引入并没有破坏 AD 与 Ca^{2+} 的交联。总之,上述结果表

明 Ca^{2+} 、 Fe^{3+} 、 $\text{Ca}^{2+}/\text{Zn}^{2+}$ 组合离子均可以诱导 AD 形成稳定的水凝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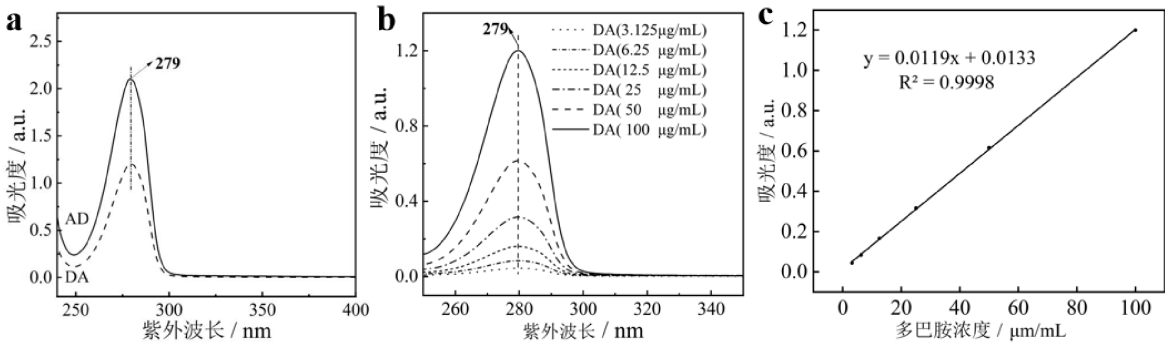


图3 (a) 多巴胺和海藻酸钠-多巴胺样品的紫外可见光吸收光谱图; (b) 不同浓度的多巴胺溶液的紫外可见光光谱; (c) 多巴胺溶液浓度-吸收强度标准曲线

2.5 明胶-海藻酸钠-多巴胺水凝胶的制备与分析

基于AD可以整合金属离子的性质,将AD掺杂于明胶中,再通过金属离子交联,可以增强明胶凝胶的强度。将凝胶样品分别浸泡于钙离子溶液和 $\text{Ca}^{2+}/\text{Fe}^{3+}$ 组合离子溶液中进行螯合交联。结果显示,Ge凝胶在离子中浸泡后溶解,这是由于 Ca^{2+} 和 Fe^{3+} 离子可以与明胶分子中的羧基和酰胺基团形成配位键,从而破坏明胶分子之间的氢键和疏水相互作用,使明胶水凝胶的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其最终溶

解。GA和GAD水凝胶经离子浸泡后没有溶解,这是由于海藻酸钠和多巴胺都可以通过螯合作用结合离子,促进GA和GAD凝胶中分子链的交联,稳定凝胶的结构,因此相比Ge凝胶其没有溶解。相比GA凝胶,GAD经离子交联后其体积变小,由于GAD中海藻酸钠和多巴胺可以同时与 Ca^{2+} 和 Fe^{3+} 发生多重螯合作用^[23],使GAD凝胶的交联度增加,导致其体积变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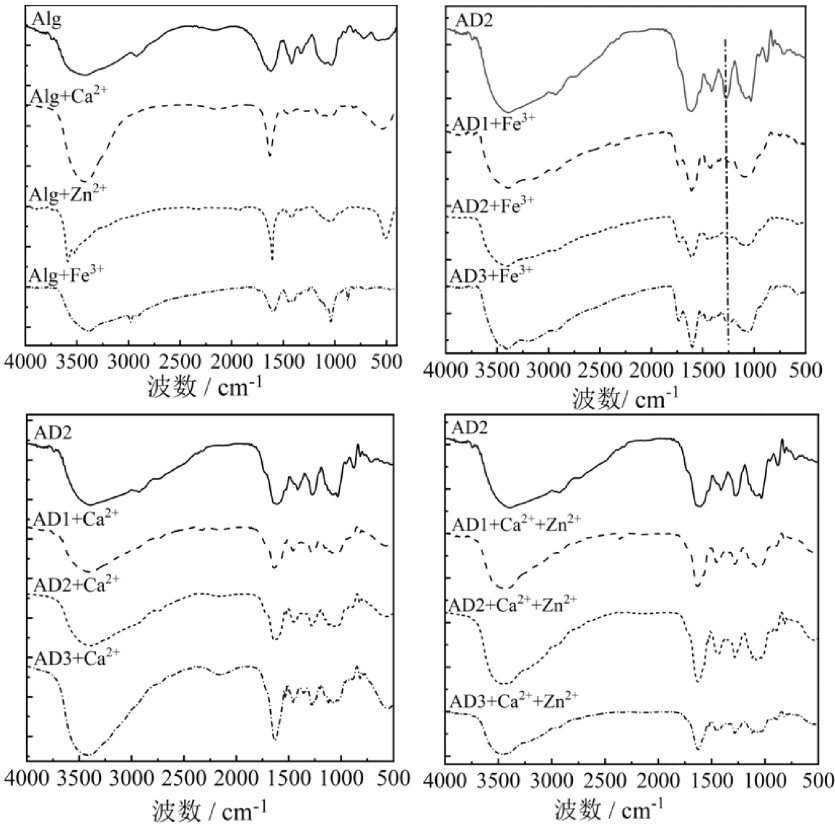


图4 海藻酸钠-多巴胺与离子相互作用的红外光谱

图5为凝胶样品的质构性能。明胶中分别添加Alg和AD,凝胶的硬度无显著变化;引入金属离子 Ca^{2+} 和 Fe^{3+} 后,凝胶样品的硬度增强2~8.4倍,其中

明胶-AD+ Ca^{2+} 凝胶的硬度最高。这是由于 Ca^{2+} 和 Fe^{3+} 与Alg和DA通过螯合作用促进分子链交联,使凝胶硬度增强;同时高离子浓度会影响明胶分子链

间的相互作用^[24],使凝胶骨架中明胶分子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凝胶的整体硬度。弹力结果显示,金属离子的引入会导致弹力的下降,这是由于 Ca^{2+} 和 Fe^{3+} 离子促进分子间交联,使凝胶的整体结构变得紧密,从而弹力下降。粘力结果显示,AD 的添加

可以提升凝胶的粘力,这是由于多巴胺的儿茶酚基团易与羟基、羧基等基团相互作用形成氢键,进而增强其粘力^[25]。添加 Ca^{2+} 和 Fe^{3+} 离子后,离子通过螯合作用消耗凝胶体系中的羧基、氨基、羟基和儿茶酚基团,导致其粘力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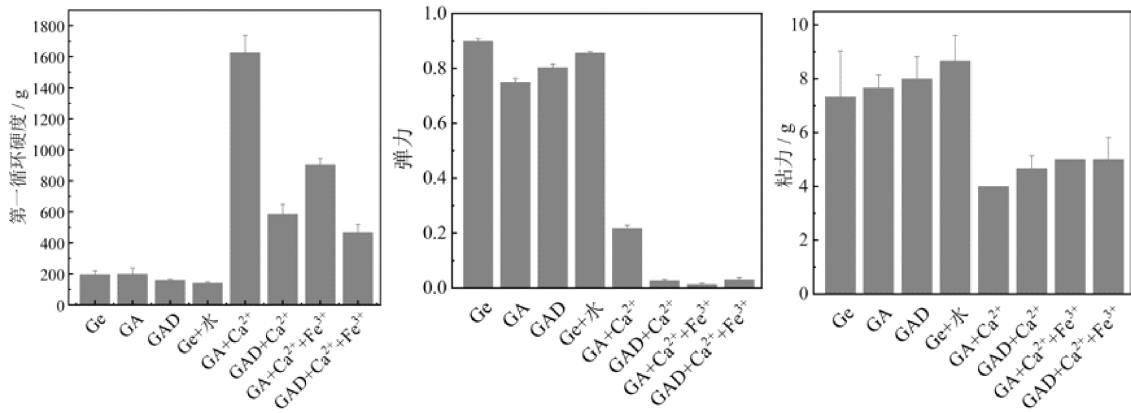


图5 海藻酸钠-多巴胺缀合物和金属离子对明胶水凝胶样品的质构性能影响

3 结论

以海藻酸钠和多巴胺作为原料,使用 1-乙基-(3-二甲基氨基丙基)碳酰二亚胺和 N-羧基琥珀酰亚胺缩合制备了 Alg-DA 缀合物。通过紫外可见光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方法表征 Alg-DA 缀合物合成成功,不同投料比获得缀合物中多巴胺的接枝率分别为 13.14%、16.19%和 17.57%。Alg-DA 缀合物可以与 Ca^{2+} 、 Fe^{3+} 、 Zn^{2+} 到发生螯合作用,在 Ca^{2+} 、 Fe^{3+} 和 $\text{Ca}^{2+}/\text{Zn}^{2+}$ 组合离子作用下均可以交联形成稳定的水凝胶。Alg-DA 缀合物和离子的引入可以改善明胶水凝胶的性质,通过海藻酸钠和多巴胺与 Ca^{2+} 、 Fe^{3+} 的离子螯合作用提升水凝胶的硬度,降低水凝胶的弹力和粘力。

参考文献:

[1] HOZUMI T, KAGEYAMA T, OHTA S, et al. Injectable hydrogel with slow degradability composed of gelatin and hyaluronic acid cross-linked by Schiff's base formation[J]. Biomacromolecules, 2018, 19(2): 288-297.

[2] 肖娅, 吴婷, 刘文涛, 等. 一种低共熔溶剂制备明胶基膜前驱液特性研究[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05): 25-31+59.

[3] WEI Z, ZHOU H, MENG Y, et al. A fully biobased tough hydrogel derived from guar gum and gelatin as a flexible sensor[J].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024, 48(30): 13577-13588.

[4] AMBAYE T G, VACCARI M, PRASAD S, et al.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s of chitosan and cellulose composite material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2, 301: 113850-113868.

[5] 姜安龙, 易晶晶, 余晓青, 等. 海藻酸钠水凝胶对尿素的缓释效果研究[J]. 现代化工, 2015, 35(07): 86-88.

[6] ZHENLE T, LIPING Z, CAIHUA N. Preparation and flocculation properties of modified alginate amphiphilic polymeric nano-flocculant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9, 26(31): 32397-32406.

[7] 吴婷, 李东泽, 孙秀英, 等. 海藻酸盐复合凝胶在骨组织工程中的研究进展[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37(02): 179-188.

[8] 陈秀琼, 王洪财, 步亚楠, 等. 电纺海藻酸盐纳米复合纤维的挑战及其生物应用趋势研究进展[J]. 精细化工, 2025, 42(02): 256-266.

[9] HECHT H, SREBNIK S.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of sodium alginate and calcium alginate [J]. Biomacromolecules, 2016, 17(6): 2160-2167.

[10] FAN Y, YANG J, DUAN A, et al. Pectin/sodium alginate/xanthan gum edible composite films as the fresh-cut pack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1, 181: 1003-1009.

[11] BAI Z, DAN W, YU G, et al. Tough and tissue-adhesive polyacrylamide/collagen hydrogel with dopamine-grafted oxidized sodium alginate as crosslinker for cutaneous wound healing[J]. RSC Advances, 2018, 8(73): 42123-42132.

[12] 林美, 万晓波, 穆有炳. 仿贻贝粘附蛋白聚合物的研究及动态[J]. 高分子通报, 2020, (01): 1-16.

[13] 施冬健, 汪飞, 刘蓉瑾, 等. 儿茶酚基聚合物-金属复合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6, 32(05): 156-160+166.

[14] 黄金鑫, 吴承伟, 余小刚, 等. 基于多巴胺的自愈水凝胶研究进展[J]. 材料导报, 2022, 36(08): 193-199.

[15] ISKANDAR L, ROJO L, SILVIO D L, et al. The effect of

- chelation of sodium alginate with osteogenic ions, calcium, zinc, and strontium [J]. *Journal of Biomaterials Applications*, 2019, 34(4): 573–584.
- [16] CHEN W, CHEN F, ZHANG Z, et 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depressant effect of sodium alginate on galena flotation in different sulfide ore collector systems [J]. *Minerals Engineering*, 2021, 160: 160106705.
- [17] 巩桂芬, 梁杰睿. 聚多巴胺改性静电纺 EVOH-SO₃Li 薄膜的热力性能 [J]. *工程塑料应用*, 2017, 45(12): 43–48.
- [18] 孟小琪, 杨霜, 余海溶, 等. 多巴胺改性海藻酸钠/聚丙烯酰胺水凝胶的制备及其性能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49(01): 33–39.
- [19] 刘涛. 海藻基水凝胶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D]. 青岛: 青岛科技大学, 2021.
- [20] 胡乐. 铁整合水凝胶伤口敷料的构建及其促愈性能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3.
- [21] 杜璐璐. 聚多巴胺及其多功能水凝胶的制备和性能研究 [D].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 2022.
- [22] 高子健. 自愈合水凝胶的制备及其在柔性应变传感方向的应用 [D]. 长春: 长春工业大学, 2020.
- [23] 吴颖嫦. 海藻酸钠-多巴胺/亚铁离子涂层的抑菌性能研究及其口腔护理应用 [D]. 无锡: 江南大学, 2022.
- [24] 暨南大学. 一种海藻酸钠-多巴胺/聚乙烯醇水凝胶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201811610730.8 [P]. 2021-09-07.
- [25] WANG W, XU Y, LI A, et al. Zinc induced polyelectrolyte coacervate bioadhesive and its transition to a self-healing hydrogel [J]. *RSC Advances*, 2015, 5(83): 66871–66878.

(责任编辑 李玉玲)

Preparation and Gel Properties of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DUAN Bingchao¹, QU Lingge², WANG Ziwei¹, WANG Li¹, XU Mengzhen¹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2. School of Food and Health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were prepared through an amide condensation reaction between the carboxyl groups of sodium alginate and the amino groups of dopam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was characterized using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proto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¹H-NMR), and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scopy (UV-vi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and metal ions, as well as their effects on the properties of gelatin hydrogels, were analyzed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i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dopamine was successfully grafted onto sodium alginate through the amide condensation reaction. The grafting ratios of the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obtained with different molar ratios of sodium alginate to dopamine were 13.14%, 16.19%, and 17.57%, respectively. The sodium alginate-dopamine conjugates could form hydrogels through chelation with Ca²⁺, Fe³⁺, and Zn²⁺. In particular, the introduction of Ca²⁺ and Fe³⁺ enhanced the hardness of the gelatin hydrogels, reduced their elasticity and adhesion, and improved their textural properties.

Keywords: Sodium alginate; Dopamine; Chelation; Gelatin; Hydrogel